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作为 意识形态的 现代化

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美] 雷迅马 / 著 牛可 / 译

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在冷战时代，美国政府和学界的相互联系与支持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当美国着手建立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兴致勃勃地要对这些经济停滞、政治衰败、文化畸形的“落后民族”施行援助和“发展指导”时，社会科学家更是得到了施展其学术专长的空间。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相信自己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能够为新兴民族国家开列出达致“发展”和“现代化”的药方。这是一度统御美国社会科学主流、也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广泛“消费”的“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社会学背景。通过细致深入的历史分析和个案研究，历史学家雷迅马揭示了：第一，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如何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第二，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自命和自信的美国社会科学，却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成为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自觉不自觉的支撑者和追随者，而这又在何等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品质和实践效用。

◆极少有著作像《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那样充分显示了思想观念在国际历史中的力量。在“新冷战史”系列丛中，它是最受欢迎的一部著作。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优美、准确、知识渊博。作为一部杰出的外交史研究著作，它显示了当外交史研究具有批判精神时，当它在广泛的历史证据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范围时，这种研究工作能做得多好。

——安德斯·史蒂芬森

<http://www.cctp.com.cn>

ISBN 7-80109-702-5



9 787801 097026 >

中央
编译
出版
社

ISBN 7-80109-702-5/D·85 定价：22.00元



作为意识形态的 现代化

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美] 雷迅马 / 著 牛可 / 译
Michael E. Latham

京权图字:01-2003-18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美)雷迅马著;
牛可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7

ISBN 7-80109-702-5

I. 作…

II. ①雷…②牛…

III. ①社会科学—研究—美国—现代②美国对外政策—第三世界—现代

IV. D8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53820号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66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译者序

在此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这部著作是美国新锐历史学者、福海姆大学副教授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的新著。该书原为作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被选入美国冷战史领袖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教授所主持的“新冷战史”(New Cold War History)系列丛书,经过作者修改,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译者在尚未联系好出版社的情况下已断然着手翻译该书,因为相信它对自己的专业研究和其他许多研究领域都有重要的价值。翻译完成后,译者收到作者寄来的一些材料,看到《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政治学评论》(*The Review of Politics*)、《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外交》(*Foreign Affairs*)、《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等八家非常重要的学术期刊都发表了对该书的介绍和评论,纷纷予以高度评价,更感到自己最初对其价值的判断是不错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后冷战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美国确立了它的“全球主义”对外政策体系和全面动员的“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后,在现代科层制和国家政治中的“技术治理”(technocracy)深化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学界的交往联系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而当美国着手建立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

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兴致勃勃地要对这些社会、经济和政治停滞衰败、智力和文化发育不良的“落后民族”施行经济援助和“发展指导”时,拥有宏大的知识和政治抱负的社会科学家更是得到施展其学术专长的空间。可以说,在美国对外政策诸领域中,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是受学院社会科学影响最大、最深的领域。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相信自己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能够为新兴民族国家开列出达致“发展”和“现代化”的药方。这是一度统御美国社会科学主流、也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广泛“消费”的“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社会学背景。

肯尼迪政府高扬美国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精神旗帜,将美国推动和“指导”第三世界发展/现代化的热情和海外发展援助活动推向巅峰,其短暂的“一千天”比战后其他时期能更充分地展现作为整体的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要素和特征。通过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历史学家雷迅马要揭示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两点远远超越了肯尼迪时期:(一)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如何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二)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自命和自信的美国社会科学,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却成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自觉不自觉的支撑者和追随者,而这又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损害了美国式社会科学的科学品质和实践效用。这项杰出的研究还向我们中国历史学者显示,批判的精神和跨学科的文献与知识基础是如何增强了历史学实证研究的经验深度和理论力度。

对于国内的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而言,这本书显示出,就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是合理、可行而又必要的;这本书还提醒我们,对于显性的和潜在的以“国家利益”和“权力”为出发点去看待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老式“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我们至少应该持有所保留的态度,因为意识形态随时随地在支撑和塑造着“权力”,而且它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规定着历

史活动主体对“利益”的认知、选择和追求。而对于国内纷纷涌向“现代化”的题目之下,对这个“概念箩筐”在学术史上的复杂意义以及它天然的缺陷和理论上的危险性缺乏必要的体察的各种研究而言,本书中有许多内容和讨论应该能够引起更多的反思,从而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复杂精致、更具有历史主义气质的现代化观。基于本书的主题和内容,想必它对美国史、社会科学思想史、拉美研究、亚洲研究等领域也有相当参考价值。

以下名字应该列在此处接受译者的诚挚感谢:

作者雷迅马博士给予译者以信任、鼓励和多方帮助,他还专为本书中文版提供了一些来自肯尼迪图书馆和约翰逊图书馆的重要图片。我的师弟赵海首先将作者赠给他的本书英文本介绍给我,并在我和作者之间牵线。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志明教授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越南语专家咸蔓雪女士不厌其烦地为我解决了翻译中的越南译名问题。我的老师和师兄、北京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董正华教授对我的翻译工作给予各种鼓励和帮助。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董经胜博士、台湾东华大学谢定中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厄文分校陈勇教授也就一些名称的译法给我提供过宝贵的帮助。我特别要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王吉胜编审,前者的推荐和后者眼光、决断使这本书的底稿迅速地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归宿。遵王吉胜先生之命,译者收集选择了一些图片,并撰写了兼有评论性质的说明。如果这些能为本书增色,这个创意完全应该归功于王吉胜先生。

翻译工作多少有些仓促,对于文中的错讹或不当之处,恭请专家读者赐教。

牛 可

北京大学畅春园

2003年1月19日

中文版序

20世纪是一个为意识形态狂热所激荡的世纪。多起革命运动、两次大规模的全球战争、欧洲殖民主义的终结、炽烈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漫长而痛苦的冷战，都受到各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思潮的深刻影响。然而，对许多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学者来说，“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一向只限于对处于美国挑战和遏制下的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家对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了探究，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目标和战略，也说明了革命理想是如何塑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坚定信念和胡志明的强大决心的。

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去考察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冷战的认知，又如何塑造了美国在冷战中使用的手段和策略，而本书就是为此而作出的一个努力。在欧洲殖民帝国崩溃、冷战的战场迅速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扩散的过程中，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做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我要指出的是，现代化理论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学说。到20世纪60年代时，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幻象，它预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的。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现代化理论似乎也成为一篇“非共产党宣言”，一种美国可以用来加速全球发展的手段，而美国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将消减激进主义的吸引力和必要性。本书探究

了这种现代化思想何以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以及当美国人用这种理论来推动欠发达世界的“民族国家建构”时所导致的后果。本书还探究了现代化理论中所蕴涵着的哪些东西反映了美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特性的感受。

我还要论证的是,现代化理论并不像它的倡导者宣称的那样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所有国家都要经历一组共同的演进阶段的思想,以及历史发展能够被加速的思想,固然也同样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图景当中。但是,现代化理论浸透着冷战高潮中美国人对自身的某种信念。现代化理论的鼓吹者一方面对此起彼伏的叛乱动荡和军事威胁感到忧心忡忡,但另一方面却也坚信美国的确处于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的终点。作为最具“现代性”的国家,作为一个克服了大萧条的国家,作为一个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国家,美国认为自己应该可以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追随和仿效的榜样。对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普通美国人而言,现代化理论最终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天定命运”观念,代表了美国人对本国的优越性和道义使命的自我感受。

然而,历史所展现出的实际状况要比美国人头脑中的景象复杂得多。民族主义、文化差异和阶级冲突所产生的力量和影响是如此巨大,远远超出美国的现代化论者的预料。在现代化者的想像中,全世界都将百川归海,不可避免地走上符合美国理想的发展道路,但是其他国家的政治行为者却在寻求属于他们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和目标界定进步的内涵。实际上,冷战史学者们现今正在对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比以往深入得多的探讨。他们提出如下问题: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以及普通群众对美国的现代化观点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如何想方设法达成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又如何确立他们自己的方法、路线的?他们接纳和包容了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哪些成分?他们又拒斥了现代化思想中的哪些东西、修改了哪些东西,以使之适应自身的

需要？进而，我们又可以就文化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获得些什么新的认识？我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将有助于激发对这些引人入胜的问题的深入探讨。

除了我在英文原版的“致谢”中提到的个人和机构，我还要向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作出努力的几个人表达谢意。我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的历史学者牛可，感谢他对本书的重视、他翻译此书的慷慨提议，以及他为这一计划的完成所付出的一切。没有他的努力，本书肯定不会以中文面世。在2000—2001学年，我有幸在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工作。这是一段使人迷恋的工作经历，我要向南京中美中心的教职员工朋友表达谢意，也要向我有幸教授、同时也使我获益匪浅的那些优秀的中国研究生们表达谢意。

M. E. 雷迅马

2003年1月6日

纽约，索默斯

加迪斯序

有意识形态要比没有意识形态使人们更容易地对待现实。意识形态为理解复杂的现实提供简单的模式。意识形态指示着历史运动的方向。意识形态靠言辞赋予行动以正当性。因为意识形态履行着这些功能,所以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吸引着各国领导者,以它们来指导行动。

冷战史学家们一直在重新评价意识形态在苏联、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以及中国的作用。新的档案材料显示,在这些国家,意识形态至少起了这样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次又一次地决定了对外政策的优先选择。

但是美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冷战时期美国有没有可与苏联相提并论的那种意识形态?雷迅马对肯尼迪政府启动的三个创举——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和越南的战略村计划——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显示各种现代化理论的确在20世纪60年代初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社会科学显著地被注入政策领域,由此这些思想观念号称可以为诊断第三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兴起的条件提供客观的基础,而且可以为采取行动消除这种条件提供客观的基础。曾有一度,这些理论变得格外有影响力。

但是雷迅马同时也揭示出:那些被认为是新的、没有感情色彩的分析工具实际上反映了一整套陈旧的、具有强烈感情内涵的文化态度,而后者可以一直追溯到天定命运观念盛行的时代。结果

是将科学和国家的使命感混合起来，这又使得美国官员分不清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因为，如果说意识形态促进行动，它也能掩盖行动的实际效果。如果现实中有某种恼人的情形，不能适合为现实所勾画的模式，那么意识形态就使这种情形模糊起来。

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已认识到，苏联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和它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雷迅马的贡献是，他向人们指出，在美国走向其最大的对外政策失败即越南战争的那些岁月里，这个国家也深受意识形态幻象的困扰。这种后果的破坏力并不像苏联及其盟友所承受的那样巨大，但是也糟糕得可以了。对于理解美国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受害者，这项新的重要研究也提供了最明晰的解释。

极少有著作像《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那样充分揭示了思想观念在国际历史中的力量。在“新冷战史”系列丛书中，它是最受欢迎的一部著作。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作者致谢

研究和写作要求进行孤独的劳动,但是仅靠我一人,这本书就永远不能脱稿。在写作的全过程,许多个人和机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肯尼迪图书馆、林登·约翰逊基金会和福海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文理研究生院的艾姆斯基金给我提供了外出收集档案资料所需的经费支持。有许多档案馆员帮助我清理研究思路、向我提供资料信息,其中约翰逊图书馆的迈克尔·帕瑞什(Michael Parrish)和肯尼迪图书馆的莫拉·波特(Maura Porter)使我受惠最多。列昂纳德·宾德(Leonard Binder)、卡尔·凯森(Carl Kaysen)、白鲁恂(Lucian Pye)、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百忙中同意接受一个历史学家的采访,回答我提出的关于过去的尖锐问题。我还得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IGCC)的一项研究奖助金,使我能够摆脱其他学术工作而专心将我的研究成果撰写成书;而我是在参加梅隆基金会赞助的两次历史学研讨会时,开始更认真的考虑意识形态的问题。本书第三章最初作为一篇论文发表于《外交史》杂志第22卷(1998年秋季号)上,我要感谢该杂志允许我将其中的材料用于本书。

我还要向几位同行表达我诚挚的谢意。我特别感激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博士生时的导师迈克尔·萨尔曼(Michael Salman),因为他推动我越来越深入地思考一系列更具挑战性、也更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他总是耐心倾听我的想法,然后帮助我厘清

概念问题,鼓励我提出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支持本书的研究计划。还有乔伊斯·艾帕尔比(Joyce Appleby)、詹姆斯·德雷克(James Drake)、弗兰克·宁柯维奇(Frank Ninkovich)、西奥多·波特(Theodore Porter)、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安德尔斯·史蒂芬斯(Anders Stephanson)和玉井真理子(Mariko Tamanoi)等,也对我关于现代化的思考提出宝贵的评论和深刻的批评。我感谢他们各位。丛书主编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仔细审阅了书稿,并提出几项眼光敏锐的建议以使表达更清晰,由此帮助我提高了本书的质量。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执行主编刘易斯·贝特曼(Lewis Bateman)熟练地操作着出版过程,并且始终以耐心和幽默指导我的修改。审稿编辑格雷丝·布尔诺科尔(Grace Buonocore)和项目编辑帕梅拉·厄普顿(Pamela Upton)自始至终都展现了他们的专业水平。我还要感谢我在福海姆大学历史学系的同事们,他们就如何在教学和研究之间达成平衡向我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的挚友、也是我从前的老师理查德·哈里森(Richard Harrison)未能亲眼看到本书便与世长辞,但是他对我的激励和对本书写作的坚定支持已使我受益无穷。

最后,我最深切的谢意要献给我的家庭。我的妻子詹尼弗·布里格斯·拉瑟姆不间断地支持我的工作,研究中每有突破即相祝贺,而且提醒我生活中还有别的事情。我的母亲南希·拉瑟姆和父亲彼德·拉瑟姆也是我最初的教师。这本书献给他们。

目 录

译者序	I
中文版序	IV
加迪斯序	VII
作者致谢	IX
第一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问题的由来	1
第二章 美国社会科学、现代化理论和冷战	33
冷战的背景	37
宏大理论	48
科学主义和国家	73
知识渊源和帝国意识形态	97

第三章	现代性、反共主义和争取进步联盟	111
第四章	以和平为目标的现代化:和平队、社区 发展和美国的使命	171
第五章	战争中的现代化:越南的反叛乱 和战略村计划	235
结 论	333
参考文献	343
附录:注释中使用的缩略词	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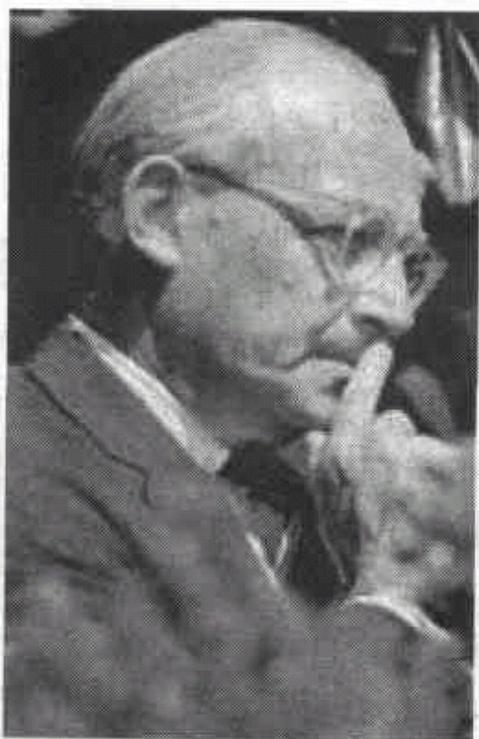
第一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问题的由来

1961年6月，美国各大学和学院忙着举行学位授予典礼，正要把它们的毕业生派出去改变这个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就在此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发表了一个独特的毕业典礼讲话。这个典礼在北卡罗莱纳州布莱格堡(Fort Bragg)举行，这位经济学家想必会感到这与他从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参加过的典礼颇有不同。这位新上任的白宫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放眼望去，看到集合在他面前的不是穿着学袍的学生、教师、管理人员和校董，而是来自20个国家的军队的80名身着戎装的军官。他们都是美国陆军特种战争学校^①反游击战战略研修班的毕业生。

虽然场景有所不同，但罗斯托还是觉得蛮自在。他相信，比起他在麻省理工院所教授的学生，他构筑的社会科学模式对他现在的听众有更大的干系。他开门见山地直切主题，省却了问候和祝贺之类的套话。他发出警告，说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所在。在古巴，在刚果，在老挝，在越南，肯尼迪政府都遭遇了危机。这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共产党——就在前几年间——又一次成功地突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停火线。这每一次危机的根源都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不同的方式来利用欠发

^① 该校在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被正式命名为约翰·肯尼迪特种战争学校。——译者

达地区的内在不稳定性”。现在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必须以各种方式迎接这个挑战，要远远超出过去有限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他们必须找到赢得战斗的手段，这种战斗“不仅要用武器来打，而且要在生活在村庄里、山冈上的人们的心灵世界中展开，还要靠掌管当地政府的人的精神和政策来打”。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直接介入，积极投身于“现代化的整个创造性进程”。^①



出生于 1916 年的罗斯托被认为是聪明绝顶、笔下生风的天才型人物，他 20 岁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此后很快在学术上成名。而且他在进入肯尼迪政府之前已经有丰富的参与政府情报和政策研究工作的经验。他不仅是罕见的高产学者，而且撰写政策建议和报告的速度也快得惊人。肯尼迪曾语带讥讽地说：“沃尔特写的比我看的还快。”

对罗斯托来说，对他的知识分子助手班子以及他们为之献计献策的决策者来说，现代化的概念远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模式。它也是一种理解全球变迁的进程的手段，还是一种用以帮助美国确定推进、引导和指导全球变迁的办法。他们担心的是，美国在二战后所拥有的史无前例的力量已经逐渐消退。欧洲帝国崩溃了，“新国家”正在形成，这对已经决心要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美国构

^① Rostow, “Countering Guerrilla Attack”, 464, 468, 471.

成可怕的挑战。在二战后的五年间，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都获得了独立。在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之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脱离了法国的殖民帝国。又过了几年后，马来亚、利比亚、苏丹、摩洛哥和突尼斯摆脱殖民统治，正式获得自由；而加纳、多哥兰^①、喀麦隆和圭亚那也紧随其后。到1960年，大约有40个新独立的国家，人口总计约达8亿。^②当这些“新兴”国家与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原有的国家一道要求国际援助以满足它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时，冷战就形成一种全球对抗的局面。许多美国决策者辩称，那些不稳定的政权、贫困而心怀不满的民众只会给马克思主义革命提供肥沃的土壤。正如杜鲁门政府的战略家保罗·尼采(Paul Nitze)及其助手在著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中所声称的，“德国的战败和英法帝国的衰落”将导致美国和苏联的竞争，而苏联这个无情的对手决心要“把它的绝对权威强加到世界其余各地”。在非殖民化所引发的动荡中，革命的势头似乎只会向前推进。^③

尽管大多数美国战略家不认为苏联会在20世纪50年代冒险搞直接军事对抗，但是他们还是确信克里姆林宫已下定决心，要一点一点地蚕食“欠发达的边缘地带”，破坏国际上对美国的信任，坚定地削弱美国努力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联盟体系。在苏联成功地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后，中国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革命，而朝鲜战争带来巨大的心理震荡和人员伤亡，这些都使美国官员对全球性的社会变迁的过程越来越关切。美国在菲律宾和南越进行了干预，企图击败对其盟友的武力挑战。在危地马拉和伊朗，艾森豪

① 当时西非一地区的名称，今其西部为加纳。——译者

② LaFeber, *American Age*, 563.

③ FRUS, 1950, Vol. 1, 237—38; Sherry, *In the Shadow of War*, 128.

威尔政府采取了秘密行动,以支持颠覆左倾政府的政变;而且它在印度尼西亚也曾试图这样做。艾森豪威尔为中东的动荡局势所困扰,而且担心俄国人与埃及和叙利亚的交往,故而他还向黎巴嫩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以保护那里亲美的上层精英。在世界各地,美国向承诺采取强硬反共立场的外国领导人派拨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肯尼迪政府的政策设计者致力于制止在他们心目中由苏联推动的侵略,一心要显示魄力和决心;而且他们担心革命者会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愿望。故此他们继承了遏制政策的框架,并寻求实施这种政策的更有效办法。古巴革命,南越吴庭艳摇摇欲坠的政权,新独立的刚果逐步升级的内战,所有这些更加剧了他们的担心。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61年1月发表讲话,誓言要支持殖民地人民的“神圣”斗争,并承诺要捍卫“民族解放战争”。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新政府最大的担心。当肯尼迪本人还是参议员时,他就曾经警告要当心发展中国家的弱点。现在他已进驻椭圆形办公室,遂敦促其谋士们研究赫鲁晓夫的讲话,仔细琢磨其中的字句。他告诉手下:“你们一定要搞明白这个讲话,这是我们理解苏联的一个关键。”^①

在焦虑情绪不断加剧的环境中,各种“现代化”理论的确对希望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制定者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②这些理论是冷战初年的产品,其基础是关于全球变迁的性质以及美国与全球变迁的关系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假设。到了肯尼迪政府掌权时,就职于诸多学术中心、从事各种学科研究的一大批学者已经开始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政策建议。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包括

^① Beschloss, *Crisis Years*, 60-61.

^② 参见罗斯托作为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在《从第七层楼上展望世界》中的讨论。Rostow, *View from the Seventh Floor*, 85.



1960年,切·格瓦拉与赫鲁晓夫、毛泽东一起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这个画面显示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反抗和革命的一个普遍看法,即那些偏离现代化康庄大道的动乱都是在莫斯科和北京“煽动”与“支持”下发生的,是全球共产主义“叛乱”的组成部分。

罗斯托、白鲁恂(Lucian Pye)、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等人。他们手持社会科学的工具,对自己的理性分析力量信心十足,提倡对所谓“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进行比较评判。他们还利用大幅度增加的联邦政府的资金赞助,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所需的条件进行估定。^①在这种新兴的分析研究中,“现代化”涉及经济组织、政治结构和社会价值体系等方面一系列紧密关联的变化。他们着手研究的问题无非是要创建一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性的坐标体系,以描画全球变迁的总体状况。普林斯顿大学的西里尔·C.布莱克曾提出一个宽泛的界定:所谓“现代化”,就是“历史上演化而来的诸项制度适应迅速变化着的各种功能的过程,而这些功能反映了人类知识前所未有的巨大增加,使人类得以控制自己的环境。”^②

到20世纪60年代初,现代化进程研究终于主宰了关于国际社会变迁的各种问题的学术研究。知识分子们既为他们的理论争论不休,又对他们的学说精雕细琢,而且还将自己的思想运用于千差万别的各个地区、各个社会,所以他们的定义和模式也经常有所差异。然而,在大量学术术语的背后,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部分的那些概念都集中在以下几个互有重叠互有关联的假设之上:(1)“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互不相关,截然对立;(2)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变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3)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4)发展中社会的进步能够通过发达社会的交往而显著地加速。^③理论家们将西方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历史发

① 上述作者的重要著作包括:Rostow,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Pye,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g*; Lerner,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Almond and Coleman,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② Black,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7.

③ 关于对这些要点的类似的阐述,参见 Alexander, “Modern, Anti, Post, and Neo”, 168。

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标示出现代性较弱的社会与这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他们相信美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展现了通往真正的现代性的道路，故而强调美国能够推动“停滞的”社会步入变迁的进程。

到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关于现代化模式是否有效的争论开始产生数量浩繁的论著。一些学者们指出，相对古老的社会组织类型并不总是为现代化进程所涤荡而尽，由此他们批判那种把“现代”和“传统”截然对立起来的观念。一位批评者反驳道：“新的形态可能只增加选择的范围。巫术和医学可以并肩而立，由同一群人交替使用。”^①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还对现代化变迁的整体性观念发起挑战。有个案研究显示：社会结构经常在国家政府已经改变了的情况下保持原封不动；而且，政治参与的扩大所导致的往往不是稳定的民主政体，而是不稳定的局势，是军人政权、寡头政治、种族冲突和国内战争。随着越南战争使人们重新关注帝国主义的问题，批评者们也开始质疑这种观念：与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的联系能够加快通过“过渡阶段”的步伐。对于认为那些生活在“传统”社会里的人们能吸收技术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观点，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也将其作为一种种族中心论的假设加以拒斥。他们进而指出，与工业化世界的联系交往所产生的远非一种有益的“示范效应”，反而经常遗留下破坏和暴力的遗产。^②

不久，政治谱系中的左右两派都提出系统的挑战。在左派中，依附理论家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论证说，今天的工业国的过去与诸如拉美那样的国家的今天并不完全相同。他们声

^① Gusfiel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354.

^② 关于这方面重要的批判性历史著作，参见 Tipps, "Modernization Theory"; Nisbet,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为了完善现代化模式，亨廷顿也指出了现代化理论的一些缺点。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称,西欧和美国可能曾经也是“欠发达的”,但并不是因为那时它们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建立了剥削性的关系。世界体系理论家更对普遍性的进步道路提出直接挑战。他们强调,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跨国经济关系已经增加了工业化中心国家的财富,同时却又将边缘的卫星国锁定在对剥削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屈从位置上。从相对立的右的一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保守派思想家发起了一场“反革命”。他们认为证据不能说明富国和穷国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在扩大。他们还坚持认为,外援与各种形式的国内福利支援一样,只是阻碍了当地企业的主动精神。最近,在欢呼国家社会主义的垮台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变革力量的后冷战分析中,现代化观念又复兴了。^①

作为一种解释性图式,现代化理论显然有易受诟病之处。就这个概念在学术上究竟有多大用处,曾发生过旷日持久的争议。此外,关于这个概念的历史背景、政治功能和文化意义,也不乏其他重要而又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的问题。通过对现代化主宰学术研究的那个时期予以追溯,并且通过对它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关系的考察,我试图揭示的是,现代化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科学上的学说。我要论证的是,现代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概念框架,这个框架中融汇了美国人对美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对美国改

^① 弗兰克的著作是依附论的突出代表。Gunder Frank, *Latin America*; 另参见 Cockcroft, Johnson, and Gunder Frank, *Dependence and Underdevelopment*。世界体系理论家沃勒斯坦撰写了现代化理论的墓志铭, Immanuel Wallerstein, “Modernization”, 132-37。P. T. Bauer 领导了保守派的反攻, *Dissent on Development*。关于使现代化理论在经受磨练之后得以复兴的努力,参见 Alexander 对“新现代”理论路线的反思: “Modern, Anti, Post, and Neo”。但对现代化主题最显著的回收利用是福山的作品: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en*。以下两篇文章也对现代化概念下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综述: Sutton, “Development Ideology”; Binder, “Natural History of Development Theory”。

变世界的特定部分——即那些在物质和文化上都被认为有缺陷的地区——的能力的一组共同的假设。我将要提出的一种解释，对现代化模式在学术上的价值提出严峻的质疑。本研究还要揭示，在冷战的高潮中，社会科学在美国权力的运作和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和感受中所发挥的深刻作用。^①

我把研究的范围集中在肯尼迪时期。为此，我通过对三个基本的、互有重合的问题的讨论，考察了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如何运作的。第一，我考察了社会科学家共同体是如何在他们所生产的知识和现实政治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性的；第二，通过研究三个具体的个案，即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和越南战争期间的战略村计划，我分析了社会科学理论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最后，我探究了冷战中所宣称的这样一种看法——即美国资源将会促进贫困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现代化——是如何重塑了美国长久以来对自身国民特性的认识和理解。正如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实践所显示的那样，现代化思想与过去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强烈共鸣的。

在这些问题中我首先考察的是现代化理论在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兴起。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我发现，许多学者把他们的研究看成是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努力。与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分析过的镀金时代的社会科学家很相似，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也对找出保证他们的社会安全的办法很是关

^① 这个问题现今在社会科学史学者和关心美国对外关系的学者中都引起了巨大的兴趣。例如参见收入 Michael A. Bernstein, Stephen P. Waring, Ellen Herman, Deborah Welch Larson, Daniel Lee Kleinman, and Mark Solovey 等各位文章的专号，“The Cold War and Expert Knowledge”，*Radical History Review* 63(Fall 1995)。

心。他们也试图勾画出“美利坚共和国的未来命运”。^①但是与其前辈不同的是，他们对国家力量和本国文化的巨大优越感并没有导致他们认定自己面对的问题来自国内因素，诸如劳工风潮、经济萧条、社会激进主义。因为，美国已经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于它来说，现在它最严重的威胁似乎来自一个敌对的、颠覆性的外来意识形态。正如历史学家伊莱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等人所显示的，麦卡锡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言论显示出，想像出来的外来威胁曾在何种程度上抹杀了美国的国内文化和它的外部角色之间的界限。^②这些现代化理论家认为，二战后的年代里最主要的挑战是，找到复兴和推广美国的自由主义社会价值观、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和民主的政治结构的各种办法。他们声称，胜利取决于击败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力量，只有通过加速“传统”社会向开明进步的“现代性”转变的自然进程才能达成这一目标，而美国本身就是最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性的国度。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冷战的背景下，“真理”远不仅仅是一种大家所共同寻求的知识产品。它也被看做是“我们的武器”。^③在二战后的年代里，学术研究越来越受联邦基金的影响。而且，战时在政府和大学科学家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继续扩展，国家支持的研究项目越来越以生产有助于解决军事和战略问题的知识为目的，由此使学者们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多地以政策为取向。尽管这些经费的大部分被用于发展国防技术，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诸如卡内基公司和福特基金会之类的私

① Dorothy Ross,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xxi, xvii.

② May, *Homeward Bound*. 关于这个主题另参见 Whitfield,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Fried, *Nightmare in Red*.

③ 参见 Needell, “‘Truth Is Our Weapon’”。

人组织也支持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在“斯普特尼克”号卫星^①上天之后，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也向地区研究计划、语言训练、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投入了大量的联邦资金。^②美国官员指出，国家安全向学术界提出这样的要求，即它要拿出对实际政治有用的知识——关于世界的知识，关于如何使美国直接促进和控制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迁的知识。

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许多现代化理论家竭力创造一种将会使美国政府感到极为有用的知识。他们声称，为了对付苏联的挑战，美国所需要的正是他们能够开展的那种严格的科学研究。他们许诺，系统性的探索将能鉴别出使美国崛起为世界上最现代的国家的独特优势，也能解释导致其他社会落后的原因，还能分析出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社会革命兴起的潜在条件。他们还指出，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能够找到社会变迁的主要杠杆。美国不必坐等“较不先进”的各国人民模仿美国的业绩。客观的分析和科学的研究将向决策者显示，如何通过提供所需的物质资源和道义保护来帮助那些正在美国开辟的道路上奋斗着的人民。建设基础设施、转让技术、培训人员，乃至显示效率、长期计划、多元政治、个人纪律的好处，这些做法都将在一个深受共产主义叛乱危害的世界上推动“进步”。他们解释说，现代化将会增加美国赢得冷战的能力。而赢得那些渴望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和成就取向的社会伦理——这些都是开明而慈善的西方很久以前就已达成了的——的民族的“人心”，正是这场战争的目标。

现代化模式特别对肯尼迪政府的胃口，许多理论家蜂拥而至，

① 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译者

② Geiger, *Research and Relevant Knowledge*, 165;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65; 另参见 Rosenzweig, *Research Universities*, 111。

加入“出类拔萃之辈”的行列中。^① 比如罗斯托就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进入白宫成为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一位顾问,后来又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林肯·戈登(Lincoln Gordon)加入了肯尼迪的拉美特别小组(Latin American Task Force),成为美国驻巴西大使。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白鲁恂为国务院讲授反叛乱理论的课程,并给新建立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出谋划策。斯坦福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尤金·斯塔利(Eugene Staley)应肯尼迪之邀出任驻越南发展援助代表团团长。许多社会科学家利用个人关系,争取联邦基金,争相谋取政府决策机构中的职位。他们宣称,在这个为贫困和西方帝国的衰落所困扰着的世界上,他们的专业知识对遏制共产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关系网和个人联系固然重要,但是我在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社会科学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更值得关注。而我对这种关系进行探索时发现,现代化理论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并不总是反映特定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本来意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化体现了知识分子、官员、乃至美国公众的各组成部分所共有的、内涵更深刻、渊源更久远的一整套文化假设。社会科学所使用的辞藻,所提出的概念框架,所宣扬的思想,都体现了一种更广泛的自由国际主义观点,体现了这种观点对美国社会的性质的认知,也体现了一种认为美国可以通过投入自己的力量而引发全球大转型的信念。我必须强调,现代化理论并不是本书所分析的那些政策背后惟一的或全部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后面各章所论述的,这些政策中的每一项都是多种考虑、事件和历史力量共同作用

^① 这个说法当然来自 Halberstam, *Best and the Brightest*。本书有中译本。戴维·哈尔伯斯坦著,《出类拔萃之辈》,齐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译者

的产物。然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确反映了一种世界观,而正是在这种世界观之下,美国的战略需求和政治选择才能够被表达、被评估、被理解。

通过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来分析现代化理论及其与肯尼迪时代的发展政策的关系,我试图表明,知识和文化方面的分析能够拓宽对美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学研究。对于我所分析的三个个案,以往的批判性研究都拒斥前政府官员和肯尼迪的追随者提出的观点。一些历史学家强调顽固僵化的反共态度所造成的谬误,并痛心指出,美国决策者由于对苏联的力量过分担心,从而对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作出错误判断。还有一些学者就物质和经济力量影响肯尼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方式提出尖锐的质疑。他们声称,美国扩展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决心驱使它对任何对它的经济主宰所构成的威胁发起挑战。我相信,对意识形态和国家特性进行范围更宽、更专门的研究,能够为对“利益”——这是批评者通常已在官方的话语的背后辨识出来的——的分析引入更为广泛而复杂的分析方法,从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我并不把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仅仅作为用来赋予真实意图以正当性和条理性的宣传手法而对其摒弃不顾。相反,我要考察的正是:美国是如何把其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认识与其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推动现代化的潜力的认识联系在一起。

早期许多对肯尼迪政府政策的研究对研究材料往往不加批判分析,接受了官方对美国的发展举措所持的论调,即这都是利他主义的和有远见的努力,为的是创造除了那些热衷于暴力和压迫人之外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的社会。许多学者,其中包括那些本来就曾经充当政策制定者或者政策顾问的人,也常常在现代化理论的范式内论述肯尼迪时代的对外关系。谈及和平队,他们的论调一般都是赞扬这个组织的领导者和志愿者,把他们说成是向全球传播自由的使者。这类论著强调肯尼迪以及和平队创立者们的智

慧、决心和勇气,同时也都描述这个组织是如何把富有牺牲精神的美国人派到海外去改变世界。一些肯尼迪的崇拜者认为,是官僚机构的拖沓敷衍和管理上的失误导致这个机构成为一个“未被实现的希望”。但是所有人都在总体上认为,和平队是针对冷战做出的一种极为开明而富于想像力的反应。正如罗伯特·凯里(Robert Carey)在早先关于和平队的一部书中所讲的:“和平队固然有一长串祷告辞,但这是探险者和边疆人的祷告辞。”尽管肯尼迪是从反共产主义的角度出发宣扬和平队的理念,但是这些对和平队的描述仍然坚持认为,和平队是一项极其成功的业绩,因为它是美国的创造性和人道主义理想的体现。^①

关于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争取进步联盟,当然也不乏各种赞赏性的解释。尽管作这种解释的人有时在评估这个计划的长期效果时持悲观态度,但他们在解释这个计划的目的时却都在重复政府的说辞。在这里也有人称赞肯尼迪政府向前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尽管大多数描写争取进步联盟的著作承认,大量投人的经济援助、技术顾问、全面的发展计划,并不总是在各地产生高增长率、社会进步和民主,但它们仍然把争取进步联盟描述为一个具有真正的变革潜力的进步主义计划。诸如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之类的学者们相信,争取进步联盟已经发动了“和平革命”,以适应与根深蒂固的贫困和专制开战的需要,而他们通常以悲剧性的笔调讲述争取进步联盟的故事。列文森(Jerome Levinson)和德奥尼斯(Juan de Onís)在论著中强调官僚机构的组织不善和人浮于事;还指出林登·约翰逊强调私人投资,这背离了肯尼迪促进真正的民主的努力,而拉丁美洲的寡头没有能够将争取进步联盟提出的美好生活图景展现给当地人民。他们进

^① Carey, *Peace Corps*, viii—ix. 另参见 Redmon, *Come As You Are*; Lowther and Lucas, *Keeping Kennedy's Promise*.

而指出，这个有希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计划“迷失了方向”，最终未老先衰，不幸夭折。^①

对肯尼迪政府在越南的反叛乱计划的赞誉性历史著述，特别是那些由前官员撰写的论著，读来也使人感到像是对一项未竟事业的缅怀。他们认为这项事业如果被给予公平的机会，本来是会成功的。在前驻南越大使弗雷德里克·诺尔廷(Frederick Nolting)的回忆录中，他居然为西贡政权的残暴镇压极力辩解，认为美国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护“南越人民在没有外来强迫、武力和恐吓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这种说法固然令人讶异，但这不过是这类论著中的一个共同的主旨。罗杰·希尔斯曼当年在美国官员中是鼓吹将越南农民重新安置在战略村里的首要人物，多年后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为这种做法的深刻影响辩护。他坚持认为，如果说政府机构和对社会的政治动员对于将越共与其地方根据地分割开来是必要的，则这种做法本来是能够成功地创造一种对吴庭艳的南越国家的新的民族主义忠诚的。希尔斯曼一方面指责目光短浅的美国将领和腐败的南越官员，另一方面也认为，肯尼迪政府“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对付游击战的战略观念，一种与军事措施相结合的政治计划”，但未能“说服吴庭艳政权乃至五角大楼高层认真地将其付诸试验。”他对此痛惜不已。这些作者们都认为，美国的意图是改革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他们声称，如果给予良好

^① 小施莱辛格还声称：争取进步联盟“随着肯尼迪之死而消亡”。除了他早期在 *Thousand Days* 中的讨论外，另可参见他的“*Myth and Reality*”，71。关于类似的想法，可参见 Perloff, *Alliance for Progress: May, Problems and Prospects*；和 Rogers, *Twilight Struggle*。列文森和奥尼斯更直率大胆地指出这个计划的局限性，但他们仍认为：“争取进步联盟的民主理想是西半球的和平和发展的真正方向。”参见 Levinson and Onís, *Alliance That Lost Its Way*，该书长期以来是关于争取进步联盟的典型著作。

的条件,建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上的反叛乱本来是会发挥作用的。^①

后来的学术研究又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提出了对肯尼迪政府的目标和政策的更全面细致和更具批判性的解释。有研究认为从冷战出发考虑问题的方式引发了一种扭曲效应,从而将肯尼迪政府的计划置于“对共产主义的灵活反应”的思维定势之中。朱利叶斯·阿明(Julius Amin)认为,和平队就其创始者本心而言,当不乏某种真诚的理想主义,但它主要还是为了改善与“第三世界”那些叛乱频仍、危机四伏的地区的领导人的关系。当正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不具有政治上的可能性时,这个机构就会被用来体现美国的支持。^② 那些认为战略考量是争取进步联盟的根本动力的作者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威廉·沃克尔(William Walker)、约瑟夫·塔尔钦(Joseph Tulchin)、斯蒂芬·拉比(Stephen Rabe)和霍华德·维尔达(Howard Wiarda)都强调,反共的决心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政治决策。他们还指出,无论对肯尼迪还是约翰逊来说,争取进步联盟都不仅仅与民主和发展有关,它与卡斯特罗和反叛乱也有着至少同等重要的关系。面对拉美国家在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民主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决策者们始终为拉美存在着颠覆的危险而倍感焦虑。他们也为完全无意推行自由政府和公众福利的右翼军队提供训练。当华盛顿的官员们因为政治动荡和一再出现的激进主义而发生意见分歧时,拉丁美洲人也越来越多

^① Nolting, *From Trust to Tragedy*, 39-40, 59;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442, 512.

^② 参见 Amin, *Peace Corps in Cameroon*, 以及 Rice, *Bold Experiment*。霍夫曼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有细微差别的解释,强调美国人把自利和利他主义理解为互相补充互相加强的关系。Cobbs Hoffman, *All You Need Is Love*.

地把美国与反动而不是改革联系在一起。^①乔治·赫林(George Herring)、罗伯特·舒尔辛格(Robert Schulzinger)、乔治·卡辛(George McT. Kahin)等人对越南战争进行了细致的档案研究,他们也把肯尼迪政府对南越的理解的不足作为其战略形成的中心因素;而在这种战略中,遏制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它即使不足以造成对战争的全面投入,也足以排除各种更明智政策路线,即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或撤退的那些政策路线。肯尼迪政府的政策计划人员执迷于美国的信誉问题,将美国一步步推入战争的泥沼之中。^②

通过将美国的扩张主义目标与其对市场的持续寻求和建立经济霸权的努力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强调物质利益的历史学家从一种不同的解释框架出发,分析了肯尼迪时代的发展和反叛乱政策。尽管和平队没有像争取进步联盟和美国的反叛乱行动那样受到那么多的批评,但至少有一部著作指出,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缓解革命的压力”,同时也给那些致力于执行有意识的经济剥削的政府蒙上一张“善良的面目”。^③对保罗·多萨尔(Paul J. Dosal)及其他采纳依附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历史学家来说,争取进步联盟只不过强化了一种使美国投资者和拉美精英牺牲贫苦农民的利益而为自己谋取财富的格局。沃尔特·拉费伯尔(Walter LaFeber)和西蒙·汉森(Simon G. Hanson)专门研究了阶级利益如何以跨越国界的方式运作的问题。他们对一个“新的金元外交时代”感到痛切,认为在这个时代里公共资源被用以控制起义和维系独裁政治的现状。他们的观点是,真正的“联盟”是在外国公司和当地资产

① 参见 Walker, “Mixing the Sweet with the Sour”; Tulchin,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Rabe, “Controlling Revolutions”; Wiarda, “Misreading Latin America—Again.”

②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Schulzinger, *Time for War*; Kahin, *Intervention*.

③ Windmiller, *Peace Corps and Pax Americana*, vi, 39, 48.

阶级之间建立起来的,因为这个计划巩固了它宣称要改造的镇压性制度。^①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帕特里克·西尔登(Patrick Hearden)的批评中也遵循了这样的路线,他们将美国在越南的干预判定为一种击败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因为这种革命威胁要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收入的再分配,从而对那种在牺牲当地福利的基础上确保国际资本主义的控制的结构形成挑战。^②

尽管在写作中采用了不同的分析角度,但学者们都强调了战略方面的考虑,也强调了那些围绕着经济关系的考虑。他们都成功地发现了隐藏在言辞上的理想主义和仁爱之心背后的利益——其中既有冷战中的安全利益,又有全球资本主义所要求的经济利益。尽管他们的讨论有很多长处,但是它们仍然具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在国家政策目标形成中的作用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正如韩德(Michael H. Hunt)所指出的,从20世纪50年代的乔治·凯南和汉斯·摩根索,到20世纪80年代的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历史学家们都只关注“在追求和运用权力的过程中”“作为中心角色的国家”。在以“谈论‘国家利益’、‘关键利益’和‘国际现实’之类的不证自明的概念为特征”的分析中,美国冷战战略的批评者们对决策者在保护国家免受估计中的外来威胁

^① Dosal, "Accelerating Dependent Development", LaFeber, "Alliances in Retrospect"; Hanson, *Dollar Diplomacy Modern Style*. 拉费伯尔的另外一部著作申述了上述主题,而且它对安全本身是如何经常地在经济和物质的意义上加以界定的问题,也提出有力的说明。LaFeb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145-95。

^② 关于在经济解释框架下的总论性历史著述,参见 Hearden, *Tragedy of Vietnam*. Chomsky, *Rethinking Camelot*, 该书将肯尼迪政府的越南政策置于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加以观察,从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的过程中的成功或失败之处进行了评估。^①安德斯·史蒂芬森 (Anders Stephanson) 曾指出, 通过将“国家安全”用作一种“表面上中性的解释工具”, 这些批评冷战政策的学者们关于政策形成的历史著述也倾向于将意识形态问题排除出去。^② 关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对思想观念与国家目标和政策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漠不关心。加布里埃尔·科尔柯 (Gabriel Kolko) 就轻视“信念的宣扬”, 认为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公共关系的运作”, 而且他坚持认为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必须从“对国家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的全力追求的角度出发, 才能加以估量”。他的观点代表了这样一种倾向, 即把对市场的追求和国际贸易的逻辑作为不证自明的、不受任何障碍的和毋庸置疑的驱动力。^③

在对政府的决策和政治战略作出逻辑严密的阐述时, 许多立场观点各不相同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始终将观念和言辞与利益割裂开来——似乎国家的需要和优先目标与概念、价值观和语言毫不相干。而正是通过概念、价值和语言, 国家的需要和目标才能被理解和表达, 才能为更广大的公众所接受。他们忽视了美国人对自身的特性和历史的文化理解的作用, 由此使他们的分析简单化, 无法妥善处理弗兰克·宁科维奇 (Frank Ninkovich) 所说的

^① Hunt, “Long Crisis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 118—19. 关于这一点, 另参见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2—8. 这些作者的著作包括: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Morgenthau,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② Stephanson, “Ideology and Neorealist Mirrors”, 285. Stephanson 的另一部著作, *Kennan and the Art of Foreign Policy*, 提供了一种有洞察力的观点, 即凯南本人实际上比受他的概念框架影响的人要少一些现实主义色彩。

^③ Kolko, *Confronting the Third World*, 12, 123. 科尔柯主要关注美国外交精英的阶级利益, 以及商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他的这种观点也反映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 *Roo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如何界定利益的特定问题”。^① 就肯尼迪政府的发展政策而言，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如果说现代化有时会成为维护国际资本主义秩序的战略工具和手段，那么，它也是一种更广泛的世界观，一种由相互支持的各个观念组成的观念体系。现代化思想影响着对国家的理想、历史和使命的界定，进而往往影响着对政策目标的确定。现代化观念的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期望它能帮助美国战胜苏联的地缘政治野心，并保持美国经济扩张的机会。但是现代化也是在冷战的高潮中影响力大增，因为它与美国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假设相互呼应。

在本书中，我将现代化作为一种在不同的环境下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来加以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是一种政治工具。但在有些情况下，它又是一种分析模式，在一些幕后决策的制度环境中被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以对各种选择进行权衡，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有的时候它还是一种制造言辞的工具，被用以为特定的行动制造理由。然而，在一种不同的和更具影响力的水平上，现代化也是一种认知框架，而且经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与艾里克·方纳(Eric Foner)所说的“由一个社会集团的信仰、价值、恐惧、偏见、反思和义务感组成的系统——简言之也就是社会意识”相密切联系。^② 现代化意识形态与艾米里·罗森伯格(Emily Rosenberg)分析过的20世纪初的“自由发展主义”很相似，它的功能也远不仅

^① Ninkovich, "Interests and Discourse in Diplomatic History", 136. 宁科维奇最近探讨这个问题，他分析了自威尔逊到约翰逊的历届美国政府的“信仰系统”是如何影响了美国维护自己的国际信誉和形象的政策。参见他的 *Modernity and Power*。“统合主义的”(corporatist)解释从制度环境的角度探究利益集团的界定。这些研究追溯了美国政府和公司权力如何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结成联盟，并且指出这个联盟的兴起与如下趋势是相互关联的，即政府为确保资本主义全球秩序而推动私人企业、技术援助和经济增长。

^②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4.

仅是一种简单的“政治武器”。^①从卡尔·曼海姆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也是一种认知架构，通过这一架构，美国对自己的民族特性、使命和世界角色所达成的理解具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并且广泛流传。^②

从这个更广泛深远的观点来看，现代化就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要素，是一种为许多不同的官员、理论家和媒体所共同拥有的意识形态，其内容是关于美国这个民族、它的历史“发展”以及美国变革它周围的“欠发达”世界的能力和责任。我在思考中通过现代化概念将文化和对民族特性的自我认知与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与其他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是受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著作的影响。吉尔兹将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系统”，以及“一种公共资产，一个社会事实，而不是一套互不相关的和未被实现的那些私人情感”来对待。以此为出发点，他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如下功能，即“赋予社会状态以意义——而非如此社会情势便无法被理解，并由此解析社会状态，以便有可能在其中采取有目的的

^① Rosenberg,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7. 在罗森伯格的工作之后，又有两部著作与我采纳的那种意识形态分析相近：Packenham, *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和 Shafer, *Deadly Paradigms*. 不过，Packenham 更愿意指断他所辨析出的具体的认识架构的错误之处，而不是全面分析与探究意识形态是如何与陈旧的、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思想相联系的。而且，这两位作者都主要关注力量和战略之间的联系，因而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即发展的意识形态也与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中都表达出来的影响广泛的国家特性观念和国家使命观念紧密关联。

^② 曼海姆区分了“特殊的观念”(particular conception)和“总体的观念”(total conception)，进而指出了这里给出的意识形态的两种涵义的区别。第一种涵义即“观念(ideas)和陈述(representations)”，意指“对一种情势的真实性质或多或少自觉地加以掩饰”；曼海姆的第二种涵义则是指，“当我们考虑一个特定时代或一个特定的历史—社会集团(比如阶级)的精神结构的特征和构成时”，“我们就形成对这个时代或集团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参见 *Ideology and Utopia*, 49-53。

行动”。^① 在这种意义上,诸意识形态是从表面的混乱和迅速的变化中脱离出来而形成的,它们在复杂凌乱的信息和事件中梳理出有意义的和可以被理解的关系,使人们得以免除无所适从的状况,为未来的行动做出规划。尽管吉尔兹的这种看法不无裨益,但我也试图避免他那种因“浓墨重彩的描述”而导致的问题。阿莱塔·比尔萨克(Aletta Biersack)曾就此提出她的洞见:“意义是被描述出来的,而从来不是被推究出来的。”她解释说:“吉尔兹宣称,‘人是一种被挂在他自己编织出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吸引吉尔兹主义的是网,而不是编织的过程;是文化,而不是历史;是文本,而不是文本化的过程。”^②另一位批评家指出,试图仿效吉尔兹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把现实描绘为“一出戏,在这出戏中,关注的是符号的交换,而不是社会后果。‘阶级’、‘剥削’——最重要的是‘阶级’——之类的词汇退出了,不再成为分析的对象”。^③ 如果只在吉尔兹的意义上将现代化界定为一种文化,就无法稳妥地处理如下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学问题:意识形态之“网”随着时间变化是如何、为何、在何种条件下、在何种程度上被编织而成的?

沿着这些批判性观点的思路,我又考察了另外两个问题,即关于国家特性的问题,以及现代化与更老旧的天定命运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潜在的呼应关系问题。如果说现代化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全新的模式,那么当美国的权力在变动的环境中继续扩张时,它又是如何重新塑造和表述以往关于西方的优越性的观点的呢?在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领域里,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和沃尔特·拉费伯尔的著作影响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尽管这两位学者被批评者

① Geertz,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232, 220.

② Biersack, "Local Knowledge, Local History", 80.

③ Walters, "Signs of the Times," 553.



美国左派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就一向是美国第三世界政策的尖锐批评者。乔姆斯基说：“我之所以关心美国对外政策，是因为我发现它在总体上是令人厌恶的，而且我认为我有可能做点什么事情来修正它，至少可以减少其中最危险和最具破坏性的成分。”

贴上经济决定论者的标签,但他们都努力去把握掌权者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并指出,指导他们的那些观念乃深深植根于美国历史上对国家特性的建构之中。威廉斯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中谈到的“门户开放”,拉费伯尔在《新帝国》中谈到的帝国观,其根源都在于对特纳式的边疆的一种流布甚广的文化理解所派生出来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美国内部的生命力来源于用商业或殖民手段进行持续的扩张。^①正如威廉斯在论述起主导作用的世界观时所指出的,那些掌权者们追溯 19 世纪早期的西进运动,以便说明美国是“世界的最高希望”,并“由这个公理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美国的扩张自然地自动地‘扩展自由的领地’。”^②威廉斯和拉费伯尔指出,19 世纪初关于按照美国的设计重塑世界的主张有效地使大定命运观念得以翻新,并推动了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力量的兴起。

在对冷战年代里的类似问题的解释中,我要指出,社会科学理论和现代化政策既不是重要的知识突破,也不是全新的政治创举。这与他们的鼓吹者所宣称的观点是不同的。美国的现代化论者接续了启蒙运动对西方优越性的解释,承袭了那种认为无私而慈善的西方有必要向缺乏“先进性”的民族提供物质援助和道义监护以指导其前进的帝国主义论调,由此他们从一种从前的世界观中吸取了一些成分,来表达一种适应于自己的时代的世界观。尽管不是单纯的挪用,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无论就其知识形式还是制度形式而言,都吸收和修改了更老旧的认知系统。面对变化了的历

① Williams, *Tragedy of America Diplomacy*; LaFaber, *New Empire*. 关于对他们的工作的批判性吸收以及这些工作的影响,参见 Perkins,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威廉斯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强调特纳式的观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参见 Williams, “Frontier Thesi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② Williams,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46—47.

史条件,在不同于以往的对种族、宗教和国家任务的文化理解之下,现代化论者必须编织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语言。但是现代化理论家们在宣称只有一条通向现代性的道路具有历史的正当性时,在宣称他们自己对这条道路有着最好的理解时,他们也要老调重弹。

在我思考意识形态在历史上的延续性的问题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等思想家提出的问题也给我以特别的启示。福柯指出,维护权力地位需要“相应地建构一个知识领域”。像福柯所描述的 19 世纪的社会改革家一样,现代化理论和政策的倡导者建造了一个类型学系统,在其中“所有不同于常规的情况都必须被确定出来;它们必须被划分到各种门类中去,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遗漏”。在确定何为“发展中”世界的“缺陷”时,理论家和官员们乃是在重复以往西方对其权力的表达方式,乃是在利用政治、行政和经济控制手段去界定一个特殊的发展道路,一种“连贯性的、有既定方向的和积累性的社会时间;也就是发现一种‘进步’的意义上的进化过程”。冷战中的现代化论者和他们在启蒙运动时的先辈一样,也要排列出福柯所说的“‘进化的历史真实性’……而这注定是权力运作的一种方式”。福柯在解释启蒙运动的影响时指出,“毫无疑问,编年史、族谱、英雄事迹、帝王纪、一般纪事中的‘历史记忆’长久以来都与一种权力的形制(modality of power)联系在一起。因为有了新的征服(subjection)技术,所以有了以持续进化的‘动力学’(dynamics)取代关于盛大事件的‘朝代更替学’(dynastics)的趋势”。^① 20 世纪的美籍社会科学家和决策者声称,他们所采纳的模式是建立在关

^①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27, 98, 160. Whit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该文也对历史撰写方式与权力和权威的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于有机的自然秩序的经验的历史证据之上的,以此重塑老旧的陈述,将“现代化”界定为用以衡量全球变迁的单一变量,而且声称自己拥有对现代化变迁进行操控的权威。美国的权力在现代化实践中运作,美国的权力也由此找到通向外部世界的新渠道。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权力的制度化越来越高,影响也越来越普遍深入。^①

通过将自已的社会在社会科学中置于一个线性发展序列的终点,美国的现代化论者也在美国与其他文化——他们认为这些文化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在为模仿美国的成就而奋斗——的关系的框架内来认识他们的国家。爱德华·萨伊德在考察西方学术界对中东的“东方主义”描述时论证说,对民族特性的建构正是知识和知识的政治应用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萨伊德强调:“的确,我真正的论点是,东方主义是——而且不仅仅代表了一——现代的政治性、知识性文化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它与东方没有太多的关系,而与‘我们的’世界有更多的瓜葛。”像萨伊德所分析的东方主义者一样,美国现代化理论家、决策者和传媒都致力于为美国建立一种以“地位的优越性”为基础的特性。他们强调,“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

^① 有文化人类学家关心发展理论如何界定现代现象以及如何影响政策选择的问题方式,他们对上述主题也予以极大关注。例如参见,Ferguson, *Anti-politics Machine*;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Wood,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Policy Labeling”; Dahl and Hjort, “Development as Message and Meaning”。关于福柯和制度力量的普遍意义,参见 Young, *White Mythologies*, 5。

和文化相比”，他们的社会的特征就是独一无二的先进性。^①理论家和决策者一方面坚持认为，所有社会都经历了同样的、普遍性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他们也给他们所属的社会和他们为之分等的其他社会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他们认为差别的根源不在于地理和自然资源，也不在于帝国主义剥削的后果。他们坚持将关注的重点置于西方“理性的”、“积极的”和“成就取向的”社会价值观方面，而在解释“欠发达”世界之所以明显停滞和不能发挥潜力的原因时，他们又强化了对本民族的内在文化活力和动力的自豪感。

在冷战的背景下，现代化理论中的科学主义（scientism）也有助于老旧意识形态的重塑。现代化理论正立基于这种老旧的意识形态之上，而对其进行重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受欢迎的。美国的理论家和官员把美国的世界地位描述为一种普遍的发展进程，而且认为美国的地位又是由客观力量所决定的，也是为科学所证明了的。因此他们利用现代化意识形态营造一种美国力量在非殖民化的时代里扩张的诱人图景。罗斯托曾向肯尼迪政府的另一位策士解释说，现代化将取代殖民主义，它会创造“自由世界的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间一种新的后殖民主义的关系……随着殖民关系的终结，新的极具建设性的关系能够被建立起来……这是

^① Said, *Orientalism*, 12, 7. Stoler, “Rethinking Colonial Categories”, 该文解释了健康、教育和社会化等问题是如何被纳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分界的建构当中的，由此在帝国主义理论的架构内提出了类似的解释。坎贝尔也分析了靠确定什么是“外部的”来界定什么是“内部的”的做法，进而对冷战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新解说。他指出，通过在私人性和公共性的情境中指断外部威胁，美国决策者不断地“书写和再书写”着美国的“安全”需要和国际身份。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格雷默评述了上面那种工作，并考察了近来将后结构主义理论应用于对外关系的研究工作。Gramer, “On Poststructuralisms, Revisionisms and Cold Wars”。

一种自由人之间新的伙伴关系——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一样”。^①经过如此这般的表述，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各国独立声浪不断高涨的时代里为一个霸权的特权和权力进行宣扬的手段。社会科学家、决策者和国家媒体宣称现代化进程是美好的、普遍适用的，而且在历史和科学上都已被证明，由此他们也掩盖了美国在历史上推行帝国主义的经历。^②在这样的描述中，美国不再是一个曾经在北美搞大陆扩张的国家，也不再是一个在1898年发动帝国主义战争、为争夺菲律宾而动武的国家，反而成了一个有能力带领贫穷世界走上它自己所走过的变迁之路的进步力量。依这种看法，美国革命和罗斯福新政都成为反殖民主义的、民主的进步和改革的历史蓝图，可供奋斗中的国家效法。现代化论者借助于那种以为美国注定要成为世界领袖的老旧观念，并且对这些观念进行加工，以使之看起来似乎符合客观的历史发展图式。而且，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力量正在向美国所宣扬的主张发起尖锐挑战。

在以上对我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分析所要阐明的问题进行说明之后，我还想就有关本书的范围和观点的其他一些问题做出一些澄清。首先，读者会看到，我并不试图综述发展理论的学术史，也不试图全面详细地考察发展理论制度化的结果——肯尼迪政府的三个计划。上文已经指出，其他学者已分别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专门、细致的研究，而本文的篇幅也不允许我在这里这样做。在本书中我的目标是，通过阐明社会科学、国家特性和冷战时代的对外关系三者之间的联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我并不认为，肯尼迪时代的新举措都纯粹是现代化观念影响的结果。正如后文中将要说明

^① Memorandum, Rostow to Theodore Sorenson, March 16, 1961, NSF, box 325, "Rostow, Foreign Aid, 3/16/61 - 3/18/61". JFKL.

^② 关于这一点，参见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xvii, 8—9.

的，现代化当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它是在与人物个性、历史力量、人的经历、甚至还有突发紧急事态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发挥影响的。现代化理论本身不足以“产生”任何结果。然而，作为具体制度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它却是重大的因素之一，它赋予复杂的事件以意义，促成系统性的思维的形成。我还要指出，正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分析是批判性的，所以它不必追究肯尼迪政府的决策者及充当其策士的知识分子一方的阴谋、欺骗或“不诚实”。他们都真心相信现代化对“发展中”世界和工业化的西方都有利，而且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认为，在他们所确定的美国的目标与他们所理解的国际主义理想和利他主义之间有什么冲突。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他们那些未经质疑的想法和登峰造极的自信心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对于西方变革其文化和政治的努力，现代化的“接受方”做出的反应是千差万别的。特别是本书中关于争取进步联盟和战略村计划的两章揭示出，对现代化的不同反应中有不同政治路线在起作用，不同的反应之间的差别很大。尽管拉美的自由派强烈拥护争取进步联盟并支持其各项努力，但卡斯特罗的古巴却直截了当地拒斥它的目标和意识形态。在南越，吴庭艳要利用美援支撑其压制性政权，而民族解放阵线却发动革命以反对美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运动。阿尔伯特·梅米(Albert Memmi)、艾德瓦多·加里亚诺(Eduardo Galeano)、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等学者的分析，以及吉安·普拉卡什(Gyan Prakash)和阿荣·阿帕杜赖(Arjun Appadurai)等学者近年来的分析都显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确不可避免地受到它企图要改造和启蒙的对象的批判性检验。当代大众交往和人口迁移的力量并没有毁灭“传统”文化，也没有导致“现代”文化的一致和融合，而是在国际社会中培育出千差万别的、难以预料的和互有交错的宗教

的、种族的和集团的认同。^①实际上,现代化很少产生其倡导者在书本上所预言的那种效应。

最后我们还要认识到重要的一点: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也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认同反映在学术著作和公共政策中的现代化观点对他们国家的看法。我承认对肯尼迪政府的“发展”政策有限的批评人多没有能够挑战主导性的看法。但是另一方面,诸如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和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等激进派学者也的确曾对现代化观念发起了最初的和彻底的抨击。许多返回美国的和平队志愿者,特别是其中的非洲裔美国人,也转而拒斥华盛顿的那种说法,即美国有能力在海外创造声势浩大、广泛深入的变革和进步。^②当时,在国内“伟大社会”^③的背景下,基础广泛的社会运动对宣扬“现代化”的方式构成挑战,它们还批评联邦政府的各种计划乃是“贫困的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概念借尸还魂。20世纪60年代末,民权运动更趋激进,同时新左派兴起,这使得这些内容广泛的异议发出更有力、更公开的声音。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样的讨论是比较少的,因为当时一些根本问题还没有被提出来。而这些问题是在越南战争中才最终被推向全国性争论的中心的。

在肯尼迪时期,有一种意识形态被美国用以确定战略目标和勾画适应冷战环境的国家特性,而促进自由民主制度和加速经济发展是这种意识形态中相互强化的两个组成部分。在欧洲殖民秩

① 参见 Memmi,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Galeano,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Rodney,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Prakash, “Writing Post-Orientalist Histories”;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② 如参见 Zimmerman, “Beyond Double Consciousness”。

③ 约翰逊政府的国内政策纲领和口号。——译者



许多美国人认为肯尼迪总统身上凝聚了美国精神和理想。他本人和他的班子都有很强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重视第三世界，对海外发展援助态度积极。帮助肯尼迪竞选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这样向公众介绍这位富家子弟：“显然，肯尼迪是一位非常有头脑的人。我的意思是，他对事物的看法，都是在异乎寻常的程度上经过冷静的推理和分析得出来的。”

序崩溃的过程中,肯尼迪政府把现代化看做对共产主义的严重危险的全面反应的一部分。理论家和官员们把美国判定为一个利他主义的和仁爱善良的国度。他们相信,从民主政治、高生活水平、个人自由各方面看,这个国家都居于现代性的顶端,由此他们也就重建了老旧的、帝国式的关于美国的全球性力量的图景。单靠现代化理论并不能导致和平队、争取进步联盟和战略村。然而,现代化理论的确作为一种认知框架而发挥作用。正是通过这种认知框架,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关于美国的性格和国际角色的假设才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公众文化中落地生根。我的分析的目的不是用意识形态决定论取代“国家安全”和“资本主义需要”的决定论,而是尽可能圆满地对以往的历史解释做出补充。我不用“文化”来取代“权力”和“利益”,而是探索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正如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所指出的,美利坚帝国当然涉及政治上的遏制和市场中的垄断,但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①

^① Williams,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第二章 美国社会科学、现代化理论和冷战

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原为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后来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认为,美国学术界应该做更多的事,而不仅仅是生产供同行学者们参考和评论的新学术著作。冷战要求充分动员一个国家的智力储备,由此学者也被期望为国家效力。邦迪在1964年指出:“在我们大学的生活中,对于那些撰写这样一种历史学作品——只有当你对政治战场和置身于这个战场中的人用以思考他们的战争的方式寄予深切同情时才可能写出这种作品——的人米说是有很大空间的。”当学者们“与那些在政府里积极有为……拥有和使用权力的人从同样的立场出发”去工作时,学术界和整个国家都会受益。^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二十年里,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认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在其学术研究和为解决战略问题而创造知识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他们接受了冷战的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他们能够确定普遍变迁的根本力量,并判别出驾驭这些力量的杠杆。他们寻求使自己的学科获得更精确、更科学的地位,这可以与遏制共产主义——它在地缘政治和道义方面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努力并行不悖。正如罗斯托在其名著的结尾处所宣称的,成败的关键在于这个国家及其根本

^① Bundy, “Battlefields of Power”, 3, 9, 15.

的、特定的价值的存续。他警告说：“除非我们民主的北方充分伸张我们的道德义务，最大限度地投入我们的能量和资源，按照现实情况面对和处置经济增长阶段中出现的挑战，否则很可能没有多少人类文明可以获得拯救。”^①

对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来说，冷战成了政治学家伊拉·卡兹纳尔逊(Ira Katznelson)所说的“目的动员者”(mobilizer of purpose)，一种使他们形成自己属于“知识生产者和捍卫自由民主的阶级”的自我感觉的力量。^② 罗斯托及其学术上的同道自认为属于小阿瑟·施莱辛格等冷战知识分子所界定的“至关重要的中心”(vital center)，他们断言左翼或右翼的极端主义将把“边缘”世界引上错误的道路。他们相信，不稳定给社会革命大开方便之门。他们认为广泛接受自由价值、资本主义形态和多元主义制度是自己的国家之所以建立起深刻共识的基础，这种理解本国历史的方法成为建立一种线性发展阶段论的基准。所有社会都被纳入这种阶段图式，无论其在种族、文化和地理上有什么差异。

现代化理论家们相信，“欠发达”世界的非殖民化释放了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而这些力量需要加以疏导和控制。这就要求进行严格的社会分析。理论家们坚持认为，如果以精心整理并经常加以量化的资料为比较方法的基础，则这种比较方法将会使理解全球发展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推理问题，而更多地成为一项对确定的、客观的事实进行评估的工作。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以他们的分析工具为武器，力争应付邦迪和罗斯托所指出的那种挑战。尽管并非所有现代化框架下的从事研究的人都力求得出与政策问题有关的结论，但确有大批学者在知识生产与在各个战线上开展的冷战斗争所产生的需要之间建立紧密的关联。历史学

① Rostow,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167.

② Katznelson, "Subtl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Emergency", 236-37.



麦乔治·邦迪,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1961—1966),后来离开约翰逊政府,却又充当政府的“哲人”谋士。而他的哥哥威廉·邦迪是当时的国防部长助理。和当时的许多“冷战知识分子”一样,邦迪对自己的智力和美国改造世界的能力都极度自信。加尔布雷斯在评论肯尼迪政府中邦迪式的“冷战知识分子”时说:“他们的专业知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主要是社会背景和某种教育的产物,他们并没有周游世界,他们对本国和整个世界都一无所知。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同一个反共主义之间的区别。但这毫无影响,他们有这种神话……”

家艾伦·赫尔曼解释说,冷战知识分子“在专业责任和对国家的爱国主义义务之间,在科学进步、国家安全和国内稳定之间”建立了联系。^①

通过集中分析现代化理论的政治背景和知识根源,本章考察这种理论在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兴起。首先,本章探究美国官员是如何在冷战中“对发展”进程产生兴趣的。出于对欧洲帝国迅速瓦解和革命运动兴起的关切,决策者越来越多地寻求用美国力量来指导“新兴”世界变化的方向。本章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将现代化作为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反应来加以考察。在社会学、政治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学术领域,现代化被视为一种宏大理论,一种能够整合各种社会分析方法的共同的概念框架。尽管这个模式在人类学等其他学科里也是有影响的,但集中在这三个领域的简短学术史考察将特别提供明确清晰的例证,能说明各个不同领域里的理论家是如何形成了共同的关于社会变迁的模式。不同领域里的学者也借现代化来整合他们的研究,宣称自己在科学精确性上达到了新的水平,而且要通过参加冷战斗争而为国家服务。当社会科学家开始把现代化作为一个战略问题加以谈论时,他们在华盛顿拥有了热心的听众。最后,对于与现代化理论吸收和翻新启蒙运动思想和帝国主义观念的方式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本章也进行了考察。美国理论家与他们知识上的前辈很相似,他们在分析外部世界时也是强调本国历史上的美德、源远流长的优越性和善意干涉的权利。正如后面各章所显示的,有关现代化的思想观念远远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这些思想观念是关于美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以及美国力量能够成就什么的更大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在冷战时代对国家利益、对外关系和文化认同的建构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① Herman,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 9.

冷战的背景

现代化理论受到国家支持的影响,并以决策者面临的问题为取向,它兴起的过程伴随着官方对发展的性质和意义的兴趣不断增加。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越来越多地探究能采取什么方法将其经济资源和计划方面的专业知识用于发动欧洲和“新兴地区”的社会变迁。尽管这些努力中有的比较成功,有的不太成功,但美国在这些年的经历还是促使后来的肯尼迪政府的决策者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即现代化将被证明是在一个非殖民化的世界里对侵略性的和机会主义的对对手做出的有效反应。到1961年,冷战局势和美国新政府的决心使得现代化论者获得高度的制度影响力。当时官员们正在寻求更有新意、更有效的对付苏联挑战的方法。由此产生的那些计划当然并不是将学术理论简单而直接地转化成对外政策的结果。在各种情况下,现代化意识形态都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取得影响力,而政策的形成经常有多种动因。现代化勾画出美国人战斗的方式,甚至勾画出赢得一场危险的斗争的方式,而在这场斗争中,形象和认同对界定安全和战略至关重要。由此现代化成为美国对冷战的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肯尼迪政府在发展方面的新举措,是先前一系列将美国的经济力量用于外交目的的努力的继续。自从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山区举行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美国已与其盟国进行合作,力图保证在战后时代建立起一个稳定和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政策规划者们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将提供一个多边机制,以处理收支平衡问题,稳定货币,保障

欧洲复兴所需的贷款,向“新兴”国家提供援助。各新机构更关心的是促进生产和贸易的总量增长,而不是现有财富的再分配。新秩序反映了美国的主宰地位,而这个国家当时占有世界黄金储备的大部分,而且坚持货币体系与美元挂钩。历史学家黛安·昆兹(Diane Kunz)曾解释说:“美国超强的经济力量使得它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划确定国际组织的形态。美国的目标成了国际现实;多边主义经常成为单边主义的外衣。”^①

尽管苏联很快就表明,它不会让美国创建以市场为基础的战后秩序的期望顺利实现,但美国政策规划者还是找到了运用他们的经济力量的新方法。斯大林在整个东欧扩展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控制的同时拒绝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通过实施新的五年计划力求实现经济上的自立。苏联人坚持不加入美国主导下的秩序,而是力图重建自己的工业和军队,寻求自给自足。美国把苏联带入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的希望落空了,但是美国战略家很快就转而按照自由主义路线重建西欧,在1947年发起马歇尔计划。杜鲁门政府的决策者对共产党在意大利、法国和奥地利等国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感到忧虑,遂寄希望于经济复兴将会削弱左派的号召力,减少欧洲人民在战后的困顿中诉诸马克思主义手段的危险性。

与后来在现代化方面的尝试一样,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也是在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关于美国本国历史经验可以被移植到海外的想法之间建立相互关联的关系。如迈克尔·霍根(Michael J. Hogan)所指出,美国经济专家“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他们说,技术问题是可解决的,只要用美国的科学管理和劳资合作取代欧洲的旧式经营方式和传统的阶级斗争习惯”。他们的这

^① Kunz, *Butter and Guns*, 12. 另参见 Cohen, *America in the Age of Soviet Power*, 4—7.

种宣称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支撑。^①热衷于马歇尔计划的人宣称,专家的经济计划不仅仅为应付迫在眉睫的危机而提供援助,它也要将美国人在罗斯福新政中创建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农村电气化管理局之类的制度带到欧洲。它还要恢复繁荣,重建工业,驱动欧洲各国经济向前发展直至它们再次实现自立。当它们不再依靠美国时,它们就会重新成为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②而且这项计划的确成了一个惊人的成就。到1951年,美国向欧洲的工农业输入了120亿美元。在基础设施、政府制度和熟练劳动力方面,美援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欧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2%。^③杜鲁门和他的谋士们为这些成就欢欣鼓舞。共产主义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是杜鲁门宣称美国的努力“为全人类带来新的希望。我们已经击退了绝望情绪和失败主义。我们已经拯救了一些国家,使它们免于失去自由”。^④

在1949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杜鲁门号召采取新的举措,以对付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各国的紧迫危机。他承诺,美国将发起“一个大胆的新计划,以使我们的科学成就和工业进步的好处能够被用以推进欠发达地区的改善和增长”。^⑤杜鲁门及其下属希望,科学训练和技术援助将会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并帮助限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在1950年5月,国会通过了国际开发法(Ac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国务院设立了技术合作署(Technical Cooperation Agency)以执行这些新政策。^⑥尽管这个后来被称作“第四点”的计划并没有提出马歇尔计划那样规模庞大的项

① Hogan, *Marshall Plan*, 19.

② Kunz, *Butter and Guns*, 35.

③ Ibid., 48-49, 52.

④ 转引自 Leffler, *Preponderance of Power*, 267.

⑤ Ibid.

⑥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36.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发表其第二任期就职演说,宣告了四点政策方针,其中第四点是宣称美国要向欠发达世界提供技术援助。这是战后美国海外发展援助的开端,也是其系统的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开端。第四点可以被认为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互利国际秩序观念、传教士精神和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的混合。杜鲁门在演讲中还说:“为从海外获得利益而进行剥削的老牌的帝国主义,在我们的计划中没有立足之地。我们所设想的是一种以民主的公平对待的概念为基础的发展计划。……只要有民主就可以产生富有生气的力量,可以唤起全世界人民投入必胜的行动,不仅去反对压迫他们的人,而且反对他们自古以来的敌人——饥饿、苦难和绝望。”图为就职典礼上的杜鲁门。

目,但它仍然标志着美国开始了其指导“新兴”地区的变迁的长期努力,而这种努力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它的高峰。麦尔文·莱夫勒(Melvyn Leffler)解释说:“发展本身越来越和美国对国家安

全的思考纠缠在一起。”^①

20世纪50年代的新挑战大大增加了美国对发展进程的兴趣。当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宣布胜利之时,美国政策规划者们已经能够肯定他们所投身于其中的是一场真正全球规模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的风险极高,代价极大。1950年,被称作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的战略计划书称:“现今对自由制度的进攻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在目前权力两极化的情况下,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都是全局的失败。”^②朝鲜战争后,美国继续改变以前几乎完全将注意力放在欧洲的做法,对直接影响亚洲、拉美、中东和非洲各国的形势发展的问题给予更多关注。随着殖民帝国崩溃和新国家的“兴起”,美国官员断定,在两个对立世界体系之间的激烈竞争中,美国正面临失去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和重要的自然资源产地的危险。美国决策者制定出对付新威胁的政策,以求平衡美国与欧洲的关系。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最近解释说:“殖民主义的瓦解为苏联和中国的扩张主义创造了新机会;但是支持殖民主义却很可能加剧共产主义的扩张趋势。西方的权威似乎在分崩离析当中,但‘中苏集团’却正在巩固加强。”^③

艾森豪威尔政府担心在国际盟友和国内选民面前失去“可信度”,这驱使它对包括民族主义运动在内的各种运动发起挑战。他们认为民族主义运动蕴涵了共产主义扩张的可能性。在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遭受失败之后,美国蓄意违反日内瓦和平协议的规定,以军事援助和秘密行动支持新的南越政权。1953年,美国帮助颠覆了当时的伊朗政府,以阻止该国石油资源国有化运动;一年以后

① Leffler, *Preponderance of Power*, 291.

② FRUS, 1950, 1: 240. 关于这一时期的背景,参见 Sherry, *In the Shadow of War*, 128--29; Leffler, *Specter of Communism*, 56-96.

③ Gaddis, *We Now Know*, 154.

又导演了危地马拉的政变,阻止左倾的民族主义者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继续执政。1956年加马尔·阿布德尔·纳赛尔对英国经营的苏伊士运河实施国有化,当时艾森豪威尔反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入侵。但两年以后,美国却又派部队在黎巴嫩登陆,目的包括支持该国的保守政权,在伊拉克对抗该国的亲纳赛尔政府,宣称美国有反对“共产主义”的决心。

在“自由”和“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中,美国当局认为采取中间路线几乎完全是不可接受的。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印度尼西亚的阿赫梅德·苏加诺邀集各国举行会议,以求组成一个“不结盟运动”。与会各国拒绝了美国的军事联盟体系,并誓言要维护独立和国家主权,美国决策者对此颇为不快。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担心印度尼西亚等国会在美苏两国之间玩拉一个对付另一个的手法,而这种危险的游戏将会导致这个国家对革命敞开大门。苏加诺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一亿美元的贷款后,又通过把印尼的现存议会制度转变为他所谓的“有指导的民主制”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并宣布对新几内亚的荷兰属地拥有主权。这些都使得美国在对苏联竞争中不断遭遇挫折。^①

美国战略家把非殖民化、民族主义和西方帝国的衰落看做是在各条战线上围攻美国的危险力量,故而寻求能够对“边缘”的变化做出更多的反应。他们还力图找到控制使这些力量得以产生的根源的办法。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以对外援助来影响经济增长过程很感兴趣,在1955年建立了国际合作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作为一个统筹开发贷款的发放和美国剩余农产品出口的机构。艾森豪威尔相信,对外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与资本主义的稳固联系是阻止马克思主义侵略的最重要的防波堤。

^① Cohen, *America in the Age of Soviet Power*, 116-17.

他指出,生产力“能在世界上共产主义占优势的地方减轻压力”。^①艾森豪威尔最终也认识到,私人投资的主动性必须伴随以更为直接的政府介入。在1957年,他的政府提出为共同安全计划(Mutual Security Program)立法,目的是建立一笔数额巨大的开发贷款基金(Development Loan Fund),提供多达20亿美元的软性贷款。^②然而,即使在这冷战方兴未艾之时,推动美国各界对发展给予更多的重视也是一项困难的政治任务。由于外援计划在国內缺乏固有的支持者,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提出的动议在国会不受欢迎,他的努力经常被人打折扣。国会首先就不愿提供多年性授权,而是希望逐年审议,将该计划第一年的拨款由5亿美元削减为3.5亿美元。^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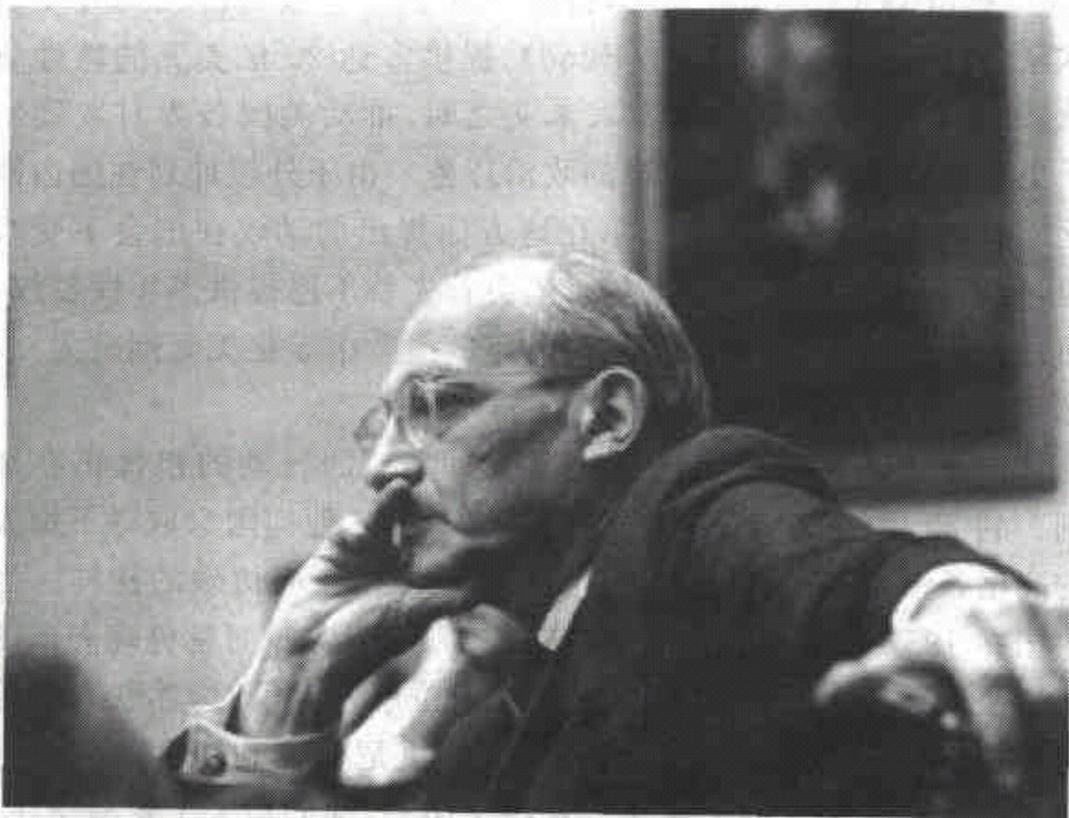
但是美国人对共产党在“欠发达世界”的行动的担忧仍在加剧。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宣称,他们国家取得了惊人的高增长率,由此可以成为世界上“新国家”所应仿效的榜样。当中国在1957年顺利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赫鲁晓夫试图与这个对手为“发展中”世界的领导地位展开竞争时,苏联人开始努力提高他们的号召力。出访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苏联官员就经济援助做出慷慨承诺。在拉丁美洲,他们扩大了贸易交往,发起了他们自己的技术援助计划。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9年初夺取政权,号召西半球其他国家进行革命,并与苏联进行贸易谈判,到此时美国就更加焦虑了。许多美国战略家提出,如果美国想在“边缘”地区与苏联展开竞争,那么它就必须采取更坚决、更具创意的路线。美国必须以涉及对外援助、科学咨询、人员培训,以及

①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76.

② 软性贷款(soft loan)指在还贷期和利率等方面条件宽松的贷款项目。——译者

③ Merrill, *Bread and the Ballot*, 137—38.

农业和工业的综合计划的国际开发计划来向“新兴国家”显示，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至少能够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一样减少贫困、提高生活水平。^①



罗斯托对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世界局势的一个判断是：“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欠发达地区，莫斯科力图通过以下方式扩张势力：即运用游击战、颠覆、贸易、援助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挑动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突出共产主义的形象，把它标榜为使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最有效的方法，标榜为正在迅速地从四面八方围住那懒洋洋地跑在前面的美国人的一种制度。……自由的事业看起来处于守势。”（图片来源：肯尼迪图书馆）

^① Ibid., 140; Cobbs Hoffman, *All You Need Is Love*, 106.

约翰·肯尼迪在参加总统竞选时就一再强调这个主题。当他还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时,他就一直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核威慑的依赖和相互确保摧毁战略提出批评。尽管肯尼迪主张增加国防预算,并对后来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战略“导弹差距”感到悲哀,但是他也坚持认为,艾森豪威尔对核武器的过分强调使美国丧失了关于“世界发展”的斗争中的有利地位。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中,肯尼迪谴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使用美国武器,并指出,欧洲仍然维护其殖民主义统治,而这种趋势又没有受到美国的制止,结果是把怨忿的民族主义者推向了共产主义阵营。尽管肯尼迪在对外政策上的看法与其在1960年大选中的共和党对手里查德·尼克松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差别,但肯尼迪还是不断地指出:在“新生国家”那里,美国已经在教育、技术和威望方面处于苏联的下风。在大选前一个星期,肯尼迪宣称,共和党政府和国务院没有为迎接所面临的挑战而做好准备。驻外大使素养不足,外交官缺乏外语能力,决策者对一个正处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的世界懵懂无知。肯尼迪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不能阻止席卷古巴的革命浪潮,并警告说形势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在美国无所作为虚度光阴之际,“莫斯科、北京、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千百万男男女女,其中有科学家、物理学家、教师、工程师、医生、护士……正准备到国外去献身于世界共产主义”。^①

肯尼迪及其谋士属于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G. Paterson)所精辟地指出的,他们是一些“痴迷于过去峥嵘岁月的人”。肯尼迪在杜鲁门主义出台前几个月才进入国会,他的经历,以及他的班底里的成员

^① 肯尼迪在1960年11月2日的竞选演说。参见Sorenson, "Let the World Go Forth", 119。另参见Giglio, *Presidency of John F. Kennedy*, 14, 17。

的经历,都受到冷战的核心原则的深刻影响。他们亲眼目睹了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中国的“丢失”和朝鲜战争,故而接受了多米诺骨牌理论,相信美国的安全要求它坚决对抗苏联在世界各地的猖狂扩张。和他们的前任一样,他们也对革命持强烈反感的态度。他们对民族主义力量的感受力在程度上与艾森豪威尔政府有所差异,但他们仍然认为革命的前景是非常危险的,认为革命将为共产主义的成功大开方便之门。^①

这样,当尼基塔·赫鲁晓夫宣称亚非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最重要的中心”并扬言要支持“民族解放战争”时,肯尼迪和他的助手就以高度的警觉做出回应。尽管苏联领导人在1961年1月发出的信息也许在更大程度上是针对他们与中国的竞争,但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仍发誓要“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担……以保证自由的存续和成功”。这些话正反映了他的政府对付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巨大挑战的决心。肯尼迪还宣称:“对那些我们欢迎其加入自由行列的新兴国家,我们做出如下承诺:在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统治行将消失之际,不应该再由一种更严酷的暴政取而代之。……对于南半球那些生活在茅屋和村庄里的、正在为驱除大众贫困的顽疾而奋斗的各国人民,我们承诺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自强自立,无论这需要多少时日。”^②正如杜鲁门在马歇尔计划上的所作所为,肯尼迪为促进经济进步而使美国投入巨大努力。然而,在这个时候,竞争的领域已经扩大了,竞争也直接以非殖民化、发展和全球变迁的动力等问题为中心。

而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似乎在“第三世界”面临了一大堆危机事态。在东南亚,老挝在美国最初就关切的问题上给它施加了沉重压力,行将离任的艾森豪威尔告诫他的年轻继任者,

^① Paterson, "Introduction", 9-11.

^② Sorenson, "Let the World Go Forth", 12.



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的就职演说激情洋溢、辞藻华丽,富于鼓动力,是美国政治史上的著名篇章。肯尼迪总统任期的这个开场白赋予美国对外政策以更多的美国式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色彩。演说对第三世界着墨甚多,其中特别可见争取进步联盟和和平队的端倪。肯尼迪在演说中还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者正在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谋求它们(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自由社会如果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无法保全少数富人。”

该国大有为共产主义势力所掌控之势。苏联人空投补给,北越提供训练,这已大大加强了巴特寮的力量,以至于就通过谈判达成政

治解决的方案面临艰难险阻。南越吴庭艳总理的那个脆弱而专横的政权看来也无力阻挡民族解放阵线的壮大和它发动的革命叛乱。新政府如何处理它所接手的印度支那的麻烦局面呢？刚果发生了内战，比利时支持矿产丰富的加丹加省分离出来，这使得肯尼迪政府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支持一个欧洲盟友，要么就要面对苏联可能从非洲的民族主义怒火中渔利的局面。卡瓦米·恩克鲁玛决心开启加纳的独立之路，并寻求与苏联和美国都建立联系，美国对此也忧心忡忡。古巴的革命国家作为拉美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巍然屹立，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天比一天更趋向苏联路线。在中东，纳赛尔试图在也门支持建立一个革命政权，由此美国人更担心埃及会使阿拉伯世界的一大片变得激进化，并对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保守政府构成威胁。政府还担心给奉行中立政策的印度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会对它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产生某种不良影响，更对中印边界冲突可能升级感到惴惴不安。总统和顾问无论面朝何方，他们看到的似乎都是相互密切相关的发展问题、反共产主义问题、革命问题。对肯尼迪政府的战略家而言，现代化成了紧迫的政策问题的答案。^①

宏大理论

肯尼迪迁居白宫之际，正值各种现代化理论开始显著地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之时。但是这些现代化理论还有深厚的学术根源和强大的文化号召力。作为一种宏大理论，现代化理论号称将整合不同的社会科学门类，并将井然有序地处理来自复杂的外部世

^① 关于这些冲突的总体背景，参见 Paterso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和 Kunz, *Diplomacy of the Crucial Decade*。

界的经验事实。对关心国际局势迅速变动的步伐的专家学者而言,现代化理论似乎也提供了一个宏大的框架,可以提高其研究的精确性和实证性。当然冷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美国社会科学家相信,通过现代化理论,可以明确揭示自己国家的历史成就,找准“新兴世界”的缺陷,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危机时代里针对国家的需求提出应对的办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化理论的科学论断首先出现在社会学领域里,而这些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产物。欧洲学术界以往一向在社会学领域占据着理论上的优势地位,但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蒙受了重大损失。较古老的大学专注于古典学和人文学研究,它们拒绝承认这门突然兴起的学科的价值。这个学科中的许多顶尖学者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社会学家们曾乐观地希望“能够针对世俗工业社会的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但随着纳粹主义兴起,随着第二轮的一连串全球性冲突导致重大灾难,他们的希望看来是破灭了。另一方面,在大西洋对岸则拥有繁荣的经济,那里的学术机构数量不断增加,财力充沛,其中的学术气氛也较为宽松,这些都为社会学在美国的复兴创造了条件。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曾就此指出:“在二战后的年代里,理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的重心决定性地转移到了美国。”^①

现代化理论正诞生于这个大转折当中。美国社会学正坚定、明确地以创造总体性社会理论为目标,而现代化理论之在美国的兴起,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芝加哥大学的爱德华·西尔斯(Edward Shils)在 1948 年对美国社会学的现状进行了考察,他发现他的学术前辈留下的是一笔复杂的遗产。他指出: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威廉·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

^① Alexander, *Twenty Lectures*, 18-19.

C. H. 库利(C. H. Cooley)和爱德华·罗斯(Edward Ross)“站在一个中间地带,他们的一边是图书馆社会学和沉思冥想,另一边则是日益精密的当代研究技术”。他们的影响当然是深刻的,但是他们的假设和所探究的问题往往自始至终是含混不清的。由于这类学者没有去探究他们的具体研究工作背后的理论问题,所以他们的“芝加哥学派”门徒们也就一向大量开展对单独的社群和都市社会的经验研究,而没有建立更广泛、更具体系性的理论框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分析。他们就阶级分层、族群认同、家庭、宗教、公共舆论和小型群体进行调查,得出有价值的资料,而且这种工作有可能对解决具体的地方性问题产生助益。但是他们学术传统被后辈学者继承发扬,却导致社会学学科处于一种“大混乱”的状态之中。西尔斯哀叹道,由于社会学缺乏一种理论来整合学科并赋予它一个中心关注点,所以美国社会学还没有“上升到科学的高度——它仍然停留在山脚下”。^①

然而,西尔斯还是寄希望于美国社会学能尽快走出它“目前那种非理论的史前史状态,进入一个更复杂精致的阶段”,^②而哈佛大学发生的一些变化似乎正符合他的期望。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这个领域里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他已在其1937年出版的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帕森斯关心的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角色,就此他写出了这部极为深奥抽象的著作。他对他认为是朴素的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进行补充和调和,由此既对独立的人的能动性(agency)予以尊重,又承认任何社会结构中内在的强有力的制约因素,试图在二者之间达成平衡。帕森斯强调,个体所采取的行动要受一组规范性价值(regulating values)的调和,而规范性价值是由保证社会秩序和社

① Shils, *Present State of American Sociology*, 3—4, 6.

② *Ibid.*, 54—55.

会平衡的制度为传播途径的。在孤立的或者更“原始”的社会里，家族的或社群的制裁扮演着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角色。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扩张、工业已经出现的社会里，正式法律系统的规范(regulation)和民族国家的规范的影响最大。帕森斯认为，古典经济学理论过分夸大了个体的效用最大化动机。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长期的社会聚合力往往显示着关于矛盾冲突的说的谬误。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并不能简单地决定人类意识的“上层建筑”。所以当帕森斯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时，他就强调文化价值对整合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有强大作用。^①这正是西尔斯所寻找的那种宽广的社会理论。



帕森斯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具有抽象而严密的概念体系，是以高度简单化、图式化的方式揭示“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理论形态，被称为“新进化论”。帕森斯的历史发展序列是原始社会、中间社会和现代社会，其中中间社会又可根据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距离分为古代社会、历史社会和苗床社会。追求精确性和自命客观的帕森斯理论背后其实有深刻的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文化目标，也就是“恢复和详细阐发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帕森斯社会学中浸透了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而且

是一种“非常自鸣得意的自由主义”。(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语)

^① Alexander, *Twenty Lectures*, 22—28; Buxton, *Talcott Parsons*, 21—24, 30—31; Savage,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200—207.

帕森斯的观点在他的书初版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是他认为自由价值有内在力量能够对有凝聚力的、健康的民主制度提供保障,这种乐观的结论对他学术上的迅速成名起了作用。在战后这样一个拥有无可匹敌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国家,他的理论路径似乎再恰当不过了。帕森斯在1946年就任哈佛大学新成立的社会关系系主任,掌管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其目标是将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等各学科的学问见识结合起来。在获得了新的制度平台、在专业领域内也确立了正当性之后,他将注意力由理解人类行动的问题转向勾画作为社会整合之必要条件的基本社会结构上。他和爱德华·西尔斯一样,都认为建立严密精确的新科学门类的关键不在于纯粹的经验主义,并且很快把他的这位同道从芝加哥请来参加一个新计划。他们都认为社会学亟需分析的力量,而他们的项目正是要给社会学以分析的力量。^①

他们合作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帕森斯的理论偏好所驱动。无论是对于社会学后来的总体发展,还是对于后来很快以“现代化理论”为人所知的那个研究领域,他们的工作都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帕森斯和西尔斯把他们的研究框架建立在“功能运作系统”(functioning system)的基础之上,进而指出,在每一个个体人格中存在的角色范围(range of roles)与不同的社会结构相互关联。当社会系统的结构适应变化着的个体需求,并且与文化理念形成互补关系,则这样的社会系统就处于完善的、以共识为基础的均衡当中。对资源和角色的配置要与共同价值的整合潜力相适应,而当时的美国看来正是如此。然而,如果这些力量之间失去平衡,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那样,则失调和失序就会导致动荡、暴力和镇压,并最终导致社会控制加剧。帕森斯指出,在德国,

^① Rocher, *Talcott Parsons and American Sociology*, 20.

凡尔赛和平产生了严酷的经济后果,随后工业、技术、城市化和职业流动性等方面的迅速变动滋生出社会混乱,这些都动摇了整合性制度,导致“激烈的极端态度”。与国家社会主义现象相关联的,是德国议会制度的弱点、独立的法律系统的缺乏,甚至还有性别关系的形态。德国的性别关系使妇女非女性化,提倡对好战而友爱的男性青年组成的集体的崇尚,“有时甚至以同性恋(至少是潜流)相伴随”。由于丧失了基本的社会稳定,“德国社会极端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倾向”被迫服务于“一种具有疯狂进攻性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又与一场反对西方世界的整个理性化潮流、同时也反对其最深层的制度化基础的‘原教旨主义’反叛相互结合”。^①美国及其民主国家盟友得以幸免于这种动乱。然而失去社会平衡的危险也是明显地存在着的。

虽然帕森斯和西尔斯一向更关心“文化形态的效应而不是起源”,^②但他们不久以后还是试图将大规模的结构分析与更具动态性的因素结合起来。受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影响,帕森斯特别在意于发现一种描述社会平衡如何随着时间变化而转换的方法。帕森斯和西尔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一组“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这是一组被扩展了的二元对立图式,用以进一步深化“传统”条件和“现代”条件的二分法。他们表示,以此为工具,就可以用衡量进步的指标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人格和社会都可以加以衡量,其方法是首先判断它们是强调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重视成就还是先赋,是自我取向还是集体取向,角色是专一的

^① 关于一般性理论的讨论,参见 Parson and Shils,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还有 Parson, *Social System*. 对这些思想的述评,参见 Alexander, *Twenty Lectures*, 37-51. 帕森斯对德国的分析最初成文于1942年,参见“Democrac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Pre-Nazi Germany”。

^② Savage,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 204.



帕森斯的学术伙伴爱德华·西尔斯

还是弥散的,是情感性的关系还是情感无涉的关系。^① 这一范围有限的变项只不过扩充了原有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区分,并没有直接讨论驱动一个社会由一端向另一端变动的的原因。然而帕森斯的确也提出,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力量可能对社会秩序提出新的要求,反过来又要求结构的变化,以维持稳定的平衡。他也遵循韦伯的思想指出,社会价值的状况对变迁将要采取的方向有深刻的影响。^②

帕森斯的理论模式的基础是在一个社会的特定结构及其所需的功能之间建立关联,所以很快就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这一理论有三个特别重要的方面。第一,它赋予把社会作为整合系

① Bierstedt, *American Sociological Theory*, 421—24.

② Savage,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205—7.

统加以观察的方法以重要性。在这个整合系统中,政治、社会和经济各部门都是相互关联着的。一个领域内的变化以其他领域里的变化和调整为条件。正如一个同情帕森斯的评论家所解释的,这个观点导致这样一种观念,即“各部分的相互依存与整体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在这种观念之下,变化和运动不会以无序和偶然的方式发生,而是结构或过程中的复杂互动的结果”。^① 第二,这种模式表面上允许进行广泛的比较分析。由于假定全人类都有一组相似的基本需求,而这些基本需求又必须由社会结构的功能运作来加以满足,故而各系统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比较,而不必考虑其历史的和环境的差异。许多现代化理论的鼓吹者相信,以造就更宏大、更具综合性的科学观点为目标,则多种多样的“经验性”研究最终能相互联系在一起。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区,无论其文化如何独特,其地理位置如何遥远,都不会被排除在比较分析的范围之外。最后一点,虽然“模式变项”本质上是对静态社会秩序描述性的“抓拍”(snapshot),但似乎还是提供了建立衡量社会变迁的指标的一种办法。不同学科的理论家利用这一组二分法形成复杂的图式,进而奉结构—功能主义为圭臬,将其作为一种将诸社会纳入历史的、线性的、阶段性的“发展”序列之中的方法,又使之成为将现代化作为包罗万象的进程所进行的研究中的关键成分。帕森斯试图将他的静态图式转化为一个动态的模式,所以他最终亲自出面指出,诸如“原始”和“现代”之类的术语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而是以“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y)不断增强为标志的进化路线上的环节。“现代”社会能在技术、人口或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社会秩序,因为它们创造了高度专门化的制度,能更有效地利

^① Roher, *Talcott Parsons and American Sociology*, 22. 正如另一位论者所说,这种假设会使读者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所有的好东西一起来”。见 Packenham, *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20.

用自然资源,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的政体,而且将基本价值系统赋予法律条文的形式,而法律条文又能被自觉地、与时俱进地加以修改。^①

帕森斯很少采用具体的案例,选择二分法时也十分随意。他爱好自由和共识基础上的和谐,由此又倾向于对持续存在的制度性压制轻描淡写。由于这些原因,帕森斯受到一些失望的批评者的猛烈抨击。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评论道,帕森斯式的分析“使社会学家完全脱离了对权力的因素的考虑”。^②另一位沮丧的读者发现,“当帕森斯宣布社会学理论中又有了一个‘突破’或者‘进展’——他已太多次地这样宣布——时,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或者社会关系乃至社会行动方面发现了什么新东西。这仅仅意味着他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又注意到一组概念上的对称或者平行关系”。^③ 虽然关于帕森斯是不是冷战时代里美国最强大的社会科学家尚可商榷,但他确实不是到处都受欢迎。

然而,对于那些急于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广泛变化的人来说,他的学说的抽象性似乎正好提供了一套灵活方便的分析工具。马里恩·列维(Marion Levy)的著作《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1949年),就是美国社会理论领域里的这场“帕森斯革命”的一个突出例子。列维的这本书最初是帕森斯亲自指导下的一篇博士论文,其意图是研究“传统的”和“变迁中的”中国的亲缘

^① Savage,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208-16. 虽然帕森斯早期著作中有不少地方明显持有进化论观点,但表述最清楚的还是他的以下著作: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Evolutionary Universals in Society”和 *Societies*.

^② Mills,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35-36.

^③ Bierstedt, *American Sociological Theory*, 441. 关于针对帕森斯及其学术盟友的批评,参见 Smith, *Concept of Social Change*, 以及 Lauer, “Scientific Legitimation of Fallacy”。关于论战往来攻防的情况,参见 Turner, “Parsons and His Critics”。

关系。列维指出,家庭承载如下必要功能:“(1)角色分化;(2)团结的配置(allocation of solidarity);(3)经济配置;(4)政治配置;(5)整合和表达的配置”。列维使用这种含混、烦琐的帕森斯式的范畴,将之作为探究特定的“现代化中”社会的框架。列维的分析以中英文材料为基础,并利用了得自二战期间与中国人交往中获得的资料。他指出,西方工业的进入将不可逆转地改变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的重心,使之向普遍主义标准转换,并必然地改变承载满足社会基本需求的家庭结构。由于现代工业“不在乎某人是谁”,而仅仅关注“他是否能以特定水平的技能承担某种特定的技术功能”,所以,现代工业自西方涌入中国,就必然会侵蚀孝道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组织原则的传统影响力。大众性交通通讯、在华西方社群的不断扩大、对外市场经济的扩张,都将使注重政治自由、个人主义、功能专门化和自立人格的新观念广为扩散。某些“传统模式”(traditional patterns)在短期内仍可能存续下来,但如果西方式工业继续增长,则这些传统形式最终将被削弱,而以往产生社会平衡的结构也将发生根本嬗变。以家庭为变迁的指标,列维断言中国确实正在走向现代化。^①

在为列维的书所作的序中,帕森斯欢呼这是“由一个新型学者在社会制度的比较分析中做出的第一项重大工作”。^② 尽管中国革命很快证明列维关于中国将建立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预言是错误的,但仍有许多研究人员步他的后尘,于是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就开始掌控对历史变迁的社会学分析。学者们称赞现代化是研究崛起中的“新国家”的一种精确、科学的方法。他们试图确

^① Levy,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6, 274—79, 281, 352—65.

^② Parsons, foreword to Levy,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ix.

定什么样的价值对现代化进程是必要的,对韦伯所强调的新教伦理在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性进行思考,并探究现代化力量与非西方宗教伦理系统的互动关系。当社会学家把研究扩展到心理学领域时,他们也开始关注如何界定“现代”人格的特质,致力于探究那些期望驾驭其环境的、积极的、“未来取向的”个体与那些他们在“传统”民族中发现的消极的、惧怕变化的人格之间的差别。^①在其后的二十年间,现代化成了组织整个学科的研究工作的金科玉律。

就清楚地显示社会学家所归之于现代化进程的普遍变革力量而言,没有其他著作能超过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广受欢迎的《传统社会的消逝》。这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声称要用具体的分析来探询外国文化、宗教和社会的奥秘。他分析了来自多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总量数据,并对由美国新闻署在土耳其、黎巴嫩、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朗安排的600多次访谈做出解释。勒纳并不顾忌与联邦政府的合作可能会影响证据材料的客观品质的问题。他大胆地提出:“世界各大洲所有的现代化中社会都呈现出同一个基本模式,这与人种、肤色和信仰无关。”在与西方的交往的推动之下,中东各国的现代化将渗透到社会各个部门,并根本改变这些部门的结构。商业关系及后来的工业关系将促进一种“流动性人格”(mobile personality)的兴起,鼓励个体做出“在别处寻求他自己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个人选择”。当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城市化就会扩展,识字率就会提高,人们就会领略大众传媒和全球交往的力量。这些相互关联的“历史方面”反过来又会促使移民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相互依存的政治实体,并感受到对他们的同胞的“移情”。与孤立的传统乡村社会相比,这种新文化将促进

^① 如参见:Shils,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ew States”; Eisenstadt, *Protestant Ethic and Modernization*; Inkeles, “Modernization of Man”。

参与型社会精神气质在其内部不断成长,而这是政治民主赖以建立的基础。勒纳还宣称,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即使在传统束缚下的中东,现代化也意味着“‘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精神’的输入,对此学者们似乎都认为‘伊斯兰教绝对无力招架’”。^①

勒纳以令人惊讶的自信提出一系列普遍存在、连续演进的阶段。这些阶段的提出意味着各个社会都不可阻挡地向“现代”西方的共同终点运动。他坚持认为,他的有关城市化、识字率和政治参与的指标“对描述特定社会在特定时间内的现代化程度提供了恰当的方法”。勒纳还认为,所有向西方顶峰状态迈进的具体进展都是可以仔细地加以测量的。同样重要的是,他也认为这整个过程都可以为西方的行动所加速。对“构成(中东)人口大多数的孤立的和没有文化的部落居民”进行驱动的关键在于迫切需要“就生活中可能有哪些更好的东西向他们做出提示”。^②

因而对社会学而言,现代化概念提供了一个分析结构,社会变迁的全部过程,包括西方的过去和“发展中”世界的未来都可以被纳入其中,并由此得以理解。它提供了一个似乎可以套用于具体的经验资料的模板,而且可以将各不同领域的研究纳入一个共同的、综合的研究议程,从而对以后的研究起组织作用。现代化理论关注变迁的整体进程,强调一组普遍存在的结构和功能,由此它也宣称自己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历时性比较分析。在其发展的巅峰时期,现代化看上去似乎是一项关键突破,是社会科学“统一场理论”。

作为一种“宏大理论”,现代化对美国政治学中对全球发展的研究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尽管该领域以往根据国别、文化和地区在专家中有所分工,但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快速变化似乎要求建

^① Lerner,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尤见第 45—48 页。

^② *Ibid.*, 69, 411.

立一个更宽泛的框架。在殖民帝国消亡和“新国家”兴起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在1953年12月建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parative Politics Committee)。由于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在制定学科发展规划方面居关键地位,对资源的分配有影响力,而且享有高度的专业声望,所以这个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分析案例。自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于1923年成立后,其领导层不断强调利用社会科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科学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秉持这样的观念,即学术客观性和公共影响力是可以相互加强的。^①许多人希望,作为SSRC下属的一个新委员会,比较政治学委员会能推进其母体机构承担的促进跨学科研究和合作的使命。后来的情况表明,现代化研究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任务。

在首次开列出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研究议程的一份文件中,乔治·卡辛(George Kahin)、盖伊·波克尔(Guy Pauker)和白鲁恂指出:“随着传统社会被暴露于西方观念和方式的影响之下,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就发生了。”而分析这种趋势的条件也是令人鼓舞的。这几位作者评论道:“非西方政治系统有很多共同的特征”;“过去十年这些国家变化的步伐已然使这些问题适合于经验考察了。”然而,当时这个研究小组却没有建构一个总体理论框架就停下来了。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所描述的共同形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同时他们也承认他们想要研究的各地区各社会的复杂现实,通过反思认识到“迄今为止的变化远不是一个统一的进程”。他们警告说,政治学家应该“对文化传统中的差异保持敏感”,应该认识到许多不同的政治形式都具有顺应变化进行调整的能力。尽管这几

^① 关于社会科学理事会早期情况的材料,参见 Fisher, *Funda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s*。

位作者认为所有的政治系统都必须克服类似的障碍,但他们还是断定委员会应该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变迁问题,警告该领域的研究者要抵制“把诸社会和政治系统布列于进化序列中”的诱惑。^①

然而,当政治学家转而求诸社会学模式时,这种在理论上留有余地的做法很快就消失了。在1956年的一次规划研讨会上,来自普林斯顿的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麦尔隆·维纳(Myron Weiner)提交了一篇文章,希望该文能“厘清委员会对研究策略的观点”。阿尔蒙德是一位不对特定地区进行专门研究的政治学家,在另外一篇给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报告中解释了他的观点。他指出,“本研究领域的现状还不能满足全球性比较研究的需要”,因为“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学术团体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个专业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而是被划分为欧洲、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专家”。“在当今世界上大约100个独立国家中(选择)15个研究地点”,并试图从这些研究的结果中得出结论,是绝不会解决问题的。^②

但出路还是有的。依阿尔蒙德之见,研究同一个地区的学者可以选择共同的研究问题,同时“在跨地区的基础上”相互报告研究成果,并“加强比较理论研究,以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在近期对社会学的强调的激励下,阿尔蒙德也指出实地调查工作“能够突出功能,以及政治、文化和社会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还提出:“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模式变项’概念似乎能被用以区分不

① Kahin, Pauker, and Py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Non-Western Countries”, 为了与上述观点保持一致,委员会规定其最初的研究计划是,选择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具体政治群体进行研究,并为此一较为有限的目标而确保福特基金会对18个研究项目的资助。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56—1957, 19—20。

② Almond, “Seminar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46—47.

同政治系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①受这些看法的影响,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研究小组设列了一些理论研究题目,其基调是委员会先前的一个印象,即与西方的交往经常是变迁的推动力;而且他们也试图放弃自己先前在两个问题上的保留态度,不再强调重视文化差异的特殊性和特定“传统”形式的生命力。当委员会成员在勾画比较分析的新战略时,他们还提出研究者应该将社会变迁作为一个共同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进程加以考虑,而且应该趋近这样一个观点,即即使在不同地区之间,“政治发展”的性质也应该被置于一个共同的历史性框架之下。^②

美国人思想上的这些转变也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得以传播。争取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是一个由立志挑战共产主义号召力的知识分子所操控的组织,它在这方面被证明特别有用。在中央情报局的部分支持下,这群人举办了几次以“第三世界”政治发展问题为主题的会议。1958年和1959年,在罗兹(Rhodes)和尼日利亚的伊巴丹,西尔斯组织了跨学科研讨会,讨论亚洲和非洲“新国家”的“代议制政府”和“政治民主”问题。会议的主题是“传统和变迁——关于进步的问题”,这给了西方学者一个与多个国家的学术界交流思想的机会。在与非洲和亚洲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律师和新闻记者的会晤中,关于应该如何推进政治发展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分歧的观点。但是,在美国学术界,这些争议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建立宏大而综合的研究计划

① Almond, “Seminar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46—47. 着重符号为原文所有。

② 比较政治学委员会设立的研究课题反映了它强调的新重点。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研究小组聘请社会学家爱森斯塔德“对历史上的政治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此外还设立了下列备忘录的题目:“知识分子和政治发展”、“日本的政治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和政治发展”。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57—1958, 19.

的信心。实际上,这些争议可能只是加快对建立控制社会变迁的全球性理论的追求。美国政治学家将其关注的重点放在民族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国家制度、领导阶层和极端主义危险之上,继续沿着阿尔蒙德及其同事所号召的综合研究路线向前推进。^①

在几年内,“政治现代化”逐渐支配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政治学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决定了整个学科研究的基本问题。白鲁恂热衷于寻求“一种更具动态性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路径”,所以虽然他以前曾在参与解释结构—功能主义是解决办法时表现出小心谨慎,但现今也顾不得这许多了。在向1959年6月在纽约州多布斯费利(Dobbs Ferry)举行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小组会议提交的报告上,他为理论突破而欢呼,声称这标志着“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学术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他解释说:“我们开始时曾经拒绝对结构和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因为我们热衷于寻求比较整体进程的方法;这导致了对进程中的‘行为体’即政治群体的分析;但是为了使研究规范有序并为比较研究奠定一个基础,就有必要提出全部政治进程中的某些普遍的功能,而这些功能中的一些必须由一个或另一个结构来履行。”一旦研究者接受了各个社会都有共同的政治功能的观念,则他们就能在新的视角下理解相应的政治结构。以不同的结构所扮演的共同角色为基础对它们进行比较,就能将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政治发展纳入一个更广泛综合的概念框架之中。一旦按线性的历时期列加以排列,则传统到现代的各个结构都可以被用以确定各社会在发展道路上的相对进步程度。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坚信这个方法被证明“特别有利于研究新兴国家转型中的系统,还有利于对传统社会的政治系统的比较研究,甚至有利于将原始社会与发达工业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由此开始规划一

^①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87—96.

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①

结果,试图建构新理论并将之应用于不同地区的研究著述在 一时之间大批涌现。除了提供研究经费、利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继续召开研讨会,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成员们还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将他们的会议论文在以“政治发展研究”为题的多卷本系列丛书之下予以出版。这套丛书各卷中的引言和结论部分都被用来讨论理论问题,这项工作规划研究的方向,对现代化模式进行定义,并且将现代化牢牢置于该领域研究规划的前沿。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发表于首卷上的丛书总序中大胆宣称:“本书是比较‘发展中’地区的各政治体系的首次努力,也是按照一组共同的范畴对它们进行比较的首次努力。”他继续说道,“新的概念上的整体”不应被误认为是“一个专门的问题”。它所体现出的不亚于一场分析革命,“预示了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本质上有了重大发展”。^②学者们以普遍和比较的观点勾画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试图对理论进行加工提炼,并在这个框架之内指导整个学科的研究方向。^③

政治学家们也试图将新的模式运用于他们对特定国家的专题研究。白鲁恂的《政治、人格和民族国家建构》(1962年)就特别突出地说明了现代化理论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政治分析。白鲁恂对缅甸如何追求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很感兴趣,于是进行对当地人士的访谈,以期了解“那些要在过渡社会中建立民主制度的人(如何)完成他们的任务”,以及“他们的经历(如何)影响他们建立

① Py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26.

② Almond and Coleman,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3-4.

③ 作为例子可参见 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Spengler, “Economic Development”, 387-416; Ward, *Studying Politics Abroad*.



白鲁恂在政治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研究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问题的大师,同时也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

这种制度的能力”。然而就在工作进行过程中,白鲁恂断定,他对个体心理的观察从一开始就要和对更广泛的全球趋势的分析结合起来进行。他这样说:“问题的全部远不止于异族统治及其后的争取主权的运动。因为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只是更深刻的历史进程的局部方面,而这是一个变迁的过程,一个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和转型的过程,此中社会整体和个体人格都得被迫采取新的形式”。和丹尼尔·勒纳所做的一样,白鲁恂也将他对具体文化进程的研究置于普遍模式的背景之下。他感到褊狭的和传统的态度有持久存在的潜力,这使他明显地持一种不太乐观的观点,认为要使传统的世界观发生转变并不那么容易。但是,与他那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一样,白鲁恂也敢于就一系列内容广泛的问题做出结论。他将社会化、家庭结构、职业角色和对经济增长的政治渴求结合在一起,进而指出缅甸的情况并不是特例:“做出反应的形式可能在程度上有所差别,这取决于文化融合的环境和传统文化的

性质。然而,这些差别只能发生在人类的人格中固有的和共同的特性所规定的限度之内。”^①如其在社会学中一样,现代化理论也宣称要为政治学提供一种从整个体系的角度理解社会的方法。它将容纳一种动态的观点,而且能勾勒出对各个社会都适用的普遍进程。

在本章对作为一种“宏大理论”的现代化理论加以探讨时,最后要涉及的是发展经济学。它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当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在寻求建立更大、更综合的变迁模式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模式。正如阿尔伯特·赫希曼所指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他们的学科立足于“几个简单但却是‘强有力的’普遍有效的法则:只有一个经济学(‘正如只有一个物理学’)”。^②由此发展经济学家不得不证明“新兴”国家的问题完全不同,而且要说明在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一套新的思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与在另一个问题上的长期争论是联系在一起的,即穷国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通过仿效“先进工业国”而取得重大成就。比如,亚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等经济学家就深深怀疑增长和发展可以沿着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推进,而且就无限制的国际贸易对贫困社会的影响问题提出严峻的质疑。^③然而,更乐观的说法才会在公众中受到更多的欢迎,而且正如本章后文所显示的,也受到更多的政治支持。也许是因为这种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发展经济学领域里的从业者得到的学术声誉也比经济学其他领域的学者要少。然而,即使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现代化概念也被证明在分析范畴的转换上、在理解这些分析

① Pye,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g*, xiii -xiv, 286.

② Hirschman, “Rise and Declin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74.

③ 参见刘易斯在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中对“二元经济”的阐述:“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范畴的方式上都产生了影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把注意力转向以下问题,即西方工业强国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在亚非拉扩大市场、增加生产?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提高供求之间的总体经济平衡水平的角度界定“经济发展”的,所以首要的问题似乎不过是找到恰当的财政工具并使之运作起来而已。许多经济学家发现,对于这些问题,只要将凯恩斯理论稍做修改便可应付自如。采取下列手段,即在几个产业部门之间实现投资平衡,提高总储蓄水平,努力提高单位资本投入的产出量,就可以将凯恩斯的短期就业理论转换为一种达成总体的长期增长的可行途径。^①许多美国理论家受他们本人在对付萧条、安排战时计划、参与欧洲复兴计划等方面的经历的影响,所以最初都认为“发展”无非是一个提高总体经济表现的问题。一位学者回忆道:“凯恩斯是新革命中的英雄。他显示了在不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实际上任何产出和就业水平上——也可能存在均衡。”以国内生产总值为理论解释的“关键变量”,所分析的问题被化约成一个为达成所期望的增长水平而确定恰当的投资和积累之间的比率的问题。^②

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初为止,计划中的进步并没有得以实现,这使得许多经济学家断定,由于“新兴”国家的经济与已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当前所面对的问题有显著不同,所以同样的药方对这些国家是不起作用的。各种“结构主义”理论对那些主张纯粹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的人提出直接的挑战。这种理论出自阿根廷人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和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设在智利

^① 这些观点经常与经济学家哈罗德(R. F. Harrod)和多马(Evsey Domar)联系在一起。参见 Meier, “Formative Period”, 15-16。

^②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69-70。

的圣地亚哥)的有关讨论。凯恩斯主义者一般把不平衡的均衡(unbalanced equilibrium)作为长期通货膨胀等问题的原因,而结构主义者则坚持认为发展的真正障碍在于一些特殊的阻碍生产和消费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贫穷的农业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于工业化的西方。一位经济学家曾解释说,结构主义者认为这些国家缺乏灵活性:“障碍因素、瓶颈和局限性遏阻了变迁。人们感到难以采取行动或作出调整,资源往往无法流动。”^①由于基础设施缺乏和交通通讯不良,商品难以迅速流通;人口增长经常超过投资的扩大;生活在“传统”社会系统中的农民的行为往往不符合“理性”或“利润最大化”的要求。结果,价格机制不能顺利运作,市场也无法履行其自我纠正机能。

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者对经济发展的分析终告成形,此中它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的观点。在某些学术圈子里,它帮助了一些观念的出现,而这些观念在后来的年代里经过修改后最终成为依附理论的核心。对普雷维什这样的学者而言,基础设施、交通通讯、金融资源以及在制造业领域进行竞争所需的资本等方面的匮乏都是由特定原因生成的。他坚持认为,农业国的贸易条件自19世纪晚期以来是持续恶化的。由于出口农产品价格跟不上制成品价格的上涨,所以许多拉美民族主义者终于出来指斥:经济自由主义、不受限制的投资和资本外逃阻碍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所必需的积累的形成。在这种理论框架中,拉丁美洲之所以不能充分发展,其根源在于强大的经济中心和受剥削的边缘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拉美的经济危机只能进一步加剧。^②

然而,结构主义思想也给另一种理论观点帮了忙。这就是:解

^① Little, *Economic Development*, 20.

^② 关于相关的学术综述,参见 Love, “Raúl Prebisch”。

释明显的经济“停滞”不应从对贸易关系的重点分析出发,而是应该与社会价值和政治领导阶层中相互密切关联的缺陷结合起来。与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一样,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开始从由互相依赖的功能性部门组成的整体系统的角度来描述变迁的过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英国经济学家罗森司坦-罗丹(Paul N. Rosenstein-Rodan)的思想就反映了这种观点。罗森司坦-罗丹指出,如果发展的努力要取得成功,则它们必须是全面的和决定性的。国家必须在促进消费品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扩展市场的运作范围,这需要集中力量建设交通网络,建立公共设施,并鼓励新技术的利用。由于结构和心理方面的障碍非常顽固,所以必须实行涉及大规模外部投资、教育和全面的社会工程等方面的“大推进”(big push),以此来对这些障碍发动迅猛进攻。^①瑞典的诺贝尔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是这个领域中极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也呼吁进行这种整体性的中央计划。而且他的语言显示了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一样,都趋向于认为经济变迁是更大的、更具有社会综合性的问题的一个部分:“整个积累性扩张过程必须切实根据具体的投资计划加以规划:(要考察)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年份中这些投资计划对不同行业的生产量的影响,对消费的影响,对工人就业和自然资源利用的影响,等等;主要关注系统中各种要素之间周期性的因果互动。”^②当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涉入其他领域、并将社会变迁作为一个广泛综合的进程加以考察时,他们都同意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增长”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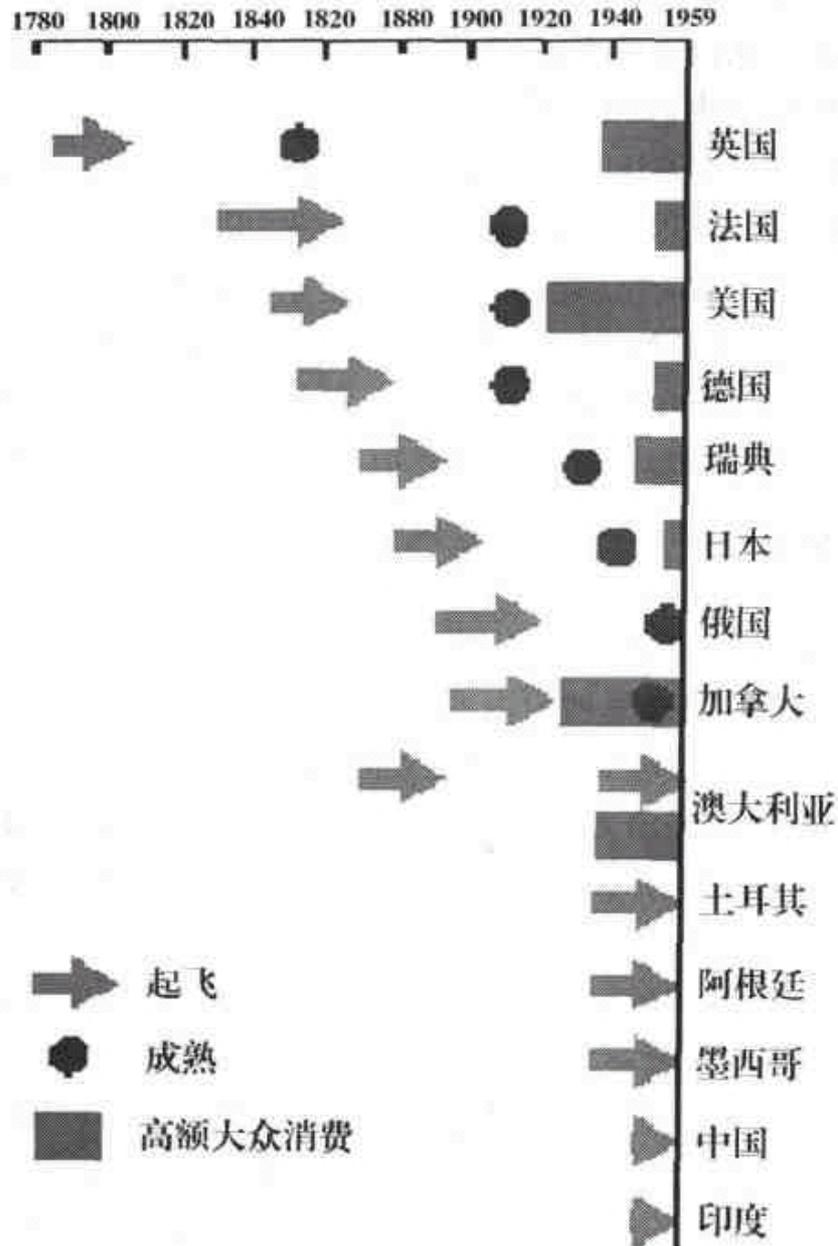
^① Rosenstein-Rodan, “International Aid fo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Rosenstein-Rodan, “Natura Facit Saltum”; Little, *Economic Development*, 38-39.

^② Myrdal,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68, 转引自 Little, *Economic Development*, 58.

对于这种思想方式,没有人比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表述得更彻底、更生动了。其《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最初是他在剑桥大学写下的一系列的讲稿,该书以先前对经济发展的各种解说为基础,又改造了这些解说。罗斯托继续讨论了宏观经济理论如何指导投资以增加人均收入的问题,但他也企图回答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其中包括“将在整个社会中运作的经济力量与社会和政治力量联系起来的更广泛的问题”。他设立一条由“传统社会”到最后的“高额大众消费时代”演进路线,借用历史记录来确定各国在这条路线上的具体位置,由此他大胆宣称要解释为什么西方的某些部分发达起来了,而世界其他地区却没有。^①

罗斯托指出,整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转型进程本身。他引述路易斯·哈兹的《美国的自由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一书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认为美国属于那种“在某种意义上‘生而自由’、(而且在建国之初)已在变革进程中处于前列的少数国家”。美国人,以及其他“主要产生自英国”的国家的人,拥有一套关于个人主义、民主和经济机会的观念,这使得他们“自然”而迅速地达致“现代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水平。尽管那些不那么幸运的社会在变革过程中要经历更为艰难的岁月,但它们仍然有希望存在。如果它们能够实现某些“前提条件”,那么它们也就能够克服导致其陷于“传统的”习俗和迷信的“前牛顿科学”(pre-Newtonian science)和“长期的宿命论”(longrun fatalism)的。这就要在提高积累和投资的同时也要促使思想态度方面发生重大变化。而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得以实现,那么整个社会就会经历迅速的“起飞”,在此期间“将会最终克服长期存在的对稳定增长的阻碍和抵抗”。如果民族国家的形式得以确立,基础设施被兴建起来,

^① Rostow,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ix.



在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现代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在他开列出的由五个经济发展阶段组成的序列中找到时下所处的位置,而发展就是向上一个阶段的升进,是重复英国和西方的基本历史演进路线。罗斯托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未来的潮流,它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病症,在现代化初期由一些训练有素而组织良好的职业骨干强加于各国社会的一种病症。”基于他的发展理论,罗斯托积极推动美国的海外发展援助。

农业生产率提高,银行和投资制度被建立起来,而且如果新的精英热切追求经济增长,那么,整个系统就将发生转型。现代化中社会肇始于“有限的突破和飞地”(limited bursts and enclaves),在穿越了自促(self-sustaining)经济增长的历史分水岭后突然加速,最终趋近先进国家很久以前已经达到的水平。^①

《经济增长的阶段》使得一个极其复杂的进程在突然间变得简单起来。每个国家都必须穿越一系列基本的阶段,无论它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和地缘的特殊性。一些国家进步得比其他国家快,而这个过程经常导致不稳定。但是变迁的基本方向以及加速变迁的手段是明确的。《纽约时报》认为,罗斯托的分析不亚于“划破充斥着杂乱事件的昏暗历史夜空的一记闪电”。^② 罗斯托在采用阶段论和立论宏大方面本来与马克思很相似,但是它那以综合连动的、直线式演进序列为内容的“非共产党宣言”还是号称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明确回应。自由文化和复利(compound interest)是真正的历史发展动力,而不是阶级斗争。罗斯托指出,计划式资本主义和对外援助,而不是社会革命,才能最好地服务于现代化。

作为一种“宏大理论”,现代化似乎的确照亮了一片复杂的和处于转换中的知识领域。作为一种关于整体变迁的模式,它将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整合在一起。由于它将具体的结构与必要的功能结合起来,所以它宣称能赋予科学家以对处于不同时间、空间中的社会加以比较研究的能力。作为一种普遍进程,它又降低了各个文化的复杂差异的重要性,而提高了共同因素的重要性,并且认为这些共同的因素可以将各种不同文化统一起来。1945年以后非殖民化进程使世界发生了根本转型,但是美国社会科学家相

^① Rostow,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4-7, 17-27.

^② Schwartz, "Review of *The Stages of Growth*", 6. 关于较晚而且不大赞许的回应,参见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355-61.

信,由于配备了这一套新的理论工具,所以他们有能力说明全球变迁的状况,有能力解释其根源并塑造世界的未来。

科学主义和国家(state)

随着现代化作为一种知识模式日益流行,它的创造者也站到了潮头浪尖上,面对着要他们以服务于美国社会的热切期待。在现代化理论家向肯尼迪政府的决策者提供具体政策建议之前,他们已经在存在于专业学术和政府扶助之间的强大网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925年,赫伯特·胡佛在(Herbert Hoover)代表全国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发表的讲话中,曾就一个事实发出悲叹,即美国科学家每年仅有区区1000万美元的资助,而这些钱大部分来自私人基金。伍德罗·威尔逊执掌全国研究理事会时,该机构曾成为政府在科学筹划事务方面的正式顾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也曾将科学专业知识送到军事机构和公司实验室中,以期在无线电通讯技术、潜艇侦测、炮兵测距、乃至化学武器等方面推动重大进展。然而不到十年,国家的科学预算就被大幅度削减。胡佛呼吁国家对科学增加投入,同时提醒他的听众说,“为建立知识体系而投入的大量的人力、了不起的设备,还有长期耐心的科学实验,这些都是发明和工业”的根本源泉。^①

胡佛个人的呼吁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是,在第二次全球性大冲突中,美国政府所迈出的步伐却是当年胡佛无论如

^① Hoover, *Vital Need for Greater Financial Support*, 2; Leslie, *Cold War and American Science*, 4.



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赫伯特·胡佛(1874—1964)多年来致力于强化政府和学术界的关系、提升学术界作为政府智库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任命胡佛担任福特基金会主席;一战后又担任最高经济委员会(Supreme Economic Council)委员和美国救济署署长。1929年,胡佛成为美国第31任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胡佛又曾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担任过政府和国会的研究咨询委员会的领导职务。

何也想像不到的。战争行为、学术才能和大量政府资助被相互联系起来,这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科学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如斯图尔特·莱斯利(Stuart Leslie)所指出的,二战中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以及政府直接向大学提供巨额资金的做法,都使政府对科学的扶持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大规模的战时合同仅向麻省理工学院

一家就投入了 1.17 亿美元。加州理工学院得到 8,000 万美元,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也各分得 3,000 万美元。前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卡内基基金会万尼瓦·布什(Vannevar Bush)不辞劳苦为增加经费进行游说。布什相信美国还没有为战争在科学上带来的挑战做好准备,于是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施加压力,建立了科学研究和开发办公室(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作为 OSRD 的领导人,布什在 1945 年前掌握着 4.5 亿美元的武器研发支出。而且,美国对科学的投入获得了迅速而巨大的实际回报,雷达、固体燃料火箭和原子弹都是“战争中的神奇武器”。^①

特别是曼哈顿计划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放射性实验室,成为联邦经费支持自然科学的重要先例。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沙漠中、在麻萨诸塞州康桥^②的大楼里的成功激起政府的兴趣,促使其支持建立一种协作性的制度架构,而这种制度架构在战后和平时期也延续下来。战时成就的教益是清楚的,知识生产的新体制在兴起过程中涉及“大型、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对复杂问题进行协作攻关,越来越精密复杂的工具——一句话,就是大科学”。^③而且,资金投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都没有被削减。斯大林在东欧的强悍行为,中国的共产党革命,苏联开发原子弹,这些都使紧迫感持久存在,而且促使联邦政府积极介入。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每年的研究开发拨款已达到大约 13 亿美元。^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获得的资源和职业声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随着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合同涌进美

① Leslie, *Cold War and American Science*, 6--7.

② 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

③ Geiger, *Research and Relevant Knowledge*, 30.

④ Leslie, *Cold War and American Science*, 8.

国各大学,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教员们分享了公共投资的利益,开始致力于生产美国为对付严重威胁而需要的知识。



肯尼迪和小阿瑟·施莱辛格

尽管职业社会科学家的的工作较少为人所知,但他们也投入了战时对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斗争。由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下属的研究分析处(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以“离职人员讨论会”(displaced faculty seminar)为掩护,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关于国防的分析工具,其成员包括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社会学家爱德华·西尔斯和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以及经济学家爱德华·梅森(Edward S. Mason)和沃尔特·罗斯托。该团队成员受命分析敌方的补给系统,规划军工企业的组织,确定油料和其他工业资源的储存地点,而且

他们还分析预期的轰炸目标,研究投入的单位成本与对敌方的破坏之间的比率。^①通过将数学模型运用于经济学和管理会计学,这种工作在后来促成了“行动研究”(operation research)领域的兴起,而这对冷战时期的武器设计和全球军事战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②其他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心理学家,则致力于研究轰炸对敌人士气造成的影响,分析敌人和盟国的民意情况,为军方人员准备标准化的智力测试和心理健康测试,而且试图为日裔美国人收容营设计一套社群管理办法。^③

然而,到战争结束时,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所作出的贡献却显得相形见绌。许多官员也指出,在未来不值得给社会科学那么多支持。物理学家创造了雷达技术和核裂变,直接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战后的和平,而社会科学家的贡献却显得不尽人意。美国参议院在1946年通过的最初的法案授权设立的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就反映了这种差别,并显示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广泛存在着的怀疑。这一法案的发起人托马斯·哈特(Thomas C. Hart)指出,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的投入是不值得的,因为“关于社会科学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问题至今没有共识”。对社会科学的各种定义有的含糊不清,有的甚至越说越让人糊涂,比如有一个定义是:“哲学,人类学,各种种族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各种经济学,文学,也许还有宗教,各种意识形态。”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所以哈特坚持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十分抽象的领域,而所建议设立的科学基金会所要处理的其他学科是由具体的研究领域构成的,两者之间没有联系。”^④参议员们

① Katz, *Foreign Intelligence*; Winks, *Cloak and Gown*, 70-71, 87, 90-91.

② Waring, "Cold Calculus", 30-32.

③ Herman,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 17-47.

④ Buxton, *Talcott Parsons*, 117.

也同意,物理学家们的经验研究对人类理解宇宙能产生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积少成多的进步。而社会科学家则置身于一个充满了价值和偏好的云山雾罩的世界里,除了就价值规范作出判断外别无所长。如何能判断政府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成功”与否?又以什么标准判定所谓新“发现”是否确有其事?又如何确认公共资金投入收到了预期的回报?^①

社会科学家采取两种策略对这些怀疑做出回应。首先,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研究是严格、客观的,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与自然科学家的研究一样“科学”。他们声称,“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可以洞悉普遍法则,并将其用于生产与科学家个人的观点无涉的知识。其次,他们声称其研究的正确性和“具体性”使之具有真正的实用价值。他们宣称,精确严密自会有其收效。在向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提交的一篇文章中,塔尔科特·帕森斯亲自出面反复强调这两点。他指出,客观的社会分析能够提供用以塑造世界未来的基本工具:“我们是否拥有——或者说我们能否发展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关系的知识,使之作为理性的‘工程学’控制的基础?……我们已经看到的证据显示,答案无可争辩地是肯定的。社会科学是一项发展中的事业;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创设之,而在于如何对其加以利用和发展。那些仍在讨论科学地对社会生活进行研究是否可能的人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事实如此,它将终止这种观点。”^②帕森斯满怀信心地宣称,社会科学家就好似致力于对人类苦难进行生物学研究的医生。通过对一系列个案进行严密、客观的研究,他们就会建立充分的知识储备,对治疗各种病症发挥作

^① 关于这次争论,参见 Larson, *Milestones and Millstones*, 8-9。

^② Parsons, “Social Science”, 107, 转引自 Herman,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 128。

用。^①

诸如国家科学基金内部的争论之类的事情对许多杰出社会科学家的启示是清楚的。既然联邦研究经费中的大部分都投到了自然科学领域,既然各大学不断提高对有能力获得制度支持的人的奖励,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就应该效法“硬式”科学。当然,许多社会思想家之所以为更“科学”的辞藻和规划所吸引,是出于本人就其学科应该如何促进知识进步所持的看法。然而,制度环境自然是要对这种趋势推波助澜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有些社会科学家紧盯着研究经费和学术地位,一心想挤进与冷战事业所相关的行列当中,他们也转而宣称严格的客观性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

而且在麦卡锡时代,这种做法还有一些额外的好处。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的著作被认为对美国的国内生活持过分的批评态度,这些著作以不爱国为由受到猛烈攻击;而保守分子也总是把这样的研究斥为颠覆性的左翼“意识形态”的表现。为免遭这些攻击,受国家科学基金雇佣的一位社会学家哈里·艾尔波特(Harry Alpert)建议他的同事“要划清与社会改革运动和福利活动之间的界限,特别是别让自己听上去和社会主义有什么瓜葛”。^② 宣称有严格的客观性,是为了避免被指控为含有颠覆性内容,也是为了增加一点知识进步的感觉。社会科学家都要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冷战斗争中站在正确的一方,而且他们能够帮助美国取得胜利。

在政府的国家安全体制、公益基金、联邦经费支持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形成了新的联盟,而现代化理论家则直接从这个联盟中分沾利益。他们自信能够提供帕森斯所许诺的那种“理性的‘工程

^① Buxton, *Talcott Parsons*, 128.

^② Kleinman and Solovey, “Hot Science/Cold War”, 121。另参见 Solovey,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Identity”, 40—49。

学’控制”，所以也追随着帕森斯，坚持认为他们的研究是真正“科学的”，而且他们的专业知识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所用。他们指出，客观的分析将会引领社会理论走出玄奥的思辨推理。它将促使脆弱而敏感的“发展中”世界信服这样一个道理，即自由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是通向政治自由和高生活水平的真正的、惟一的道路。理论家们都力争跻身于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所说的“资本密集型研究体系”——这是一个“由须对公众的政治压力做出反应、完全以军事为优先的政府所赞助的体系”。^①由此他们也宣称调查研究中的严格细致和研究成果对政策的实用性是密切相关的。这群知识分子的想法是，保卫“自由世界”需要进行科学上的探索。他们使用的语言模糊了政治判断这个固有的问题，而他们正是以这种语言将“意识形态”隐藏在他们的方法论力量背后。理论家们试图在科学的完整性与知识武器的制造二者之间进行调和，所以他们强调，而且也总是相信，自己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不会影响他们所生产的“真理”。无论是面对外国听众还是本国听众，他们都会论证说，现代性和现代化都不是政治建构的产物，它们都是社会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客观现象，它们是事实。

理论家们相信现代化作为一种为“新兴”国家提供的发展模式极具价值，所以也认为，对现代化现象在全面观察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加以阐述，就可以帮助决策者对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另一条发展道路提出挑战。为了使自己的专著和文章站得住脚，他们采用了各种分析论证的技术，其中包括数量化、多元指标体系、标准化方法手段的应用，由此使他们的作品显得客观公允不偏不倚。^②罗斯托的五阶段论创造了一组范畴，可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

^① Hollinger, "Free Enterprise and Free Inquiry", 900.

^② 关于科学史上类似的例子，参见 Poter, *Trust in Numbers*。

加以分类。而另有一些理论家的工作更是一大二全,将整个新兴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分析对象。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布莱克(C. E. Black)似乎推动了充斥着奇思怪论的社会理论发生转折,使之更注重具体的经验研究。他表示,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案对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加以理解,即:确定出五个重大的质上的事项和四个不同的时间阶段,并在这些阶段中根据权力转移的时间、变化的动力来源、领土幅员、人口、是否有殖民地经历以及制度结构对变化力量的适应性等因素确定出五种不同类型。布莱克的分析最后产生了一个由七个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构成的图谱,以及一个长达五页纸、用以对 148 个国家加以分类的表格。^① 在其标准范畴和统一指标的作用下,布莱克理论路径的主观性得以淡化。城市化,积极的行为方式,对社会地位变化的期待,对西方价值的心理态度,以及组织的灵活性,诸如此类的概念似乎都不再是抽象的和随意编造出来的社会学学术语或理论概念,而成为用以进行客观的表达和分析的清晰明确的数据资料。

丹尼尔·勒纳之类的学者对布莱克已经划分出来的进程加以数量化处理,由此也产生了与后者类似的效应。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中指出,现代化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公民中一种“流动性人格”的兴起。在那些人们的相互依存程度高、积极进取的社会伦理盛行的地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就可获致其存在的基础。和布莱克一样,勒纳也指出,他的结论并非来自主观推断。为论证“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和传媒的参与”都是现代化普遍进程的组成部分,他显示了各种因素之间纷繁复杂的相互关系;然后,他试图将社会学要素与人类移情的心理学特质结合起来,而后者是“身处现代化情境中的人们做出的反应”的“关键变量”和“共同要素”。尽管他的分析材料来自美国

^① Black,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10 26, 67--68, 90--96.

新闻处(U. S. Information Service)搞的数以百计次的访谈,但他还是费了很大力气来抹去任何在学术上不够独立的痕迹。他采用所谓“隐性结构分析”(Latent Structure Analysis),试图证明现代化之个体的、移情的要素与他所谓的现代化之社会的、制度的表现是相互关联的。根据都市主义、识字率、职业身份、大众媒体的覆盖率和移情等项目判定正面或负面的价值在个体中的分布,勒纳的研究架构给出了五个变量之间 32 种可能的组合方式。

鉴于自己的研究围绕着每一种特定的反应模式都调查了大量个体的案例,所以勒纳断定他关于心理变量和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是正确的。尽管他也承认以二分模式收集统计资料有某种程度的随意性,但他在一个五组、32 行的表格中提出 16 个“现代的”、五个“过渡的”和 11 个“传统的”“项目模式”(item patterns),使得这张表格本身就能确定“高”、“中”、“低”三种过渡性的次级类型。以这些“从经验上再次确证”了的结果,勒纳宣称将社会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在他的模式中,评估现代化以及对“移情”的隐性特质进行量化分析当中的主观成分似乎都在标准化的数量关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① 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假设相反的是,现代性几乎对人与人的关系不造成破坏。“现代的”公民,而不是贫穷的、与世隔绝的和疏离的个人,才具有决定性的移情品质,能照顾到他的同胞公民的需要,并适合于过民主的生活。

与布莱克和勒纳的著作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阿列克斯·英克尔斯和戴维·史密斯(David H. Smith)的《走向现代:六个发展中国家个人的变迁》。在这部书中,为了证明现代化在经验上的有效性,两位作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论证说,社会心理学将清楚地揭示过渡阶段的情形。英克尔斯、史密斯及其研究助手向阿根廷、智利、印度、以色列、尼日利亚和东巴基斯坦(后来的孟加拉国)

^① Lerner,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438—46.

六国近 6000 名年龄在 18 岁至 32 岁的人进行了提问调查。两位作者判定,“那些能够通过参加大规模生产事业(如工厂)而诱导出来的个人品质”就是现代的。所以,围绕着“对新经历的接受程度”、“对社会变迁的准备情况”、“意见的增长”、时间的有效利用、是否愿意信任他人、个人进取心、对他人尊严的尊重之类的问题,二人对其访谈所得的结果进行了梳理。然后,他们将这些品质与一系列在亲缘关系结构、对女性权利的态度、宗教、工作态度和社会分层等项目下的观察结果结合起来。所选择出的这两个研究主题最后又派生出第三组测度行为的指标,其内容包括投票、参与宗教活动、读报、听广播和讨论政治问题等方面。^①

除了利用多元回归、相关性检验和差异性检验等等标准化手段,这个研究小组还把计算机作为分析工具。在计算机上摆弄一番,长长的数据带和成千上万张 IBM 卡片被分门别类地整理,然后就得出了最终的结果即“总体现代性尺度”(Overall Modernity Scale)——一个用以比较“传统村落”中的耕作者与那些已经迁往城市、已在工业行业工作三年以上的人们的复合指标。这些作者设计了一个图表,就现代性列出 24 个重要的主题,并且给个人从 0 到 100 打分。用这个图表,他们就可以度量个体与现代制度(如学校和工厂)的相互作用程度。将按照总体现代性尺度所给出的分数置于纵轴,将与现代生活交往的程度置于横轴,这样研究小组就确定出他们所考察的个体的位点,并连成一条曲线。他们发现,对各个不同国家而言,曲线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宣称,现代化是一种普遍的、总体的综合性状,它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在各种情况下,新生的现代公民都会成为“通达的参与

^① Inkeles and Smith, *Becoming Modern*, 5, 6-8, 18-35. 这项宏大的研究由英克尔斯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时设计和启动,但直到 1974 年才发表。

者”，具有“独立自主”和“开明圆通”的特点。对那些被他们的理论认为是“充分面向”工厂劳动和学校教育的人，作者们发现可以肯定其中有76%可以被算作是“现代的”。英克尔斯和史密斯自豪地宣称：“我们那一组数量不多的基本解释变量和个人现代性分值之间的多重相关性高达.79。”他们在那些在被研究者贴上“现代”标签的制度中工作的人群中发现了“现代”要素，这种研究在逻辑上的循环性似乎被隐去了。通过经验分析，英克尔斯和史密斯已经克服了“我们专业中不断感受到的失落感，因为我们的论断必须经常性地做出保留，这就使社会学的基础学科色彩少了一些，而增加了那种限于诊断评估的实用学科的色彩。他们宣称，一种客观的、科学的方法已经证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既不是——一种纯粹的类型学意义上的类型，也不是一种破坏性力量，而是一种普遍进程，对个人和社会都有根本上的好处。^①

在冷战的背景下，联邦政府和私人公益基金都支持宣称要廓清现代化进程并找出加速现代化的手段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家们指出，为了控制共产党扩张，美国除了投资于新军事技术外还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它也要求社会科学生产出关于政治权威、经济组织、苏联和“边缘”地区的社会关系的知识。有人相信，苏联为了削弱“美国的相对世界地位”已经启动了一个“政治、经济和心理战争”的计划。这导致美国对社会分析的兴趣大为增加。^② 1948年，卡内基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与哈佛大学合作组建了俄国研究中心，该机构关于苏联社会体系的研究在正式发表之前要被送交联邦政府。^③ 两年后，福特基金会宣布实施一项新计划，以支持对人

① Ibid., 7, 12-14, 34-98, 290.

② FRUS, 1950, 1; 288.

③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50-110; Geiger, *Research and Relevant Knowledge*, 50-52.



在冷战年代的美国“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中,军人和知识分子的交往更加频繁,相互之间的目标、兴趣和观点也更接近了。图为1965年2月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访问南越,在西贡机场受到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右)和驻南越大使马克斯维尔·泰勒的欢迎。

类行为的研究;而且启动了多项课题研究,目的是回答如下问题,即美国如何促进和平,培育民主,加强世界经济的稳定等问题。特别是为了支持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福特基金会于1951至1954年间在多项国际研究项目上耗资5,400万美元。^①苏联在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后不久,联邦政府根据国防教育法案也在大学生贷款、研究生奖学金及其他广

^① Buxton, *Talcott Parsons*, 168-69, 175. 到1975年,该项数额达到3.4亿美元。参见 Rosenzweig, *Research Universities*, 111.

泛的语言和地区研究计划等方面提供了大笔的费用支持。^①

对经费支持、个人威望和为国家的反共斗争作贡献的机会孜孜以求的现代化理论家们发现,美国的外交政策设计者当中有他们热心听众。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的设立和运作就是一个醒目的例子,它体现了一种试图把客观的现代化理论和冷战斗争结合起来的努力。1950年,国务院曾就“特洛伊计划”(Project TROY)——一个向苏联干扰美国对苏广播发起反击的计划——向麻省理工学院寻求帮助。在麻省理工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约翰·布尔查德(John E. Burchard)领导下,一个由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小组接手了该计划。他们提出,在就对苏广播的技术方面进行考察之外,还应该就与苏联公民的交流所带来的更大的好处进行研究。在前中央情报局助理局长、经济学家马克斯·米利坎(Max Millikan)的指导下,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在1952年建立,其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正如研究中心成员沃尔特·罗斯托所说,这个机构的使命是“将公共政策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②他后来回忆说,“朝鲜战争促使我们当中一些人相信,阻止和遏制共产主义力量扩张的势头的斗争将是长期的,美国未来一代的对外政策需要新的观念”。^③

该中心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其中包括现代化理论家丹尼尔·勒纳、白鲁恂和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它一成立就致力于生产两种内容相互关联的研究报告。对“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有关分析由福特基金会和洛克非勒基金会提供经费,面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现代化(或者按有的报告的说法是缺乏现代

① Geiger, *Research and Relevant Knowledge*, 165.

② Needell, “‘Truth Is Our Weapon’”, 417; Killian, *Education of a College President*, 65—67.

③ Rostow, “Development”, 240—41.

化)的研究则继续接受中央情报局的支持。^① 在其后四年内,该中心还聘用了 70 多人,支持由博士后学者、访问学者和外国专家组成的一个“流动研究分遣队”。^② 麻省理工学院小组始终通过现代化理论框架研究“发展”进程,把他们的集体工作解释为“一种跨学科分析的尝试”。为了取代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单独的研究工作,他们决定“尝试对得自这种研究的诸多洞见进行加工利用,进而就新兴国家正在经历的过渡进程提出合理而完整的描述”。该研究小组还提出,美国能够防止“过渡”阶段中共产主义颠覆的危险。美国要通过外援和发展计划促进现代化,从而能够“帮助那些社会沿着一定的道路前进,使之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长期利益,而且符合我们自己的长期利益”。^③

尽管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开展的是国家设立的研究项目,依靠联邦政府的支持,而且将现代化作为明确的政策目标,但是它却不断宣称其分析是独立、客观的研究的产物。他们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裁剪加工,以使他们所提出的具体的变量能够为决策者所用,这种做法对于这样一群立志于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人来说似乎并没有引起什么顾虑。麻省理工学院的分析家们力求将现代化、消除贫困、增进民主和国家战略结合起来,而且宣称在学术探索和冷战责任之间没有任何相互抵牾之处。按罗斯托的说法,国际研究中心从来没有违背麻省理工学院教务长朱利叶斯·斯特雷顿(Julius Stratton)的训导,即这所学府应该“保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当然也要保持对政府的完全的知识独立”。只要“保持高水平的专业水平和学术诚实,那么,对变动不居的世界进行现状研究和预测性研究就会丰富我们的科学知识”。即使在中央情报局持

① Ibid., 241.

② Geiger, *Research and Relevant Knowledge*, 69.

③ Millikan and Blackmer, *Emerging Nations*, V, ix-x.

续资助该研究中心时，罗斯托也宣称中央情报局从未“试图影响我们的研究或结论”。^① 尽管麻省理工学院小组有意识地将制造涉及政策问题的知识和推动科学进步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但其成员在二者之间是看不到任何冲突的。

而且，在这样宣称的同时，罗斯托及其助手也在积极寻求与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制定者建立合作关系。早在1954年，米利坎和罗斯托就曾向高级官员强调过现代化的战略重要性。在致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一份备忘录中，此二人解释道：“如果人的能量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发挥出来，而且针对在民主框架下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赋予他们以某种成功的希望，那么我们相信极权主义政府形式的吸引力就会大为减少。在短期内共产主义必须从军事上加以遏制。在长期内我们则必须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来推动这样一种局面的深化，即使直接或间接地威胁我们的那些社会不向前进化。”两位经济学家也承认：“每个社会都必须找到适合它自己的传统、价值和愿望的增长方式。”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恰当的道路，美国扩大其介入又有什么好处，他们在提出建议时却几乎没有显露出丝毫的迟疑。他们强调：“自由世界成功地照看着欠发达国家越过艰难的过渡阶段而走向自促的增长，这将打破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一个危险的神话，即只有共产主义能变革欠发达社会。”^②

1957年，罗斯托和米利坎出版了《关于有效的对外政策的关键的建议书》(*A Proposal: Key to an Effective Foreign Policy*)，这是他们上述讨论的解密版，在华盛顿的政界引起了广泛的

① Rostow, "Development", 211.

② Millikan and Rostow, "Notes o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Memorandum to Allen Dulles, May 21, 1954, 转引自 Simpson,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41, 42, 44.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是战后新兴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是“现代化理论”在经济学中的代表人物。其出版于1960年的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对美国关于第三世界发展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理念有重大影响。作为政治谋士和政策规划人员,罗斯托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内更直接参与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作为肯尼迪政府内头号研究欠发达世界的专家,罗斯托曾指着地图说,苏伊士运河以西归邦迪管,运河以东归他自己管。1964年至1966年,罗斯托还兼任美国驻争取进步联盟美洲国家间委员会代表。(图片来源:约翰逊图书馆)

讨论。该书号召实施新的计划,以“推动那个(欠发达)世界的演进,在这里,对我们的安全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方式的挑战似乎不大可能出现”。二人继续解释说,“世界上大部分人对政治向来是迟钝的,但是现在美国可以开始将世界上新近迸发出来的人的能量引上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方向”。通过投入100亿至

120 亿美元的长期性资金,实施国家发展计划,根据受援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提供援助,美国就能完成其“推动民族独立和人类自由的原则向全世界扩展的使命”。向“现代性”的过渡不可避免地是一个不稳定的过程。在现代的技术和价值的冲击下,旧的社会组织形式将会逐渐消逝,这使得各社会很容易受“外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号召的影响。但是如果美国指导着发展中国家穿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危险阶段,那么一个更自由民主的世界就会出现。罗斯托和米利坎之类的思想家指出,关键在于加速现代化进程。^①

这些想法给来自麻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肯尼迪留下了深刻印象。1957年,他为制订对南亚发展的政策建议书而向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征求意见。肯尼迪希望把共和党政府在对付“边缘”地区持续的叛乱上的失败搞成一个有利的竞选议题,于是派其助手福莱德·霍尔本(Fred Holborn)前去会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比尔·梅林鲍姆(Bill Malenbaum)和罗斯托。在罗斯托应邀出席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后,肯尼迪和参议员约翰·库柏(John Cooper)成功地促成了一个决议案的通过,要求艾森豪威尔政府研究南亚发展问题,而这一行动导致了一个正式的世界银行代表团。^② 麻省理工学院小组对自己被派上新用场感到高兴,它还从其设在新德里研究中心为肯尼迪和库柏提供演讲稿、报告和关于印度发展的资料。^③ 在向椭圆形办公室^④进发的过程中,肯尼迪对非殖民化问题的看法有了进一步巩固,而他和麻省理工学院小组的关系也更紧密了。1959年2月米利坎亲自向这

① Millikan and Rostow, *Proposal*, 3—4, 8, 70—71, 131.

② Rostow, Oral History Interview by Richard Neustadt, April 11, 1964, transcript, JFKL; Rostow, *Eisenhower, Kennedy, and Foreign Aid*, xiii, 36—44

③ Merrill, *Bread and the Ballot*, 155.

④ 白宫的一个主要办公室。

位参议员陈述自己的想法,其间强调了他的这样一种观点,即“采取一项远远超过(艾森豪威尔)政府当前立场的新举措是今年的头等大事。”^①在总统大选后,他直接将麻省理工学院小组带到白宫的政策规划系统。罗斯托和米利坎加入肯尼迪对外经济政策的交接工作组。二人四处游说,主张树立新的“更清楚更有建设性的形象,充分显示我们的目标以及我们对民族国家建构的兴趣”。^②

肯尼迪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政策制定者们自信美国的经济力量、专业知识和全面计划能够使它迅速取得国际成就,而他们也相信美国能够将民族主义力量和发展中经济体制引向自由和民主的轨道。在1961年3月对国会的一次讲话中,肯尼迪大胆地提出了他的方针。总统强调发展进程的重要性,进而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的历史时刻。世界的整个南半部——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正全力投入伸张其独立和使其古老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事业。”肯尼迪还警告说,共产主义的压力威胁着进步事业的开展;但美国的援助将击退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而且将会“向历史展示:在20世纪,在地球的南半部和北半部,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能够携手并进”。总统认为,在这一危机时代,长期的借贷机构,其他“自由的工业化国家”在资金上的贡献,以及对那些充分准备好要进入“自我持续的增长”阶段的国家的特别关注,这些都是必要的。为了协调行动,肯尼迪建立了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授予它以统筹技术援助、贷款计划、发展计划和军事援助的权力。肯尼迪还对美国的外援任务做出了

^① Millikan to Kennedy, February 6, 1959, Millikan Papers, box 1, “Correspondence, 1959–1961”, JFKL.

^② Memorandum, Millikan on “Foreign Aid Program”, NSF, box 324, “Staff Memoranda. W. W. Rostow, Foreign Aid, 1/1/61--1/10/61”, JFKL.



决策者和学者都相信社会科学为美国对付冷战中的世界提供了正确而有效的观点、方法和技术。肯尼迪和他们的幕僚们意识不到美国观察世界、特别是观察第三世界的方法有什么问题。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广泛的规划。向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和公务人员培训计划进行投资,并实施全面的发展计划,也都成为包罗万象的“发展十年”的组成部分。马歇尔计划成功地重建了欧洲经济,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向穷国提供了技术援助,而肯尼迪和他的策士们要着手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界。^①

社会科学家广泛地参与了肯尼迪政府的政策规划。除了罗斯托和米利坎,还有许多其他学者受命参加现代化规划工作。哈佛经济学家爱德华·梅森、戴维·贝尔、林肯·戈登、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都曾论证过宏观经济政

^① Kennedy,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Foreign Aid”, *Public Papers*, 1: 203, 2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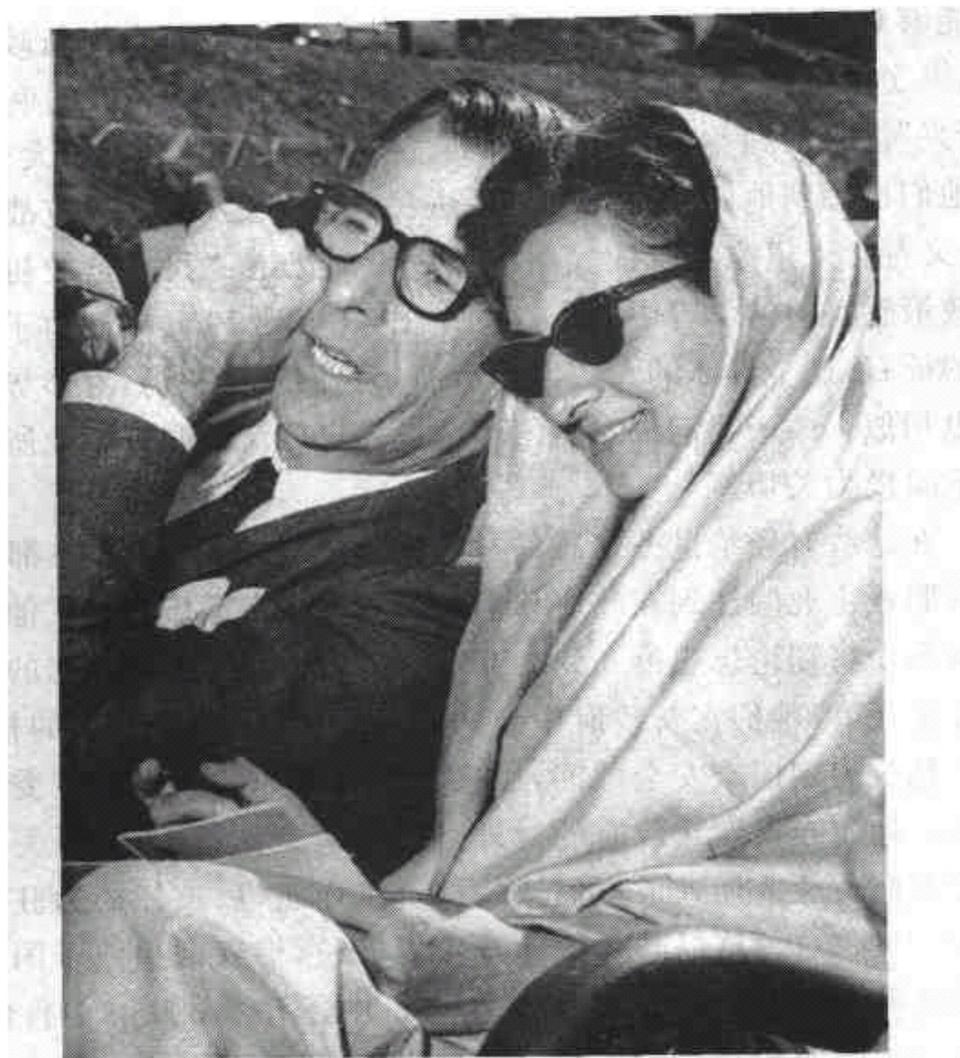
策能够对国外的发展产生显著成效,他们也纷纷前来为新政府效力。^① 这些社会科学家关切安全问题,但也坚信美国的利益与“新兴”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促进的。决策者的大门为他们大开着,而他们也感到他们的研究可以促进民族国家建构,既适应战略需要,又符合人道主义目的。罗斯托后来回忆道:“我只是最初对公共政策感兴趣的学者中的一员。在1959年到1960年间由于肯尼迪的征召,这个群体的人数大为增加。我们年龄相仿,对形势的看法也相似。……我们都对美国和全世界更广泛的和平事业所面临的危险极为关切。”^②

在这些有经纶世务之志的社会科学家当中,有许多人都把他们的职业生涯倾注到在政府和学术界之间往来穿梭之上。他们驾轻就熟于将理论思想推介到官僚机构中去。作为踌躇满志的自由国际主义者,他们在新政府中位居要职,为其提供知识上的根基。罗斯托成为副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又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加尔布雷斯在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工作组,后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戈登加入了肯尼迪的拉美工作组,后被任命为驻巴西大使。贝尔白预算局升任国际开发署署长,梅森则担任了国际开发署顾问委员会主席,而该委员会成员中还有米利坎和白鲁恂。^③ 斯坦福大学的发展问题专家尤金·斯塔利(Eugene Staley)成为越南政策顾问,密西根大学教授萨缪尔·哈耶斯(Samuel P. Hayes)

^① Schlesinger, *Thousand Days*, 586-94. 关于以上各位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思想,参见 Maso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Galbraith, “Positive Approach to Economic Aid”。

^② Rostow, *Diffusion of Power*, 125.

^③ 作者于1994年10月19日在麻萨诸塞州康桥对白鲁恂的采访。根据白鲁恂的回忆,整个委员会最初设立是为了帮助建立国际开发署,但在整个约翰逊政府期间仍然召集会议,其角色是研究外援问题和就新的发展观念提出建议的论坛。关于这其中许多人的传记资料,可参见 Lichtenstein, *Political Profiles*。



自由派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也进入肯尼迪政府，成为美国驻印度大使。但他后来也对政府的越南政策提出很多批评。图为加尔布雷斯与印度当时的第一夫人、尼赫鲁总理的女儿英迪拉在一起。

在美国和平队的策划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人际关系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现代化理论也投入了冷战斗争，因为它明确提出了变迁所需要的普遍条件，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一整套看上去新颖而又有力的分析工具。像作为其前身的老旧的帝国意识形态一样，现代化理论将对“落后的”外部世界的研究与对美国自身的“先进”特性的认定结合起来。在学术界和

政府中,与现代化相关的各种观念都赋予这些隐性的文化假设以社会科学的凭证。现代化论者宣称其知识是建立在所谓公正、客观的“没有特定立场的观点”(view from nowhere)的基础之上的,但他们认为自己已达到了现代化的顶峰,而他们正是站在这个顶峰上看世界。^①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自信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回忆道:“到处弥漫着欢欣;我们一度认为世界是我们手中任意揉捏的泥团,未来的前景无限光明。”^②从这种视角出发,现代化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探讨的社会变迁模式。它还是美国的一种观念,是这个国家改变一个急于学到只有美国能教给它的东西的世界的使命。

在冷战的情境下,现代化理论所具有的这些特性使之成为肯尼迪政府政策规划的一个理论来源。这些特性还使现代化理论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反映了一种新的天定命运观念和经过翻新了的帝国思想,此中美国的战略的和物质的目标似乎与该国那种促进民主、消除贫困和推动一个蒙昧世界的“发展”的理想主义的和道德的使命契合在一处。现代化理论重申了一个老旧的意识,即社会研究和政治权力的扩张是相互关联的。最初欧洲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曾希望,非殖民化会为社会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实验室,并为他们报效国家提供一个孔道。现代化理论在言辞上避免了殖民主义主张,但是保留了一种假设,即美国力量的扩张将增进社会科学知识,并增加对社会科学知识加以战略利用的机会。^③在冷战时期,当美国需要在一个因欧洲殖民帝国崩溃而被改变了的地区

^① 关于宣称科学上的客观性的论著,参见 Nagel, *View from Nowhere*.

^② 引自 Decter, “Kennedyism”, 20, 转引自 Paterson, “Introduction”, 15.

^③ Ng, “Knowledge for Empire”, 121-29; Asad,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肯尼迪的政策班底网罗了“出类拔萃之辈”——“最有能力为国家服务的人”，其中多有出身于著名学府的社会科学精英，更不乏研究第三世界和发展/现代化问题的专家。在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上，肯尼迪政府对第三世界的重视程度较以往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就是这群“出类拔萃之辈”将美国推进越南战争的泥潭。图为1961年1月肯尼迪政府的内阁宣誓仪式。

增加其影响力时，这些观念就异常清晰地重现出来，现代化论者所依赖的观念也植根于久远的帝国主义历史当中。

知识渊源和帝国意识形态

一位历史学家最近曾指出,“现代化理论家经常否认他们与早期历史哲学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而且将他们的工作说成是“现代的和科学的,切实体现了理性化进程”。^① 话虽如此,但他们的思想与早期欧洲社会理论极为相似。帕森斯和罗斯托及其同仁使用阶段论,将变迁作为一个综合进程,强调“发达”社会推动较“原始”社会走向现代性终点的能力,凡此种种显示,他们的逻辑与启蒙运动和进化论的社会变迁模式背后的逻辑极为相似。冷战社会科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西方进步而非西方世界则停滞不前。而这正是一个深深植根于帝国历史的问题。即使当世界被正式地加以非殖民化后,现代化论者仍然在与贫穷国家的固有“缺陷”的比较中界定“先进”国家的优点,论述与西方的联系必将对“落后”社会产生积极的连锁效应,宣称增进全球“发展”的途径之一是从美国过去的历史中得出正确的启示。现代化理论中似乎有一种以往传教士观点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混合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关于西方何以具有显著的优越性的思考已不是什么新东西。正如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所描述的,在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上伟大的“水晶宫”里,英国工业革命的各种奇妙产品与非洲、亚洲和中东的手工业品并排展出。可更换零部件的机器需要数十名工人操作,而生产出的产品更是可供大批消费者使用。在展会上,这样的机器旁边就摆放着来自热带地区草席和“野蛮”或“专制”国家的神秘领袖

^① Cmiel, “Destiny and Amnesia”, 355.

人物穿戴的奇装异服。这样布展,为的是显示出一种发展的线性时间秩序,由此向英国观众提供“实物说明”。理所当然地,主办者希望各国人民都会接受上帝所赐的理性,明辨宇宙法则,使自然世界为自己服务。然而十分明显的是,“在履行其普遍使命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迈着同样的步伐,也不会在同一时刻到达终点”。^① 依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之见,伦敦万国博览会的600万观众所看到的是“伟大历史信心的见证。在这样的现代公众娱乐场所布列着的奇妙物件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政治上的确定性。……然而,展览会、博物馆和其他各种奇观不仅仅是这种确定性的写照,它们还反映出产生这种确定性的缘由,也就是以‘客观’的形式造就历史、造就进步、造就文化、造就帝国的手法。”^②

已有几位学者表明,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种展览会所传达的讯息类似于那些致力于阐释独一无二的“欧洲奇迹”(European miracle)的社会理论。^③ 虽说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那些已经“到达”终点的国家当中美国又是首屈一指的,但其实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将他们和他们的知识前辈联系在一起。亚当·斯密、孔多塞和马克斯·韦伯等人都认为自己能够解释欧洲为什么享有独一无二的先进地位,虽然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一样。在《国富论》中,斯密诉诸政治经济学和分工论,力求说明为何“勤劳节俭”的欧洲农民的生活水平远远高出“那些主宰着一万名赤身裸体的野蛮人的非洲国王”。^④ 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历史概略》中,孔多塞指出,欧洲优越地位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能力的不同演进程度。正如个人认识能

① Stocking, *Victorian Anthropology*, 3--6.

② Mitchell, *Colonizing Egypt*, 6.

③ 例如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④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k. 1: 12.

力的发育速度各不相同,作为个人集合的社会也是如此。欧洲人转向系统农业、私有制制度和书写文字的时间远远早于其他地区的人民,他们达到的文明程度与“野蛮”部落形成鲜明对照。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指出,“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在西方文明中显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正如我们乐于认为的那样)才存在于一条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道路之中”。韦伯分析了宗教体系中的道德律令,以此解释特殊的西方形式的资本主义理性是如何兴起的。^①加尔文教信徒在对神谕的追求中产生的禁欲价值和焦虑为世俗商业和投资活动赋予一种意义和紧迫感,这驱使西欧新教国家执资本主义发展之牛耳。

在这些思想家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其文化的优势地位一味感到欢欣鼓舞。比如,韦伯晚年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铁笼子”所进行的反思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其中显示出一种阴沉的悲观主义。韦伯为他所描述的“沾染了一种狂躁的自我膨胀的机械化的僵化”感到担心,由此他向世人警告会出现一个空荡荡的世界,在这里“天职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鬼魂似地游荡着。”^②费尔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也和韦伯一样身处 19 世纪晚期,它对田园的、村社的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向都市的、契约性的法理社会(*gesellschaft*)过渡感到哀婉,认为这是真诚挚爱的关系的衰亡和原子化的、充满竞争对抗的社会的兴起。^③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也以一种提倡坚忍克己的议论来调和自己的分析。尽管“势力和财富”可以给那些有钱有势之人的生活以许多好处,但追功逐利使得他们“还是像以往一样、甚至比以往更多地感到对疾病、危险和死亡的焦虑、恐惧和

① Weber, *Protestant Ethic*, 13. (着重符号为原文所有)

② Ibid., 181-82.

③ Tönnies, *Community and Society*.

悲伤”。^①然而,这些思想家都想解释欧洲的惊人发展,为此谈及创新的关键作用、知识的质量和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神价值。由于这些基本要素在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所以那些地方也就不会出现类似的“进步”。

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家也从文化方面在“先进”国家和他们试图要分析的发展中世界之间划下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美国和西欧总是被认为体现了现代性的质素,由此它们享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在分析西方对中东的学术研究时,爱德华·萨伊德指出:“……欧洲文化将东方作为一种替代物、甚至一种潜在的自我与自身加以比照,由此获得力量和自我认知。”^②类似的动因也可见诸现代化理论之中。罗斯托、帕森斯之类的学者,甚至还有爱森斯塔德——一位最初对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批评的重要学者,都赋予美国和欧洲的社会以特殊的质素,同时给顺着西方道路苦苦前行的其他地区并列出诸般缺陷。罗斯托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确定为“特例”,而这些国家的特点是“都没有沉陷于传统社会的结构、政治和价值当中”。这种做法与帕森斯乃是异曲同工。帕森斯在《现代社会的结构和进程》中认为,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与“东方的伟大文明——明确说就是中国和印度”相比,“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方面显现出高度的积极有为的倾向”,而后者则有“完全不同的性格”。爱森斯塔德也跟从这种做法,将包括“西欧、英格兰、荷兰、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和美国”确定为一组具有共同特点的社会,此中现代化进程“或多或少是在中心阶层和其他各社会阶层同时发生的”。他承袭了韦伯的思想,认为由于存在着中产阶级和新教的企业家价值,所以这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对现

①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t. 1, chap. 1, para. 8, 转引自 Hout and Ignatieff, “Needs and Justice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10

② Said, *Orientalism*, 3.

代化的影响是开放的”，而其他地区则不然。^① 与其知识前辈一样，这些理论家也致力于论证与独特的行为和价值有连带关系的变迁只出现在“现代”“西方”文化当中，以此为基础提出对成功的发展经验的解释。他们用导致“传统”世界落后停滞的弊端来对照出西方的优点，由此他们最终要阐明的无非是，西方的优势不在于自然资源或军事征服，也不在于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决定性的因素深深植根于西方传统中固有的价值。

为了解释这种基本的二分法，美国社会科学家通过一个仿照自然界进化的模式来勾勒现代化进程。与他们之前的 19 世纪思想家一样，许多 20 世纪的理论家也认为民族国家的历史与有机体的演化是类似的。在赫伯特·斯宾塞等试图创立关于历史和社会进化的普遍性、综合性理论的人的思想中，这种想法起了很大作用。斯宾塞认为，由于社会是综合的整体，而“进步”又与结构性“秩序”的强化密切相关，所以可以通过观察社会组织之逐渐明晰化、法规化和专门化的程度辨别在进步程度上的差别。像后来追随他的现代化理论家一样，斯宾塞也是在静态的结构框架内解释差异性，由此将差异断定为在向更稳定、“更具确定性”的格局运动过程中在时间上的差异。他曾这样说：“一个居无定所的野蛮部落在地方性和内部分配方面都没有被固定下来。他在与其组成部分的相对关系上较一个民族国家远为不确定。在这样的一个部落中，社会关系是混乱而动荡的。政治权威既没有牢固的基础，也没有确切的身份。等级差异既没有明确的界限，也不是不能逾越的。除了男女居民有职业差别外，没有完整的产业分工。……然而，这些原始社会中的一个如果出现进化，则其会逐步趋向专门化。”斯宾塞认为，“当社会向成熟迈进时，分工的明确性就会增加，而且会

^① Rostow,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17; Parsons, *Structure and Process*, 138—39; Eisenstadt, *Modernization*, 55—58.

得到更多样的体现。”^①

由于变化的法则和自然的法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运作是一致的,所以所有的社会都沿同一条道路行进。于是不同的社会就分别代表了最发达民族历史上以往各个阶段,或者说甚至代表了整个人类社会和文化以往各个阶段。^②向西方式的终点运动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自然进化过程的结果,而各社会都以不同的速度经历这个过程。乔治·斯托金曾表明,这类假设贯穿于欧洲扩张史的始终。所谓“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组成的部落社会”显示出“与早期欧洲社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的说法看来是极有道理的。想来在欧洲人精神和文化的进化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进步要远远超过其他民族。西方学者断言:“只要在比较方法的框架内审视社会精神的进化,则不仅我们的尼安德特人和爪哇人先祖,还有现存的‘野蛮人’群体都应该被视为处于智力发展的低级阶段。”^③

尽管美国现代化理论家经常以对文化价值的优越性的强调来取代对生物决定论的公开主张,但他们仍然把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说成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帕森斯强调“一个明确的和经过充分分析的进化尺度”的重要性,罗斯托谈论“经济增长在本质上的生物学方面”,就都反映了他们把社会变迁理解为一种有机的整体进程。^④理论家们把美国作为现代化的终极范例,认为仅仅根据其他国家与这个进化的终点的距离,就可以估量其他国家的现代化

① Spencer, *First Principles*, sec. 134, 转引自 Leaf, *Man, Mind, and Science*, 76—77.

② Bock, “Theories of Progress and Evolution”, 24.

③ Stocking,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114, 131. 关于这个论题,另参见 Pratt, *Imperial Eyes*.

④ Parsons, *Structure and Process*, 163; Rostow,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36.

程度。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强化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是美国的决策者和普通读者都热切期望的。迪安·蒂普斯(Dean Tipps)曾指出,单独根据与“发达”国家的比较来为“发展中”国家分类,这种做法“为现代化理论家提供了一个认识图式。这个图式由从理论家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的直接经历中抽取出的相似的、稳定的范畴组成。根据这个图式,就可以对‘相对非现代化的社会’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加工”。^①如其先辈一样,许多冷战理论家调用了一套目的论的自然法则,借此逃避研究特定“新兴”国家具体的历史和文化特性的责任。由于外国的社会被当作一个综合的有机系统,并被置于一-条普遍的发展路线之上,所以对它们进行评估就只需要一些根据西方或美国自身特性得出的固定的指标。全世界代表了一组“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的记录”,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落后民族是“当代的先祖”或者“原始的当代人”。^②

由于美国已经抵达现代性的顶峰,由于欠发达社会注定要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行,所以美国的历史就显得格外有用。理论家从美国的历史中发掘可供其他国家吸取的“教益”,而且以一种怀旧的笔调把美国历史描写成一个美好和谐的故事。在他们笔下,美国现今的制度似乎成了早期历史的质朴传统和理想的延续和再现。于是美国革命似乎成了一个特别恰当的历史案例,被用来充当现在处在奋斗中的国家的楷模。政治学家威廉·奈斯比特·钱伯斯(William Nisbet Chambers)虽说还不至于宣称其他国家应该一点不漏地复制美国模式,但他还是提出: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发展向全世界显示了“温和的、实用主义的路线的价值”,显示了“为提高和训练领导人而推行广而专的教育”的重要性,显示了“负责的反对派”的作用,显示了政党之“容纳多元主义力量和赋予公共

^① Tipps, "Modernization Theory", 207.

^② Nisbet,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205.



自由女神像上写道：“把劳苦的、贫困的、畏缩的，但渴望自由呼吸的人民交给我吧。”美国外交史学家韩德指出：“在政治文化稳定的国家中，意识形态有一种执着的倾向。美国从未受过社会革命的大震荡，也从未受过外国的入侵或占领，同其他国家相比，它享受到很大程度的政治社会稳定。所以，毫不奇怪，伴随着体制结构以及社会与政治的价值观的延续而来的就是外交政策领域中意识形态的长期延续，这在近代世界性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

源自基督教的“天定命运”观念在 19 世纪后期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美国社会科学的强化，支持了美国的海外扩张。二战后仍然可以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中看到这种观念的影子，尽管它只以隐性的方式起作用：民主和自由是美国的特性，美国负有向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道义和政治责任。

政策以连续性”的功能。在现代化理论的筛选下,意识形态冲突、阶级对抗和美国革命中暴力的一面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是一系列含糊宽泛的概括性说法,内容是关于“新兴”社会如何为了实现“发展”而达成以自由和共识为基础的平衡。^①

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他指出,如果新国家努力争取获得那些“出自我们的革命起源的”、关于平等和成就的“关键价值”,则他们将获益匪浅。作为“第一个成功地反抗殖民统治的主要殖民地”,美国一举丢弃了“传统的合法性来源”,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区分了“主权来源和权威的代理者”。李普赛特承认转型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但他乐观地断言:“整个世界一直沿着美国的方向前进。……而在工业化之前就实现民主和平等的美国则在这些方面中充当先导。”^②对于现代化理论家而言,美国历史所证明的是:走出过渡阶段的路线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以及以共识为基础的,而不应该是激进主义的和充满分裂争斗的。理论家对他们创造的本国社会的理想镜像中“所感悟到的乌托邦”(utopia apprehended)深感满意。在他们的展示性表述中,现代社会成了一个美好的自然进程的完美结果。^③

不仅如此,现代化理论家还分析了变迁的进程,以及“西方”和“其他地方”之间的基本差别。与其知识前辈一样,他们也考察“先进”地区和“新兴”地区之间的交往互动所产生的效应。一些学者曾令人信服地说明,通过提供关于非洲和亚洲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宗教信仰的知识,社会科学研究是如何加速了欧洲殖民事业

① Chambers, *Political Parties in a New Nation*, 13.

② Lipset, *First New Nation*, 2, 11, 130.

③ Lauer, “Scientific Legitimation of Fallacy”, 885.

的建立和扩张。^① 然而帝国主义取向的社会科学不仅仅向决策者提供有用的资料,它还帮助构建尼古拉斯·德克斯(Nicholas Dirks)所说的“文化工程”,而这反映了“权力和知识之间以及文化和统治之间的微妙关系”。^② 美国现代化理论家在其分析中重申了那些为殖民扩张辩护的古老说法。他们指出,与美国的交往是促使那些“停滞”社会发生变化的伟大催化剂,而通过展示西方方式就能使原本缓慢的发展进程得到加速。虽然这些自由派现代化理论家真心欢迎那种正式的、合法的殖民主义的终结,但他们却从为殖民主义提供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中吸收养分。罗斯托承认,殖民主义列强“并没有总是在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工作中做得足够好”,但是“他们不可避免地在思想、知识和制度方面引发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将推动社会走上过渡之路”。^③ 罗斯托解释说,与西方的交往经常产生一种“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通过这种效应,外部的价值和方法可以使停滞的当地制度发生转变,推动传统文化走向进步。美国之音向国外广播的一篇文章声称,发展中国家面朝西方就可以“预先看到现代化过程”。“向上走的国家”所必须做的无非是“考察现今所谓‘先进’社会的生活状况,然后为自己近期内的未来做出规划”。^④ 一位非常敏锐的学者在多年后评论道,理论家们相信“人类进步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落后种族至少还有模仿的能力”。^⑤ 他们认为,照葫芦画瓢就可以

① 参见 Asad,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还有一部著作针对美国对菲律宾的帝国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反思:Rosaldo, *Culture and Truth*, 68—87。

② Dirks, introduction to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3, 11.

③ Rostow,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27.

④ Wood, “Future of Modernization”, 41.

⑤ Mazrui, “From Social Darwinism to Current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76.

增进现代性。

然而,许多理论家认为美国不应该坐等其他国家来效法自己。一个“现代”社会能够积极地创造用以影响“新兴”国家社会生活的制度。除了提供外来投资,“先进”国家还可以贡献科学技术和教育培训,宣讲民主制度的好处,帮助创建更有效的商业组织形式,甚至灌输新的理性精神。而且,受影响的一方在这个方面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丹尼尔·勒纳等学者认为,“传统的”体制和文化在与西方交往中“毫无防守之力”,而罗斯托把这个观点又往前推了一步。他坚持认为,当地对外来入侵的反对和抵抗实际上会促进现代化。毕竟,“反应型民族主义(reactive nationalism)一向是过渡阶段中最重要的和最有力的动机。……拥有有效权威和影响力的人向来希望根除传统社会,这首先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而是因为传统社会已经不能或即将不能保护他们免遭外来的凌辱”。^①于是现代化也就不仅仅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现代化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它也是促使“停滞”社会发生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力。由于真正的动力来自西方,所以“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完全是地方性的和发自人民内心的。“传统派”可以反对现代性,但是他们无法拒绝现代性。他们可以模仿而不能创新,可以做出反应而不能主动出击。世界似乎注定要向着惟一的终点前行,而西方已经到达了终点,并代表着这个终点。

与他们之前的许多社会理论家一样,冷战时期的现代化论者认为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向成功的发展,而他们是在民族和文化的优越感基础上描绘这条道路的。有一些基本要素仅见于西方文明之中,而正是这些要素导致了他们的巨大进步。但是其他社会至今仍只能从西方历史中求得所需的经验。因为对已经标示出的路线的偏离只能延误必要的和重大的转变,所以发展中社会的民

^① Rostow,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26—27.

族主义抵抗只能是排外的和非理性的。道路是普遍有效的,但变化的催化剂独属西方所有,西方才有力量加速那人们所向往的、而且最终不可避免的发展进程。而且现代化理论家还指出,这些结论不是来自于玄思冥想和皓首穷经,而是客观的、科学的分析加上跨学科方法、国家使命和爱国主义道义责任的结果。

正是由于现代化理论融汇了意识形态,结合了客观主义的分析和对国家特性的认知,所以它才有力量去塑造肯尼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并影响冷战时期美国对自身国家特性的建构。理论家夸耀其方法上的严密和科学上的完善,进而把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形态说成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并祛除他们所提出的加速现代化的手段的政治色彩。他们强调自己国家的力量,还为美国塑造出一个受欢迎的形象,即一个帮助其他国家战胜贫苦、压迫和消磨意志的宿命论的进步的国家。白鲁恂宣称,美国人响应召唤,“将自己与那些处于过渡阶段的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帮助他们建立民主社会”。他解释说:“通过传达我们对他们及其面临的问题的真诚关心和尊重,我们能够创造一种新的关系,使我们在一起共同对付所面临的重大问题。”^①在表述这种传教士式的冲动时,现代化论者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谈及作为集体的“我们”。第一种定义是作为一个特定国家的美国,一个卓越的现代公民共同体。他们希望这个国家团结起来为全世界作贡献。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会谈到普遍的关怀,谈到他们在自身现代性的参照下,他们与他们准备帮助的社会共同展望、认识和面对的进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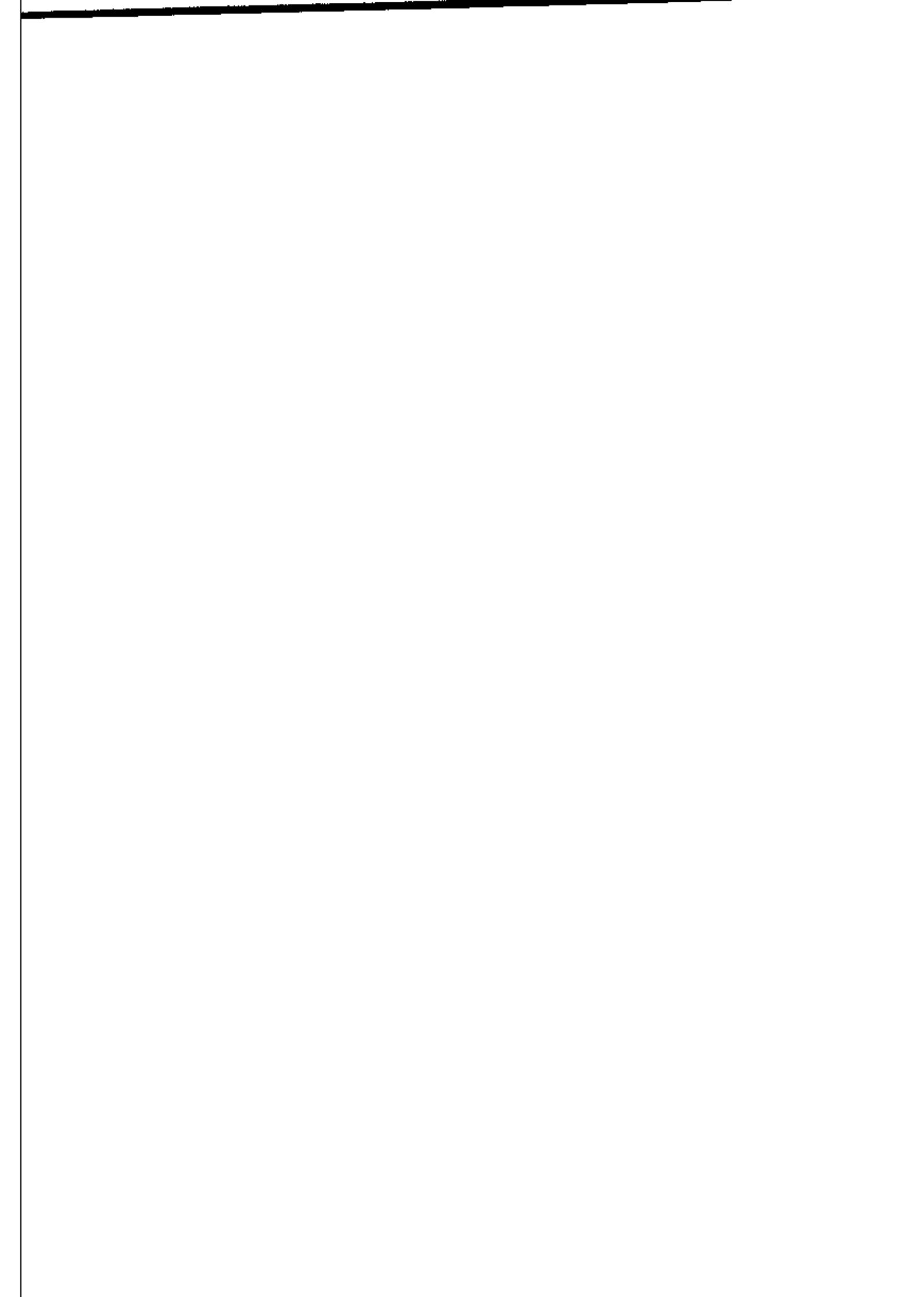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现代化理论强化了美国的战略目标与关于其担当仁义慈爱的世界领袖角色的思想二者之间的联系。至于推动现代化论者的是—种真诚的利他主义原则还是对国家利

① Pye,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g*, 300.

② 关于相关问题,参见 Hollinger, “How Wide the Circle?”。

益的追求的问题,则是一种错误的二元对立式的理解。我们不必为了证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确在起作用而去寻找阴谋和欺诈的例证。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家乐观地认为,美国倡导的民族国家建构能够战胜贫困,能够帮助民主政府的形成,能够提高全球的生活水平,能够保障个人自由,所以他们也真诚地相信防止“民族解放战争”和促进“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家都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某些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有特定影响。还有一些人留在学术界,没有参与甚至根本不想介入决策圈。然而,正如我们对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和越南的战略村的分析所显示的,现代化理论中的思想和假设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理论的辞藻及其基本假设都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冷战文化。无论是在政策制定的制度环境当中,还是在公众话语当中,现代化意识形态都重新塑造了帝国主义理念。它还告诉美国人他们是什么样的民族,以及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国家力量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第三章 现代性、反共主义和 争取进步联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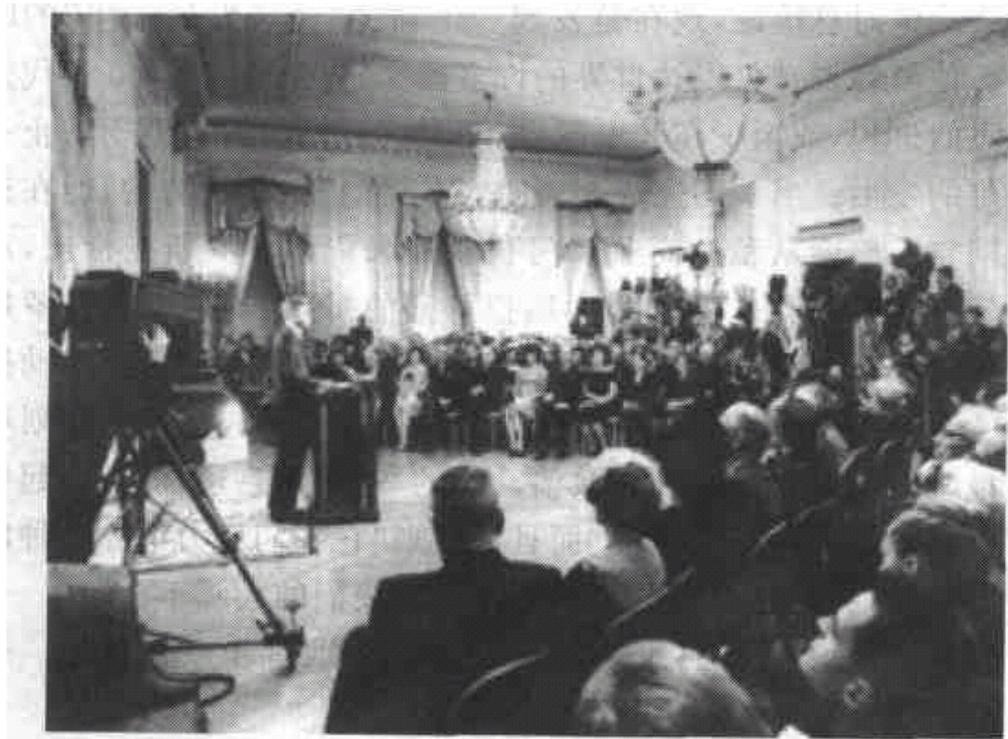
1961年3月2日,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向约翰·肯尼迪总统呈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位现代化理论家兼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此举意在向肯尼迪政府的拉丁美洲特别小组提出的一个建议表示支持。他对总统说,现在是发起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十年”的时候了。他解释说:“欠发达世界的许多国家将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起飞的进程,或至少在其中取得相当大的进展,这有助于防止一场灾难的发生。当一国完成起飞时,它可能仍然是贫穷的,但在这段时期它一般会从私人商业部门获取外来资本。”罗斯托指出,对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的“国际救济”(这是罗斯托本人的用语)都可以终止。通过大量注入外援,美国可以推动拉美80%以上的人口进入“自促的增长”。他补充说,这样的计划不仅可以减少引发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的贫困,而且还具有“燃起各国群众想像力的巨大力量”。而且该计划“在我们努力消除各种麻烦时”,将使“欠发达”地区不再“紧紧抱着我们的大腿不放”。^②

肯尼迪政府在1961年3月开始实施争取进步联盟计划。这

① 本章部分内容曾作为一篇文章发表于《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杂志1998年春季号,题目为“*Ideology, Social Science, and Destiny: Modernization and the Kennedy-Era Alliance for Progress*”。

② Memorandum, Rostow to Kennedy, March 2, 1961, POF, box 64a, “Rostow, 3/61-5/61”, JFKL.

是一个为扭转拉美迅速蔓延的经济贫困和政治高压状况而采取的一项紧急而广泛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了经济增长速度指标,而且号召在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推行名目繁多的改革,还呼吁推动工业化、土地改革和收入再分配。肯尼迪的谋士们信誓旦旦地宣称,只要美国做出全面的规划,并对民主制度予以支持,拉丁美洲就将迎来一场空前广泛深刻的和平革命。他们希望,在美国社会科学家的帮助下,拉美各国将提交详细的全国性发展计划和各种项目规划,由他们来审核。一旦这些计划和项目被核准,美国各政府机构以及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信贷机构将直接提供所需的资金。



1961年肯尼迪在白宫宣布争取进步联盟成立。(图片来源:肯尼迪图书馆)

他们还希望拉美人改进其政策，在国民经济中增加私人投资的分量。美洲国家组织批准的一个正式宪章开列出了一长串目标，其中包括：每一个国家所应该达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出口多元化；加速工业化；提高农业生产率；农地改革；提高预期寿命；提供廉价住房；区域经济整合；消灭成人文盲。而且，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要由那些致力于“改善个人尊严和政治自由的制度环境的政府”来完成。^①

争取进步联盟是肯尼迪政府的经济发展举措中极引人注目、被议论得很多的一个。它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例，可用以说明现代化理论是如何在特定的机构中、针对特定的政策问题起作用的。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家在政府中充当顾问和政策制定者，在计划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手段的选择上施加影响力。作为关于如何加速发展的一系列原则，现代化理论提出了具体的政策选择，以促使争取进步联盟能最大限度地推动各国社会沿着“过渡的道路”走向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然而，在这种社会科学讨论和政策规划之间的直接联系之外，现代化理论还作为一种概念和认知框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就此而言，现代化理论往往远不只是一套被用来产生特定结果的分析性和操作性的工具。它也是一种在各种相互强化的观念之间建立联系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理论宣称自己能够提供客观、科学的知识，由此以有力的方式表达了美国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假设，其内容是关于美国具有的推动民族国家建构的强大力量。现代化理论认为贫困和压迫是社会革命的温床，所以它可以通过减缓贫困和压迫而适应美国的战略需求，进而就履行美国仁慈善良的国家使命作出承诺。有许多人相信，推行自由

① “Charter of Punta del Este Establishing an Alliance for Progres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Operation Pan American,” as printed i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gional and Other Documents*, 101-3.

民主的发展观、对抗马克思主义教义和苏联的支持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使命是并行不悖的。在官方的幕后决策中,在政府和媒体的公开言论中,争取进步联盟都反映出美国的一种自我认定,即认为美国完全能够胜任在“欠发达世界”的冷战斗争。在与苏联和古巴所倡导的发展模式的激烈竞争中,争取进步联盟凸显出美国作为一个先进而又无私的国家形象;通过大力援助一个急切地希望效法自己的创新典范和历史成就的地区,这个国家自身也将焕发出它最伟大的力量。

当然,理论、政策和自我认知之间的关系不能解释和说明争取进步联盟的全部历史。正如已有的众多论著所显示的,这个计划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包括拉美国家的要求,战略上的担忧,先前的发展经验,对军事行动可能引发的后果的顾虑,以及建立西半球的经济纽带的企图。^①然而在本章中,作者通过考察该计划的形成、其重要的活动和公开的言论来追索现代化的观念,进而显示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历史环境中的功能。第一,本书的解释考察现代化理论在确定争取进步联盟的目标的过程中的作用,分析这样一种概念框架如何使得“发展”问题与古巴革命所引发的对国家安全威胁的界定联系起来。为了使拉丁美洲加速走出危险的“过渡阶段”,现代化论者就应采取的办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以指导该地区各国赶在社会革命打断正

^① 参见 Walker, “Mixing the Sweet with the Sour”; 关于战略上的恐惧及这种恐惧对争取进步联盟的形成和命运的影响,参见 Tulchin,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Rabe, “Controlling Revolutions”. LaFeber 和 Dosal 强调了经济因素的作用; LaFeber, “Alliances in Retrospect”; Dosal, “Accelerating Dependent Development”。下面两部著作中的有关章节将争取进步联盟与以往的发展经历结合起来考察; Kunz, *Butter and Guns*. Smith, *America's Mission*. 关于拉美方面的主动提议,参见 Levinson and Onis, *Alliance That Lost Its Way*.

常的发展进程之前就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其次,本章也从公众表达的角度探究这个问题,所以也要考察这样一个问题:在官方和新闻媒体中,现代化思想是如何表达物质援助和价值观念的赠送方和接纳方双方的国民特性的。争取进步联盟的情况显示,反共主义(anticommunism)是战略斗争和经济斗争,同时也是一场文化战争。

最后,本章在对争取进步联盟的解释中,还要探究现代化意识形态是如何限制异议和批评——即使在该计划已明显无法达成其既定目标时,对这个计划的不同意见和批评也受到限制。现代化是一种将特定政策和深层次的民族自我感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它实际上削弱了官员和谋士们认识和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的能力。虽然有许多人对具体的管理问题不满,指责拉美人要为计划的明显失败负责,或者呼吁对私人投资给予更多关注,但很少有人对这样一种基本假设提出质疑,即:只要引入“现代”价值、资源并予以监护指导,则“欠发达”地区的巨大变迁就可以被启动。在争取进步联盟这个案例中,现代化意识形态塑造并支撑着一个雄心勃勃而又热热闹闹的计划,其意图是将促进拉美发展与遏制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它也使僵化的模式被套用到对社会变迁的分析中,把内容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归结为单纯的主观愿望问题;它使美国那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得以反复申述,宣称美国拥有改造这个奋斗中的世界的力量、知识和权利。在宣称自己要取代伊比利亚殖民主义的古老传统、对卡斯特罗的现代革命路线提出挑战的同时,美国却使自己的帝国主义理念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数位学者曾指出,最初呼吁推行西半球发展计划的声音来自拉美内部。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初,该地区的经济形势普遍处于起伏波动之中。在大萧条时期,拉美在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市场严重萎缩,而广泛的贫困也使内部需求锐减。第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了对拉美生产的原材料的需求,美国政府非军事部门的采

购额达 44 亿美元。由于拉美拥有丰富的稀有金属、石油和肉类，所以历史学家史蒂芬·拉贝(Stephen G. Rabe)将拉美称为“美国和联合国的储备仓库”。^①然而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末，繁荣消退了，该地区在小麦、咖啡、锡和铜等重要产品上的外汇收入再次跌落，不足以弥补其进口制成品的费用。医疗卫生方面的进步降低了死亡率，但是在人口净增长速度加快的同时，失业率也随之攀升。拉美各国没有多少内部积累可用于投资，而正统派通过贸易发挥“比较优势”的主张又经常导致贫困加剧，而且使得精英控制的出口部门在自身扩张的同时却无助于缓解大众的贫困。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带来严重的问题，因为经常依靠外国投资建立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提高大众收入，也就无法为昂贵的商品提供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拉美各国受这些情况影响的程度不同，但大多数国家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确长期处于一种令人痛心的状况。^②

前途也并不光明。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ECLA)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地区机构成立于 1948 年，它进行的数量研究显示，自 19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全球贸易关系的运作对基本产品出口国产生了系统的不利影响。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警告说，“贸易条件”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恶化。重要农矿产品的价格总指数相对于制成品大幅度下落，而当拉美各国为进口制造业产品而在债务中陷得越来越深时，它们的出口收入却无法弥补这个缺口。普雷维什和他的助手们指出，由于“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拉丁美洲业已广泛蔓延的贫困还将继续加深。对于一个人均

① Rabe,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8-9.

② Skidmore and 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60-61; LaFerber, "Alliances in Retrospect", 342-43.

收入在 20 世纪 50 年代低于 250 美元、人均预期寿命只有 43 岁（比同期美国少 25 岁）的地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当然，问题的相当一部分在于拉美内部的因素。在许多拉美国家，一小撮寡头控制了大量土地和财富。在秘鲁，1.1% 的人口拥有该国 82% 的土地。在巴西，该国最富有的 1% 人口聚敛了全部收入的 19%。对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来说十分清楚的是，如果不采取猛烈的行动是不会有任有进展的。^①

拉美贫困问题如此严重，加上拉美经济委员会做出的诸如此类的预言，促使拉美各国纷纷向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对其进行援助。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它们的要求被坚定主张军事优先的历届美国政府搁置在一边。在 1945 年于墨西哥查普德佩克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拉美领导人发誓要和美国保持团结；他们同意公开宣布，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进攻都被视为对所有拉美国家的进攻，并且在发生侵略时要通过相互磋商决定恰当的反应。在冷战局势趋于紧张的过程中，拉美各国于 1947 年在里约热内卢通过一个正式条约确认了这个协议，以此平息美国在安全方面的忧虑。在哈里·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将世界分为两个意识形态阵营和两种“生活方式”的宣言^②仅仅数月后，他就前往里约热内卢参加泛美会议。在前呼后拥地抵达二战中日本投降的地点——“密苏里”号战舰后，杜鲁门自豪地为“一个属于新世界的长着牙齿的和平协议”而欢呼。他宣称：“我们已经把整个美洲的团结由理念变为现实。这是黑暗世界中的阳光。”^③一年后美

① Skidmore and 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340-41; Rabe,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74-75; 关于普雷维什的理论立场的背景情况，参见 Love, “Raúl Prebisch”。

② 指 1947 年 2 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的所谓“杜鲁门主义”的演说。——译者

③ 转引自 Smith, *Late Years of Monroe Doctrine*, 59。

洲国家组织(OAS)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成立,其宗旨也在于通过建立一个美洲国家间合作的正式制度框架来巩固泛共产主义的统一阵地。尽管杜鲁门政府对西半球国家互不干涉内政的要求表示同意,但美国其后几年内与十个拉美国家签订双边共同防御条约时并没有任何顾忌。为了换取美国的军事装备和援助,拉美国家同意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直接向美国输送战略物资、限制与苏联集团的贸易。^①

这些事态变化反映出,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拉美官员的社会经济考虑和美国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之间的裂隙已经达到何种程度。阿图罗·艾斯科巴尔(Arturo Escobar)曾指出,自查普德佩克会议后,拉美领导人“说明了工业化对巩固民主的重要意义,并要求美国帮助推行一项经济变革计划”。^②然而美国决策者总是忽视这些要求,要不就是发表一通讲话,强调保持对共产主义的警惕的必要性,以此作为回应。当拉美人于1948年波哥大会议上再次提出援助问题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只是告诉他们,欧洲安全需要予以优先考虑。马歇尔坚持认为,由于美国已倾力于西欧复兴,所以拉美人就必须等待。杜鲁门政府在1945年至1950年间向西欧投入了190亿美元,而沮丧的拉美人只得到将来会考虑的含糊承诺。依加迪斯·史密斯(Gaddis Smith)之见,“美国政府高官中广泛弥漫着一种对世界性威胁的感受,这使得他们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而不是从个别的国家的角度或地区的角度,甚至不是从其他拉美国家和美国之间长远关系的角度去考虑拉丁美洲”。^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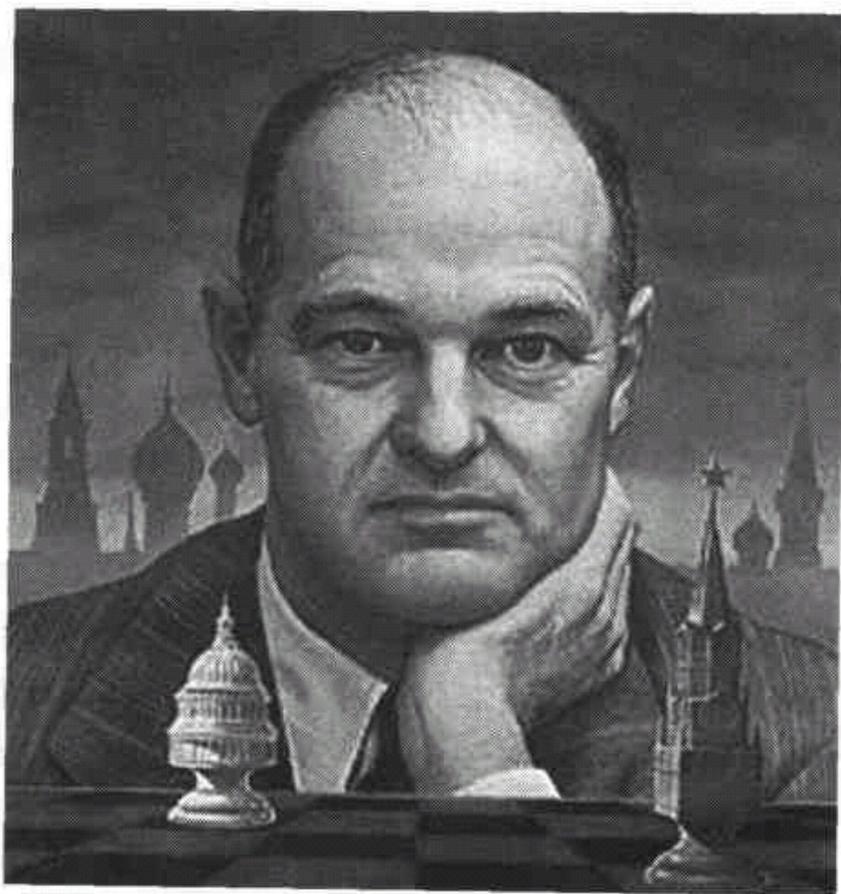
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中混杂着美国主要战略家中广泛持有的

① Skidmore and 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334-37; Smith, *Last Years of the Monroe Doctrine*, 41-62.

②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29.

③ Smith, *Last Years of the Monroe Doctrine*, 66; Levinson and de Onis, *Alliance That Lost Its Way*, 37.

态度。杜鲁门的谋士中几乎没有人花时间去研究拉丁美洲，他们当中许多人认为这个地区的人民秉性凶莽不明事理，不值得美国认真考虑。在1950年，时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首脑的乔治·凯南曾遍访中南美洲各地，先后到过墨西哥城、加拉加斯、里约热



对美国冷战的观念和战略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的乔治·凯南。他的“遏制”概念使美国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获得了新的动力。

内卢、圣保罗、蒙的维亚、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拿马城。凯南对所看到的贫富两极分化深感震惊，左派对他发动的攻击又颇使他不快，而他对自己所认定为颟顸平庸而又自高自大的领导阶层更是大失所望，所以他断定这里共产主义渗透和颠覆的危险是实实在

在的。然而,在他看来拉美人似乎是无法挽救的。他认为,他们还没有实行民主的基础,而且实际上没有能力推行真正的经济发展。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地区的失败“渗入这里人们的血液当中,而且已经形成为地理上的特征,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失败的情绪都不会轻易消失。……人们针对这些失败做出的回应迄今为止一向是软弱无力和毫无成效的”。^① 许多高级分析家认为,美国承受不起由于忽视拉美的安全问题而导致的后果。但是在那里推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进步的努力又是徒劳的。

1954年底,在美洲国家组织下属的美洲国家间经济社会理事会(Inter-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的一次会议上,拉丁美洲人再一次促请美国给予援助。而且这次他们提出了一个全面的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在普雷维什和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工作的指引下,会议主席智利人艾德瓦尔多·弗雷(Eduardo Frei)指出拉美经济发展要求外援注入,以稳定商品价格,促进新产业发展,帮助区域经济整合,提高生活水平。一群拉美经济学家提出建立泛美银行的要求,他们估计,在其后十年间,该地区每年至少需要10亿美元的外援,其中大部分须由公共部门承担。他们指出,为了促进增长和地区经济的多元化,必须通过投入大量资本扩大内部积累。而且美国应该提供大部分援助。^②

艾森豪威尔政府持保守的财政思想,在对外政策上只关注反共产主义问题,而且充斥着与其前任一样的许多偏见,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它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当地拒绝了计划。艾森豪威尔及其谋士认

^① Kennan, *Memoirs*, 476, 转引自 Smith, *Last Years of the Monroe Doctrine*, 68. 关于凯南对拉丁美洲、共产主义威胁的看法及其关于有必要采取“强制措施”的观点,参见 Stephanson, *Kennan and the Art of Foreign Policy*, 162—65.

^② Rabe,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75; Kunz, *Butter and Guns*, 122.

为,经济发展必须通过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私人企业的运作来达成。他们指出,由政府运作的计划只能造就庞大的掌管外援事务的官僚机构,伤害企业的利益。艾森豪威尔更关心的是保持稳定,而不是推动进步和改革,所以他也认为不必施行会削弱美国支持下的拉美独裁者的社会经济计划。艾森豪威尔政府从来不在人权和民权问题上向拉美领导人施压,还把一项殊荣——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of Merit)授予秘鲁的曼纽尔·奥德里亚(Manuel Odria)和委内瑞拉的马尔克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美国的大使们还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和古巴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残暴政权大加赞赏,称他们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自由的捍卫者。而且,如果看起来有必要的话,艾森豪威尔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动用秘密力量来维持它对该地区的控制。1954年,就在弗雷及其下属向美国提出援助请求后几个月,艾森豪威尔的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导演了一场针对该国民选领袖、民族主义者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的政变,因为他拒绝将共产党人驱逐出他的政府,并采取了进步的土地改革措施,要征收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的地产。在干脆地拒绝拉美的发展计划之外,艾森豪威尔政府还不惜使用武力来消除经济组织和政治主张中体现出的独立路线对美国造成的挑战,这向西半球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即现状十分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激进主义。艾森豪威尔的行动表明,美国将不会支持广泛的社会变革计划。而且,那些走得离现存秩序太远的国家要自己承担巨大危险。^①

^① Levinson and de Onis, *Alliance That Lost Its Way*, 38-42; Kunz, *Butter and Guns*, 122; Rabe,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86-87. 关于危地马拉政变的历史,参见 Gleijeses, *Shattered Hope*; Immerman, *CIA in Guatemala*; Schlesinger and Kinzer, *Bitter Fruit*.



1950年,阿本斯经选举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在国内推行激进的改革,触犯了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动用海军封锁了这个中美洲小国,并对其进行轰炸和入侵,又扶植叛乱武装,最终推翻了阿本斯政权。同年8月,美国驻巴西大使策动右翼军人发动政变,瓦加斯总统愤而自杀。图为危地马拉民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

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的几个事件最终导致美国政策发生转折。1958年副总统尼克松前往拉美进行“友好访问”期间,在利马的圣马科斯大学遭遇了愤怒学生的示威,而当他试图前往加拉加斯时,有一群抗议者投掷石块,甚至几乎将他的坐车掀翻。这些事件反映出拉美对美国政策的憎恨日益加剧的情形,但是真正令人震惊的事发生在1958年和1959年;卡斯特罗的游击武装从墨西哥马德雷山脉出发,击败了巴蒂斯塔政府,胜利地开进哈瓦那市区。当古巴新政府开始进一步支持其他地区的革命行动并与苏联结盟时,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发生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战

略家担心的是,革命民族主义将由古巴迅速扩散到其他国家的贫困而怨愤的人民当中。他们急于知道的是,既然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已被证明是一推就倒,那么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和尼加拉瓜的索莫查家族之类的政权又当如何?有势力的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包括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赫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威廉·富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以及政治抱负远大的约翰·肯尼迪,都开始提出类似问题,并对行政当局的政策发起长时期的公开批评。对独裁政权的支持也引起拉美的自由派——如哥伦比亚的罗慕洛·贝坦科尔(Rómulo Betancourt)和哥斯达黎加总统何塞·菲戈斯(José Figueres)——对美国的憎恨。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其支持古巴的反卡斯特罗“第三力量”的努力遭到失败时也只能沮丧地观望。这也导致了对政策的重新评估,由此美国首次将拉美问题置于聚光灯下,对其社会经济形势和问题予以认真考虑。^①

在这种情境下,巴西总统库比切克(Juscelino Kubitschek)在1958年提议推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的经济发展计划即“泛美行动”(Operation Pan-America)。该建议出人意料地在美国战略规划人员中受到不同以往的欢迎。^②库比切克的分析认为,革命动乱的根源不在于共产党的阴谋,而在于大众的悲苦和绝望,这种观点在华盛顿政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1960年9月在波哥大,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终同意建立5亿美元的社会进步信托基金,目的

^① Rabe,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3—4, 97; Paterson, *Contesting Castro*, 135—36; 244—45.

^② Rabe,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107—29; Levinson and de Onis, *Alliance That Lost Its Way*, 44—48.

是促进农业改革、建设住房、提高公共卫生条件和教育水平。在美国通过这项措施的同时，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及其他行政官员将社会改革和追求共同战略目标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在反共方面取得成功仍旧是一个基本目标，但现在美国已将经济增长和减缓大众苦难作为实现反共目标的重要途径。历史学家拉斯·舒尔茨(Lars Schoultz)指出，改良主义者、发展导向的拉美领袖已最终促使美国认识到：虽然共产主义是一种危险的“外来力量”，但它并不是惟一的“问题的根源”。^① 至1960年秋，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开始把援助作为一种对抗卡斯特罗革命政权造成的威胁的武器。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美国官员从来没有放弃以武力和强制为基础的战略。当卡斯特罗政府就接受苏联石油进行谈判，并将拒绝加工苏联石油的美国炼油企业收归国有时，美国政府做出反应，削减对古巴蔗糖的进口配额，实施贸易禁运。在1960年3月以前，中央情报局已经开始筹划那场倒霉的猪湾入侵。由于1954年在危地马拉的武装行动曾大奏其效，所以美国战略家对再次动武信心十足，毫不迟疑。在军事措施和反叛乱行动之外，外援和发展也成为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思维的关键组成部分。

在肯尼迪于1961年1月入主白宫之前，拉美已然是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主要战场。肯尼迪的谋士是一群行动主义分子，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思想僵化和无所作为已经使共产党大有收获，所以也决心在全拉美范围内发动一场变革，使得那里无法出现第二个古巴。在依据波哥大法案采取行动的同时，他们也大幅度扩充了美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和目标。一次次平息那些贫困造成的起义是不够的。只有用那种能根本改变该地区发展方向的计划，才能遏制共产党的进攻。艾森豪威尔政府不过构思了一个有限的

^① Schoultz, *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 353. 关于波哥大法案的原文，参见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gional and Other Documents*, 92-97。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在一起。一个距美国仅 60 多公里、而美国也拥有传统影响力乃至宰制权的“后院”国家进入共产主义阵营，这对美国决策者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投射在美国对整个拉丁美洲、甚至越南的政策上。古巴革命本身，以及格瓦拉所代表的游击战，都成为美国在第三世界在加强反叛乱行动的同时加强“发展指导”、加紧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直接动因。

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计划，而肯尼迪和他的学者顾问们则启动了一个大规模、长期性的新举措，将政治改革、经济繁荣，甚至创造新文化价值观的目标都包容进来。艾森豪威尔及其下属最终是不得已地转向“增长”问题，而肯尼迪团队却是信心百倍地谈论“现代化”。

在为新的拉丁美洲行动进行规划时，新政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大而无当的作风。包括哈佛经济学家林肯·戈登、老新政派分子阿道夫·伯勒(Adolf Berle)、罗切斯(Rutgers)新泽西州立大学

经济学家罗伯特·亚历山大(Robert Alexander)、宾西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家亚瑟·惠特克(Arthur Whitaker)、波多黎各发展问题专家提奥多罗·莫斯库索(Teodoro Moscoso)和阿图罗·莫雷列斯·卡雷昂(Arturo Morales Carrión)等人在内的一个拉美特别小组被指派提出行动建议。这个小组称,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公开“宣称,私人企业,以及为私人企业和美国投资创造的良好环境可以达成全部必要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然而,现今该地区长期的动荡已经证明这些想法是错误的。这个小组相信他们面对的是“美洲大陆外干涉”的严重威胁,由此断定“目前拉美的动乱加剧了共产党的渗透,这直接反映出一种美国所不能和不应加以遏止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潮流”。他们宣称,防止革命的关键是制定系统的、长期的计划,引导这些力量“进入可以为当地人民接受,并对他们有利的渠道”。^①

肯尼迪政府政策规划人员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方案。早先拉美人的建议集中在贸易和工业等方面的细节问题上,而波哥大法案也强调有必要推行具体的社会发展计划。但是现在,肯尼迪的谋士们寻求的是一个更具综合性的政策平台,此中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都可以被同时予以处理。他们指出,苏联和中国都有声名远播而且很有说服力的革命学说;对苦苦寻求减缓贫困、实现社会公正和终止政治压迫的办法的拉美人来说,苏联和中国使马克思主义教条产生了吸引力。特别小组感叹道:“在我们一方,美国却没有宣扬属于它自己的清晰的哲学,而且没有有效的工具来传播这种哲学。”^②他们指出,如果要引导拉美人的愿望、

^① Task Force Report, January 4, 1961, Moscoso Papers, box 9.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Immediate Latin American Problems, Winter, 1960”, JFKL.

^② Ib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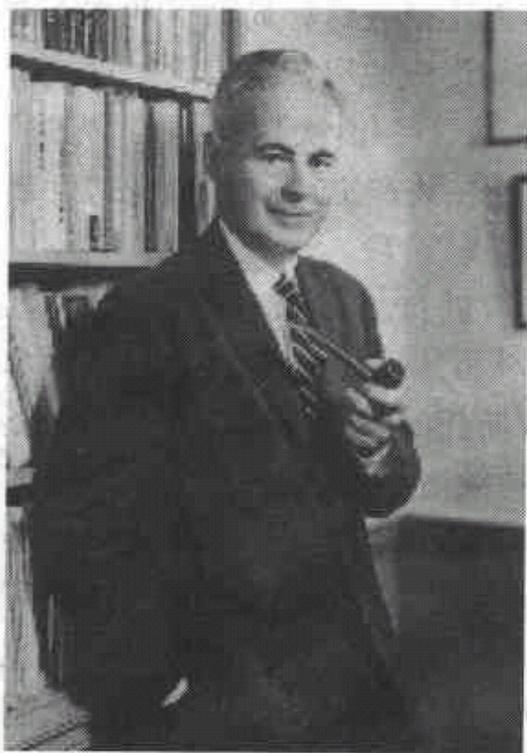
指导这个地区的未来,就必须有一个新的政策方案,而更重要的,是要有新的、更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来配合新的政策。

通过争取进步联盟,现代化力量被用来满足这两种需要。在新计划的设计中纳入了关于以下问题的社会科学理论观点:通向现代性的转变,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相互依赖,直线式的进步道路,美国的知识、价值和投资所具有的加速现代化的潜能。争取进步联盟确定出有效利用资本和促进新价值观的方法,进而提出:要通过同步推动社会计划、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来推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性”。肯尼迪的谋士们相信,经统筹协调的大规模行动将推动拉美走出动荡、贫穷局面,而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共产主义才会对绝望的人民产生吸引力。人们逐渐脱离传统信念,“过渡阶段”必然破坏旧的价值观。然而,通过现代化,美国那样的“先进”社会可以提供新的意义系统,可以赶在共产主义破坏“自然”发展进程之前推动拉美国家加速进入“起飞”阶段。

而且,加速现代化进程将同时增进拉美国家和美国的利益。哈佛经济学家、拉美特别小组成员林肯·戈登后来回忆道:“学术界和官员的思想都深受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的影响,包括‘前提条件’、‘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之类的概念。这里而潜在的思想……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如果自由、责任政府和机会平等这些美国价值观能在海外得到广泛传播,则它们在国内就可能更加繁荣。我们已经从欧洲和日本的复兴中受益,同样我们也将因欠发达世界的现代化而受益。”^①戈登和罗斯托先前曾帮助制定马歇尔计划,现在则梦想着取得更了不起的成就。他们推论说,如果说美国曾重建了西欧经济,那么它现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西半球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吗?在许多方面,马歇尔计划并不是一个恰当的类比。黛安·昆兹曾发现,就马歇尔计划而

^① Gordon, “Alliance at Birth”, 74.

言,成功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战略家们“以专门的经济手段对付经济问题,而这些经济问题容易从经济上加以解决。……西欧为美国方式的实行提供了一个理想场所。政府结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储备等方面的条件在此以前就是具备的”。^①而他们针对拉美所提出的任务却复杂得多。然而,肯尼迪的政策计划人员依然毫无退缩之意。在他们看来,现代化不是什么决定性的政治选择和竞争性的发展方案,而是美国使命——创造一个使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理想同时增进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世界——的一种自然延伸。



林肯·戈登后来曾任美国驻巴西大使和负责美洲国家间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而且拉美似乎最适合于这个计划,肯尼迪政府的许多谋士相信存在着“加速西半球发展的特殊机遇”。正如戈登所说:“我们相信,在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南美的几个大国和墨西哥,正处在罗斯

^① Kunz, *Butter and Guns*,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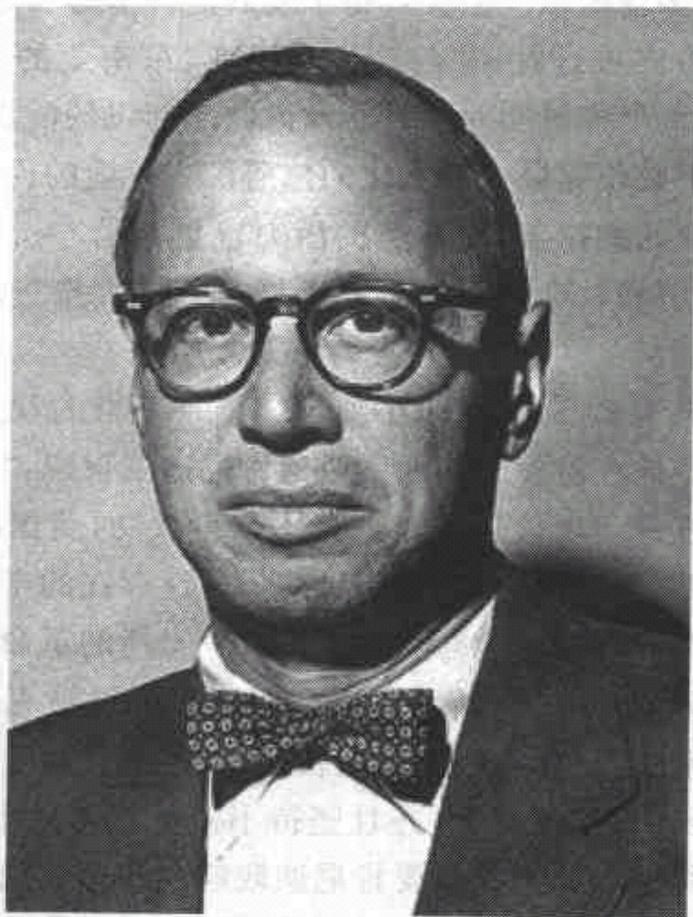
托理论中所说的起飞的起点上。”当然还存在着“制度和社会障碍，但是那里没有诸如东方式的宿命论、圣牛和种姓制度之类的文化障碍。”以其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已经建立工业基础和对民主的渴望，拉美许多地区似乎已经具备了发展的许多必要条件，已经达成了发展的历史可行性。“与非洲和南亚、东南亚的多数地区相比，所有这些都形成鲜明对照。非洲尚缺乏起飞的前提条件，而南亚和东南亚则必须克服古老文化的障碍。”肯尼迪的许多谋士比先前的决策者更熟悉拉美，对拉美的潜力也更具信心。他们认为拉美在地理、经济和社会上都更接近美国，似乎“大推进的时机已经成熟”。^①

哈佛历史学家、白宫顾问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观点与这种看法不谋而合。他在访问了该地区后向肯尼迪汇报说：“拉丁美洲正不可逆转地投身于现代化事业。”为了取得成功，美国必须对拉美国家进行援助，使它们“根本改变目前仍广泛存在的半封建的乡村社会结构”，并同时向土地寡头和卡斯特罗支持的革命分子发起挑战。对这些障碍不应掉以轻心，但它们完全可以被克服。通过对工业进行投资、为农作物生产制定价格稳定协议、对土地改革予以支持、对社会计划提供资金，并且坚持不懈地反对独裁政权，美国完全可以赢得这场斗争。只要肯尼迪政府在几个战线上都投入战斗，它就可以发动一场“中产阶级革命，此中经济现代化将使新的城市中产阶级获得权力；并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扩大，建立起立宪政府、诚实的公共管理、负责任的政党体系、合理的土地制度以及有效的税收制度。”^②施莱辛格承袭了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的

^① Gordon, "Alliance at Birth", 74—75.

^② Memorandum, Schlesinger to Kennedy, March 10, 1961, Schlesinger Papers, box WH 14, "Latin America, Report 3/10/61," JFKL.

思想,强调那些对资本主义具有本质性意义的要素。他指出,挑战是巨大的,但将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联结在一起的根本转型的确是可能的。



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二战期间就曾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后来成为母校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在1949年出版了《至关重要的中心:自由的政治》一书,认为美国在历史演进中形成“自由主义共识”,自由主义代表了美国历史经验的全部内容,而自由主义阵营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至关重要的中心”。1960年他被延揽到肯尼迪的竞选班子,肯尼迪当选后他担任总统拉丁美洲事务特别顾问。施莱辛格于1965年出版了记述肯尼迪政府任期的名著《一千天》。

既然罗斯托、施莱辛格和戈登等策上都坚持认为，美国能够“向西半球显示：在各个社会中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民主发展是可以携手并进的”，所以肯尼迪就准备了一篇公开讲话来表达本届政府的立场。^① 1961年3月13日，这位美国总统在一个拉美各国外交官的集会上以华丽恢弘的言辞说，争取进步联盟将是“一个巨大的通力协作的行动，在规模和目标的高尚方面史无前例”。肯尼迪预言，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每个美洲家庭的生活水平都会处在上升当中，所有人都可获得基础教育，饥饿的经历将在人们记忆中消失，对大规模外来帮助的需求也将成为过去，大多数国家将已进入自促的增长阶段；而且，尽管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每一个美洲共和国都将牢牢掌握自己的变革，牢牢掌握自己的希望和进步”。^② 肯尼迪宣称，现代化将使现实发生奇迹般的转变。

而且，猪湾的失败又给争取进步联盟以额外的推动。在肯尼迪宣布成立争取进步联盟后仅一个月，由中央情报局在位于迈阿密、新奥尔良、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等地的营地训练出来的反卡斯特罗流亡分子在古巴的海岸登陆，希望引发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以终止革命。入侵在1961年4月17日发起，很快演变成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在实施登陆之前，中央情报局的飞行员就摧毁了卡斯特罗的小规模空军的一部分，但是古巴的战机还是设法击沉了运送重要通讯器材和武器的船只。当1500名突击队员驾驶小艇冲上密布着珊瑚礁的海岸时立即处于绝境，其他到达海岸的人也发现预期中的美国空中支援迟迟不到。（不过即使美国飞机来了可能也是无济于事。）流亡分子们迅速丢盔卸甲地四散逃命，根本没有形成滩头防御，在占绝对优势的古巴民兵武装面前损失惨重。

^① Memorandum, Lincoln Gordon to Richard Goodwin, March 6, 1961, NSF, box 290, "Alliance for Progress, 1/61-12/61", JFKL.

^② Kennedy, *Public Papers*, 1: 172.

幸存的入侵者希望从周围的沼泽地逃出去,钻进山地继续周旋,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迅速被俘。在这一通过武力入侵推翻卡斯特罗的努力遭到惨败后,肯尼迪政府转而采取秘密行动,企图破坏古巴经济,暗杀革命领袖。美国还大力加强其长期宣传攻势,以图在拉美其他地方削弱古巴革命的号召力。许多战略家寄希望,争取进步联盟能够抵消美国在卡斯特罗手上遭受的羞辱,并促使拉美人相信真正的发展可以通过美国的援助而不是革命行动来实现。^①

从宣布该计划到1961年8月正式照会拉美国家代表的几个月里,肯尼迪政府计划人员试图起草一个宪章,目的是赋予争取进步联盟以一种意识形态号召力,从而引起拉美人的共鸣。为了应付在古巴问题的争论中出现的反对声浪,并且针对可怕的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一种进步主义的选择,肯尼迪政府着手起草一个能够将拉美的希望引向自由资本主义方向的文件。在1961年夏季,罗斯托、施莱辛格、白宫助理理查德·戈德温(Richard Goodwin)和波多黎各籍政策顾问阿图罗·莫雷列斯·卡雷昂搭成班子起草该文件。罗斯托给这个文件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提出:该宪章所应强调的是,争取进步联盟要承担起责任,“将美洲各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的全部力量汇聚起来,从而使它们根据自己的选择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这要求推行根据民主原则制定的全面周详的经济和社会计划”。^② 施莱辛格也提出类似的言论。在一些要讲给

^① 关于猪湾事件的详细情况及其意义,参见 Paterson, “Fixation with Cuba”; Giglio, *Presidency of John F. Kennedy*, 48-63; Lyman B. Kirkpatrick, “Inspector General’s Survey of the Cuban Operation”, February 16, 1962. 第二种文献由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安全档案馆援引信息自由法从中央情报局获得。

^② Memorandum, Rostow to Richard Goodwin, June 20, 1961, NSF, box 290, “Alliance for Progress, 1/61 - 12/61”, JFKL.

拉美人听的话中,他写道,西半球各国人民都有必要做出“以公民自由和代议制的原则”行事的保证,并且应该“宣布,为了迅速而有效地取得成果,必须推动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以加速现代化进程”。^①

该宪章于1961年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Punta del Este)定稿,并没有保留罗斯托和施莱辛格提出的那些语句。但是该文件的确将现代化作为其最重要的目标,因为文件中提出根本目的是“加速拉美各与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这些国家建立符合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的民主社会,取得最大限度的福祉,使每一个人获得平等的机会”。美国要求美洲国家组织各成员国在第一年缴纳10亿美元的共同基金,并在10年内通过私人投资和国际借贷途径确保获得200亿美元的援助。在美国的压力下,除古巴以外的其他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都签署了该项协议。宪章为拉美国家制定了人均收入每年增长2.5%的最低目标,并鼓励各国“参照社会经济演进的各个阶段”来确定工业化和群众福利的目标。这个文件将社会经济领域与政治发展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还宣称必须在“民主原则”下通过全面的全国性计划来推行改革。^②

为了积极推动现代化进程,美国在输出资本外还不遗余力地提供社会科学技能。为了加速全面计划的制定,肯尼迪政府“根据与各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派出专家,在“乡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卫生、合作社、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税收”等方面“指导”各国政府开展投资项目的考察评估、土地调查和各种计划的制定。^③ 作为根本性变革的推动者,美国顾问们受命将社会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

^① Memorandum, Schlesinger to Arturo Morales Carrión, July 19, 1961, Schlesinger Papers, box W-1, “Alliance for Progress, General Memoranda,” JFKL.

^②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gional and Other Document*, 101-3.

^③ *Ibid.*, 106-7.

整体加以分析,并确定出什么是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国际开发署驻援助申请国代表团收到发展计划的建议书之后,美国分析家就对其进行审查,进而就其可能的影响及其与该国的总体发展计划的关系作出判断。分管各地的“项目官”(project officer)估算所需资金的数额,而工业、农业、教育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对建议的具体细节进行审核。如果华盛顿国际开发署的财政货币委员会同意,贷款协议即可宣告达成。^①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20世纪50年代曾为哥伦比亚政府工作。在此期间,对于社会计划人员被希望在这个广阔的新天地里做些什么事的问题,赫希曼悟出了一些门道。多年后他回忆道,他之所以去南美是因为他有兴趣解决一些当地的具体政策问题。然而很快他发现派给他的任务与此大相径庭。

从世界银行总部很快传来消息,说他们主要希望我尽快开始编订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而其中将为哥伦比亚政府开列出以后几年的投资、内部积累、增长和外援目标。据称,所有这些工作对掌握了新的规划技术的专家来说十分简单:显然现在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关于积累率和资本—产出率可能的浮动幅度的知识,尽管并没有对当地情况进行细致研究;而且根据这些方面的估算,再加上该国近期的国民收入和收支平衡的情况,就可以得出全部所需的关键数据。^②

在为争取进步联盟工作时,发展问题专家们还被希望寻找出社会变迁的关键要素,并指导将资本和技术用于培育这些要素。

① De Oliveira Campos, *Reflections on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132-34.

② Hirschman, "Dissenter's Confession", 90-91.

当争取进步联盟的协调员提奥多罗·莫斯科索告诉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说,最近开始关注“制度建设”问题时,这就要求所开展的工作超越单纯地输送专门技术。比如,在农业等领域,联盟的计划要求“在该领域对美国国际开发署代表团予以全面的重新组织”。国际开发署认为不再需要“设备专家、农学家、畜牧专家和农业延伸服务技术人员”,还是计划用“农业发展官员、合作社顾问、总工程师……经济顾问、计划官员和项目辅助官员”来取而代之。^① 由于技术专家被社会科学的万事通们取代,顾问的职权范围就更加模糊了,而对全面综合的社会工程的热情也更加高涨。

有关机构还希望社会科学知识能够帮助美国按照受援国的特定发展阶段对援助予以量身定做。由于各国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有先有后,所以不能以相同的类型和相等的数量对它们进行援助。然而,至于如何评估发展程度,又该把美国纳税人的钱投在那里,却没有被作为一个主观判断性质的问题提出来。在争取进步联盟开始前几个月,肯尼迪对外经济政策问题特别小组推荐了“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文中逐一开列了新近算出的各国所需援助的预计数额”。^② 罗森斯坦·罗丹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成员,后来被任命为争取进步联盟九人专家小组成员,负责对国家发展计划的评估。在其题为《对欠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的论文正式发表前几个月,他将该文呈交给肯尼迪的白宫。在他看来,外部援助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可以直接提高受援国的生活水平,而是因为它可以促使受援国启动由经济停滞到自促经济增长的转折”。最终还是得由受援国的公民将这一进

^① Statement of Teodoro Moscoso before the Senat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May 17, 1963, Moscoso Papers, box 11, “Senat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5/17/63,” JFKL.

^② Task Force Report, not dated, Millikan Papers, box 1, “Task Force Recommendations, 1960”, JFKL.

程推展下去,但是援助可以从正面推动全体国民进行最大限度的努力。这里的主意就是指导援助发挥其“最大催化效应”。换句话说,外援的输入必须有助于“提高国内资本形成率”,由此将受援国推向起飞阶段。^①

罗森斯坦-罗丹解释说,一国所应接受的外援数额可以根据“吸收能力”(absorptive)被计算出来。外国资本和“诀窍”使一国增加其产出,使该国有可能将积累率提高到从前不可能的水平。由于边际积累率可以被提高到超过平均积累率,所以就可以有更多的资源被用于投资,由此发展就得以加速。罗森斯坦-罗丹推论道,因为“发展水平越低吸收更多资本的能力越有限,而较高比重的技术援助必须成为大规模资本流入的先导”,所以援助发放国就需要按照受援国在发展阶梯上的总体位置对其进行分类。他宣称,外援行动成功与否取决于对全国性发展计划进行全面评估,并确定出哪个国家已为“起飞”做好准备、哪个国家还需要完成“起飞”的“前提条件”。罗森斯坦-罗丹解释说,“体现着同一个发展计划的不同项目相互关联相互加强,”而有些国家会比另一些国家更适合接受大规模援助。但即使对那些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教育在长期内、习俗的转变在短期内”都会“扩大活动余地”。^②

在这种框架之下,罗森斯坦-罗丹宣称美国能够通过以下三个指数估量一个受援国的吸收能力:投资增长率、平均积累率和边际积累率的差距、受援国的“总体行政和发展组织”。罗森斯坦-罗丹指出前两个指数属于“可验证的事实”,而第三个指数虽然依赖于

① Rosenstein-Rodan, “International Aid for Underdevelopment Countries”, 107. 关于罗森斯坦-罗丹的文章原件,参见 NSF, box 324, “Staff Memoranda, Walt W. Rostow, Foreign Aid, 1/61”, JFKL.

② Rosenstein-Rodan, “International Aid for Underdevelopment Countries”, 108.

“粗略的常识性经验法则”，但也决不像看上去那么“主观武断”。他暗示，“现代的”观察者可以很容易地形成关于那些正在为发展而奋斗的国家可能会取得的成就的观点。其实，当需要评估不同国家的“潜力”并将它们按潜力大小进行排序时，“在商人、经济学家、甚至普通旅游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分歧。为了使计划工作更简便，罗森斯坦-罗丹引入了一组表格，在对以后 15 年间固定的、或高或低的增长率进行估计的基础上，对世界上 86 个国家进行分类。他指出，客观的社会科学能够证实美国人的常识的正确性。在已为“起飞”做好准备的 国家，资本密集型外援将能刺激向自促增长的转变。在那些仍在较低发展阶段蹒跚着的国家，技术援助将促使受援国至少能“模仿和吸收其他国家的生产方法”。^①

管理计划人员将这些观点牢记在心。经济学家霍里斯·钱纳里在离开斯坦福大学之后、进入哈佛大学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曾担任国际开发署主管计划的助理署长。他认为外援可以产生一个“自由国家的共同体，它们就共同关心的事务进行合作，将他们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公意的基础上，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公正方面共同进步”。受援国从它们与更先进国家的交往中受益，并获得“大西洋共同体所特有的那种尊严感和成就感”；由此它们就能够克服“经常妨碍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的“传统价值和统治方式”。钱纳里应和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调，指出国际开发署应该使自己的工作适应于各个受援国的“当前发展阶段”。在初级阶段，在推行管理计划、提供教育、建立民间信贷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是最重要的。而当各国已为“前提条件”做了一些准备、已经具备了利用现有资源的能力时，更多的基础设施就能够到位，国际开发署也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制度建设”，以增加内部积

^① Ibid., 113—15.

累,打破“瓶颈”。^①

由于美国对外援助将加速“传统”社会向西方所代表的“现代”形式的过渡,肯尼迪政府许多计划人员对争取进步联盟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把“期望不断提高的革命”引向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方向。然而问题是美国并不能垄断全部的变革力量。正如罗斯托和其他战略家所指出的,世界上的一个根本危险就是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即苏联人通过并用贸易、援助和游击战等各种手段,而成功地“树立起共产主义之作为欠发达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最有效方法、作为一种能迅速赶超懒惰的美国先行者的体系的形象”。由于那些发展程度很低的国家会本能地模仿先进国家,所有像美国这样的现代社会就能够造就巨大的转变。但不幸的是,同样的情况对共产主义侵略者也是适用的,而罗斯托把共产党称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食腐动物”。^② 罗斯托在1960年在达特默斯学院的一次讲演中解释说,美国的努力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要么在与美国和西方的联合中为民主的演进开辟道路,从而成功地实现现代化,要么在挫折和绝望之下转向一直在向它们招手的共产主义路线”。^③ 对于那些用现代化的有色眼镜观察世界的人来说,冷战当然是一场争取发展中世界的人心民意的斗争。而且这里的人心民意似乎是飘忽不定的,这既使人踌躇满志又让人心惊肉跳。

所以,现代化就不仅仅是一场计划和政策的战争,它也成为一场以树立形象和争取认同为目标的战争。而且美国为此在拉美投

① Memorandum, Hollis Chenery, “Policy Guidance for Foreign Assistance”, 1963, AID Historical Collection, AIDC. 关于一项数量分析,参见 Chenery,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② Rostow, *View from the Seventh Floor*, 7, 106. 另参见 Rostow, *Two Major Communist Offensives: Rostow, Great Transition*。

③ Rostow, Speech at Dartmouth College, February 29, 1960, Rostow Papers (not indexed), LBJL.

下的本钱似乎格外地大。正如阿道夫·伯勒在给其拉美特别小组的同事的信中所指出的，“如果说伟大的冷战并不能在拉美战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显然有可能在这里失败，在我和委员会的大多数人看来这种局面是十分危险的”。^① 古巴所出现的正是罗斯托及其同事最担心的那种意识形态上的竞争者。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和经济学家理查德·加德纳(Richard Gardner)等分析家所作的考察深刻地影响了肯尼迪政府对古巴革命胜利的意义看法。在仅仅40年的时间里，苏联人似乎已经成功地将其祖国由一个落后的农民社会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其经济进步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美国生产领先苏联的幅度已在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上都落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因为苏联人将资源投入消费品生产以外，缺乏广大的大众市场，把重点放在那些只能产生有限回报的非商业部门，所以加德纳强烈怀疑苏联的势头能否持续下去。然而在短期内它在国际上却造成巨大的恶劣影响。他解释说：“苏联的增长速度越快，它造成的心理影响就越大。这种影响可以被我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感受到，而也许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被全世界欠发达国家的亿万人民感受到。”^②对美国的战略规划人员来说，卡斯特罗的古巴不仅仅是一个游击战和颠覆活动的基地。作为苏联在西半球扶持起来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它还针对贫困和压迫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极具革命性的解决办法。古巴被看做是一个具有危险的诱惑力的异例，很可能会引导拉美国家偏离现代化道路，而这一进程就在根本上只能沿着自由主义的和非革命的路线予以推进。

^① Berle to Latin American Task Force Members, January 10, 1961, Moscoso Papers, box 4, "Correspondence, 12/60 -4/61", JFKL。

^② Gardner, *New Directions in U. 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4 - 18.

为了对他们心目中的卡斯特罗挑战予以回应,美国决策者以两种相互关联的方法推进争取进步联盟的事业。第一种是,驱除古巴在美洲国家间决策体系中的地位,并促使拉美国家共同公开拒斥古巴模式。1962年1月,由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白宫助理理查德·戈德温、罗斯托和施莱辛格等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再次来到埃斯特角城,为确保美洲国家组织的一系列决议被通过而运筹交涉一番。虽然古巴一再反对,但21个国家中的20个投票赞成宣布古巴政府与“美洲国家间体系”不相协调,19个国家同意对卡斯特罗的颠覆行动予以研究,17个国家承诺不与古巴进行贸易,14个国家投票赞成将该国从美洲国家组织中驱逐出去。美国虽然获得了必要多数,但它却没有能够确保通过一个共同协议来对古巴政府实行制裁,而且美国还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就驱逐古巴进行的投票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投了弃权票。^①显然,即使把争取进步联盟援助端出来做交换条件,也不是所有拉美国家都愿意追随美国去反对腊斯克所称的“试图破坏我们正在辛勤建设的自由体制的强大对手”。^②然而为了争取投票胜利,国务院宣称会议“已经明确宣示将古巴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孤立于美洲国家间体系之外”,并对争取进步联盟的意义给予“更高评价,将其作为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最佳手段,从而为在西半球加强代议民主制度奠定基础”。^③

防止“另一个古巴”出现的第二种、也是更全面的方法是用各

① Morse and Hickenlooper, *Report of the Second Punta del Este Conference*. 关于该决议文本和投票结果,参见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gional and Other Documents*, 115—22.

② Rusk, “Allianc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Affairs”, 103.

③ Telegram, Department of State to U. S. Delegation at Punta del Este, January 30, 1962, NSF, box 244, “Secretary of State, Punta del Este, 1/62, General, 4/61--1/62”, JFKL.

种手段向拉美人显示：争取进步联盟体现了一种那些正在发展道路上前进的国家都需要的根本性变革的理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战略家在1961年警告说：“遍布拉美各地的革命潮流正在加速奔涌……没有一个人或政府能够长期地遏制这种趋向。那些能够幸存下来、能够将这些潮流引入建设性变迁的人必须学会因势利导，而不是逆潮流而动。”为了把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界定为“在西半球建设现代社会的大事业”，美国应该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只能由武力和颠覆来强加的外来制度。美国还必须这样描述争取进步联盟：它植根于“我们的国家生活和政治制度中最古老和最根本的使命”，它出自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真理”。^① 在肯尼迪政府计划人员看来，革命的能量沸腾着拉美各国社会，那里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但是美国决策者也相信，通过强调现代化模式的普遍适用性，通过向“传统”国家提供一整套理念、目标和期望，他们可以战胜古巴的挑战。

现代化理论家宣称他们能够“展示”那些推动过渡中的社会前进、而且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价值观，而肯尼迪政府则亲自出面“展示”这些价值观。一名国务院官员解释说，简单的反共产主义是不够的，美国需要提出它自己的动人心弦的意识形态。为了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美国必须让拉美的大众相信：他们是真正民主而可行的发展事业的积极参与者。^② 罗斯托曾指出，过渡阶段中包含着对“消极”和“长期宿命论”的“传统”价值观的侵蚀。要逐步填补这个意识形态真空，争取进步联盟就要成为一整套新的文化目标

^① Memorandum, "A Doctrine to Preserv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 not dated. Vice-President's Security File, box 4,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61, 2of 2", LBJL.

^② Memorandum, State Department,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and Cuba", NSF, box 244, "Secretary of State, Punta del Este 1/62, General. 4/61-1/62", JFKL.

的源泉。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的设计目标之一就是,将积极进取的伦理——理论家把这种伦理与“移情”这种现代性要素联系在一起——输入该地区人民当中;它要确保拉美人接受一组共同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只是在美国的历史、制度和社会中才得以最充分的实现。

对肯尼迪政府而言,引发拉美公众的意识形态的强烈变化仍然是中心的考虑。在1963年中期,美国新闻署(U. 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得意洋洋地报告说,一项对七个拉美国家的研究证明:在对“期望不断提高的革命”进行热烈讨论的过程中,人们对争取进步联盟及其目标的了解达到了很高程度。城市人口中一大部分人知道这个计划,而“绝大多数”了解联盟的人也赞成它。而且多数受访者希望联盟“在未来取得大的进步”,而且相信它会“使普通人受益”。也许最使争取进步联盟的规划者感到振奋的是,大多数受访者甚至同意:“如果该计划没有能够实现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那么首先应该受到责备的是他们本国的政府,而不是美国。”^①

这些结果当然鼓励了美国决策者,但是他们当中许多人相信现代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拉美人的赞成。要使联盟成为强有力的催化剂,它就必须“与每一个国家的民族理念相互融合”。依波多黎各总督路易斯·穆诺兹·马林(Luis Muñoz Marín)的看法,争取进步联盟面临着如下的繁重任务:“建设性地唤醒一个大陆——这里的许多地方已在半封建状态中沉睡了400年”,“将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社会革命压缩为一场革命”。他

^① Report, U. S. Information Agency,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limate of Opin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June 1963, POF, box 91, “USIA Alianza Opinion Survey”, JFKL.

认为,为了迎接这个巨大挑战,联盟不应该仅仅是一项单纯的“转移资本和技术的经济事业。为了取得成功,它必须打动人民的心灵,它必须激发他们的梦想和希望……它必须有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内容”。拉美人民不应该认为争取进步联盟是“在遥远的华盛顿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而是应该把它作为“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由他们自己来推动”的事业。^①



历史上拉美人蓄积了深厚的反美情绪,他们常说:“拉丁美洲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比起前任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非常注重增加拉美对美国的认同和亲和。图为肯尼迪总统1961年访问拉美时,与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库尔特一道宣扬争取进步联盟。(图片来源:肯尼迪图书馆)

穆诺兹·马林的外交事务顾问兼肯尼迪拉美特别小组成员阿

^① Speech, Muñoz Marín to the AFL - CIO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ty Services, May 3, 1962, Moscoso Papers, box 10, “Speech Materials, 5/62 - 6/62”, JFKL.

图罗·莫雷列斯·卡雷昂也持同样观点。不应该把联盟仅仅理解为一个“美国制造”、单纯的经济和技术性质的贷款机构。它必须“与拉美民族主义联姻”，而后者“提供政治行动所需的情感和口号”。为了确保拉美人投身于变革，美国必须驾驭该地区的革命潜力、指导关键的变化过程。由于民族主义力量被认为是具有可塑性的，所以可以使联盟的根本理念成为拉丁美洲的热切愿望的核心。但是莫雷列斯·卡雷昂也警告说，如果肯尼迪政府不能将现代化议程与拉美不成熟的和不加引导的革命狂热结合起来，那就是把资源投入“心理上的无底洞”。^①

肯尼迪政府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处理问题。肯尼迪指示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组织每月一次的会议，并责成他一定要让莫雷列斯·卡雷昂出席，以强调该计划的“思想和心理效应”。^② 美洲发展银行副行长格雷敦·厄普顿(T. Graydon Upton)也向肯尼迪进言：联盟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动员拉美民众的精神”，并且将“真正的民族神秘力量”与这项计划融合起来。厄普顿赞扬美国新闻署在双边领域里的努力，同时建议美国资助美洲国家组织建立单独的国家委员会，利用拉美媒体宣传联盟在每一个国家取得的成就。^③

向自由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过渡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争取进步联盟宪章宣称，为了取得成功，要求拉美人民方面能够实现“自助”。拉美人要制订发展计划，确定投资项目，改革土地所有权，美国期望在这些基础上拉美人重组他们的社会。而且，由于肯尼迪

^① Memorandum, Morales Carrión to McGeorge Bundy, NSF, box 290, "Alliance for Progress, 4/62- 6/62", JFKL.

^② Memorandum, Kennedy to Bundy, April 23, 1962, PCF, box 62a, "Bundy, McGeorge, 1962", JFKL.

^③ Upton to Kennedy, March 16, 1962, PCF, box 95, "Alliance for Progress", JFKL.

政府坚信广泛的社会变迁可以在十年时间内实现,同时强调思想意识变化的重要性,所以它认为这些事情更多地涉及决心和意愿,而不是由拉美的权力分配状况造成的。肯尼迪政府的意思是,贫困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战略家们相信,如果美国能够找到恰当的形式来表达争取进步联盟的理念,就有可能推动拉美的贫困大众和根基牢固的寡头为了他们共同的、长期的利益而寻求合作的办法。宪章的确强调有必要支持民主政府,但是它也表示,拉美的现代化不是一个争夺资源的问题,而是一种自然的演化进程。这一进程符合美国的安全目标,也符合拉美人民的利益,无论他们是什么阶级、族群、人种和宗教。理论家和决策者坚持认为,中心任务是将共产主义的影响排除在西半球之外,并找到恰当的手段展示真正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和价值。“起飞”的巨大冲力将推动现代化进程迅猛前进。

然而,争取进步联盟所做的不仅仅是将现代化理论的中心观念吸收到其政策目标和实践当中。它也树立了美国的这样一种身份:一个帮助那些苦苦挣扎中的社会走上它自己的经历所指明的道路的发达国家。像更古老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天定命运论一样,“新边疆”口号中的现代化如此界定作为仁义之邦的美国的好处:它有能力帮助那些长期停留在文化和发展阶梯中较低位置上的国家。争取进步联盟吸收了现代化意识形态,进而强调美国推动变革的力量,使美国对拉美各国的直接干涉正当化,并促使决策者和广大公众把自己看成是深切的利他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传教使命的一部分。在冷战的背景下,争取进步联盟把美国描绘为一个意志坚定、思想深邃的国家,为其树立了一种推动奋斗中的拉美地区走向进步的国家形象。

肯尼迪政府从一上台就开始向公众解释其现代化努力的必要性,并不断论证争取进步联盟所涉及的远不仅仅是资金的转移。罗斯托告诉总统,如果要使外援抓住“公众的想像力”,那么美国就



肯尼迪政府的政策纲领和口号是“新边疆”，肯尼迪本人和他的谋士们热衷于将“新边疆”所代表的美国制度和精神推广到欠发达世界。1961年访问拉美时，肯尼迪一路宣讲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理念。1959年尼克松访问拉美时到处都遭到抗议，而肯尼迪却受到广泛而热情的欢迎，这当然与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的推出有关。（图片来源：肯尼迪图书馆）

应该对其推动各国社会进入“起飞”阶段的成果大加渲染。^① 前洛

^① Memorandum, Rostow to Kennedy, March 2, 1961, POF, box 64a, “Rostow, 3/61—5/61”, JFKL.

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同意这种观点。他向美国新闻界解释说,尽管这个关于拉美的新计划需要“大量通常所谓的‘援助’”,但国务院认为这个问题“首先不在于援助,而是一个加速发展的问题”。^①肯尼迪本人也强调其政府对这一思想的贡献,他把这些行动描述为通过创设“新制度”和“新计划”帮助拉美实现其“现代化努力”。这些社会在秩序和混乱之间摇摆,正经历着“充满新期望的动荡阶段”;如果它们要在“晦暗不明的争取自由的长期斗争”中取得胜利,那么他们就需要美国的帮助。^②外援并非新生事物,它自杜鲁门时代以来一直就是美国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诸如争取进步联盟之类的计划却宣称要提出目标更加远大的方案。

新边疆^③团队也致力于通过分析美国实现民主、持续发展和繁荣的道路而向拉美人提出可供其学习的经验。罗斯托在墨西哥城的一次商会会议上说,拉美人将很好地学习他们的北方邻居曾借以登上现代性顶峰的战略。他解释说:“各个国家的发展有点像人的发育。”处于现代化“孩童期”的社会可以模仿世界上更先进的国家。罗斯托论辩说,正如我们“有可能在大体上了解9个月的婴儿、5岁的孩子、14岁的少年、21岁的青年所必定面临的问题一样,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可以被称为一门科学的话,那么它首先应该包括确定一系列需加以克服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努力。这些努力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有成功的,有失败的”。^④

① “Secretary Rusk’s News Conference of February 6”, 298.

② Kennedy, *Public Papers*, 2:217.

③ “新边疆”(New Frontier)是肯尼迪政府的施政纲领和政治口号。——译者

④ Rostow, “Economic Development”, speech to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Mexico City, August 19, 1963, Moscoso Papers, box 11, “Speech Materials, 6/63—9/63”, JFKL.

罗斯托的言论上承天定命运论和世纪之交那些热衷于帝国扩张的人的言论。他表示,一个成熟的、发达的社会能够拉着尚未定型的、孩子一样的社会的手,把它们领进现代性的成年期。

而且肯尼迪政府的官员不断地把美国说成是一个曾经特别成功地经受了具有普遍性的发展挑战的国度。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托马斯·曼(Thomas Mann)承认“不同的国家文化、国情和问题各不相同”,但是他还是认为有一些“广泛的经济原则 200 多年来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而这些经验可以从美国的历史中抽取出来。曼引用美国在持续的长期增长、工资提高和国内购买力的提高几方面的卓越经历来说明问题,进而劝告他的听众要注意: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是如何保障了以“资本、商品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市场。曼强调,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在私有权、创新的自由和“竞争性经济”的基础上,“个人积极性”发挥了一种作为“进步的主要推动力”的作用。^① 曼建议,如果拉美国家要实现持续增长,那么他们就应很好地设计出使这些力量发挥作用的制度。

美国官员为此教育目标而选择罗斯福新政作为历史教材,他们认为其中的历史经验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林肯·戈登指出,罗斯福的努力证明:当国家计划为自由企业的有效运作提供必要的保障时,经济扩张和增长就能取得成效。通过规范证券市场、提供住房和农场保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组织大批失业人员从事政府工程工作,新政赋予美国经济以新的结构,使之得以从经济震荡中恢复并更稳定持久地发展。他赞扬新政“热情地将某些曾被遗忘的群体,包括黑人、农场中的移民劳工、南方被边缘化的农场主、没有工会组织的城市工人充分包容到国民社会中来”,还宣称罗斯福证明了社会公正和经济进步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新政在更大程

^① Mann,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772-75.



托马斯·曼后来升任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图为 1966 年罗斯托和曼在国务院的一次招待会上。(图片来源:约翰逊图书馆)

度上是一次英勇无畏的创举,而不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试验性应对,它成为拉美在依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路线推动社会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所学习的榜样。^①

戈登继续指出,新政所首先展现出的一点是,严格、科学地加以规划的社会工程能够产生显著的效果。他遗憾地说,许多拉美人仍然认为国家计划是“业余爱好者”的领域,是“兼课教授教出来的法律和经济旁听生”的游戏。他们相信“口头表达”完全能够“取代对事实和严格客观的考虑的尊重”,幼稚地以贬低系统分析而以夸夸其谈的哲理雄辩为荣。如果拉美人变得现实而理性,像北美

^① Gordon, *New Deal for Latin America*, 105—8.

人那样勇于直面现实,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把外国投资者和贪婪的投机商当作共产主义的替罪羊而把怒火投在他们身上”。^① 戈登和他的同事指出,世界上最现代的国家过去为在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框架下锐意进取提供了一个典范和蓝本。戈登没有说出、但已暗示的观点是,“发展”在许多方面是个意愿的问题。如果拉丁美洲人能够控制他们的“情绪”,不再寻找“替罪羊”,而是去效法他们的北方邻居,则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克服。他表示,拉美人的当务之急无非是:承认他们的文化缺陷,接纳客观的社会科学分析的工具,并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戈登塑造了一个物质和精神上都处于贫困状态的拉丁美洲的形象,又把美国描绘为只凭借其合理的技术和决心就登上现代性的制高点的国家。

在整个肯尼迪政府任期内,当它公开谈论争取进步联盟、谈论其他国家有必要仿照美国的成功经验制定路线时,曼和戈登之类的观点就浮现在字里行间。在为向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和巴西地区提供电力的计划的启动而举行的仪式上,肯尼迪谈起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的经验,并表示:“我们可以对欠发达国家作出的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将我国国民业已成功地发展出和利用过的技术传递给它们。”国际开发署首任署长福勒·汉密尔顿(Fowler Hamilton)同意总统的观点,并希望一旦美国顾问“在这其中一些国家把事情干起来……则其他国家就会像受到传染一样仿效它们的榜样。因为存在于这些先生女士们的大脑中并能传授给拉美人的东西,比之官僚们揣在口袋里的那些东西要重要得多”。^② 迪安·腊斯克赞扬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国民国土保持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声称美国的过去“对正在努力指导他们的人

^① Gordon, *New Deal for Latin America*, 109.

^② Kennedy and Hamilton cited in Kennedy, *Public Papers*, 2: 818 - 20.

民的经济增长的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有重要的借鉴作用”。^① 尽管向现代性的过渡是艰难的,但发展中国家能够从美国的历史记录中吸取经验,仿效伟大的美国先驱者几十年前想出来的成功计划。



肯尼迪政府的外交政策班底中很多人是有深厚学术背景的知识名流或者“出类拔萃之辈”,而且自由派色彩浓厚。而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却是政客出身、长期在外交部门工作的“二流人物”,其特点是循规蹈矩和沉稳克制,思想保守,被认为只是“名义上的民主党人”。但他的反共主义政策理念和“美国精神”的文化假设与政府里的教授们没有根本差别。图为肯尼迪和腊斯克在交谈。(图片来源:肯尼迪图书馆)

^① Rusk, “America’s Destiny in the Building of a World Community”, 898—99.

肯尼迪政府还强调美国具有一种潜力,能够帮助拉美的“传统”社会以积极进取的世界观取代其“冷漠”(apathy)和令人麻木不仁的“宿命论”。争取进步联盟的协调员提奥多罗·莫斯库索的话使人想起帕森斯和列维的社会理论。他认为,现代化将会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核心。他指出:“无论是在一个孤零零的村落里,还是在一个农业地区或者一个城市小区中,在现代经济的压力下一个扩展型家庭不可能原封不动。”父母“将在一段时间内很难保持儿女们的尊敬,因为孩子们已经知道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而男人们不得不忍受挣钱和他们一样多的妇女们挑战他们的传统权威。莫斯库索评论道:总人口中更多的部分将流进城市,并拒绝传统的生活方式,因为已经“厌倦了等待幸福的明天,厌倦了等待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明天”,他们要求“今天活得更好”。^①

勒纳、白鲁恂、罗斯托和其他理论家指出,与“现代”社会的交往将改变那种把生活看成是外在的准则价值的“传统”观念;对通过后天努力取得的地位的尊重,社会流动,甚至人的移情都将动摇欠发达社会,使之摆脱宿命论的停滞僵化,将他们推向进步之路。面对拉丁美洲,肯尼迪政府官员解释说,美国将必须提供超出计划技术和物质资源以外的东西。助理国务卿艾德温·马丁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说,争取进步联盟还需要“打开亿万人民发现机会的眼界”,并“帮助他们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提供给他们的新机会”。马丁接着说:“砖、沙浆和机械显然都不过是手段,而人民的态度、价值观和热情才是计划的根本。”为了推动拉美的现代化,美国承诺要给那些仍陷于残缺、消极和停滞的文化中的人们

^① Moscoso, “Social Change and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speech, April 18, 1962, Moscoso Papers, box 10,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Lectures on Alliance for Progress”, JFKL.

带来巨大变化。马丁指出,拉丁美洲人需要美国来帮助他们确立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的方法。

首先有必要把变化作为好事来接受,变得更好的可能性要大于变得更坏的可能性。数量上的精确性、工作和生产程序中的准确,对成本优势的仔细核算,都必须成为建立现代社会所需的第二天性。科学的或者说理性的思维习惯也同样必要——这其中包括一些不那么浪漫的德性如干净整洁和井然有序,而传统的或者情绪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必须被放弃。……我并不是在描述什么是好的生活。我只是指出,在20世纪一个现代社会最低需要什么样的物质福利水平,而所有国家都说它们需要这些物质福利。^①

正如马丁所描述的,争取进步联盟所弹奏出的曲调与多年前的泰勒制工厂和芝加哥的社区中心(settlement house)是类似的。他指出,拉美人民继续在奋斗中受制于其宿命论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为了在现代制度中生存并获得现代的生活水平,他们还必须采用现代价值体系。

肯尼迪的争取进步联盟规划者们相信,教育和技术培训能够帮助“理性的”伦理的产生,但是他们也强调有必要在拉美人与美国制度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肯尼迪政府派劳工部长维拉德·沃尔兹(W. Willard Wirtz)前去参加一个拉美劳工领袖的会议,希望借此显示“自由民主”的工会是如何提高工资、促进经济增长和

^① Martin, speech to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World Affairs Institute, December 4, 1962, Moscoso Papers, box 10, "Speech Materials, 11/62--12/62", JFKL.

为工人在民主政治中提供一席之地的。^① 通过与女选举人联合会 (League of Women Voters) 签订协议, 政府也希望向拉美妇女提供“公民教育”。莫斯库索指出, 对计划的成功实施极为重要的是, 要为争取进步联盟确定更高的政治目标。在个人交往中也要强调民主制度对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意义。^② 争取进步联盟还将拉美人送到美国, 向他们展示当地社区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国际开发署的一份出版物解释说, 从萨尔瓦多来访的商人为底特律和匹兹堡的巨大工厂感到敬畏, 但是他们认为密苏里州马斯林 (Marceline) 的小纺织业的情况对他们最有借鉴意义。当他们访问这个小城的工业企业时, 看到平均投资水平很低, 仅为 50 美元, 而数百名工人都持有股份, 这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国际开发署的一份杂志报告说, 回国后不到 30 天, 来访者就开始模仿北美人, 组建他们自己的地方开发公司。^③

联盟的倡导者宣称, 将拉美人置于美国文化的影响下, 将有助于他们克服“传统的”惰性和冷漠。用一位赞成争取进步联盟的杂志编辑的话来说, 美国可以在以下方面充当“拉美的促动者: 动员拉美巨大的资源优势, 吸引海外私人投资, 鼓励当地政府支持合理的、民主的和‘援助下的自助’的发展计划”。^④ 莫斯库索向美国媒体解释说, 如果美国更多地将其看成是“十字军”而不是外援项目, 就能鼓励拉美人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 并激励他们推进改革。通过传播美国的价值观, “教化”南美大陆, 美国能输出

① Robinson, “Now the U. S. Is Exporting Union Ideas to Latin America”, 86, 88-89.

② Moscoso, speech to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for Foreign Service, November 26, 1962, Moscoso Papers, box 10, “American Council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for Foreign Service”, JFKL.

③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utting PEP in AID”, 7.

④ “Is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Progressing?”, 380.

美国革命中普遍有效的原则,推动拉美人保护个人尊严,为进步营造良好的氛围。^①

在这样的描述之下,争取进步联盟就成为国家使命的象征,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借以为拉美人的奋斗作重大贡献的计划。斯坦福研究院的两位分析家以同许多政府官员类似的语言指出,“欠发达国家”的人民所需要的不只是美国的资本和专家顾问。他们也要“同情的理解,要求与发达国家的机构保持持续接触,以便能就发展计划的方方面面求得帮助”。他们坚持认为,通过扩大发展援助的机制,将州政府、地方城市和个体公民都包容进来,美国就能扩大其推动现代化的能力。美国各州政府的经济基础相对简单,财政支出规模较小,但他们能够与欠发达国家分享其在农业、教育和制造业方面的经验。人员交流、传媒覆盖率的扩大以及新商业协议的达成,都必定促使“双方的人员和机构在切实的、有意义的和有压力的关系格局中参与进来”。^②

白宫顾问理查德·戈德温决定将这些想法付诸行动。他告诉肯尼迪,由美国各州单独和拉美国家开展合作,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外援工作的整体思路”。^③在几个月之内,美国自豪地启动了一个“联盟合作者”计划。该计划特别包括如下协议:加利福尼亚和智利的农业合作,密西根州奥克兰县与哥伦比亚的考卡河谷互派专家,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市向秘鲁的钦伯特市派遣医疗队。

① Szulc, "Selling a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10; "Evangelist for Progress", 54-55.

② Memorandum, W. B. Dale and D. C. Fulton, "Do the States Have a Role to Play in Foreign Aid?", January, 1961, Eugene Staley Papers, box 23, "Development; Misc. Material", HIA; Dale and Fulton, "On Statesmanship", 52.

③ Memorandum, Goodwin to Kennedy, February 2, 1961, POF, box 63, "Goodwin, R.", JFKL.

莫斯库索的助手吉姆·鲍仁(Jim Boren)宣称,该“计划将不断自我改善”,而且希望对它产生“不断蔓延的热情”。他解释说,美国公民源源不断地来到拉丁美洲,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个计划触及联盟各项事业共同的精神实质’,这就是,各国人民希望互相帮助,必要的时候政府出面,可能的情况下个人出手”。^①与和平队的情况一样的是,政府官员把公民个人的贡献说成是更广泛的民族使命感的表现。

理论家和决策者对美国自己的帝国主义历史闪烁其词,甚至将美国说成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反殖民主义国家。罗斯托解释说,争取进步联盟是新边疆计划的内容之一,它将在南北美洲人民的“头脑中建立一种观念,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尽管殖民主义的历史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现在处于不同增长阶段的各国之间正形成广大的具有持久共同利益的区域”。^②美国把最好的现代价值观、技术和制度送到拉丁美洲,发誓要发动伊比利亚殖民主义在历史上未能成就的巨变。联盟协调员提奥多罗·莫斯库索向众议院外事委员会解释说,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来到拉丁美洲是为了“征服和掠夺”;但是美国是那些躲避宗教迫害的人们的定居地,他们来到这里“生息繁衍,组成国家,建立民族”。^③莫斯库索的言辞将美国与其自身的殖民活动分割开来,他把美国说成是一个例外的国家,愿意与其南方邻国分享资本和价值观,帮助他们走过最终成功前的艰难里程。在拉美落入伊比利亚殖民主义枷锁之下五百年后,本身诞生于反殖民主义革命的美国将传播其建设民族国家的精神,帮助拉丁美洲人完成他们自己的进步事业。共产主义侵

^① Alliance for progress Information Team, Weekly Newsletter, December 23, 1963. Moscoso Papers, box 3, "Partners of the Alliance", TFKL.

^② Rostow, "American Strategy on the World Scene", 628.

^③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2*, 468.

略仍然是一个可怕的挑战,但争取进步联盟将向全世界证明:美国既不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先行国,也不是消除贫困事业的反动障碍。这个国家仍然是“巅峰之城”,正为各国的共同利益而传播它的经验。

美国媒体也认为联盟计划拥有巨大的潜力。它汲取美国理想的源头活水,使各国从美国历史中借取经验,并巩固亘古不变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此基础上变革拉丁美洲,并从中展现美国最好的一面。《时代》周刊在1961年3月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声称联盟是“一个能够被把握的使命、能够化为现实的梦想”,赞扬总统“对今日拉丁美洲的潮流、压力和需求有着深切的洞察”。该杂志在埃斯特角会议结束后不久称,美国迅速拨付9.73亿美元的援助,这“令人信服地说明美国愿意将它的金钱花在激情所在之处”。《时代》还向其读者保证说,经财政部长道格拉斯·迪龙“本人亲自检查,可以肯定借贷申请不会被官僚机构拖着不办”。当一位官员告诉迪龙他不准备办理一个申请时,迪龙回答:“好……我就坐在这里等。”“于是乎‘办理’——也就是批准——在大约60秒后就停当了。”“新边疆”似乎也面对着拉美人的那种巨大挑战,他们需要削减繁文缛节,跨越组织障碍。《新闻周刊》编辑部撰文称赞肯尼迪的创举,称联盟是“迄今为止(美国)发动的将其南邻从贫困和不满中拯救出来的最有希望的计划”。^①

其他媒体更加热情洋溢。《生活》周刊不惜篇幅对争取进步联盟进行了长达数星期的报道,宣称这项创举“具有历史眼光”,并且就其在教育、卫生、农业和住房等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确立了“共同遵循的革命性目标”。这个计划不“只是在冷战防护墙上再补一块”,而是代表了拉丁美洲和美国共同的坚定承诺,而这种密切关

^① “Progreso, Sí”, 29; “Help on the Way”, 16; “Alliance Progresses”, 44.

系就连那浪漫的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也无法打破。《生活》周刊报道说,在埃斯特角城,衣着考究的百万富商、财政部长迪龙“不得不忍受”戴着贝雷帽的古巴人的“中伤和嘲笑”,“但是在这里他也得到了帮助——帮助他的正是粗俗的格瓦拉本人。一次,迪龙讲话结束时切想摆出愤然离席的架势。但是他走错了门,领着他那群挎着手枪的‘秘书’跟班走进了女卫生间。”美国媒体宣称,争取进步联盟将阳刚雄健的华尔街智慧和开明的人道主义结合在一起,所以没有理性的共产党人无法阻挡美国取得成就。^①

然而没过多久,当许诺的奇迹没有出现,联盟最初的冲劲也就消失了。在拉美领导人签署宪章仅一年后,《展望》杂志的高级编辑评论道:“在近期的记忆中几乎没有一个伟大计划是争取进步联盟的这般情形:启动时被寄予如此大的期望,又如此之快地沦为笑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发现,尽管该计划向19个拉美国家投入了大约10亿美元,但“在许多重要方面,世界的这个重要部分却比一年前变得更糟了。”该杂志认为,美国商人继续将该地区视为一个危险的投资场所,拉美的寡头还是没有能够朝委托税制(mandated tax)和土地改革迈出步伐。《新闻周刊》报道说,在争取进步联盟的第一年里,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增长2.5%的目标。四个国家达到2%,两个国家只有1%,五个国家“原地不动”,还有七个国家更是在实际上倒退了。农业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出口收入填不平进口费用,展望未来,并没有更多的光明。甚至《生活》周刊也发表社论指出,肯尼迪讲话之后一年花了10亿美元,但这个计划“已经陷于严重麻烦当中”。^②

① “Fresh Breeze from South”, 46; “Yanquis Open a New World Series against the Reds”, 40.

② Gross, “Has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a Chance?” 80; “How Much Progress in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42—44; “Quasi Stagnation,” 44; “For ‘Alianza’ a Warning,” 4.

虽然美洲国家组织稍微乐观一些,但它对争取进步联盟的态度也是复杂的。根据美洲国家组织对联盟第一年工作的正式报告称,更多的外来资金已经可以获得,中央计划机构已经建立起来,一项国际咖啡协议增加了拉美国家的收入,该地区的经济整合已经迈出步伐。然而同时,美洲国家组织也警告说,拉美的经济增长率“仅有轻微提高,仍低于联盟的长期目标”。税制改革和土地改革的措施仍然不足,发展计划缺乏“一个目标可行的框架”,资本流入不足以“提供该地区各经济体所需的有力促动”。^① 在其对第二年的评估中,美洲国家组织指出有十个国家已经达到联盟宪章中提出的增长指标。但是该组织也指出:“人们不得不担心的是,许多国家克服内部障碍,推动制度、政策和内部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进展缓慢,而只有这些变化才能使联盟成为活生生的现实。”^② 尽管资本援助似乎能加速经济增长,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公平分配看来还是遥遥无期。

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肯尼迪政府对争取进步联盟也越来越担心。在1962年4月,莫斯库索向肯尼迪报告说,拉丁美洲的问题已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在第一年提供的10亿美元当中,只有7,500万美元的发展贷款,而在这其中又只有500万美元流向工业。由于紧迫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加上拉美人没有提出项目计划,所以剩下的资金都被用于支付商品进口、弥补贸易支付差额、转移剩余农产品,而这些用度对该地区的长期目标毫无裨益。^③ 1963年10月,莫斯库索带来更坏的消息。美国在本财政年度的支出仅

①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Its First Year, 1961—1962”, NSF, box 290, JFKL.

②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Its Second Year, 1962—1963”, Moscoso Papers, box 3, JFKL.

③ Memorandum, Moscoso to Kennedy, April 27, 1962, NSF, box 291, “Alliance for Progress Reports, 3/62—4/62”, JFKL.

为前一年的70%，美国在该地区的新增私人投资由1961年的4.28亿美元下降为1962年的2.55亿美元。^①一份白宫内部备忘录向总统作出说明：“我们未能在拉美启动真正的发展努力。计划和项目都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的行动就是缓慢拖沓的。我们没有能够花出我们拥有的钱，而且我们将在一段时间内很难向国会说明我们的拨款要求的正当性。我们正在慢下来。……可以准确地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在着手实施争取进步联盟之下的发展计划。”^②处在低增长率的困扰下，又不能推行长期的发展计划，“发展十年”的启动举步维艰。

然而，如果说争取进步联盟遇到了麻烦，但它背后的意识形态却没有。虽然公开和内部的材料都已说明这个计划未能实现预定目标，但围绕着联盟的意见纷争，以及关于其缺陷的说明，都很少触及那一套核心观念。虽然各方要么指责华盛顿的官僚体制，要么提出有必要增加对外投资，再不就是批评拉美人抵制社会政治改革，但极少有人挑战这样的根本假设，即美国能够充当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催化剂。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情况，联盟的批评者对其根本目的不予置评，而是局限于现代化框架内，仅谈论管理问题或与援助发放有关的技术问题，再不就是拉美到底为最终必然实现的起飞所做的准备到了什么程度的问题。尽管具体的手段受到挑战，但总的目标一般却不会受到质疑。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初，诸如争取进步联盟之类的计划反映了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力的一种信念：美国既有责任又有能力来重塑世界的其余部分。

关于争取进步联盟难以取得进步的原因，一个经常被提及的

① Memorandum, Moscoso to Kennedy, October 2, 1963, NSF, box 291, "Alliance for Progress Reports, 8/63-10/63", JFKL.

② Memorandum, Unknown author to Kennedy, undated, PCF, box 95, "Alliance for Progress", JFKL.

看法是：美国政府外援机构重叠错综，官僚人员素质不高。莫斯库索曾宣称计划实施一周年应该“纪念”而不是“庆祝”。《时代》周刊在对此予以报道时评论说，拉丁美洲的援助要求要“经历政府各机关的层层设卡”。像洪都拉斯这样极端贫穷的国家还没有收到美国所许诺的帮助，因为它的申请“正在文件柜中积着灰尘”。^①肯尼迪政府自己也找出了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1962年3月，白宫解决麻烦的专家比尔·哈达德(Bill Haddad)告诉肯尼迪，这个计划“被打乱、打破了。联盟被打破后的碎片是在农业部、财政部，在国务院的几个点上，在国际开发署的几个点上，在美洲国家组织、(进出口)银行、(国际开发银行)上。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通过(开发贷款基金)和(国际合作署)形成的官样文章和繁文缛节。这些都造成麻烦，是枪打出头鸟式的安排”。^②几个月后莫斯库索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解释说，由于“国际开发署的管理问题”，重大建设项目从申请到批准的时间过于漫长，贷款的发放受到延迟。^③预算局的一项研究发现，华盛顿的问题也蔓延到实际工作当中。驻在国小组会在“一夜之间被要求改变立场，由政治观察员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履行报告和代表的传统外交职能——转换为积极介入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冲突的角色”。官僚们不能很快对新计划做出反应，很难“改变他们的工作方法，由试点先行的惯例和小心翼翼的顾问业务，转变为积极有为的管理工作和定案业务”。他们还作好准备，使自己能够承担“艰难谈判的任务，而这些谈判涉及的都是事关国家主权的最敏感领域——司法、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分配、税收政策、军事部

^① “Troubled Alliance”, 22.

^② Memorandum, Haddad to Kennedy, March 9, 1962, POF, box 95, “Alliance for Progress”, JFKL.

^③ Memorandum, Moscoso to Kennedy, May 18, 1962, NSF, box 291, “Alliance for Progress Report, 5/62-7/62”, JFKL.

署和军事开支”。^①

尽管指出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但每一项分析都认为联盟的麻烦是由单独的一个障碍引起的,而如果清楚了这些障碍,这个计划的现代化潜能就会被释放出来。哈达德告诉肯尼迪,总统“只要亲自签字批示,就能驱使任何官僚去做他所希望的事情”;而通过赋予争取进步联盟以不同于其他美国外援计划的“特殊形象”,就能够增加它的内在动力。哈达德相信,虽然有必要把莫斯库索周围的一些铁面人物派去把计划坚持搞下来,但最终“任务是可以完成的,而且可以很快完成”。^② 莫斯库索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联盟在它诞生的第一个、也是“过渡性”的年头因其运作须通过国际开发署而出师不利,但困难很快就会过去。^③ 预算局也表达了类似看法,把问题解释为一个执行问题而不是目标问题。有关驻在国小组职能大幅变动的中心问题“不在于这样做恰当与否,而是它被做得怎么样”。^④

肯尼迪政府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人事问题,只是继续对个别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排除了对联盟的意识形态基础的重新评价。顾问理查德·戈德温在1963年11月撰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表达了他的失望情绪:“一个在理念和历史上听来正确的计划,在运行中只达到一半的效率。”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受到讥评的原因,正是美

① Bureau of the Budget, “Survey of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Program in Brazil, Argentina, Chile, and Bolivia,” NSF, box 290, “Alliance for Progress, 7/1962”, JFKL.

② Memorandum, Haddad to Kennedy, March 9. POF, box 95, “Alliance for Progress”, JFKL.

③ Memorandum, Moscoso to Kennedy, May 18, 1962, NSF, box 291, “Alliance for Progress Reports, 5/62 -7/62”, JFKL.

④ Bureau of the Budget, “Survey of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Program in Brazil, Argentina, Chile, and Bolivia,” NSF, box 290, “Alliance for Progress, 7/1962”, JFKL.

国官员批评拉美政府的理由。所以戈德温对“缺乏想像力、勇气和行政效能”的不良状况感到痛心。他指出，“人员补充工作的不足，令人难以忍受的人事工作程序，损害个人主动性和责任心的体制，追功逐利的心态”，以及“对碌碌无为的视而不见”，这些都困扰着争取进步联盟。由于造成计划“停滞不前”的原因被认为是在管理方面，那么改善联盟的工作就似乎不需要再去分析它的根本目标。肯尼迪只需更换一些个人就可以让联盟的工作走上正轨。戈德温赞赏和平队在公众中取得的成功，又相信争取进步联盟比起其他新边疆计划“在本质上更激动人心、更大、更有魅力”。所以他坚持让总统“告诉(萨金特·施雷弗)，他必须再掌管联盟至少一年，让联盟站稳脚，然后再找出一个接班人”。戈德温相信，如果赋予这位有活力的和平队领导者以做出“重大的组织和人事变动”的自由，那么就能重振争取进步联盟。^①

为联盟确保私人投资的问题也是在公众和官员们中颇有争议的议题。尽管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需要外国资本来提高经济增长，但它们还是决心避免因依附于美国商人操纵下的跨国公司而出让主权。联盟宪章提出要制定发展计划促进外来投资，但是对美国企业来说，关于施行社会公正、土地改革和收入再分配的呼声又减弱了他们投资拉美的兴趣。肯尼迪政府决心获得拉美主张改革的“民主左派”的支持，同时又急于避免像艾森豪威尔政府时代的政策那样引起拉美人的反感，于是就不提供税收的减免和保证。而在拉美人的眼中，这些做法已使得联盟为“新一轮美国投资扩张打开缺口”。^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 1962 年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艾森豪威尔式的政策“在今天和在 50 年代一样都是错误的——或

^① Memorandum. Goodwin to Kennedy, September 10, 1963, POF, box 63. “Goodwin, R.,” JFKL.

^② Levinson and de Onís, *Alliance That Lost Its Way*, 71—73.

许在今天错得更厉害,这是因为自那时以来政治情绪的剧烈波动。……如果我们转而采取艾森豪威尔式的政策,把创造‘适宜的’投资环境作为我们在拉丁美洲的主要目标,那我们很可能就要和争取进步联盟——以及整个西半球——说再见了”。^①

在联盟成立后的最初两年,古巴革命后美国在拉美的投资的下滑趋势仍然在继续。围绕着政府未能向企业提供激励措施发生了争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争论仍然没有脱离那种凸显联盟本身的正当性的意识形态框架。蔡斯·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总裁戴维·洛克菲勒承认,美国不能强迫拉丁美洲国家听从他的领导。但是,“我们繁荣的国家是在一种以政府为补充的自由企业制度中运行,这种范例对各地不那么幸运的人们所进行的和平革命是一种激励”。^②《摩根·盖伦迪观察》(*Morgan Guaranty Survey*)在一篇报道中支持洛克菲勒的观点,强调历史示范作用的重要性,批评拉美国家忽视了美国范例的优点。美国必须在促进私人部门发展中起先导作用,因为“在那些实行计划的拉美人中间,对自由企业没有什么热情。拉美人把自由企业制度与他们自己的失败联系在一起,而没有把它与美国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各国经济发展的惯例是,生产设施的迅速建立是以收入的不平衡分配为基础的,这将促使高积累率的形成”。^③默克公司(Merck and Company)总裁约翰·康纳(John T. Connor)也试图把促进私人部门发展与那种拉美所欠缺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他指出,私人投资是“工作与储蓄的结果,痛恨不负责任、浪费和滥

① Memorandum, Schlesinger to Ralph Dungan, Schlesinger Papers, box WH 2, “Alliance for Progress, 9/28/62–10/18/62”, JFKL.

② David Rockefeller,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speech to the Economic Club of Chicago, April 23, 1963, Moscoso Papers, box 11, “Speech Materials, 5/4/63–5/6/63”, JFKL.

③ “A Progress Report on the Alliance,” 10.

用职权。……在拉美目前的混乱局面当中,美国公司差不多和扑克牌桌上的主教一样不知所措”。^①根据这些批评意见,成功的现代化要靠有活力的私人企业。如果要使争取进步联盟不同于一般的外援计划,那么它就必须教育拉美人学习美国的榜样,使他们的传统社会对理性而高效的企业能够产生吸引力。问题似乎不是美国能否或者应否使拉美现代化,而只是采用什么样的最佳战略来实现这个目标。

针对争取进步联盟及其明显停滞不前的状况的另外一种批评是:拉丁美洲政府拒绝发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重构。阿拉斯加州参议员厄内斯特·格鲁宁(Ernest Gruening)在《新共和》杂志撰文指出:“争取进步联盟的高贵理想行将失败,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拉美的掌权者没有发动和推进所需的改革。”^②由于寡头和那些脆弱的民主政体没有履行其支持公共福利计划的承诺,而且继续压制政治反对派,所以许多评论家指出,联盟的金钱并没有能够促进社会公正,而只是帮助长期存在的精英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时代》杂志报道说:“争取进步联盟只有一种运行方式:实际上是美国人在付账,而拉丁美洲人却在拖他们的后腿。”在计划实施的第一年,美国派拨了10亿美元,但是只有三分之一的拉美国家“为重建他们的社会而着手在农业、税收和其他方面进行一些艰难的改革”。一些国家似乎“正在谈论改革。但只有少数国家在各方面都接近了起飞的起点”。^③

即使事情到了这般地步,肯尼迪政府和美国新闻界都仍然认为问题在于通过教育使拉丁美洲人认识到现代化带来的好处。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强调拉美贫困的“深度

① “Troubles and Remedies”, 26.

② Gruening, “Why the Alianza May Fail”, 11.

③ “Alianza, sí, Progreso No.,” 33.

和广度”，并担心如果联盟不能唤起希望，则贫困中就会滋生出“冷漠”。^①《新共和》评论说：“对改革行动迟缓，而且缺乏总体规划，这说明许多拉美人还不知道争取进步联盟是干什么的。”^②《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也有类似心态，它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看法说，危地马拉之所以不能推行改革，是因为其领导人对联盟的主张毫不认同：“错误之处在于，和你打交道的是一个有着与西方文明截然相反的对人类的看法的社会。在危地马拉，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及其子女只关心如何尽可能多地为自己和家人积累财富。他们对社会中的其他人毫无责任感。”^③

问题看来是严重的。但是，美国的政策设计人员关注的是文化价值而不是对资源的争夺和阶级结构，所以他们只是教导拉美人，试图使他们明白现代化会给所有人带来利益的道理。切斯特·鲍尔斯提出，一个补救的办法是把哥伦比亚变成争取进步联盟的一个橱窗。在民主的阿尔伯特·勒拉斯·卡马乔(Alberto Lleras Camargo)总统领导下，该国似乎比拉丁美洲其他国家要先进一些。如果美国提供充足的资源以“确保”哥伦比亚成功，则其将有可能“向拉美其他国家显示：一个有决心、有能力、致力于改革的政府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争取进步联盟的理想”。^④其他谋士期望执行以更直接的方式“推销”争取进步联盟的计划。一位美国官员解释说，晶体管收音机即使在“最糟糕的贫民区里”也是被普及了的；“我曾经听到许多拉美播音员在

① Bowles memorandum “Setting the Pace in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in Colombia”, August 7, 1962, POF, box 28, “Chester Bowles”, JFKL.

② “Alliance for Progress; The Big Need Is Deeds,” 50.

③ “Where the Reds May Take Over Next in Latin America”, 50.

④ Chester Bowles memorandum “Setting the Pace for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in Colombia”, August 7, 1962, POF, box 28, “Chester Bowles”, JFKL.

为肥皂和啤酒做广告,在报道足球比赛,他们在做这样的节目时兴高采烈、激情飞扬。我认为现在争取进步联盟也到了在各地都能受到这种待遇的时候了。”^①有些观察家主张对那些没有听从美国指示的政府采取更强硬、更具干预主义的立场。《生活》杂志呼吁肯尼迪政府明确宣布:“我们有权坚持的改革对我们和拉美双方共同期盼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痛楚就没有进步,但是诚实的税收、健全的币值和公平的土地分配比其他形式的革命引发的痛苦要少,带来的进步要多。如果肯尼迪为其援助附加严格的条件,那么南北美洲双方的进步商人、公民和政府就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联盟,并且显示出繁荣和民主是相互依存的。”^②

其他的评论者也赞成美国必须提高拉美各国沉睡中的领导集团的“政治能力”。耶鲁经济学教授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 Lindblom)解释说,拉美领导人的统治“在根本上是无能的”,既无法获取关于本国情况的信息,又缺乏处理内部矛盾的经验,而且不能清楚地了解大众最迫切的愿望是什么。他提出美国方面要研究如何“在拉美发展出恰当的政治技巧的问题”,以此促进“新风格”和“创造力”的形成。林德布洛姆建议:“我们可以促使在拉美的美国乡村工作者的思想转化为拉美农村中的新兴青年政治活动家的思想——这些思想曾经是新鲜的,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既然大批乡村工作者在美国曾经提高了小麦的产量,那么,在拉美的乡村工作者——作为政治活动家而不是农民——难道就不能提高拉美草根政治活动家的生产力吗?”美国指导者能“给拉美政治活动家带来机会,使他们看看我们的政治家是什么样的,看看我们的

^① Attorney General's Assistant Jim Symington memorandum to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March 15, 1963, *FRUS*, 1961—1963, 12: 134.

^② “For ‘Alianza’ a Warning”, 4.

政治家有什么样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可供他们借鉴”。^① 根据这种解释,争取进步联盟的理念是合理的。拉美的寡头们并不拒绝联盟提出的价值观和目标;他们只是还不了解这些价值观和目标,误解了他们的意义。由于问题更多地涉及美国的教导而不是当地的权力关系,所以美国只需训练出负责任、讲民主的领导人。各种因素在其中紧密关联的现代化进程就从这里起步。

当然,美国国内也有一些异议人士抨击争取进步联盟的主旨及其自由主义理念。《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讥讽肯尼迪政府,说它居然“希望用争取进步联盟的简单方案解决二十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积累了400年的问题”。在秘鲁、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阿根廷都发生了政变,这说明,“华盛顿赶在卡斯特罗之前使该地区社会主义化的计划”所导致的是不稳定,而不是发展。^② 《新共和》批评争取进步联盟试图推进拉美的社会工程,而完全不考虑那里具体的、迫切的需要。该杂志编辑指出,在墨西哥,美国拒绝资助已有的那些意在提供廉价衣物、医疗、社会保险和住房的计划,而是试图“促成墨西哥人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那些制度——或者换句话说,试图去做那些除非美国人给钱否则他们就不做的事情”。^③

学术界和思想界也批评现代化意识形态及其对联盟的影响。芝加哥大学对外关系问题专家汉斯·摩根索对“资金和服务的转移”能够推动民主和经济发展的观念发起挑战,他指出,美国采取的是“自欺欺人的政策”(policy of make believe)。由于援助真正可行的目标是提升美国的威望,或者贿赂受援国,使之采取特定行

① Lindblom, “New Look at Latin America”, 81-86.

②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334-35.

③ “Mexico: No Aid for the Competent”, 9.

动,所以发展之类的言辞只会使援助国和受援国双方都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①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观点则是从另一种角度出发。他担心,美国所谓它已在西半球制造出社会公平的说法会使拉美人感到厌恶。他指出:“接受礼物会使人情绪紧张。但是,与只有拜美国之赐才能取得独立、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尴尬境地相比,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接受食品和机器的事实对荣誉和尊严的伤害还不算大。”^②

然而,争取进步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样一种强大共识的支撑,即美国能够使希望效法美国的世界实现现代化。虽然一些有洞察力的批评家指出,在遏制政策和发展的目标之间存在张力,或者质疑能够将美国经验应用到拉丁美洲,但是大多数持异议者也都受到这样一种在公众中根深蒂固的信念的影响,即美国肩负着改变“发展中”世界的义务。现代化论者把各种变迁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已为科学所证明了的美国道路,另外一种是对这种道路的偏离。在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美苏权力均衡之外,他们很少去注意具体需要、当地情况和文化背景。争取进步联盟把美国的历史奉为普遍有效的模式,把与美国模式有很大差异的其他道路斥为颠覆的产物,从一种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观点出发看待整个发展问题,把发展视为真正的、正当的增长和恶意的、外来的侵略之间的殊死竞争。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拉丁美洲的持续动乱和越南的灾难的映衬下,这种世界观的局限性清晰地显现出来。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于美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能够规定和指引世界未来的论断,很少有知识分子和政治顾问提出批评质疑。

单靠现代化理论并不能“导致”争取进步联盟。但是,现代化

^① Morgenthau,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302.

^② Hirschman, “Second Thought on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21.

理论确实履行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其作用之下危险得以被感知,战略得以被正当化,美国的国家特性得以被表达。争取进步联盟被称为一项开明的新事业,其目标是取得欧洲殖民主义所未曾取得的进步,由此通过一种美国所特有的帝国主义话语规定了美国的作用。争取进步联盟把美国奉为一种推动变革的力量,它重塑了一种曾浸透在美国早期的西进运动和海外帝国扩张中的意识形态。在肯尼迪的“新边疆”事业中,美国强调他们自己的历史进步道路,强调他们指明道路、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这与老边疆开拓史中的美国人如出一辙。当年的扩张主义者曾宣称上帝授予美国人以在美洲大陆扩张的“天定命运”,如今的决策者转而依靠社会科学来构建自己对世界的观点。

争取进步联盟承诺要再造“停滞”的文化和国家,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新边疆纲领中的和平队有极为相似之处,与肯尼迪政府在越南通过“发展”推动反叛乱的做法也是异曲同工。在上述三个案例中,美国支持下的民族国家建构都把战略目标、自由资本主义、人道主义使命与美国指导“欠发达”地区的能力、权力和责任联系在一起。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对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自大几乎毫无争议。

第四章 以和平为目标的现代化:和平队、社区发展和美国的使命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肯尼迪的个人魅力是当时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因素,美国青年对和平队的热情中不无热爱肯尼迪本人的成分。

在肯尼迪政府的各项政策计划中,美国和平队也许是最受关注、影响最广泛、最激动人心的。从有人提出把美国青年送到海外去服务的那一刻起,美国官员就惊讶地发现这个主意的吸引力竟然是如此强大。在私下的决策和公开的讲话中,肯尼迪政府都把和平队描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机构,它超越了政治和战略利益,是一种包容了深藏在美国文化当中的那种富于激情的理想主义的力

量。肯尼迪总统与和平队的官员们说,志愿者们将在海外度过两年,与他们所服务的穷人们过同样艰苦的生活。他们来自美国的各行各业,但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在富裕社会里的舒适生活,去帮助那些需要他们帮助的人。他们将提供所需的劳动和技术,在美国人民与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之间架设友谊的桥梁。根据和平队早期一次会议的记录的说法,志愿者将不充当“冷战或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或代理”,而只是“作为自由社会的产物,作为自由的男子和妇女,被派往海外参加服务工作,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接待他们的各国人民将从他们的奉献中看到哺育他们的社会的本质”。^① 在国际开发署和争取进步联盟在向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或者派专家前去评估发展计划的地方,美国人现在亲自扛着工具与主人们并肩工作。在美国军事顾问训练外国士兵、向他们传授击败共产主义的战斗技巧的地方,志愿者们将通过他们的人道主义行为和民主价值观展现美国社会的美德。一本征募志愿人员的小册子宣称,和平队所提供的是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说的“战争的道德对等物”。它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使公民个人可以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直接在一起工作,在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提供援助,通过增进个人关系和相互理解而推动和平事业”。^②

大众传媒也应和这些说法,认为和平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和勇气可嘉的组织,可以帮助那些通过吸收美国历史经验而对自身未来作出规划的社会。美国媒体对这个组织赞誉有加,更对那些愿意亲身参与人道主义事业的志愿者称颂不已。各媒体在报道中

^① Minutes of meeting, Bradley Patterson, December 6, 1961, Bush Papers, box 2, “Director’s Staff Meeting Records, 10/2/61-1/8/62”, JFKL.

^② Peace Corps, *Peace Corps Fact Book*, 3.



和平队的标志

强调美国青年的理想、决心和责任感,把和平队描绘为一个体现了美国善良无私的本性的组织。《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声称,和平队“肯定是一个所有国家都未曾推行过的非凡计划”。^①

在这幅英雄画卷背后隐藏着一些事实。在和平队被宣布后的几个月里,25,000名有望成为志愿者的人的信像雪片一样飞到和平队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许多人为那位口才雄辩、魅力十足的总统所激励,为他那“要问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的名言所感动,纷纷加入和平队,立志以一种实实在在而且对个人极有意义的方式实践人道主义。一位被派往埃塞俄比亚的志愿者回忆说,当时他和许多志同道合者一样,感到有责任效力于“那个刚刚成为我国

^① “The ‘Peace Corps’ Starts”, 26.

领导人的……热情的年轻人。……看上去他不仅仅在讲实话,而且他似乎就是在对我讲话,而我也想对他有个交代”。^①最初几年间和平队在加纳、坦桑尼亚、伊朗、哥伦比亚、菲律宾、喀麦隆、玻利维亚和其他一些国家设立了计划。这个机构还将成千上万的测量员、教师、农民、工程师和护士派往海外去和贫困作战,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所取得的成果还特别突出。例如在加纳,从1961年到1991年,和平队志愿者为将近675,000人提供了教育,占该国人口的近5%,使识字率大为提高。^②另外也有志愿者们感到他们的海外经历大大丰富了他们的人生,而且当他们回到美国时,他们对外国的语言和文化都有了更深的理解。历史学家裘利斯·阿明(Julius Amin)说:“去喀麦隆和非洲其他国家服务的志愿者帮助破除了那些关于所谓黑暗大陆的神话。越来越多的回国和平队志愿者拒斥好莱坞电影和传教士的幻灯片中对于非洲历史的歪曲表现。他们组织讨论会、协会和报告会,以此增加美国人对非洲的了解。”^③在许多国家,志愿者们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持久的友谊。

然而,要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分析和平队,我就要考虑本质上不同的另外一些问题。我更关心的不是个体志愿者的动机、经历和贡献,而是成为这个机构的思想基础的观念,是美国文化中的使命感和官方政策背后的目标。我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并不是要贬损那些去海外服务的人,也不是要藐视他们的经历、挑战他们的理想主义。伊丽莎白·考布斯·霍夫曼(Elizabeth Cobbs Hoffman)在对该组织的记述中相当公允地指出,志愿者们“并不都是中央情报局特务或者天真的受骗者”。^④然而,我们当然也会看

① May, "Passing the Torch", 294.

② Cobbs Hoffman, *All You Need Is Love*, 179-80.

③ Amin, *Peace Corps in Cameroon*, 177.

④ Cobbs Hoffman, *All You Need Is Love*, 4.

到,就其制度基础而言,和平队与肯尼迪时代的其他各种发展计划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和平队的政策目标和公开言论不是独树一帜的,更不是史无前例的,而显然与争取进步联盟和在越南的反叛乱行动一脉相承。和平队主管萨金特·施雷弗(R. Sargent Shriver)曾指出,志愿者“不是受命前来表达美国官方的观点”,但这种说法丝毫没有降低和平队的任务和形象在战略家和记者心目中的地位。无疑许多志愿者是出于为克服贫困尽心尽力的一片赤诚才来参加这个组织的,而且他们当中有些人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许多志愿者回国后还参加了民权运动,强烈反对美国在越南的干涉。但是他们的动机和活动都是通过政府和媒体的报道被传达给公众的,而至于政府和媒体怎么宣传他们,他们是无法控制的;有时他们对关于他们的宣传甚至也有些不满。对于本章所涉及的主题已有大量文献加以讨论,^①所以本章不拟详细叙述其具体过程,而是讨论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本章关注的是政策和公共宣传问题,探究和平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反映了这样一种文化共识,即美国有责任推动其他社会进入美国自身所最充分地体现了的现代性。在这种分析中,和平队难以构成一个显著的特例或异例。因为和平队的基础也是一种广泛的信念,即美国力量能够促使一个处在“发展中”而又凋敝不堪的世界实现现代化。

本章不试图从关于和平队的官方话语和公众话语的背后找出一个单独的事实,而是将文化形象(cultural images)和言论(rhetoric)本身作为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意识形态在冷战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在这场斗争紧张而紧迫的局势中,和平队把美国界定为一个特殊的国家,一个愿意帮助“新兴世界”迎战美国人很久以前曾经而对过的挑战的国家。和平队赋予其志愿者以一种

① 其中可参见 Fischer, *Making Them Like Us*; Schwarz,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特性：他们体现了美国促进别国的“发展”的国家能力。而且，和平队诱导美国人把自己想像为一个能和别国人民心心相印的伟大民族共同体。和平队还宣称它将唤醒美国民族形成之初的道义价值。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对那些缺乏民族国家建构所需的文化潜力的国家倍加眷顾，而这又将使美国重新发现自己。像肯尼迪对外政策的其他要素一样，和平队帮助美国确立其在非殖民化的时代潮流中重新伸张自己的权力的必要性和手段。

本章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和平队的意识形态。第一，本章拟评估现代化理论在这个机构的设计和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肯尼迪的其他发展计划一样，社会科学家规定了和平队的目标和潜力。而且，出现在“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中的是一种行动主义色彩特别强烈的改革“传统”社会的路线，这极其突出地体现了理论和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解释还将考察，和平队是以何种方式在公众中表现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它又是如何发挥一种文化参照点的作用的。官方和媒体都坚持认为，志愿者及其工作的性质都展现了美国全民族的利他主义和坚强决心的结合。和平队的支持者们认为，通过在海外推进现代化，它也可以帮助美国社会自身重新焕发活力。最后，本文的分析将和平队与冷战的背景紧密地联系起来。对肯尼迪政府而言，这个机构为它提供了在共产主义挑战之下保护美国信誉的一个完美手段。与争取进步联盟和越南的战略村计划一样，和平队也宣称要拒斥帝国主义传统。而且，与争取进步联盟和战略村计划中的情况一样，在和平队的案例中，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反复申述它的一些核心价值。

在肯尼迪提出关于组建一个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海外志愿者团体的著名建议之前，这样的一种想法已经在华盛顿政府外围的圈子里流传了一段时间。1957年，威斯康星州众议员亨利·瑞尤斯(Henry S. Reuss)自东南亚访问归来，对美国在海外的形象感到

担忧。他提出，应该组建一个志愿者团体，可以显示美国对后殖民国家的善意。为避免引起与法国、英国和荷兰等欧洲盟友的不和，美国一度不愿支持民族主义运动，而和平队正可修复与前殖民地国家因此受到的伤害。国会中有部分议员对艾森豪威尔的对外政策持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态度，瑞尤斯正是其中的一员。他呼吁成立“第四点青年队”，并力促通过立法对该计划的可行性予以评估。国会只派拨了一万美元给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授权其起草一份建议书，但是瑞尤斯的建议由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赞赏。瑞尤斯和俄勒冈州参议员理查德·纽伯格(Richard Neuberger)认为大规模的美国对外援助计划经常无助于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也表示美国青年将从其海外经验中获得收益。^①

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当时曾是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也为建立一个国际服务机构、通过关于“美国和平队”的法案而奔走呼吁。这位自由派民主党人把这个计划称为“一个真正的人民对人民的计划”。他解释说，通过向亚非拉地区传授“农业和工业的基础技术、本国语言和英语、医疗卫生技能”，“有才华有献身精神的美国年轻人”能够起到减缓贫困、增进和平的作用。像瑞尤斯一样，汉弗莱也对投入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援助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援助予以区别。而他认为后一类援助对加速全球“发展”和展示美国的利他主义是最为必要的。1960年，汉弗莱使关于和平队的想法成为他短暂的总统竞选活动的一个主题。汉弗莱在6月从竞选中撤出后，把他关于建议成立这个机构材料都

^① Reuss, "Point Four Youth Corps"; Amin, *Peace Corps in Cameroon*, 18.

送给他的民主党伙伴约翰·肯尼迪。^① 非殖民化运动正在进行中,而美国人对非殖民化的反应不够热情,肯尼迪对这种状况有所担忧,所以对和平队的主意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言语之间极力强调美国的弱点,不断对美国未能领会“欠发达”国家的战略重要性而表示痛惜。1952年他在众议院的辩论会上宣称,他的东南亚之行使他看到了美国所面临的严重威胁。他解释说,鉴于该地区的人口众多、经济贫困和政治动荡的情况,他断定美国“把它的注意力过分地集中在了西欧”。他警告说:“共产党人有可能在以后五六年间夺取全部东南亚地区。我们有什么样的武器去制止他们呢?”^②在1957年,肯尼迪曾攻击艾森豪威尔纵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强调“帝国主义的挑战”是冷战的一个关键问题。他坚持认为:“这是一场最为严峻的考验:亚洲和非洲的冷眼旁观着的亿万人民将根据我们这个国家的行动做出重大选择,铁幕后仍未丧失对自由的热爱的人们也将焦急地等待我们采取行动。如果我们不能迎接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那么即使投入再多的援助,增加再多的军备,签订再多的协定,发表再多的宣言,举行再多的高层会议,也不能防止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安全受到损害。”^③

在总统竞选期间,肯尼迪也发现和平队是一个将对反共产主义的强调与对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的激励结合起来的有益途径。在1960年10月14日凌晨2时许,在参加了最后一次与理查德·尼

① 关于酝酿和平队的有关情况,参见 Rice, *Bold Experiment*, 10-11; May, "Passing the Torch", 285。参见 Congress, Senate, Senator Humphrey of Minnesota speak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Corps, 86th Cong., 2d sess. . *Congressional Record* (June 15, 1960), vol. 106, pt. 10: 12634-38。

② Debate, Technical Appropriations Bill,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une 28, 1952, as reprinted in Sorenson, "Let the Word Go Forth," 330。

③ Senate speech, July 2, 1957, as reprinted in Sorenson, "Let the Word Go Forth," 331。



和平队的启动多少有些不期而至,因为肯尼迪向学生们提出和平队倡议的时间和地点都不是事先设计和安排好的,尽管这个想法在美国的自由派政治家那里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肯尼迪在密西根大学一番即兴演讲激起美国公众热情而迅速的回应,许多人签名或写信表示愿意充当志愿者。肯尼迪看到和平队中蕴涵着巨大的政治收益,所以一进入白宫就落实该计划。图为肯尼迪1960年10月14日凌晨在密西根大学即兴演讲的情景。

克松的电视辩论后,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来到密西根大学安阿伯分校。在学生会大楼的阶梯上,他受到一万名学生的热烈欢迎。在这里他激励学生们投身于冷战斗争,去作出自己直接的贡献。他问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花十年时间待在非洲、拉美或亚洲,在那里为美国、为自由而工作?在即将成为医生的那些人当中有多少人愿意在加纳度过时光?技师和工程师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为外国服务,愿意在周游世界中生活?我们这个自由国

家是否有竞争力,答案取决于你们是否愿意把你们生命的一部分贡献给这个国家。”^①1960年11月2日,在旧金山市巨大的牛市 Cow Palace 的大厅里,肯尼迪再次发出这种呼吁,并且把这种呼吁和对美国外交人员的攻击结合起来。他声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部门中净是些素质低下的大使和衣着考究的门外汉。肯尼迪指责他们对外国的语言和文化一窍不通,说进入政府的共和党人和国务院官员在训练有素的苏联技术人员、医生和教师面前败下阵来,而苏联援外队伍“为世界共产主义事业不惜在海外度过一生”。肯尼迪指出,美国必须以技能、决心和仁爱来对付苏联的努力。美国要以“和平队”的形式展现美国公民的技能、决心和仁爱。和平队主要由“有才华的青年男女组成”,但也不排斥合格的“愿意服务于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服务于自由事业的各个年龄段的美国人”。^②

为了对和平队本身及其任务进行规划,肯尼迪政府也试图寻求几个杰出的社会科学家的意见,而且也听取了他们的建议。1951年的一份关于如何与铁幕背后的人民进行沟通的报告附有麻省理工学院教师和行政官员提交的一个附件,其中建议国务院启动一个“面对面交往”的国际性计划。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位执行官罗伯特·莫利森(Robert S. Morison)也参加了这项研究,他建议“招募那些愿意而且能够拿出两到四年时间与亚洲的村民建立密切交往的美国青年”。他解释说:“如果他们能够恰如其分地代表美国人,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利用他们的地位传播美国观念,包括共同工作中的协作精神、对个人尊严的尊重,以及个人创造力

① Quoted in Randmon, *Come As You Are*, 4.

② Campaign speech, November 2, 1960, as reprinted in Sorenson, "Let the World Go Forth," 119-21.

的自由发挥。”^①大选过后，肯尼迪也亲自就此向最优秀的专家进行了咨询。在给沃尔特·罗斯托的信中，肯尼迪要这位经济学家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马克斯·米利坎谈谈，要求他们“担负起研究和平队这个想法的责任，搞出点什么东西来，以便我能在1961年冬天予以实施”。^②肯尼迪的政策设计班子还求得前共同安全署官员萨缪尔·哈耶斯(Samuel P. Hayes)教授的一份备忘录，此人后来担任密西根大学人类行为研究基金会(该机构专门从事与政府工作有关的社会研究)主任。^③利用早先瑞尤斯在国会争取到的资金，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基金会的莫利斯·阿尔伯森(Maurice L. Albertson)、泡林·伯尔克(Pauline E. Birky)和安德鲁·赖斯(Andrew E. Rice)也递交了一份初步报告，讨论全国性的和平队的可行性和可能取得的成就。



密西根大学教授萨缪尔·哈耶斯
在和平队的策划酝酿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① Needell, “‘Truth is Our Weapon’”, 412.

② Kennedy to Rostow, November 16, 1960, Milikan Papers, box 1, “Correspondence, 1959—1961,” JFKL.

③ Hayes to George Sullivan, Hayes Papers, box 2, “International Peace Corps, Correspondence, S—Z”, JFKL.

尽管对拟议中的和平队的操作细节、对美国在这方面是否应该和联合国进行合作有分歧,但米利坎、哈耶斯和阿尔伯森等人都借用现代化理论来确定和平队的中心目标。在所提交的政策建议和报告中,各位社会科学家都强调要加速“发展”,强调有必要对那些试图效法美国的历史成就的国家予以援助。各位作者还试图找出“欠发达国家”中有哪些共同的、基本的缺陷是必须由和平队来加以救疗的。他们几乎都提出,首要的问题是缺乏技术人员。马克斯·米利坎指出,满足这种要求的过程会派生出重要的战略性后果。他解释说,“许多积极推行政治、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欠发达国家在未来二三十年间将面临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才严重短缺的局面。……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大批人员,那么这种技术储备上的差距至少可以被部分地加以弥补,而且对这些国家的稳定至关重要的现代化亦可得以加速进行。……由于这种做法是对和平有序的国际社会的一种贡献,所以符合美国的关键利益。这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立场”。^① 通过提供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美国能够帮助“欠发达”国家穿越艰险的“瓶颈”阶段而继续增长,从而进一步趋近“起飞”阶段。如果和平队能够缩短“传统”社会解体所导致的不稳定阶段,就将有助于消除共产主义颠覆的可能性。和美国政策的其他工具一样,和平队也将帮助造就出一个新世界,此中服务于大众利益并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自由民主政体将纷纷兴起并不断加强。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小组的预备报告持与米利坎的分析相似的观点,但比后者走得更远。志愿者能够显示先进的技术和工作方法的价值,进而开阔当地人民的眼界。像米利坎一样,莫利斯·阿尔伯森及其合作者强调:“青年队的首要目标是帮助全世界

^① Max F. Millikan, “International Youth Service”, January 9, 1961, Bush Papers, box 1, “Beginnings and Background”, JFKL.

欠发达地区加速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而且，作者们还补充说：“成年的美国年轻人将通过参加实地工作而从更高的政策和技术水平上传播技术知识和技能。”^①沃尔特·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谈到农业生产问题时曾提出，“过渡中的国家”进步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是，“那些愿意而且能够到农村去、耐心地展现新生产方法的优势的技术人员数量不足、能力有限”。^②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小组指出，和平队将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技术性知识的匮乏仅是和平队能够加以克服的现代化障碍之一。社会科学家们论证说，美国志愿者能够将他们自己得出的关于如何应付现代世界挑战的个人知识传播出去，把解决问题的经验传授给那些缺乏这种经验的人。萨缪尔·哈耶斯解释说：“当欠发达国家自身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向前推进时，它们将面临我们曾经遇到过的（许多）社会需求。在亚洲和非洲的大城市里，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在非洲，人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些社会需求的存在。”^③哈耶斯强烈呼吁建立一个联合国监督下的国际青年服务机构，建议这个计划将来自所有国家的参加者派往“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但在建议中他也提出，那些来自“现代”社会的志愿者拥有其他国家来的人所不具备的眼光和经验。

尽管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报告的最后—稿在数月后仍然没有完成，但该报告坚持认为，美国志愿者将对“世界上的欠发达地区”产生特别强烈的影响。在传播生产技术之外，他们还将“带去一种典

^① Albertson, Birky, and Rice, “Preliminary Report: A Youth Corps for Service Abroad,” February 1961, Hayes Papers, box 2,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1960—1961”, JFKL.

^② Rostow,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142—43.

^③ Samuel P. Hayes, “International Youth Service: The Promise and the Problems”, January 1961,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box 670, “PC 5, PC Prog, 1/24/61 -3/7/61”, JFKL.

型的美国品质,即了解如何组织有效的行动”。由于“对‘自己的事自己做’的强调”是“美国生活中深刻而持久的因素”,所以志愿者们能够以此弥补外国文化中的缺陷。阿尔伯森及其助手解释说,贫困的、沉溺于宿命论中的社会所需要的不只是工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指导:

我国人民有“不待扬鞭自奋蹄”的传统,他们知道如何审时度势,知道如何通过有效的组织来处理问题。我们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中吸收了这种“组织能力”,即使是年轻的美国人一般也有组织起来完成工作的经验。然而这种品质往往是生活在其他文化类型和家长制的外在规范下的人们所缺乏的。希望在变化中得益的愿望是存在着的,但是面对实际、分析实际、制定行动计划并按计划行动的能力却没有充分发育。这种能力是成功的“制度建设”的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型社会的继续进步就依靠这种制度建设,其内容包括创造政府、教育和工业制度。^①

政府的学术顾问通过对照受援国的文化缺陷来确定美国社会的特性,由此表达了现代化理论背后的主要假设。美国和工业化西方不仅仅得益于历史环境,它们还占据了先进地位,具有一种内在的优越性。通过与“现代”文化进行交往,那些沉陷在停滞社会中的人们将在援助他们的人民的开明形象的启发下成长。

进入白宫后不久,肯尼迪就指派其妹夫萨金特·施雷弗领导一个特别小组对和平队进行研究。施雷弗毕业于耶鲁大学,作为

^① Albertson et al., "Final Report; The Peace Corps, May, 1962", Peace Corps Agency Microfilm, roll 6, JFKL.



施雷弗是肯尼迪总统的妹夫，精明干练，富于理想主义热忱和鼓动力。作为和平队首任领导人，他为该计划在美国国会和民众中争取到广泛的支持。

军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将老约瑟夫·肯尼迪的商品贸易中心扩张为一个巨大的公司。他还担任芝加哥大学董事会主席，为新政府招贤纳士而效穿针引线之力。肯尼迪认为他是和平队理想的领导人，就让他妹夫去阅读有关建立和平队的研究报告。施雷弗急于使和平队计划进入实施阶段，遂选择肯尼迪的民权问

题竞选顾问哈里斯·伍福德(Harris Wofford)以及国际合作署远东部的两位官员——沃伦·维金斯(Warren Wiggins)和威廉·约瑟夫森(William Josephson)来协助自己。他们决定不搞小型试点项目,而是直接以推行影响巨大的计划为目标。维金斯曾参与马歇尔计划的管理工作,他和约瑟夫森都坚信只有大规模的志愿者行动才能够在国内外都调动起公众的想像力。他们指出,和平队应该考虑在其建立后最初的12到18个月间派送几千美国人到海外去。^①

在创建这个新机构的过程中,施雷弗和他的同事们提出的建议都反映了先前学术界的许多想法。和社会科学家们一样,肯尼迪的新边疆团队也都深信和平队能够矫正受援国在体制和文化上的缺陷。除了为弥补“熟练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提供“技术援助人员”,志愿者们还将与当地入结成“个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同心协力地开展消灭疟疾、增进个人卫生、改善灌溉、净化水质和建设廉价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他们还将满足当地对学校教师的需要,传授职业技能和工程技术。但他们的贡献还不仅限于提供技术人员。施雷弗及其助手在给肯尼迪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志愿者们将帮助建设“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国家”。他们将“敦促蛰伏中的群体开展自助计划”;而“美国青年到农村地区去工作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将推动城市精英投身乡村,也加入到和平队的行列中来。志愿者们将投身于一个改变当地人的世界观的变革进程,将向那些有可能偏离正确发展道路的国家提供新的目标感、方向感。施雷弗和他的同事们坚持认为:“随着独立的取得,曾经作为一种整合性力量的民族主义将让位于那些赋予民族主义以新的意义的努力——建立稳定的和自力更生的家庭……能够抵御现代生活压力的

^① Amin, *Peace Corps in Cameroon*, 25—27; Cobbs Hoffman, *All You Need Is Love*, 41—44; May, “Passing the Torch,” 286—87.

社区……以及民主社会中面向未来的、具有社会自觉性的政府。”在拉丁美洲，志愿者们将提供“在当前那种无形但却重要的参与性因素，并提供对未来的希望，而这些都是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亚洲，志愿者们将为一个“大问题”提供答案：“在民主条件下，发展进程是否足以满足人民的愿望，并将亚洲各国带入 20 世纪？或者各国将转向中国所采用的那种严酷的统治方式？”美国人将传播实用知识和民主理念，提供“欠发达国家”所缺乏的视野和经验。施雷弗及其手下认为，志愿者们将帮助各国实现现代化。他们将抵御那种能将真正的自由化进程扼杀在摇篮中的颠覆性意识形态。^①

1961 年 3 月 1 日，在施雷弗递交了他的建议仅几天后，肯尼迪就下达行政命令建立和平队，并在总统基金内为其拨付 150 万美元。他宣称，这个新组织将动用美国的一个“巨大的力量源泉，即那些愿意奉献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男女公民。”^②很快地，要求参加和平队服务的申请就纷纷到达这个机构，公众对它的热情陡然高涨。到 3 月 6 日为止，和平队已经收到 4,500 多封咨询信件，而且民意调查显示出绝对多数的公众支持度。^③施雷弗还对缅甸、喀麦隆、加纳、几内亚、印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进行了私人访问，向海外推介和平队，并试图与各国领导人就接受美国志愿者达成一系列协议。他与其副手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一道，在华盛顿也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游说活动，几乎会见了全部国会议员，以确保将和平队设立为一个永久性机构的立法得以在国会通过。到 8 月底，第一队美国志愿者应加纳总统卡瓦米·恩克鲁玛的邀请抵达

^① Shriver, Draft Report on the Peace Corps, February 20, 1961, POF, box 85, "Shriver Report", JFKL.

^② Kennedy, *Public Papers*, 1, 134-35.

^③ Amin, *Peace Corps in Cameroon*, 29-30.



肯尼迪一进入白宫就命令其妹夫施雷弗对和平队计划进行可行性研究。施雷弗回忆说,和平队尚未成立时收到的表示愿意参加志愿者服务的请愿信就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志愿者组织。在施雷弗的建议下,就任不到两个月,肯尼迪就签署行政命令,在国务院内建立和平队的组织系统。1961年9月,第87届国会通过第87—293号公共法案正式成立和平队。图为1961年3月肯尼迪签署关于和平队的行政命令。

该国。在9月中旬,国会以大比数得票通过了和平队法案,拨款4,000万美元对其予以支持。^①

从一开始,和平队就试图使其志愿者为现代化使命作好准备。到1961年中期,有12,000提出申请的志愿者填写了有关其教育程度、职业经历和专门技能的长篇调查问卷。和平队工作人员使用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一台大型计算机,对不断增加的

^① Ibid., 35—42.

申请者的 420 多万条信息进行分类处理；并组成八个甄选小组审阅有关案卷，对每一个候选人提交的五份推荐书进行审查。^① 申请人要参加一系列标准化的考试，要接受面试，还要到大学校园里待上两个月，学习关于受援国的语言和文化的课程，以及关于全球“发展”进程的课程。和平队培训部解释说，“地区研究”课程是为了向志愿者们提供“一种关于移情的教育，为其继续学习提供必要的前提”；志愿者们还要完成一门“世界事务”课程，该课程注重讲授“有生命力的政治体系的要素”以及“新兴国家的迫切愿望”。培训人员还布置学员们去阅读一些著作，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尤金·斯塔利的《欠发达国家的未来》、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本论文集。为了避免志愿者对其推动现代化的任务产生误解，对和平队的一项修正案要求该机构向他们教授如何对付“共产主义的哲学、战略、战术和威胁”。^②

该机构还在政府赞助下举行了一次题为“和平队和行为科学”的讨论会，邀集学院派理论家对训练志愿者的工作进行分析。面对聚集在国务院礼堂的一大群听众，纽约市立大学的卡斯塔格诺

^① Memorandum, "Survey of Peace Corps Activiti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Administration". Bush Papers, box 4, "Organization Folder: 6 of 6", JFKL. Redmon, *Come As You Are*, and Carey, *Peace Corps*. 后两部书对和平队初期的计划和甄选工作进行了盛徒传式的、但有不失详尽细致的叙述。

^② Memorandum, Peace Corps Division of Training, September 1, 1962, White House Aides Files—Moyers, box 41, "Middle Level Manpower Conference", LBJL. 在一门《政治经济发展理论》的课程中列出的专题中包括如下题目：“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欠发达和发展、欠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和行为的特点”。参见 Gerald Bush. Handwritten notes on Peace Corps Training Program, Bush Papers, box 3. "Organization File", JFKL. 关于对反共产主义训练的要求，参见 Amin, *Peace Corps in Cameroon*, 39.

(A. A. Castagno)提出：“政治学能够为像和平队那样力求在发展中社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人们所利用。”卡斯塔格诺认为，近期知识界努力“为分析非洲、亚洲、拉美和中东活跃的政治变化而提供一套统一的理论范畴”，使得对全世界的政治体系进行分类成为可能。他解释说，在“发展中地区”存在着“文化断裂”、“针对特殊性的社会化”、“宪法内容和宪政实践之间的差距”，以及“庞大中产阶级的缺乏”，这些都向那些希望“把新兴国家纳入西方国家的模式”的人提出严重的问题。但是，诸如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詹姆斯·科尔曼合著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之类的著作可以阐明形势。尽管志愿者们“在十分不同于本国的社会里”将面临“心理调整”的挑战，但新的“政治功能理论”将提供一个“客观的框架”，使他们能更好地理解受援国，充当“变化的推动者”。科学的分析将使有能力的志愿者们更好地认识他们自己经历的意义，还会使他们能够发现当地人自己无法认识到的需求和解决办法。^①

在一篇与卡斯塔格诺观点相似的文章中，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詹姆斯·斯通(James H. Stone)指出，科学的比较研究框架将促使志愿者超越“描述性的方法”，而这种被人们“随意地、习惯性地加以采用的方法，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无非是有助于知识的积累，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可以导致知识的残缺不全”。斯通坚持认为：“和平队的使命要求选择行为主义的概念范畴，而不是具有传统人文学性质的概念范畴，来作为分类的工具。”“当老练的观察者对与本国社会差异较大或者较原始的社会进行仔细观察时，就会遇到一些难以为既有概念框架所容纳之处，”而从比较研究中得出的“中立的概念范畴”将“通过对这些疑难问题的处理而在技术上得以完善”。以严密的概念框架为武器，志愿者就能“不仅将欠发达地区

^① Castagno, "Political Science, the Developing Areas, and the Peace Corps", 1963, photocopied, PCI.

与今天的美国和欧洲进行比较,而且能将欠发达地区与另一个美国——早先的那个欠发达的、殖民地时期或后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加以比较”。^①斯通认为,志愿者们自己的社会相对于他们前去援助的社会无疑是优越的,但是现代化理论将使美国人能够在差异巨大的不同文化之间架设桥梁。它将提供一种客观、科学的手段,使得他们能够理解外国人,理解他们在进化道路上与美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如果志愿者们能够用分析性的、功能性的范畴取代描述性的范畴,那么他们就会对这些历史上停滞不前的当地社会产生新的认识,开始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些社会将踏上通向美国式的现代性巅峰的漫漫征途。

和平队在培训中也对志愿者们所代表的国家的基本性质加以界定。在美国研究课程的指南中,该机构鼓励培训人员考虑“美国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并建议学员们在讨论“青少年失足、离婚、心理健康、贫民区和犯罪”之外,还要讨论“民权、学校中的种族平等(和)住房中的种族歧视”等问题。然而,尽管美国社会中存在着这些问题,和平队的培训手册上仍然把美国描述为一个有着非凡成就的国家。在对“欠发达”国家的描述中不断出现的是消极冷漠、宿命无为、政治专制和社会分裂之类的说法,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独特的美国品性”中却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实用主义、地方自治、物质主义、公民结社和个人主义的共同信仰”。和平队的一份培训指南解释说,美国研究课程的目标是使志愿者“对他们自己作为美国人的代表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当志愿者不了解他们所拥有的推动变单的价值时,和平队就把事情给他们讲清楚。该机构坚持认为,要成为一种现代化的催化剂,最起码必须确立对

^① Stone, “The Role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rcultural Studies in Peace Corps Training Program”, 1963, photocopied. PCI.

自己的这样一种认识。^①



1962年8月9日,肯尼迪总统接见和平队志愿者。和平队是典型的美国产物,是美国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传教士的普济精神和战后美国现代化/发展理论混合的产物,美国公众和政府对它给予巨大的热情。

各种各样的任务被委派给和平队学员。在该机构成立最初的四个月里,它宣布了几个计划,派遣由地质学家、测量员、土木工程师组成的志愿者前往坦桑尼亚修筑公路,向菲律宾的公立学校提供英语教师,向加纳派遣高中科学教师,向西印度的圣卢西亚的卫生所派遣医疗人员。到1964年,和平队几乎训练了近7,000名志

^① Memorandum, Peace Corps Division of Training, September 1, 1962, White House Aides Files—Moyers, box 41, “Middle Level Manpower Conference”, LBJL.

愿者，并将他们派遣到 45 个国家。志愿者的工作包括修建学校、传授新的畜牧业技术、引进高产农作物品种、提供医疗服务、指导农民使用农机具。^① 由于该组织的业务范围如此广泛，所以对其活动很难轻易加以归纳。

然而，在和平队的各种不同任务当中，“社区发展”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能够说明和平队领导层是如何试图在受援国发动剧烈的制度变迁的。他们希望从事社区发展的志愿者不仅仅把他们的工作局限在为贫困人口提供救济的具体事务上。他们还要求志愿者改变当地的社会生活，在村庄和城镇的层级上加速推进现代化。就此而言，社区发展计划比和平队的许多其他计划都更加雄心勃勃。这些计划还可以被作为一个绝妙的案例，用以分析该机构是如何分析受援国文化的缺陷的，而在美国一方为纠正这些缺陷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社区发展对和平队的项目计划部而言也是一项特别有用的业务。和平队在初期对其目标加以说明时强调，应该用志愿者去弥补“发展中国家”的“中级劳动力”的不足。志愿者们将从事那种居于专业科学家和当地非熟练劳动力中间的技术性工作。大多数要求美国派遣志愿者的国家也需要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例如，尼日利亚和印度需要的是农业、医疗和工业方面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人员。和平队官员努力征募那些在护理、农业或工程方面有专业经历的候选者，还在商业期刊和农村杂志上刊登广告。但是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和平队和联合汽车工人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签订的一份 15,000 美元的合同只帮助招收了六名志愿者。和平队断定，年长的技术人员一般都有未成年子女，经济负担重，这使得他们无法参加和平队的服务。受过一些技术训练的年轻应征者中有许多刚刚走出校门，缺乏和平队官员认

^① Rice, *Twenty Years of the Peace Corps*, 24.

为必要的那种成熟老练。所以,被通过参加和平队服务的大多数应征者按该机构的说法都是些“文科学士百事通”(B. A. generalists)。这些人持有大学文凭,但是缺乏受援国所需要的专门训练和职业履历。在肯尼迪时代,这类文科学士万金油的人数大大超过其他应征者,到1965年他们已占参加和平队训练的总人数的70%以上。^①

然而即使面对这种局面,和平队也从来不考虑缩减规模或降低目标。和平队的一位高级官员后来回忆说,这个组织很快就“坚定地(尽管往往是非正式地)采取了这样一种政策:其大多数计划主要由文科毕业生来担当”。^②虽然这些文科多面手中的大多数被派去教授英语和其他基础科目,但和平队还是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派去参加社区发展工作。因为这项工作需要的是“领导能力、实践经验和对人类价值的感受力”,但并不一定要专门技术。^③非常有趣的是,官员们对这些多面手所能取得的成就有特别高的期待。肯尼迪宣称,所有的志愿者都能够助“欠发达”国家“一臂之力”,“帮他们建立一个社会,也使他们对我国最美好的事物有所领略”。^④这帮文科生被认为体现了美国积极有为的民族精神,体现了美国人对改善自身环境的能力信心十足,看上去完全胜任和平队的《第二年度报告》中所规定的任务——“唤醒人民,使他们认识到进步的可能性”。^⑤无须别的理由,就凭他们是美国

① Ashabranner, *Moment in History*, 142—45; Memorandum, Gail Switzer to R. E. Nolan, March 5, 1965, “Peace Corps—History, 1961—1966 (Shriver), Folder #1,” PCL.

② Ashabranner, *Moment in History*, 145.

③ Ibid., 161; Peace Corps, “Liberal Arts Students and the Peace Corps,” PCL.

④ Kennedy, *Public Papers*, 2: 12.

⑤ Peace Corps, *Second Annual Report*, 39.

人，这些万事通就能够改变“传统的”世界观。



图为 1961 年第一批和平队志愿者离开美国前往加纳。此后和平队共向 130 多个国家派出超过 160,000 名志愿者。

在 1961 年至 1965 年间，全部和平队志愿者中有大约 30% 从事社区发展工作。^① 社区发展 (community development) 经常被简称为“CD”，其中的大多数项目集中在拉丁美洲国家，但也在几个非洲和中东国家推行。在不同地区对地区发展事业的界定有所不同，但都以一个共同的假设为基础，即志愿者们在农村地区（以及在少数情况下在城市地区）的 CD 计划中能够推动当地人的世界观发生剧烈变化。和平队的一份小册子解释说，CD 的工作包括“在社区层次上传授民主；鼓励当地人民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齐心协力地工作——这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还是一种新观念。……所显示出来的成果包括学校、道路、水井、花园、沟渠和公共厕

^① Cobbs Hoffman, *All You Need Is Love*, 133.

所。但是……不容易显示出来的成果是更重要的：一个社会终于认识到它能够自己帮助自己”。^①根据萨金特·施雷弗早先主持的一次会议的记录，社区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婴儿式公共工作计划”。它“不仅解决一个或一系列农业方面的具体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要激发和推动一个地区作为一个社区、作为一个民主合作的地区的发展”。^②和平队教官要求从事社区发展的志愿者发起一种新的参与型伦理，建立一种共同利益的观念，组织集体协作的行动，帮助农民开展“自助”计划。社区发展从一开始就被寄希望于能够利用当地资源把当地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志愿者对村民们进行了训练之后，社区就能向公共机构申请对其予以物质和服务方面的帮助。

和平队的实践说明，社区发展所推动的是一种形式的社会工程，而这种工程对民族国家建构的推进是必要的。向自由民主制度的推进既依赖于物质方面的“前提条件”，也依赖于具体态度、文化方面的“前提条件”。而且与技术一样，“欠发达社会”发展所需的观念体系也能够通过“示范”的过程加以传播。通过推动社区发展计划，志愿者们将促使那些与世隔绝的村民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一个更广泛的民族国家实体的组成部分。他们将创造并控制一种进步的理念，创造并控制一种积极进取的民族主义，指导绝望无援的人民渡过“传统”的（且本质上是地方性的）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的动荡年代。位于新墨西哥大学的和平队训练中心的“社区发展协调员”理查德·鲍斯顿(Richard W. Poston)解释说，社区发展关注的是一种“增进社会整合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自决、履

^① Rice, *Twenty Years of the Peace Corps*, 24; Peace Corps, *Who's Working Where*, 11.

^② Bradley Patterson, Meeting Minutes, November 29, 1961, Bush Papers, box 2, "Director's Staff Meeting Records, 10/2/61-1/8/62", JFKL.

行社会和政治责任、公民的主动性、为解决问题而采取社区统一行动，这些观念能够而且必将被确立为基本社会价值观，而这些价值又将塑造和指导人民大众的行为模式”。在地方一级的计划取得成就后，还要追求更大的目标。根据鲍斯顿的想法，“将全国各地人民参加的地方性的发展计划和中央政府的全国性发展计划相结合，将不断增进政治稳定和国家团结。”^①通过提供一整套新的价值观，并将一种认同于范围更大的政治结构的感觉赋予穷人，志愿者们将可能对“期望不断增长的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加以引导，使之成为一种参与型的和民族主义的形式，而不是走向极权主义制度的歧途。这将有助于建立以共识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的长期目标的实现。

为了对这种规划文化发展的努力进行界定，和平队还营造了一种关于“传统”农民和下层城市工人的形象，此中刻意强调他们的消极和被动的特性。在和平队委托下，哈佛大学商学教授、前助理国务卿乔治·洛奇(George C. Lodge)撰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社区发展计划可以弥补久已存在的文化弊端。在对巴拿马的贝拉瓜斯省的个案研究中，洛奇不认为上层土地寡头或者国际结构力量的影响是该地区贫困的根源。他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精神世界中有许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根据他们所收集的信息和用以组织这些信息的概念体系以及做出选择的价值体系来看，他们不仅缺乏农业和技术方面的技能，而且缺乏做出决定的技能”。洛奇发现，农民们相信上帝指导着“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人生只是其命运的展开”，饱受“无孔不入的消极冷漠”之害。所以洛奇把这些农民称为“社会政治真空中的不幸迷途者”。像其他用现代化理论来界定和平队的使命的人一样，洛奇也

^① Post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 Instrument of Foreign Aid", 1963, photocopied, PCL.

提出了一种思路,而在这种思路之下似乎没有必要对一个地区的政治、历史和经济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他回避这些背景条件,采用一般性的“农民”范畴,在此基础上测度他的研究对象与一组抽象的“现代”理想类型之间的差距。“农民”是洛奇所创造的“真空”中的迷途者,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文化和社会。而和平队和美国必须为他们提供真正的文化和社会。^①

对和平队使命的其他分析也提出类似的关于农民和城市移民的形象,而建构这种形象的基础在更大程度上是那些关于“农民”在智力、种族和认识上滞后的假设,而在较小程度上才是物质上的贫困和有系统的剥削力量。和平队负责秘鲁事务的代表(后来升任拉美地区计划主任)弗兰克·曼科耶维奇(Frank Mankiewicz)在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工作讨论会上说,在志愿者通常的工作地,“没有一个到了城里的当地人能够说出他们那里的经济、政治或社会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曼科耶维奇继续说,这种广泛存在的消极冷漠已深深地渗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对拉美下层人群进行的罗尔沙赫氏人格结构测试(Rorschach tests)……显示,测试对象看到的人没有手或者脚,心理学家认为这表明这个人认为自己和自己的邻居没有力量去做任何改变其环境的事情。人们都把自己说成是被遗弃的或被遗忘的。……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能够取得任何成就的信心。他们坐等其他人来帮助自己,坐等那些遗弃或遗忘他们的人回来或想起他们来。但是,天哪,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②当年作为一名对民权抱有坚定信念的加利福尼亚记者,曼科耶维奇在加入和平队以前曾帮助组织农业工人,抗议学校种族隔离,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反污蔑联合会(Anti-

^① Lodge, *Case for the Generalist*, 4, 6.

^② Mankiewicz, “The Peace Corps: A Revolutionary Force”, 1964, photocopied, PCL. (着重符号为原文所有)

Defamation League)工作。^① 然而,一旦投身于在海外推动现代化的事业,他就接受了这一事业的基本假设,甚至采用其中的污蔑性语言。曼科耶维奇的看法与罗斯托关于为“长期宿命论”所苦的“传统”人的描述相互呼应,采用心理学来分析接受和平队援助的人们的特性,认为他们在智力上麻木不仁,而且毫无创新精神。他认为,拉美“下层阶级”的成员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停滞了几百年,所以他们不能独立地采取行动来提高其生活水平。在曼科耶维奇的描述中,这些穷困潦倒的个体毫无希望可言,他们沉溺于自我欺骗当中,拒绝为自己的环境承担责任。

和平队官员指出,为了使这些“传统”民族做好准备迎接现代化挑战,社区发展计划必须要动摇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根基。针对和平队拉美部行动官科尔比·琼斯(Kirby Jones)所说的“人的精神贫困”,社区发展计划必须找到一种救治的办法。琼斯和其他人相信,和平队志愿者是完成这一任务的理想工具。他们是可供仿效的榜样,代表着一个与他们前去帮助的社会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社会。他们还带去一种文化,“展示”有目标、有计划的行动所能产生的力量。琼斯解释说:“美国人习惯于主动进取、尊重法律,几近天真地相信人的无限可能性,而拉美人的习惯则恰恰相反。他们倾向于蔑视权威,对未来持听天由命的态度,怀疑自己掌握命运的能力,以邻为壑,渴望自己能有一种什么东西来象征权力或身份,不愿意尝试任何新事物,盲目地寄希望于有什么人或发生什么事情来把他们救出苦海。”通过组织社区,志愿者不仅与物质贫困展开斗争,而且他们是在推动“态度的变化”,赋予一个民族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的能力。^② 与曼科耶维奇一样,琼斯进入和

^① Ashabranner, *Moment in History*, 166-67; Cobbs Hoffman, *All You Need Is Love*, 67-68.

^② Jones, “Peace Corps Volunteer in the Field”, 64-65.

平队是为了改造世界。作为一名年仅 23 岁的志愿者,他曾在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时充当医师助手。在美国对越南的卷入加深时,他也参加了活动家阿拉德·洛文斯坦(Allard Lowenstein)组织的反战写信运动,向林登·约翰逊递交了一封有 800 多位前和平队志愿者签名的请愿书。^①然而,即使琼斯也认可现代化意识形态中贬斥“传统”世界的观点。

为建立社区发展的方法论,和平队严重依靠结构-功能的分析方法来确定欠发达国家的文化缺陷、寻求推动变革的杠杆。这个机构还为实施社会工程制订了循序渐进的步骤。首先,志愿者要调查人口、物质财产、当局的政策路线、家庭结构、所援助的社区中的经济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和平队的“整体主义思路”以密西根州立大学的顾问们发展出的技术为基础,它强调志愿者应该更多地把社区看成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要素和功能组成的,为资源的获取、准备、分配和利用提供手段的系统”,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个体的集合体。通过分析当地的制度、技术、态度和自然资源,志愿者就可能了解到关于“物质、能源、人员和信息的联系和流动”的情况。和平队教导员向学员建议,在对社区进行人口普查、调查居民的个人情况和身体状况时,要考虑居民的血缘、教育、经济、政治、宗教、娱乐和健康等因素。尽管这项工作一开始很困难,但是社区发展工作者能透过这种工作学习到有效的社会学技术,加深对“各系统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认识。^②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文科学士百事通们就会利用他们的社会科学知识形成一种诊断意见,形成对社区问题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客观的、全面的分析。

^① Cobbs Hoffman, *All You Need Is Love*, 203-4.

^② Memorandum, “Community Development Training: Jack Donoghue and Jeremy Taylor, Escondido Peace Corps Training Center”, not dated, “Peace Corps Community Development”, PCL.

志愿者们在对一个社区的生活进行了评估和归纳之后,就开始对他或她诊断出的“缺陷”加以治疗。像组织一次社会调查或人口普查的任务一样,这第二个步骤也要求有社会科学的章法。志愿者首先把社区居民召集起来,鼓励他们对他们的需要和问题进行集体讨论,以此来展现“民主体制”的有效性。由于许多村民不熟悉或不适应这样的集会,害怕被叫起来发言,所以在这个阶段志愿者应该小心地“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有发言的需要和愿望。”和平队警告说,当地人可能只讲他们认为美国人想要听到的东西。然而,只要志愿者把他们听到的话和从早先对社区的调查中得来的客观数据相对照,就能找出这一群人的真正需求。^① 和平队主管中东和南亚的行动官詹姆斯·穆迪(James Moody)指出,正是在这一“移植新观念”的阶段,志愿者要帮助“村民们领悟到变化的可能性”。他们认识到美国人“由于生活在一个先进的机械化社会里而掌握着宝贵的知识”,对美国人产生出一种自发的尊敬。而美国人可以利用这种尊敬将社区凝聚成一个整体,打破几个世纪的消极和分裂。^② 一位官员指出,通过这种形式的“鼓动”,志愿者会使农民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需求,这种需求能压倒他的恐惧、疑虑及其习惯性的悲观冷漠”。^③

一旦这个群体认识到他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志愿者就推动制度建设以把“消极”的人们动员起来。例如,在哥伦比亚,志愿者们与该国外展机构的工作人员一道“深入‘比列塔’(vereda,村庄),与村民们讨论问题,提议举行会议,帮助组织一个‘洪达’(junta,公民自治组织)来决定哪一件事——修路、办学还是开

① Jones, "Peace Corps Volunteer in the Field", 66-67.

② James P. Moody, Memorandum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the Peace Corps", August 21, 1964, "Peace Corps-Community Development", PCL.

③ Lodge, *Case for the Generalist*, 8-9.

渠——是最要紧的。……下一步是组建一个协调性的中央洪达，由十几个基层洪达的代表共同组成”。^① 志愿者们被指示从最基层开始传授民主，他们组织选举社区官员，并试图建立“正确的组织形式和公民态度”。^② 正如乔治·洛奇以奇妙的字眼所说的，这种组织将农民变成一种“接受物质和技术投入的容器”，培育他们对新群体的认同和责任感。^③ 和平队领导层认为，志愿者代表着美国最民主的文化，他们能够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鼓励地方上的人民视自己为更广泛的民族国家实体的一部分，以及他们的村庄有同样的组织方式的社会的一部分，志愿者将能够促进民族国家的建构。

在新的、民主的地方权威结构建立起来之后，志愿者就能在社区和“专家主管人”(subject matter specialists)之间建立沟通，并开始合作行动。志愿者帮助新建立的村政府与和平队、国际开发署或者受援国政府派出的卫生工作者、土地调查员、农业辅助人员建立联系，由此将推动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一位和平队官员解释说，在哥伦比亚，志愿者“正在帮助村民们采取合作行动，共同兴建校舍、养鸡、在果园喷洒农药、打井”，并“修建乡村道路”。虽然取得了这些显著成果，但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在经济和物质方面。最大的收获是美国人激发出了“勤奋的工作态度、主动精神和想像力”，而许多地方先前并不存在这些。^④ 作为一种文化上的催化剂，志愿者们将把西方进步的成果传授给那些自身缺乏达成这些变革所需的价值观和态度的人们。作为美国的代表，他们将加

① Report 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Colombia, Bush Papers, box 4, "Peace Corps News", JFKL.

② Peace Corps, "Colombia; *Acción Comunal*", 8-9.

③ Lodge, *Case for the Generalist*, 8-9.

④ Moody, Memorandum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the Peace Corps", August 21, 1964, "Peace Corps—Community Development", PCL.

速现代化进程。

而且,在一些和平队官员的描述中,所取得的成果不乏令人惊叹者。和平队首任拉美地区主任、施雷弗最终的接班人杰克·胡德·沃恩(Jack Hood Vaughn)曾讲述了一段极具戏剧性的个人经历。沃恩曾称自己“从1938年以来就是热爱拉美之人”,他在密西根大学取得拉美研究专业的学位,此后一直在美国新闻署和经济合作署工作。沃恩曾对和平队的一群工作人员谈到,20世纪50年代期间他被派驻在玻利维亚,最后一次在该国的工作是在1958年结束的。他在那里的最后半年间,他发现自己“不愿意再到的的喀喀湖附近的平原上去打猎钓鱼,因为那里的印第安人充满敌意和威胁。他们全都有武装,看上去怒气冲冲。他们不讲西班牙语,也不喜欢讲西班牙语”。然而当1965年他重新造访那个地区的五个村庄时,却对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大感惊诧。他说:“在所有的五个村子里,我都被印第安人背着进村,因为他们想向我显示他们属于人类。每个村子都已建起了一座新学校,是1,000年来的第一座学校。他们有了接生诊所,也是1,000年来的第一所。他们用输水管把清洁的水引进来,而且这些工作都是他们自己完成的。他们这几年间在物质方面取得的进步比过去1,000年都大。但是更重要的变化还在于他们的态度和与他人交流的方式,他们开始愿意用眼睛看你,愿意告诉你他们是谁、他们干了些什么,告诉你他们的自豪和他们作为公民的自尊。”沃恩宣称,和平队志愿者的工作已经导致事物发生惊人的转折。“西班牙人、印加人、西方采矿者、外交官乃至国际开发署人员在1,000年里没有做到的事,和平队却在大约三年里促成了。这是真正的革命。”^①曾经被视为外来入侵者的美国人现在成了战无不胜的英雄。

沃恩是以轶闻趣谈的方式讲述成功的现代化故事的,而社会

^① Ashabranner, *Moment in History*, 163-64.

科学家则指出社区发展计划也经受得住客观的论证。和平队也利用计量指标来支持其所主张的社会工程,这与社会学家阿列克斯·英克尔斯和戴维·史密斯构建“总体现代性”指标的做法很是相似。一份小册子宣称,该机构对社区发展在直觉上的信任“最近受到了科学上的支持”。经过对秘鲁村庄为期两年的研究,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断定:“刚从大学毕业的美国年轻人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就能对发展中社会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这些人类学家利用“发展指标”对政治和社会工作、娱乐方式、社区商业活动作出评估,给首都利马打100分的“满分”,然后对农村地区与这个峰值的之间的差距进行测评。该项研究对15个有志愿者的居民区和五个没有志愿者的居民区进行了调查,结论是和平队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世界。有一个叫“奇吉那亚”(Chijnaya)的村庄,其居民在不断降临的洪水的逼迫下逃离他们在湖畔的家园。据说该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位志愿者重新建立起来的”,它最初的得分是0分,最后达到了21分。发展指数如此大幅度增加的情况在城市居民区中是看不到的,但是城市中“现存制度也在志愿者的努力下得以相当程度的加强”。和平队宣称:“在城市以外,有志愿者的社区的发展比没有志愿者的社区快3.47倍。”^①至于如何界定“进步”和“现代性”之类的更深层次问题,则为对变化的数量分析所掩盖了,从来没有出现在研究范围中。

和平队还开发了各种分析方法,来评估特定的社区发展实践所产生的变革性影响。该机构表示,通过把没有志愿者在其中建立联系的社区设定为“控制群组”,就可以根据数量比率估算出和平队项目实施前后“沟通的相对有效性”等要素的数值。比如,如果和平队志愿者想对举行城镇每周例会的效果进行评估,则他或她就可以把在会上获知某一特定消息的人数乘以事后对这一消息

^① Peace Corps, *What Can I Do in the Peace Corps?*, 21.

做出过评论的人数。然后这个志愿者用以下两个要素的数据来除上面得出的数据：希望在会前知道这个消息的人数，以及当时对会上发布的消息进行评论的人数。如果会后知道这个消息并做出评论的人数比会前多出很多，则该比值就高，而这个志愿者也就可以满意地断定这项社区发展的努力是成功的。和平队的训练计划中还提出其他一些测评办法，其中有关于城镇会议对以下要素的影响的评估：乡村“组织化”比重、“新兴领导人”的数量、“了解社区行动的人”的数量、“社区成员提出的各种问题”的数量的影响。其他关于举行城镇会议“前后”情况的评估可以被用来显示以下方面的变化：收入分配差别，投资水平，经济总产值，死亡率，传染病发病率，识字率，培训时间，阅读量，所表达出来的对美国的态度。^①

和平队不断要求其成员对“经验”数据予以关注，以评估社区发展计划的具体影响，试图以此来证明：“社区发展工作”是用客观、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来处理本质上属于主观目标的问题。对指标数据的利用和比较背后的潜台词是：美国改造和指导外部社会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和不可估量的，它完全能推动外部社会走上自由主义的变革之路，使之逐渐趋近美国，而这正是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基本含义。和平队志满意得地认为，种种迹象显示它已成功地创造了“发展”。它毫无疑问地把这些迹象当作现代化努力的必然成果，并认为这些成果是美国和受援国都期待的。这些成果完全可以证实公众的这样一种期待：强大而慈善的美国能够为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直接介入和影响其他社会的文化生活。

和争取进步联盟的情况一样，对美国推动现代化的潜力的深刻自信也遮蔽了决策者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失败的迹象和严重的问题。在许多地区，志愿者们感到上级对他们的任务的说明是

^① Memorandum “Community Development — P. C. — Training”, not dated, “Peace Corps — Community Development”, PCL.

含糊不清的,不知道究竟如何将社区发展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形势和情境当中。前和平队副总指挥布伦特·阿沙布兰纳(Brent Ashabranner)认为,一些受命发动剧烈社会变革的志愿者之所以经常铩羽而归,是因为他们显然没有能力开展有价值的计划,或者无法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服务。更有甚者,和平队的评估员估计“在一些国家社区发展计划受挫的比率达75%之多”。这些失望的志愿者中有一些人最终选择了退出。阿沙布兰纳回忆说:“经常是这样的情况:把一个志愿者随便丢在一个小镇、一个村庄或一个城市贫民区里,然后告诉他说他将成为社区合作和社区行动的催化剂;至于怎么干,则完全由他来决定。他掌握了社区发展理论,知道如何动员民众参加洪达、就他们的共同利益达成协议,也知道如何把当地人团结在一起自力更生,还知道如何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向民众公平地分配食品和服务。然而,他没有明确规定的任务,老百姓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而即使有明确的工作,当地人中也没有可资利用的技术。……与和平队其他成员相比,这些自由行动的志愿者的伤亡率非常高。”^①关于这类问题的报告最常出现在拉丁美洲,但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历史学家裘利斯·阿明断言,在喀麦隆,社区发展“是一个失败。……在为期25星期的训练当中,志愿者们作了一本又一本关于发展理论的笔记。而且他们还要学习社会调查和建筑方面的技术。但是一旦他们到了实际工作地点,他们就发现自己装备不完善、准备不充分。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搞清楚喀麦隆的地形和村庄里的情况。他们不是训练有素的调查员,也不是绘图员,更不是工程师。这些志愿者都是些文科学士百事通,没有任何从事社区发展的经验。而在这种工作中,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②

^① Ashabranner, *Moment in History*, 161.

^② Amin, *Peace Corps in Cameroon*, 136.

许多志愿者最终发现,他们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须彻底丢开社区发展理论。弗雷兹·费舍尔(Fritz Fischer)在关于和平队的历史记述中表明:文科学士百事通们进入一个居民区后经常会发现,当地人已经拥有多种集体制度,并且抵制和平队重组社会的努力。尽管志愿者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并和他们结为朋友,但他们还是失望地感到根本无法取得官方的社区发展理论中所号召的那种“革命性”进步。许多志愿者认识到,当地文化其实很复杂,既不容易理解,更难改变。于是他们最终放弃了宏大的社会工程观念,转而致力于推展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把自己能够获得的实用技术都用上去。本来要他们做的是用现代性的威力唤醒笼罩在“宿命论”中的传统人,但现在他们却选择了别的工作,比如教音乐、帮助种植农作物等。他们也拒绝接受让他们重新制订社会发展计划的指令,而是去努力从周围的环境中学到一些东西。用费舍尔的话说,“社区发展计划中真正的发展是志愿者的发展,而不是受援国的发展”。^①

尽管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但和平队官员还是不能迅速地意识到:社区发展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期望不符。他们不去对自己的假设予以重新估价,而是固守他们的成见,继续把志愿者当成变革性的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传播者。用阿沙布兰纳的话说,“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和平队的社区发展计划出了麻烦。但是这个机构并没有放慢脚步,以便让其工作人员对各项任务进行仔细的规划,更没有停下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恰恰相反,和平队把成千上万的文科学士百事通们撒出去,让他们去搞含糊不清的所谓社区发展,像是让步兵攻占一个桥头堡”。^② 要意识到社区发展的问题,和平队的主事者就先要正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缺乏经验和技

^① Fischer, *Making Them Like Us*, 144.

^② Ashabranner, *Moment in History*, 162.

的美国人并不能以深刻的、甚至革命性的方式陡然改变其他社会。他们还须对现代化本身的正当性提出质疑,才有可能意识到社区发展的问题。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和平队的主事者们做不到这一点。

在冷战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和平队的努力被认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志愿者被描述成美国品格的化身或者美国特性的体现,他们要向“欠发达国家”、冷战对手乃至国内民众展示美国的道义力量。在这种描述中,志愿者都是些不辞劳苦、不畏牺牲,致力于弘扬美国的立国之本的人。他们还被用来证明这一点:虽然美国不乏外交挫折和社会弊端,但它仍然是可供世界其他国家效法的榜样。在官方宣传和公共舆论中,和平队推出的是自信心,是由力量、勇气和活力构成的美国特性。

许多美国高官认为,在肯尼迪所说的“晦暗不明的长期斗争”中,和平队是一个有力的武器。总统曾亲自告诉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几内亚的塞古·杜尔(Sekou Touré)曾向萨金特·施雷弗表示要“全心全意”地接待和平队志愿者。“加纳接受了50至70名志愿者”,“几内亚正要求向其派遣40到60名修路人员和工程师”——肯尼迪深受这一事实的鼓励,继续他的推测:“如果我们搞定加纳和几内亚,马里也会转向西方。如果是这样,这将是首批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国家脱离莫斯科投向我们。”^①施雷弗虽然已决定只向发出邀请的国家派出志愿者,但也对和平队的战略意义有相似的认识。有一次,在会见了被派往拉美参加社区发展工作的志愿者后,他告诉其姐夫说:“十天前,哥伦比亚的共党头目从莫斯科回国,随行的有280名哥伦比亚学生。他带着他们在苏联转了三个月。”施雷弗接着指出:“所以,要给哥伦比亚的局势留下点什么

^① Memorandum, Kennedy to Rusk, POF, box 85, “Peace Corps, 1/61 -6/61”, JFKL.

印记,我们就该派 500 名(志愿者)去那里。”^①在冷战的战场上,和平队被希望作出自己的贡献。

美国政府的宣传和大众文学也把志愿者描述为一个对全世界有关键意义的卓越社会的代表,由此使和平队成为国家象征。1961 年 5 月 1 日,肯尼迪在对和平队全国顾问委员会发表讲话时指出,8,000 份要求参加服务的申请书覆盖了“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技术的各个方面。医生、农场主、机械师、打字员、教师、工程师、学生——他们都要求和他们的同胞一道为反对贫困、疾病和苦难而工作”。在 1963 年致国会的信中,总统谈起这个话题,说志愿者“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优良传统——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期盼着这种社会,把这种社会看做是他们自己的革命的终点”。^②不论其背景和专业是什么,所有的志愿者们都被赋予一个共同的使命:将他们所体现着的最高等的文化价值传播给那些急于效法美国的人们。

和平队自己在宣传中也强调,志愿者将凭借自己作为优秀的美国人的经历改造受援国社会。和平队的《第一年度报告》称:“志愿者来自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当中有各种种族、信仰和宗教。……在加入和平队之前,他们生活在合众国各州以及波多黎各。……他们是卡车司机和大学教授。……他们当中既有老人又有年轻人。”和平队总指挥萨金特·施雷弗也提出了类似的说法:“我们只不过是来贡献我们的技艺。……我们从事和平队事业,这个事实本身就会说明美国的某些方面。对于理解美国人民的基本

^① Shriver to Kennedy, not dated, POF, box 85, “Peace Corps, 1/61—6/61”, JFKL. 施雷弗尽力排除中央情报局对和平队的影响,力主只向提出申请的国家派遣志愿者,这方面的情况参见:Dean, “Masculinity as Ideology”, 60—61。

^② Kennedy, *Public Papers*, 1: 391—92; 3: 556.

特性,这个事实会给出一些启发。”^①对施雷弗及其他许多和平队的主管人来说,这些“特性”的核心是一个利他主义的和积极奋发的公民集体,它愿意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来分享美国文明的成果。志愿者将帮助贫穷国家找到通向现代性和进步的钥匙,而这把钥匙是美国在很久以前已经发现了的。

为了吸引应征者,和平队的广告还宣称海外服务工作将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向外国人展现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中的态度和观点。早期的一个广告唱出这样的高调:“你将帮助他人,去建设、去评估、去救治、去教导,你将贡献出你的知识成果。你将得到你的主人的友谊,还将因通过与另一种文化的亲密接触而充实自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你将体现当年美国的立国之道,你将体现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道德目标。”志愿者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不是传授技术,而是传播体现美国精神本质的态度。另一本小册子引述一位“印度官员”就志愿者对其祖国的贡献提出的估计,指出之所以要强调“才华、主动精神和奉献精神”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一个人只有充分具备这些素质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还因为有这样一种根本假设,即这些品质是现代美国形成的重要原因”。^②志愿者们受命带领其他国家走向一个以美国历史为范本的未来,他们能够对自己祖国的变革理念有本能和直觉的把握。

媒体对和平队的报道充斥着对美国的优越价值观的描述。一份受欢迎的杂志《科学通讯》指出,志愿者之所以对穷国有价值,其

^① Peace Corps, *First Annual Report*, 69; Peace Corps, “Tubman Sees Object Lesson in Peace Corps”, 5.

^② Brochure,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1961, “Peace Corps—History, 1961—1966(Shriver), Folder #1,” PCL; Brochure, “The Peace Corps Generalist: Practitioner of an Uncertain Science”, not dated. “Peace Corps: BA Generalists”, PCL.

原因不外乎他们拥有关于美国基本制度和文化的经验：“所需的各种素质是不能通过几个星期的教育而获得的。它们必须来自我们国土上的父母、家乡和学校。”似乎美国人在解决“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时不需要技术训练和高级学位。他们只需要将他们的观点和生活方式带入荒野之中。丹尼尔·勒纳在社会学上将“移情”界定为最具“现代性”的质素，这与萨金特·施雷弗的如下解释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处：志愿者通过本国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来唤醒“存在于所有人内心深处的理想，弘扬人类共同拥有的希望和原则”。^①

作为一个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实现人类的普遍愿望的社会，和平队也在强化着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和目前仍处于转变中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差距永远不会消失。像许多现代化理论家一样，肯尼迪也强调西方传统中存在着独特的价值。除了向海外派出工程师和护士之外，和平队还派送英语教师。他认为英语“能打开文化、历史和司法方面所有的重要领域，这些领域已经专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在目前的艰难岁月中是如此关键”。萨金特·施雷弗引述乔治·马歇尔将军的话，以类似的腔调来描述一种“世界各地的小人物的革命”，说这些小人物“现在开始知道生活中应该有什么，开始知道他们正在失去什么”。那些无论在经济上还是人种上都高居发展阶梯顶端的人们将履行他们作为高贵族类所担负的使命，与那些处在低级发展阶段的人共同分享他们文化的成果。^②

上述的那些说法强化了美国人对文化和种族差异的一种共同的理解方式，而1958年出版的一部畅销小说《丑陋的美国人》对此

① Davis, "Peace Corps Volunteer an American Image", 165; Shriver, *Point of the Lance*, 55.

② Kennedy, *Public Papers*, 1:554 (emphasis added); Shriver, *Point of the Lance*, 9.

做了脍炙人口的描述。两位作者——海军军官威廉·莱德勒(William J. Lederer)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家尤金·布尔迪克(Eugene Burdick)把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一个虚构的东南亚国家“萨坎”，描述了那里发生的一场与苏联之间争取人心的激烈斗争。他们还写了一篇“关于现实的后记”，其中对那些出没于鸡尾酒会，身材臃肿、衣着考究的外交官大加抨击，并呼唤“一小群训练有素、经过精挑细选的、工作勤奋并具有献身精神的职业外交官”。这本书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印刷了20次。本书后来的简装本在封面上称：“肯尼迪总统的和平队就是对本书中提出的问题的回答。”^①书中的主人公霍莫·阿特金斯(Homer Atkins)用一只自行车打气筒建起稻田灌溉系统，还大力调动其美国式的朴素智慧，解决了困扰萨坎人几百年的问题。阿特金斯的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当地人的原始文化形成鲜明对照。书中还有一位精明强干的美国上校艾德温·西兰代尔(Edwin Hillandale)，其原型是美国反叛乱专家和中央情报局特工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西兰代尔说明了“亚洲精神世界”的特性，进而发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他宣称：“萨坎和其他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关键是看手相和占星术。只要你在街上走走，看看那些怪力乱神的表演，你就能学会这套把戏。玩这套把戏的人被称为博士，很受尊敬。在萨坎的每一所大学都有相手术和占星术的教授席位，总理本人就是一位神秘学专业的哲学博士。”^②亚洲人被描述为迷信和屈从于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民族，这与美国人讲究实际的气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技术知识形成强烈对比。与现代化理论一样，官方的说法和公众对和平队的描述也强调理性的、“现代的”文

^① Lederer and Burdick, *Ugly American*, 284; Rice, *Bold Experiment*, 29.

^② Lederer and Burdick, *Ugly American*, 181.

化相对于情绪化、宿命论的“传统”文化的优越性。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是人人都能看到的，所以美国人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化的优点，进而映衬出需要他们去帮助的“欠发达世界”的弱点。^①

和平队的形象也被用来帮助对抗国内的社会批评。美国在战后的经济繁荣中取得了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和 60 年代初期，许多评论家和知识分子指出官僚组织和享乐主义消费文化的破坏性影响。威廉·怀特(William H. Whyte)和保罗·戈德曼(Paul Goodman)著有一书，悲叹美国人在舒适而萎靡的物质生活中丧失了独立精神和阳刚之气，指出这个国家的青少年在成长中无法获得真正有挑战性和有意义的人生经验。社会学家戴维·雷斯曼(David Riesman)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也持类似观点，他相信一个“能够支持对闲暇和剩余产品的‘浪费的’、奢侈性的消费的丰裕社会心理”正在兴起，并批评那些焦虑而又“受外在支配的”(other-directed)人格类型的出现，而这些人格类型正适应了那些因社会成员无法抗拒对外部肯定的心理需要而产生的社会规范。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丰裕社会》一书分析了与新经济有关的问题。在这样的新经济中，广告铺天盖地，剩余财富不断增加，新的需求被人为地创造出来，于是经济生产的目的是发生了偏离，不再“为饥饿者生产食品、为寒冷者生产衣物、为无家可归者建造房屋”，而是仅仅去满足“对更豪华的轿车、更精致复杂的消遣的渴

^① 莱德勒和布尔迪克在小说中的描写是如此切合和平队对其在现实世界中的使命的看法，以至于该机构将两位小说家请来参加其项目评估工作。莱德勒访问了菲律宾，对和平队早期的项目进行调查；并前往夏威夷的希洛市，在那里向提出申请的志愿者宣讲如何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参见 Dean, “Masculinity as Ideology”, 58—59; Donovan, “Peace Corps to Hire State Dept.’s Foremost Critics?”, 2。

求——实际上是现代人的各种贪得无厌的和毁灭性的欲望。”加尔布雷斯讥评道：“在各种类型的美好社会中，已经没有人再去玩让松鼠在轮子上跑的游戏了。”有识之士们认为新教伦理正在消亡，“粗犷质朴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正在衰落，并对此深感不安。他们惊呼经济繁荣正在对美国的品格造成严重破坏。^①

受这些著作以及加缪和萨特等哲学家的作品的影响，许多严肃的美国青年把和平队作为一种逃离中产阶级在郊区的那种空虚生活的途径。许多志愿者认为，去海外工作将促使他们独立迎接挑战，给他们提供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机会。许多应征者以推动人道主义事业为目标，认为他们在和平队里的工作对他们个人极具意义。^②然而，在和平队官员和美国媒体那里，这些问题却有另一番意味。在政府和媒体的描述中，志愿者们愿意去过贫困的生活，能够与“原始人”同甘共苦、心心相印，最后回到祖国，给美国社会带来新的活力。这种解说远远超出那种个人愿望的含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高大的形象。许多志愿者希望他们能在和平队的工作中发现自身生命的意义，而美国政府和媒体却用这个机构来为冷战中的整个美国增光添彩。

肯尼迪、施雷弗以及整个和平队领导层之所以强调志愿者们做出的牺牲，为的是把美国描述成一个特别强硬、坚毅、果敢的国家。总统在签署创建和平队的行政命令时指出：“和平队中的生活是不容易的。这里没有工资，所发放的津贴仅够维持健康和基本的生活需要。”^③在为《国家地理》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施雷弗

① Whyte, *Organization Man*; Goodman, *Growing Up Absurd*; Riesman, with Glazier and Denney, *Lonely Crowd*, 18; Galbraith, *Affluent Society*, 140, 159.

② Cobbs Hoffman, *All You Need Is Love*, 22-38.

③ Kennedy, *Public Papers*, 1; 134-35.

又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了一个更大的结论。和肯尼迪一样，施雷弗盛赞志愿者，说他们“完全放弃了在自己家园里的舒适生活，奔赴遥远的国度，在艰苦、有时甚至是危险的条件下工作，所领取的报酬只够维持基本生存。他们在服务中寻求到比舒适生活中更丰富的意义”。而且他们的工作是代表美国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声明：“对外国人民来说，给他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看到美国青年选择离开祖国……来和他们共同生活。……志愿者的第一条律令似乎是：条件越艰苦，我们越喜欢。他们最大的抱怨却倒了过来：工作‘太容易’了。”^①志愿者们将自己暴露于疾病的威胁之下，生活在贫困的条件之中，放弃了条件优越的生活和工作，他们因为所有这些而受到赞扬，也被用来说明美国是一个能够渡过艰难险阻、抓住一切机会的国家，用来证明美国有能力克服冷战的挑战。《和平队志愿者》在报道中引述一位英国老地质学家的话说：“这些年轻人向非洲人展现了美国的真实形象。他们是我们所说的‘有肝胆之人’。他们能披荆斩棘，从事艰苦繁重的劳动。”^②在公众话语中，和平队象征着一个具有坚强决心、足以在一个危险的后殖民主义世界应付共产主义挑战的国家。

有时公众舆论以更精心、更浪漫的方式为志愿者描绘出一幅自由战士的形象。1963年11月28日，在肯尼迪遇刺身亡后仅数日，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举行的全国橄榄球联赛的一场比赛中中场休息时，萨金特·施雷弗来到赛场。当时正在举行一个仪式，仪式上的主角不像往常那样是橄榄球场上的英雄，而是粗犷的和平队志愿者。军乐队在场地上摆出“和平队”的字样，“150名经过挑选的女中学生”高举着和平队志愿者所服务的国家的国旗列队入场。最后仪式在音乐家们演奏的“和平队之歌”乐曲声中结束。“和平

① Shriver, "Ambassadors of Goodwill", 302.

② Leyden, "British Scientist Salutes Tanganyika Project", 2.

队之歌”由维恩州立大学教授格雷汉姆·奥沃加德(Graham T. Overgard)作曲,主旨是向那些“关心和帮助他人、为人类创造和平”的“勇毅果敢之士”致敬。^①《时代》周刊曾刊发了一篇报道,介绍和平队在波多黎各的训练中心的各种艰苦的训练项目,文中宣称,志愿者“不顾他们的年龄”,“悬在绳索上顺着绝壁往下滑行,双手捆在背后练习踩水,进行长达三英里的长跑”,“在瓢泼大雨中整夜露营于丛林间”。一位应征者告诉该杂志说,他们训练之严酷程度绝不亚于其他冷战斗士:“我们已使一些波多黎各人相信,我们正在为下一次进攻古巴进行训练。”读者们获知:志愿者们有的要步行八英里前往穷乡僻壤的学校去上课;有的要用12小时时间在加纳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18英里;有的还要前往某地勘探矿产,而就在这里曾有一名科学家被当地人杀害,因为他“唤来了恶魔”。他们在寒冷的安第斯山村中穿得裹裹擦擦,还要背着“装有解毒药的药箱,以防被矛头蝮蛇所咬”。他们要证明,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国家,能为迎接冷战的挑战而不畏任何艰辛。即使在“欠发达”世界,美国也会毫不退缩地进行斗争。^②

受到援助的人会表达感激之情,而这又加强了美国推进现代化的使命感。在莱德勒和布尔迪克的《丑陋的美国人》中,主人公的妻子艾玛·阿特金斯拿出她那与生俱来的实际动手能力,向原始的萨坎农民演示如何用山上的茅草把扫帚柄做长一些,这样就能防止背痛。而当地人似乎经过好多个世纪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村里的头人给艾玛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上说:“你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扫地的办法。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它改变了我们老人

^① 关于仪式上节目的详情和歌词全文,参见“Peace Corps History, 1961—1966(Shriver), Folder #2.” PCL。

^② “Report on the Peace Corps”, 10—11; “Corpsmen in Ghana”, 20—21.

的生活。……我们建起了一个小神龛来纪念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想念你。”^①艾玛的聪明不仅改变了萨坎人的生活，而且使她自己成了被崇拜的对象。

许多美国人对和平队的理解方式与此类似。1962年2月，小阿瑟·施莱辛格告诉肯尼迪，他在访问马德拉斯的一个乡村学校时发现，美国总统的照片“被供奉在圣雄甘地像的下面”。他解释说：“我不认为这是为了接待我们而故意摆上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张你的照片就显得太皱皱巴巴了。”^②萨金特·施雷弗也记述了另一个类似的小插曲。他写道，在他担任和平队总指挥的最后一天里获悉，“在伊朗边远地区的贡巴德卡武斯(Gonbad-e-Kabus)，市民们为巴克利·摩尔(Barkley Moore)建造了一座纪念碑。他是一名志愿者，为这个小城建起了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五年来我已经估计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得知这个消息后我还是感到惊喜，因为这是一座矗立在亚洲心脏地带的和平队志愿者的纪念碑，它距离苏联和伊朗的边界只有32英里”。^③还有一名在印度农村当学校教师的和平队志愿者被多篇报道描述为“那些动机纯洁高尚的美国年轻人中的一员，而这样的美国青年往往出现在和平队里，他们使你感到终于可以看到一些美好事物了”。这样的描述巩固了美国作为一个充满了仁爱的社会的形象。^④而来自受援国的感谢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一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工人对萨金特·施雷弗和美国公众所说的话正是他们希望听到的：“在和这位志愿者工作的几个月里，我学到的东

① Lederer and Burdick, *Ugly American*, 235.

② Memorandum, Schlesinger to Kennedy, February 15, 1962, POF, box 65a, “Schlesinger, January–March, 1962”, JFKL.

③ Shriver, “Five Years with the Peace Corps”, 26.

④ Tilman, *Peace Corps*, 15.

西比我以往 30 年里学到的都多。”^①官方和媒体的报道都说,那些从和平队的援助中受益的人,都理所当然地和异口同声地对美国为推动现代化作出的贡献而表示万分感激。当和平队首脑萨金特·施雷弗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阿尔伯特·戈尔(Albert Gore)参议员对他说:“在我看来,和平队的创意和理想的一个最有价值的收获是,它再一次向我们显示,也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我们是无私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都全心全意地响应了一项美好事业。”^②

而且,美国热衷于展现自己的坚强和同情心,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深切忧虑。正如伊莱恩·泰勒·梅所指出的,在冷战期间,美国官方和媒体的言论经常把苏联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加以描述,以此来显示,如果他们‘软弱’,美国就会变成和苏联一样的国家。反共十字军的战士们号召美国人加强其道德建设,非此不足以保持他们的自由和安全”。苏联迅速获得原子技术,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1号,中国的“丢失”,卡斯特罗在美国眼皮底下取得胜利,这些似乎都说明美国没有能力对抗苏联的挑战。约瑟夫·麦卡锡之流的政客们认为,遏制政策遭遇到的挫折与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力量不足这一事实关系不大,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的国家意志的消退。^③

在国内民众和外国盟友面前,在冷战反对者面前,肯尼迪政府不断地把和平队说成是美国复兴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此来对

① Peace Corps, “I Learned More in Ten Months”, 4.

② Senate, *Nomination of R. Sargent Shriver, Jr.*, 50.

③ May, *Homeward Bound*, 10; Whitefield,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这两部著作也描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麦卡锡主义是如何打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的,从而使美国文化政治化。Boyer 的 *By the Bomb's Early Light* 一书指出,这些共产主义的忧虑由于对核战争的恐惧而被强化。

那些担忧作出回应。萨金特·施雷弗在圣母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讲话时，将和平队与美国的可信任度这个尖锐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人说美国已经变得软弱。就在最近赫鲁晓夫把美国青年说成是‘一无所长的叛逆分子’。而我最近在世界各地的旅行当中，我听到一些对美国的能力的疑问，有人认为它不会为了和平队和其他海外志愿者服务计划做出必要的牺牲。似乎一个大问题是：美国有资格领导自由世界吗？”^①通过对和平队志愿者及其现代化力量进行描述，施雷弗和和平队官员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完全肯定的回答。他们坚持认为，美国人的确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去争取冷战斗争的胜利。

面对那些冷酷无情、刻苦自律的共产党人在第三世界的扩张，质朴而果敢的志愿者做出自己的有力回应。自南美访问归来后施雷弗对新闻界说：“一位委内瑞拉高级官员归纳了我们的问题。……他谈到共产党人：‘我们认为他们正在昏睡，但是他们并不是这样。我们想吃美酒佳肴、坐凯迪拉克，但是他们对生活享受毫不在意。他们只想着到人民中间去工作。他们知道如何讲话、如何行动，而且他们讲究效率……非常讲究效率。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工作。’”^②为了应付这种危险，志愿者们将更多地利用民主的力量。施雷弗的助手比尔·莫耶斯解释说，他们将“展示美国的一个方面，而让发展中国家看到这一面是非常重要的。志愿者们将带去活力和热情，使赫鲁晓夫关于我们的社会已经疲弱不堪的说法不攻自破。他们努力工作，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适应当地社会，这说明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的物质财富的源头活水。志愿者们将

^① Shriver, Commencement Addres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June 4, 1961, NSF, box 284, “Peace Corps, General, 1961”, JFKL.

^② Press Statement, Sargent Shriver, November 18, 1961, Bush Papers, box 6, “Weekly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JFKL.

体现出我国人民的本性”。^①

和平队在初期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平队成立后不久,各类组织,从劳联—产联(AFL—CIO)到海外战争老战士协会(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再到卫理公会传教团(Methodist Board of Missions),都纷纷对其表示支持。参议院以差不多二比一的优势得票通过了最初的和平队法案;众议院紧跟着以 288 票对 97 票通过,民主、共和两党在此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1962 年,参议院在没有任何一票反对的情况下将给和平队的拨款增加了一倍,而众议院以 316 票对 70 票的大比数通过该预算案。国会议员中的各派人物,从巴里·戈德华特到休伯特·汉弗莱都对和平队予以支持。1962 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公众的 74% 赞成和平队的表现。该组织的公共新闻部长告诉萨金特·施雷弗:“公众对和平队工作的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慷慨的支持。……对和平队的全部新闻报道中有 98% 是正面的。”^②

当然也有一些不同意见。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从其独特视角出发,为“和平队理想主义”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和平队由于把“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置于“其祖

① Draft Memorandum, not dated, White House Aides Files—Moyers, box 18, “Congressional Presentation—1961,” LBJL. 关于对这种观点及其论据的详细分析,参见 Dean, “Masculinity as Ideology”。

② White House Aides Files—Moyers, box 40, “Endorsements,” LBJL; Braestrup, “Peace Corpsman No. 1—A Progress Report”, 64; Trussell, “Peace Corps Rise Is Voted by House”, 1; Memorandum, “A Pleasant View from Capital Hill”, POF, box 85, “Peace Corps, 1—3/62”, JFKL; Memorandum, Bill Haddad to Pierre Salinger, November 20, 1962, White House Central Subject Files, box 670, “Peace Corps Program”, JFKL; Memorandum, Edwin Bayley to Richard Maguire, August 4, 1961, Bayley Papers, box 1, “August 1961 Responses to July 27 Meeting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JFKL.

国的道德和纪律影响”之外而将会“导致灾难”。一些批评家指出，和平队在建立过程中并没有经过对其有效性的认真评估，而且它忽略了在“欠发达国家”促进私人企业的必要性。还有人批评和平队在向海外派出志愿者前没有对他们进行充分的训练。^① 志愿者当中也有对和平队领导层以及现代化理论中的观点发起挑战的人，他们指出了和平队的一些失败之处。他们批评和平队对其工作任务界定不清，志愿者缺乏专业技术，在宣传中对“艰辛”和“牺牲”大加夸饰，所以拒绝接受和平队向他们展示出的那种形象。婆罗州的志愿者通讯的一位编辑指出：“我们在海报上、在各种宣传手册上，在报章杂志上都可以看到被夸张其辞地描绘出来的和平队形象，这是一种充满新边疆精神的形象，一种带有原始的个人主义色彩的图像，一个坦噶尼喀的落日余晖下勘测员们风尘仆仆的侧影。……唉，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最好有什么人出来讲讲，在婆罗州乘坐巴士和在美国米德尔堡(Middleburg)一样畅快。”和平队研究部对250名回国志愿者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不喜欢被描述为英雄，不远万里来到外国的穷乡僻壤，不辞劳苦地徒手建起一座座学校。……志愿者们提出，应该强调的是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以及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而从事单调的工作。”^②当时还有一些归国的志愿者由于其海外经历而变得激进起来，成为反越南战争运动中的领军人物。^③

① Elizabeth C. Barnes to Thomas E. Morgan, August 16, 1961, "Peace Corps History, 1961--1961 (Beginnings)," PCL: Sevareid, "Writer Says Time Is Ripe," 2; Karney, "Peace Corps a Farce", 2; Belshaw, "Experts, Not Youths Needed", 68, 70.

② Peace Corps, "Volunteer Image", 4; Barnett, "Volunteers Resent 'Hero' Role", 2, 24.

③ 关于一个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例子，参见 Cowan, *Making of an Un-American*.

然而,和平队在公众和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是建立在对美国的使命的一种理解——即美国有责任推动外国社会的现代化和进步——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和平队的声望大体上并没有受到损害。1961年《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社论指出:“投票反对和平队似乎就是反对美国青年和美国理想主义。”《展望》杂志的资深编辑艾拉·莫斯纳(Ira Mothner)对此有更深的洞察。他说,和平队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我们无法忍受它不成功的事实。和平队是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想使我们自己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志愿者在我们心目中留下的那种形象——留着寸头,扎着马尾辫,又吃苦耐劳又聪明能干又高尚纯洁,向海外的异教徒传播福音”。^①

所谓“我们自己的梦”的动人说法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渊源。美国自称放弃了欧洲殖民主义的传统,而且把自己历史上的反殖民主义革命与当代“新国家”的斗争联系起来。而美国在与和平队有关的公开言论中,也一再为自己的帝国主义扩张辩解,而且把这个机构的工作看做是上个世纪海外传教活动的继续。一方面,和平队宣称能够向“欠发达”地区提供其发展所需的价值和态度;另一方面,早期的和平队曾指出国内外的“异常”群体中存在一种“贫困的文化”,而这是美国的社会改革者长久以来所谴责的。正如历史学家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国家试图去界定“各个集团以及真实的和想像中的共同体的成员需要具备的资格”,为此经常会“创造传统”,以便“从符合这种‘传统’的过往历史中寻求与现实之间的联系”。^②对肯尼迪政府和美国新闻界来说,和平队是一种“重新创造”美国的帝国历史的手段。关于和平队的公众话语也提出了关于世界上

① “Peace Corps in Training”, 334; Mothner, “Peace Corps”, 40.

② Hobsbawm, “Introduction”, 1, 9.

最“现代”的国家里的成员的资格有什么样的限制的问题。

和平队的支持者认为，它的目标符合美国在对外交往中慈善友好的历史传统。西弗吉尼亚的詹宁斯·伦道夫(Jennings Randolph)曾在1961年夏季的一次讲话中为和平队辩护，他声称：“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是十分恰当的。”伦道夫继续说道，美国已经“发起了一场规模适度的实验”，在其中许多美国士兵留在了菲律宾，“走向乡村……生活在只有一间小屋子的校舍里，并在那里授课”，加强“美菲友谊”。^① 1962年和平队向国会提出自己的建议，要派英语教师到菲律宾去。该机构在正式报告中声称，这个计划的重要性不仅局限于增加该国会讲本国的“文化、商业和政府语言”的公民的人数。和平队的这个报告认为：“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特殊关系要求美国承担额外的责任，来帮助菲律宾人在民主体制下实现快速有效的发展。菲律宾是美国在远东的活动和援助的橱窗。”^②和平队提出，美国推动菲律宾的现代化，教授作为一种“文化”语言的英语，这只不过是历史上已推行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完全善意的干预的继续。

还有一些和平队的鼓吹者将志愿者的服务比拟于过去基督教传教士的奉献精神 and 牺牲精神。在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最初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中，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宣称和平队是“新的世俗传教团”，指出志愿者们与其坚定勇毅的19世纪的前辈一样，肩负着“为美国赢得尊敬和友谊”的使命。^③ 普渡大学历史学教授查尔斯·维泽尔(Charles J. Wetzel)对这种观点深表赞同，并说和平队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此中

① Congress, Senate, 87th Cong., 1st s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June 1, 1961), vol. 107, pt. 7: 9302.

② Peace Corps, "Presentation of FY 1962. Program to United States Congress," June 1, 1961. Bush Papers, box 5. "Policy File, 1 of 3". JFKL.

③ Toynbee, "America's New Lay Army", 10-11, 15.

“上帝的美因仆人把福音传播到越来越多的地方,还随身带去美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①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查伦纳(Richard Challener)和小肖·利弗莫(Shaw Livermore Jr.)也把和平队和美国海外民间传教活动联系起来。他们解释说,和平队反映了一种长期存在的信念,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其他国家分享美国的生活方式。……推动和平队的基本动力在于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归根结底,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传统是理想主义的”。^② 许多和平队的鼓吹者认为,通过派出自己的公民去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发展中”世界,美国将履行人道主义的甚至宗教的使命,而这一向就是驱动美国政策的目标。

而且在所有这些观点展开的过程中,美国历史上的帝国主义的话题丝毫不被提及。一方面试图将和平队与美国的自身历史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却又要与其历史上作为一个殖民帝国的身份拉开距离,还要用这个新机构来证明美国一向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动民族自决。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和平队把历史上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形容为“特殊”关系,而不是殖民主义之下的关系。教会曾号召执行上帝的旨意,支持美国占领菲律宾并“教化”其居民的帝国义务,这段历史也以类似的方式被忽略了。和平队副总指挥沃伦·维金斯在印地安纳州的汉诺弗学院讲话时提出:“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这和军事帝国主义一样恶劣。对两国人民、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方,这都是一种侮辱和损害。”^③然而,他们并没有说出来的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正是和平队社区发展计划的中心目标。和平队的支持者自称献身于一

① Wetzel, "Peace Corps in Our Past", 2.

② Challener and Livermore, "Challener, Livermore Recount Corps History", 3.

③ Wiggins, "A Question of Values", speech at Hanover College, Indiana, April 4, 1966, Bush Papers, box 5, "A Question of Values", JFKL.

项伟大事业，又说美国与欧洲的那种植民主义传统毫无瓜葛。欧洲人曾经不遗余力地推行军事征服，而且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当地民族，而美国却把自己说成是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建构”的推动者，是一场反殖民革命的产物，这个国家始终遵循政府民有民治的原则。肯尼迪在独立日致国会的一封信中宣称，和平队“体现了我们今天所庆祝的美国革命的精神。……正如杰弗逊所设想的，这是一场不受地域、种族和文化限制的革命。这是一场以争取人类的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为目标的运动。今天，在两个世纪以后，在距其发源地千万里之遥的地方，和平队的男女公民再一次证明了这场革命的普遍意义”。^① 别的国家大搞帝国主义侵略，而美国的行动则被说成是与此根本不同的。和平队的鼓吹者表示，现代化与殖民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官方和媒体都声称，“欠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美国生活方式的独特价值和优越性，以此来证明美国的使命具有正当性。萨金特·施雷弗曾记述了他和圣雄甘地的女助手阿沙德维(Ashadevi)之间的一次讨论。这位印度妇女花了好几天时间前来会见这位美国人，恳求他拯救她那在物质和伦理上都陷于贫困没落的民族：“你们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在你看来，美国青年是否具备那些对于把那场革命的精神传播到我国的必需的精神品质？有一种最珍贵的东西在全世界传播，也在印度传播。你们和平队的志愿者必须传播科学和技术以外的东西。他们必须具有美国理想主义的气质，而且把它传播给我们。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吗？”^②说这番话时，其迫切之情溢于言表。而施雷弗对她的恳求回答道：“是的，对此我可以保证。”其中透出的是一种以上帝派来的使者自居的感觉。其他国家曾用武力来征服别国人民，而志愿

① Kennedy, *Public Papers*, 3: 555.

② Shriver, *Point of the Lance*, 16.

者现在则对求援、乃至求援的呼喊声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志愿者继承了美国自己的革命传统,将本国的原则推广到海外,在迫切需要美国帮助的世界推进现代化进程。

而且,这种认为美国的全球扩张是出于善心的看法与另外一个陈旧的观念密切相关。这个观念就是:按照美国的设想改造世界反过来会对美国国内产生积极的影响。正如威廉·威廉斯和沃尔特·拉费伯尔所指出的,美国在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反映了一种信念,即海外扩张不仅服务于战略利益,而且也承担着弗里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曾赋予西进运动的那种功能,也就是说,海外扩张和此前向大陆边疆地区的扩张一样,是不断为美利坚民族注入新的活力的一种途径。^① 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曾回忆说,西奥多·罗斯福和亨利·卡伯特·洛奇也对“‘紧张的生活’和美国整体的社会状况之间存在联系”的说法念念不忘。对罗斯福和洛奇来说,帝国主义不仅是加强美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一项道德重建计划,统治阶级将通过它获得巩固其统治所必需的勇气和冷酷无情”。^②

在为和平队确立目标的过程中,施雷弗和肯尼迪也从特纳那里汲取养分。对于特纳关于19世纪美国西进运动的观点,及其认为向海外扩张力量能够保持美国的活力看法,他们实在是心有戚戚焉。特纳曾提出,“沿着不断向前推进的边界线向原始的生活状

^① Williams, "Frontier Thesi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aFaber, *New Empire*. 还有一部著作也讨论了这个命题,参见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298-303。Horsman 在书中指出,鼓吹美国领土扩张的人认为,由于其他国家的人民没有能力建立民主政府,所以美国商业的发展将有助于基督教文明的胜利,也有助于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

^② Lasch, *World of Nations*, 82-85. Slotkin 像拉什描述罗斯福那样描绘出肯尼迪的另一种形象。他指出,肯尼迪也“力图树立自己作为总统的英雄形象。战争中的英雄行为,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都被用来证明他符合英雄总统的标准。”*Gunfighter Nation*, 490。

态回归”,以及“与原始社会的简单质朴保持接触”,使得“美国风格”得以“永恒再生”,不断被注入活力。^①肯尼迪政府弹奏着这种论调,将一种陈旧的文化观念加以回收加工,将之应用于新的环境中。在1961年3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肯尼迪解释说,和平队志愿者“过着与所在国家的公民同样的生活……干着同样的工作,吃着同样的食物,说着同样的语言”。^②铺张的生活将使当地人民疏远志愿者,而与这些外国人在同一个“水平”上的交往有其极为重要的意义。施雷弗相信特纳命题和肯尼迪的言论之间是并行不悖的关系,并坚持认为:“和平队要求自力更生和独立奋斗,而这曾是已经消失了的边疆给美洲大陆上的人民提出过的挑战。就此而言,和平队是真正的新边疆。与其他国家分享我们的进步成就,将帮助我们在国内重新发现自身。”^③推进现代化,与“原始民族”在“艰苦”的条件下相互交往,将使美国民族获得老罗斯福等人所追寻的那种力量。它将使美国人建立对自身民族活力的认识,树立坚定的信心,并因此而凝聚在一起,共同对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不结盟”国家“反动民族主义”的挑战。和平队被认为是一种帮助新兴国家克服帝国主义遗产的手段,还能促进美国社会内部的道德复兴。而且,美国要在冷战高潮中取得世界领导权,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④

在谈到归国志愿者对本国社会所能作出的贡献时,所谓和平队能够帮助美国恢复意志和勇气的说法就不断被提及。在将世界上各“传统”民族带入现代化之后,志愿者们将回到祖国,向一个由

① Turner,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199-200.

② Kennedy, *Public Papers*, 1: 136.

③ Shriver, “Two Years of the Peace Corps”, 706-7.

④ Rosenthal, *Character Factory*, 6. 该书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事例:在20世纪初英帝国衰落的过程中,曾有许多人希望:“如果加以正确的理解和灵活的运用,则侦察兵的训练方法可以导致国家的复兴。”

于过于安逸自满而不能对付冷战的危险局面的社会注入新的能量。在和平队的《第五年度报告》中那些歌功颂德的辞章中,归国志愿者代表了“独树一帜的新一类美国人。……有一名官员说,这是那种不会沉溺于‘富裕生活’的人。他自信而有奉献精神。……他渴望行动;而且渴望自己亲身行动。归国的志愿者老练、成熟、坚韧、乐观、独立,但他们不愿被说成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①在海外推进现代化的事业中,志愿者们将进入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阶段,并从新的视角去看待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他们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羁绊,领悟到争取“发展”的斗争是何等艰巨,由此将会给美国的未来带来新的希望,帮助这个共和国战胜危险的极权主义对手。作为焕发出新的活力的美国公民,归国志愿者将“对他们所认为的美国社会中的弊端——‘商业主义’、‘种族主义’、‘狭隘的地方观念’、‘顺从的习惯’,以及他们这一代的不成熟——做出有力的”回应。^②许多前和平队志愿者的确在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然而官方言论和美国媒体都宣称,与“原始民族”的交往将导致这个注定要领导世界的社会的复兴。如果说19世纪90年代的帝国主义者是在一种“工业体制”中重新塑造天定命运观念,那么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的“新边疆人”使这种观念变得“现代化”,以使之适应他们对冷战危险的认识。

在海外发展和美国内部的生命力之间建立联系,这种做法也提出了关于美国现代性的局限性的问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指出,民族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想像出来的共同体”,其中原来的“非我族类者”如果完全接受了主流文

^① Peace Corps, *Fifth Annual Report*, 70.

^② Peace Corps, *Third Annual Report*, 87.

化和语言,那么这些人也可能被吸收到这个“共同体”中。^① 19世纪美国向大陆西部扩张的过程中,印第安人被判定为属于各个单独的“国内独立民族”;在关于是否要把菲律宾纳入美国的争论中,如何定义美国国民的资格也成为其背后的一个深层问题。与这两个例子类似的是,和平队的意识形态也反映了一种观念,即美国社会中的各组成部分都要被整合到单一的国家生活中去。为了完成肩负的使命,作为世界上最“现代”的国家的体现者的和平队志愿者将跨越“新边疆”,去照顾那些被认为在道德和制度的意义上都属于“欠发达”的社会和民族。然而和平队也被派去帮助美国国内的居民,即那些冷漠的“原始人”和消极的“传统人”。看起来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属于同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因为这个国家的政府和媒体更多地是从“现代性”的角度,而不是从地理的角度去界定民族共同体的。^②

在和平队为推进海外使命而执行的各项活动中,该组织关于美国内部各部分人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一些潜在观念也显露无遗。比如,那些准备参加社区发展计划的志愿者就被派去帮助美国国内的少数族裔群体。因为和平队官员相信,这将为他们提供一种与他们在海外将要面对的挑战性环境完全相同的场景。正如一份训练计划中所提出的,志愿者应该被派往“一个完全不同于他自己的社区的环境中,比如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及其他特殊族裔的居住区”。志愿者们每星期花十个小时进行训练,他们将“了解和描述所在社区的情况”,“至少交三个朋友”,而且“在可能

①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6, 145.

② 历史上美洲印第安人曾被看做“原始的当代人”;他们没有能够和其他美国人民一道在发展阶梯上不断升进。Rogin曾指出:“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和人的个体的进化是一样的。印第安人是老大哥,但是他仍然停留在人类进化的‘孩童期’”。Rogin, *Fathers and Children*, 6.

的情况下还要着手实施一项社区发展项目。”^①

受训的和平队志愿者要承担印第安人保留地、“贫民区”以及住房计划中的任务，他们被派往美国各地以使其技能经受检验。而且和平队希望，其志愿者在执行上述各项任务的过程中，都能感受到与外国一样的那种宿命论和消极萎靡的生活态度，而这类生活态度正是他们所受命要前去加以消除的。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准备前往南美洲的和平队学员参加纽约社区组织和社会福利机构的服务工作，以为海外社区发展工作做准备。该学院副院长米切尔·金斯伯格(Mitchell Ginsberg)解释说，志愿者们的任务是“激励和发动个人和群体参加到自助计划中去，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共同工作”。学员们被派往居民区和城市管理机构，“与一位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阶层的成员或者其委托人(最好是讲西班牙语的人)一道”参加实地工作。他们“走家中户”，并不时提交报告，汇报他们对所面临的挑战的感受：“当你走进这些住户人家时，当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条件时，当你感觉到一种难以克服的消极冷漠情绪时，当你试图和他们交朋友并把自己的情况和目的介绍给他们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②

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城外的皮马(Pima)和马里科帕(Maricopa)两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志愿者们单独或两人一组出去工作，“以期将来他们面对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外国文化时，在保留地的这段工作经历能够发挥作用”。报告上说，国内的学员和在海外工作

①: Memorandum, "Outline of Propo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raining for Peace Corps", 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 May 13, 1966, "CD - Peace Corps Training", PCL.

②: Peace Corps, "Peace Corps Trainees Work, Study in New York Slums", 1, 3; Ginsberg, "Short-Term Training in Urb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March 4-5, 1963, photocopied, PCL.

的志愿者一样，因为他们带来的价值观和推动力而受到热情赞扬。和平队的项目协调员指出：“我曾想像到在保留地会遭到敌视……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此类事件发生。……学员们与皮马人和马里科帕人结下了诚挚的友谊。这种友好情感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一位皮马老太太在早餐前做祷告，念念有词地感谢造物主派来这些优秀的和平队志愿者，她说这些话时感情非常真挚。”和志愿者在海外“欠发达”国家受到的待遇一样，他们在国内也受到盛赞，因为他们能够“赢得许多印第安人的感激和信任”。这些“传统人”（也就是土著美国人）对他们当中的“现代人”所做出的牺牲感恩戴德，这是理所当然的事。^①

在北加利福尼亚匹兹堡城外的公共住房计划实施过程中，志愿者学员们也因为给当地带来态度和观念上的变化而大受赞赏。在和哥伦比亚—艾尔普维布洛（Columbia—El Pueblo）社区的居民（其中多数人接受公共救济）一同工作的过程中，志愿者们参加居民委员会的会议，带领当地居民给卧室刷上涂料，开辟操场，建造供孩子们玩耍的沙盒、垒球场和篮球架。按该项目主任的说法，一项最重要的成果是，“居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可以帮助自己改善生活条件，而他们当中有些人先前曾经是非常麻木不仁的。……一种自重感正在出现”。^② 由于他们和海外“欠发达”受援国人民受同样的文化缺陷之害，美国国内的许多人也能受到和平队的鼓舞和推动。

作为世界上最现代的代表，和平队志愿者被派去援助那些少数族裔群众，而这些少数族裔群众被理论家、官方和媒体看成是美国这个“想像出来的共同体”中发育不良的成员。像海外“欠发达”国家人民一样，国内那些接受援助的人也被认为是被“贫

① Peace Corps, "Journey to a Reservation", 1, 7.

② Jacobs, "Peace Corps Trainees Do Field Work", 41-42.

困的文化”所禁锢住的人,其特性在更大程度上是消极宿命、缺乏意愿和拒绝同化,而不是种族歧视下的不公正待遇、缺乏资源和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依某学者之见,“志愿者在跨文化环境中的工作经历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思想方法,有助于他们在美国的亚文化群体——包括贫困群体、青少年犯罪者亚文化群,等等——中开展工作”。^① 和平队一再申述美国各界共同的一个设想,即先进社会的成员和那些在进步道路上远远落在后面的人们之间的交往会产生推动变革的力量。而和平队的使命正是以此为基础,显然与很久以前的居民住房计划和“美国化”计划遥相呼应、异曲同工。^② 萨金特·施雷弗后来又领导了一项所谓“向贫困开战”的运动,和平队的老调子——为克服根深蒂固的消极生活态度而必须灌输积极有为的思想——又在这里被吹响了。施雷弗向大家保证,如果美国致力于“建设一个伟大社会”,那么归国志愿者在国内也会找到在海外工作时的这种“冒险的感觉”,以及那种“纯粹的和不可抗拒的充实感”。^③

和平队是现代化意识形态被制度化的结果。现代化意识形态勾画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决策者能够推动国内外各社会加速通过进化的各个阶段。在现代化理论的科学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边疆扩张、对帝国主义的辩解、已经关于国内改革的夸夸其谈相互呼应的那种文化形态,有着何

① Zalba, “The Peace Corps”, 125,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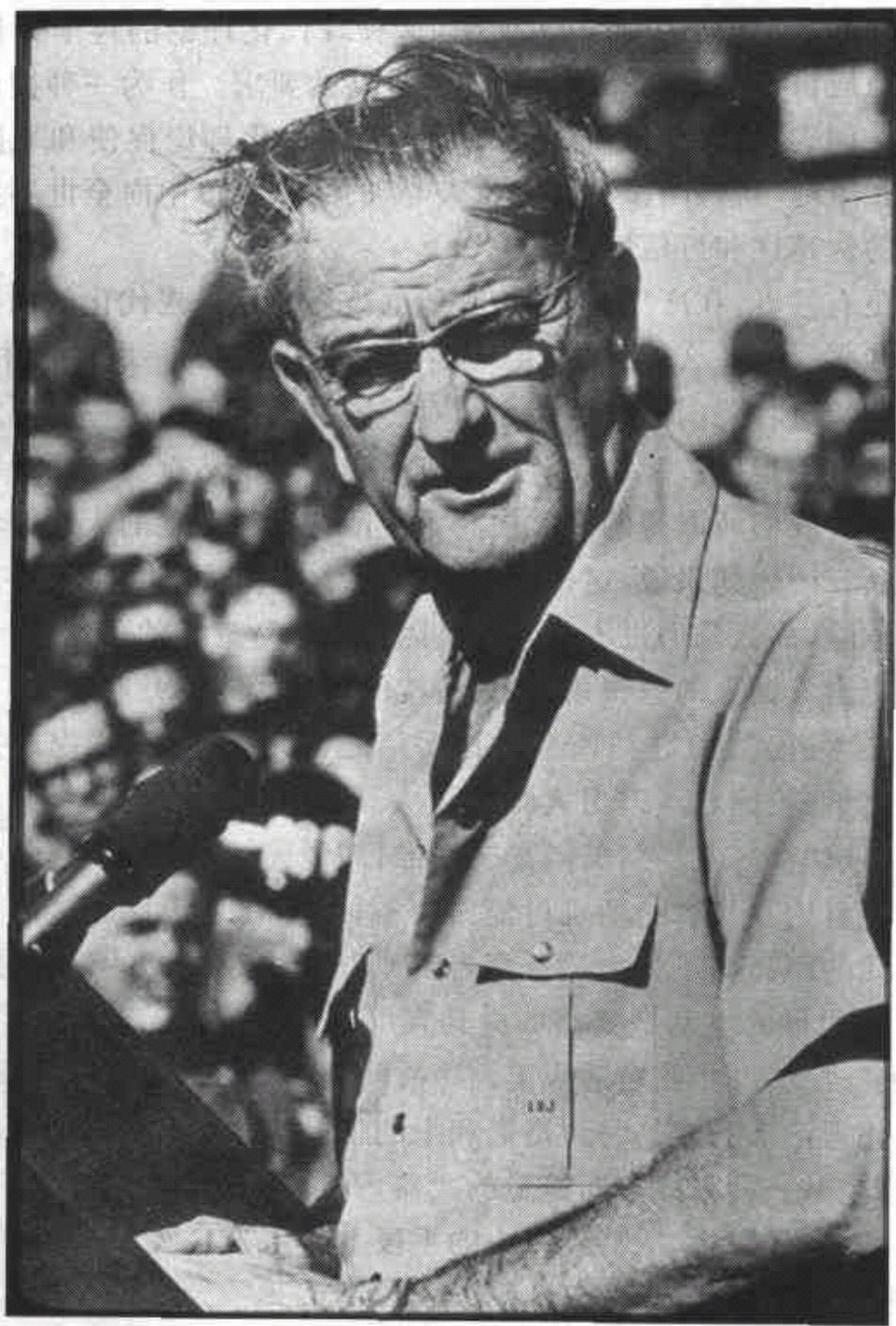
② Katz, *In the Shadow of the Poorhouse*, 76. 该书揭示出历史上的这些现象之间是何等相似。作者指出,19世纪“科学慈善会”(Scientific Charity)的理论家认为,社会上层人士前去探望穷人,将使后者得到“一个真朋友,而这些精英分子的教育、经历和影响力及其对生活的总体了解”将会有益于这些穷人——这些人“或者缺乏本事,或者缺乏机会,因而无法最有效地利用他们本来就微薄的资源”。

③ Shriver, speech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ctober 9, 1964. Bush Papers, box 5, “Shriver Speeches”, JFKL.

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而事实证明，这种现代化理论的科学话语也可以适应世界性冷战不断提出的各种新的要求。作为一种被用来帮助美国确定其战略目标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理论促使和平队等机构在争取“新兴国家”的“民意人心”的激烈斗争中向全世界显示美国的优越性和可信性。

更有甚者，在冷战斗争中，其他的被用以推进现代化的机构往往与和平没有什么干系。1965年在肯塔基大学的一次讲话中，林登·约翰逊将美国的全球使命与对美国的道德目标的一种界定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仍然重新塑造着世界各大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提高了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希望和抱负。……如果说，这些力量作用的结果有时会带来困难和危险，那么我们也不要气馁。因为美国所追求的正是：向人们指出走出禁锢人的思想、身体和精神的各种形式的专制、求得自由的康庄大道。”^①就在约翰逊讲这番话之前，在狂妄和忧虑的共同作用之下，美国已经迈出大幅度扩大越南战争的一连串步骤。和平队追求“社区发展”，美国军队则推行“爱民行动”(civic action)，尽管各自的参与者的动机可能颇有不同，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两者之间的距离却不算太远。两者都是基于一组共同的基本原则，其活动的目的也都是变革那种具有可塑性的“传统”社会，引导其“发展”改变方向，使之适应美国冷战斗争的需要。在有些情况下，现代化理论被看成是一种增进和平的工具。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也是一种为战争而铸造的武器，一种美国用以追求它自己所界定的“进步”目标的特别有力的手段。它认为自己才有资格来界定“进步”的目标。

^① Johnson, *Public Papers*, 1:212.



林登·约翰逊致力于在国内建设更公正的“伟大社会”，但越南战争提前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也断送了他自己所期待的那种历史地位。

第五章 战争中的现代化:越南的反叛乱和战略村计划

1968年,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和现代化理论家萨缪尔·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越南战争进行探讨。他断言,美国的军事战略可以在一个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综合模式的指导下加以制定。他指出:“各社会只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容易受到革命的影响。……美国很可能已经在越南不期而遇地发现了对付‘民族解放战争’的办法。有力的回应……是……强行规划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这将促使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国家走出一个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乡村革命运动有望取得充分的力量,乃至于夺取政权。”^①亨廷顿指出,美军战斗部队的部署和战争的持续加剧,将不仅使越共受到沉重打击,不断升级的暴力战争也将促使越南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迁。战争将难民驱赶到政府控制下的城市里,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能够在繁荣的资本主义都市中心找到经济利益;战争还将加速一整套现代的新价值观和效忠观念的发展,加强南越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的纽带。一位历史学家著述道,美国空军的科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将军曾声称美国应该把越南人炸回“到石器时代去”。但亨廷顿却有别的主意。他的想法是,美

^① Huntington, “Bases of Accomodation”, 652.

国能够把他们炸进未来。^①



1968年,萨缪尔·亨廷顿的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出版,他由此成为美国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顶级学者。同年他在国际事务权威杂志《外交事务》(1968年第46卷)上发表《适应的基础》一文。当时美国人中已弥漫着对越南战争的悲观态度,但这篇文章还是坚持认为,“美国主持的城市化革命”将从根本上挫败“毛泽东主义激励的农村革命”。

亨廷顿的观点反映出:现代化意识形态是在何种程度上把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许多美国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家都把越南战争看成是检验美国在“新兴世界”击败共产主义的能力的一个非常显眼的“试验场”,同时也把现代化作为一种最有效的回应手段。正如美国政策规划人员在争取进

^① 关于李梅的言论和对亨廷顿观点的简单评论,参见 Drinnon, *Facing West*, 370—73。另参见 Chomsk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20 n. 5, 书中也引用了亨廷顿的观点。

步联盟以及和平队的社区发展计划中的所作所为，美国在越南的反叛乱政策的设计师也试图达成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说的“理性的工程学控制”。对那些试图“平定”农村、建立一个强大的南越国家、击败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北越的同盟军的战略家们来说，现代化预示着在一场决定“传统”人民未来前途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美国决策者致力于击退一场社会革命，希望能够对处于危险中的东南亚社会中人们不断提高的期望加以引导，在共产主义叛乱打断所谓自然发展进程之前就使之向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发展。

本章集中关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在越南实施的战略村计划，探讨现代化理论如何塑造了美国的反叛乱政策。本章首先考察的是，社会科学思想如何帮助确定一些具体的做法，又是如何赋予这些做法以正当性的。决策者经常援引现代化理论来帮助自己设计一些计划，其目的是推动当地的世界观和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化。与本书讨论的其他案例一样，在越南问题上理论和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总是直接的。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思想家本人在肯尼迪政府的决策中直接发挥作用。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进入决策圈，但是向决策圈推销了一些思想，而这些思想呼应着在决策圈里很有市场的一些深层次的设想。在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制度环境之下，发展理论使一些广泛被接受了的文化假设——这些文化假设乃是关于美国的全球潜力以及美国运用其能力的可行方式——进一步明确化。

再者本章也将揭示，战略村计划展现了美国对自身的民族特性的认识方式，展现了美国是如何被描述为一个为应付革命的挑战做好了准备的可以信赖的世界大国。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干预的加深，美国官员利用现代化理论来指断越南“消极”、“传统”的农民阶级的缺陷，并就美国为弥补这些缺陷应该如何采取行动献计献策。美国政府发言人和媒体都解释说，对村庄实施迁移合并、重新安置的做法和社会工程计划体现了美国强权的仁慈本质。根据他

们的解释,战略村计划展现了美国的一种责任感:它要全力帮助一个苦苦挣扎中的民族实现其最紧迫的需求和最殷切的希望。官方宣传和公众言论都声称,在越南进行的民族国家建构将鼓舞这个处于原始状态中的民族,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美国最好的东西带来。它也将有力地驳斥这样的说法,即美国对在“第三世界”对抗共产党人既没有准备,也没有意愿。

最后,本章的解释也将提出,战略村计划是历史上一种特定的帝国主义战略的直接延续,其主要内容是对有可能揭竿而起的人民实施“集中”和“发展”政策。美国在越南的反叛乱政策受到现代化观点的驱动,同时也符合一种将“进步”和暴力结合起来的老套路。尽管战略村计划由于其战争环境而显得有些特别,但也不应就此认为它完全不同于肯尼迪政府其他在海外推动发展的举措。与争取进步联盟和和平队一样,战略村计划对帝国主义和天定命运等陈旧的意识形态进行修整加工,使之适应于冷战的需要。而像肯尼迪政府的其他计划一样,它也提出了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一整套构想,还帮助美国人形成一种良好自我感觉。而这是战略家和社会科学家所不停地予以推动的,即使当他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政策失败的迹象。

肯尼迪政府的政策规划人员和美国媒体声称自己对越南战争的分析是不带偏见的、“理性的”,同时又不厌其烦地描述美国的使命、价值观和利他主义传统。从一种角度出发,他们把战争说成是一项科学工程。从另一种角度出发,战争又成了一种深刻的道德义务。那些支持干预政策的人把美国人说成是理想的冷战斗士,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是因为其领导人和公民拥有“坚强的神经”和“进行冷静细致的分析的能力”,而且还

有一种超然、客观、“非情绪化的自律和自控”的能力。^①同时，用诺姆·乔姆斯基的话来说，理论家、决策者和媒体也显现出“殖民地官吏”的心态。他们“深信自己的祖国是仁慈善良的国家，深信他们自己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是正确的”，所以他们也坚信自己懂得“落后民族的真正利益之所在，认为这些人的福祉（要由他们来）照料”。^②在那些将社会科学分析与美国自己以往向文明开化演进的经历结合起来的讨论中，拯救南越成了一件客观、科学的事，同时也成了一项利他主义的国家使命。

从1962年初到1963年11月美国支持下的一场政变推翻吴庭艳政府，战略村计划一直是肯尼迪政府越南政策的核心成分。根据从法国的殖民活动、越南自身的社会试验、英国在马来亚殖民地的统治策略中汲取的经验，美国采取了一项行动。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批准了吴庭艳总理的一个策略，即将农民从分散的村落迁往集中的定居点，并提供帮助和建议。在“清剿”了南越乡村某地的叛乱分子之后，南越军队（ARVN）和美国顾问软硬兼施，对当地乡民进行劝说和武力胁迫，驱使他们迁往一些“战略村”。所谓“战略村”是一些防御据点，中间是居民住房，四周以铁丝网、壕沟和竹尖桩围起来，在其中可以更方便地推行军事控制和社会工程。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军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希望，迫使农民在居民点内修建居家房屋和防御工事，就可以将越共和老百姓隔离开来，使前者无法从后者那里获取食物、情报和兵员补充。而他们还试图向民众灌输民族主义情感，使之效忠于吴庭艳南越政府，希望由此能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美国为击败共产主义而大力推行社

① Hilsman, speech to the Conference on Cold War Education, Tampa, Fla., June 14, 1963, Thomson Papers, box 9, "Speeches - R. Hilsman", JFKL.

② Chomsk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4.

会和政治的现代化,鼓励乡村组织的建立,支持“自助”计划,并号召各省头目加强与地方居民区的联系。美国政策制定者希望乡民的视野扩大到与世隔绝的村落之外,形成一种对吴庭艳政权、而不是对胡志明的革命的忠诚。

肯尼迪政府的战略家们希望,向“传统”的农民提供医疗、化肥、食用油和牲畜将使他们“对战争压上一注”。而且他们把自己的所谓绥靖行动看成是促使吴庭艳政府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推进现代化的更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将延伸到各省的事务中去,以彰显其仁德爱民之心。而通过参加地方选举,建立各种自治组织,实施满足社区需求的计划,消极被动的农民也将变成积极有为、享有各种权利的公民。美国希望,这些村民在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环境之后,将拿起武器反对叛乱,以捍卫自己新建立起来的现代价值观,保卫他们在吴庭艳政府帮助下过上的好日子。除了把战争作为一个发展问题加以规划外,战略村计划还严重依赖于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控制。农民被置于随时随地的监视之下,他们被命令随身携带身份证明,要对外出和来访者的情况进行汇报,外出旅行必须获得正式批准。尽管战略村被说成是建立在民主和白决的基础之上,但在战略村的人身约束和纪律管束下,战略村中民众生活的内容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更有甚者,战略村以外的范围则成为自由开火区(free-fire zone)。

在对肯尼迪政府关于越南战争的想法及其战略村计划的执行情况考察之前,有必要至少简短地回顾法国殖民统治的衰落,以及美国对此做出反应的历史情况。因为肯尼迪总统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其前任对越南承担的义务。正如乔治·卡辛在其关于越战的历史著作中所指出的,美国在越南的介入反映出美国“连续采取

一系列利用外部力量来控制民族主义威胁的步骤”。^① 和他的前任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一样，肯尼迪也推动美国更深地卷入一场反共斗争当中。而且和前两位总统一样，肯尼迪也是在全球冷战的大环境中考虑越南问题，认为越南战争是一场美国输不起的战争。越南是一个位于太平洋对岸、距美国有万里之遥的小国，但其对美国的重要性最终被无限放大。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越南已经成为一个美国为之投入大量精力、资源和人员的地方。

自从 19 世纪末以来，法国在其印度支那殖民地的严酷统治激起了越南人的憎恨，也激起了他们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决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胡志明曾前往法国向凡尔赛和会请愿，但是没有能够见到威尔逊总统，也没有能使美国做出支持越南独立事业的承诺。罗伯特·舒尔辛格指出，即使胡志明和威尔逊的会面发生了，“那位认为民族自决几乎只适用于欧洲人的威尔逊，是否会给这位年仅 29 岁的纤弱越南青年帮忙，还很难说”。^② 然而，后来胡志明和其他革命领导人却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可以给越南人带来新的希望。越盟在 1941 年创建了一个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组系统，将分散的主张独立的团体整合为一个基础广泛的统一阵线，展开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胡志明和他的助手改变策略，将内容广泛的“救国续种”的计划置于其共产主义政治目标之上，由此建立了稳固的民族主义联盟。他们渡过了日本野蛮的占领统治时期，经受了苦难的生活和战时的灾难性饥荒，并开展游击战，以此作为一种反对日本人和已被严重削弱的法国人的武装抵抗手段。当日本在亚洲的殖民帝国在盟军的进攻下土崩瓦解时，越南的民族主义者为了迎接他们自己的胜利时刻的到来也做好了准备。1945 年 8 月 19 日，近千名越盟成员进入河内，受到期盼

① Kahn, *Intervention*, 33.

② Schulzinger, *Time for War*, 9.



从这幅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政治漫画中可见：第一，美国人认为胡志明领导的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是对越南南方的侵略；第二，美国的空中打击能够制止和消灭邪恶的“侵略者”。

独立的全城人民的夹道欢迎。消息传开后，在顺化和西贡等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最后，在 1945 年 9 月 2 日，胡志明在河内市中心宣布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对 50 多万集会群众发表讲话时，他引用了托马斯·杰斐逊的名言，宣称他的祖国也服膺起源于美国的一个原则：“所有人生而平等，所有人都有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他还说，越南是一个“为反对法国统治英勇斗争了 8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经支持过胡志明领导的抗日武装。图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官员正在北越丛林中训练越盟武装人员。

多年”的国家，现在它将“捍卫自己自由和独立的权利”。^①

胡志明引用美国建国文献中的话，这反映出他希望美国以其巨大的力量来支持越南的事业。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法国在战后的意图毫无信任，曾一再声明反对法国恢复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在战争行将结束时，他还曾提出，应该将法国在亚洲的几个属地转交给联合国，在它们最终独立前由盟军实施托管。然而在1945年以前，由于英国和法国的反对，以及美国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加之美国希望法国进入该地区与日本作战，这些计划最终都化为泡影。美国决策者关切美国战后在欧洲的地位，感到这里有严重的问题和不确定性。劳埃德·加德纳(Lloyd Gardner)

^① Cited in Harrison, *Endless War*, 96.

解释说,对罗斯福有影响力的谋士们“说得很明白:美国在与苏联的任何冲突中都需要法国”。^① 政策制定者们担心,如果在印度支那对法国采取强硬立场,将促使这个美国赖以在战后凋敝没落的欧洲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盟友疏远自己。当罗斯福在1945年4月去世时,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还没有最终形成,而且也没有被清晰地加以界定。

哈里·杜鲁门更加坚定地相信应该防止法国及其宝贵的殖民地落入敌对势力的影响之下,所以他领导的政府没有在越南政策上显现出其前任的那种模糊态度。杜鲁门及其政府高官对东南亚的了解要比罗斯福少得多,几乎没有人对允许法国恢复在印度支那的统治持有异议,特别是他们考虑到这将鼓励法国人与美国在冷战中进行合作。^② 到1947年,美国政策制定者也开始认为胡志明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危险的。在法国和越南民族主义者之间含糊的口头协议瓦解的同时,越盟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也都有了扩充,这使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等官员对越南局势持悲观的看法。尽管他们认识到胡志明有强大的民族主义号召力,但马歇尔及其同僚仍然担心胡志明具有共产党的本质,摸不透他的长期目标,因为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一度在莫斯科居住和学习。^③ 于是美国拒绝了胡志明不断提出的要求美国对其予以承认和援助的呼吁,放弃了大西洋宪章中的反殖民主义原则,也背弃了罗斯福战争期间给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人民以自决权的主张。从遏制战略的角度来审度局势,则相对于美苏之间的全球力量均衡,越南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历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在1950年初以前斯大林对胡志明的支持一直停留在口头上,

① Gardner, *Approaching Vietnam*, 14.

② Schulzinger, *Time for War*, 22.

③ *Ibid.*, 30.



战后最初，美国在原则和理念上是反殖民主义的，对前殖民地的民族主义也不乏一种笼统的支持。而在反抗法国殖民统治过程中兴起的越南民族主义的矛头最初也并没有指向美国。1945年和1946年，为了保持越南独立，胡志明一度对外宣布永远保持中立，还曾向美、苏、英、中等国发函，希望各大国帮助越南摆脱法国统治获得独立。但是在冷战在西太平洋展开的过程中，美国终于把胡志明树为自己的危险敌人。美国的一个逻辑是，胡志明是共产党人，因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而只能是中、苏阴谋的代理人；只有吴庭艳政权能代表越南的民族主义。图为20世纪50年代初的胡志明。

而且只是在美国多次拒绝承认胡志明政府后，苏联才对其予以正式承认。尽管如此，杜鲁门政府还是认为，越盟及其土地改革计划和抗法战争都说明，西方在哪里示弱，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就将扩张到哪里。美国一方面要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另一方面也试图为西方保留进入这个地区的机会，使之作为重要的市场和原材料

产地在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的策士们指出,印度支那的橡胶和矿产原料对法国工业有重要意义,将有助于法国经济的恢复,进而有助于防止法国本国的共产党从该国战后的经济萧条中捞到便宜。从马来亚出口的锡和橡胶也有助于减轻英国的战时债务负担。正如历史学家安德鲁·罗特尔(Andrew Rotter)指出的,美国官员希望东南亚“成为一个有生产力的地区,像战前那样出口稻米和原料,从日本和西欧进口其所需的全部制成品”。^①许多策士担心,假如胡志明获得胜利,这种局面就会受到破坏。基于对地缘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双重考虑,美国排除了用革命手段来消除冲突的可能性,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来扶持那个衰落中的殖民帝国。法国提出,将19世纪阮氏王朝的继承人保大抬出来,使之成为越南统一国家的君主。同时,美国则支持达成一项协议,其内容是保留法国对该国外交事务的全部控制权、法国军队驻扎在越南。美国官员低估了胡志明及其同志的决心。不取得完全独立他们是决不会罢休的。^②

不久以后,越盟迅速获得了全国农村的广泛支持,发起了强大的军事进攻行动。美国帮助法国遏制社会革命的企图由此失败了。尽管法国人还掌握着重要城市和交通线,但是他们对该国其余部分的控制却越来越多地丧失掉了。詹姆斯·哈里逊认为,到1950年革命者已“控制了全国超过一半的乡村地区,其中包括南方的三分之二,以及北部三角洲地区的一半以上。……在夜间,在没有政府部队活动时,或者说在大部分时候,许多村民都听命于共产党领导的抵抗武装,与当地的活动分子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与

① Rotter, *Path to Vietnam*, 6.

② 除了 Kahin 和 Rotter 对这一阶段的解释,另参见 Young, *Vietnam Wars*;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外来的’政府、‘外人的’部队发动的扫荡形成强烈反差”。^① 胡志明的游击队的大部分装备都是从中国运来的，是先前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从蒋介石部队手中缴获来的美制装备。靠着这些装备，越共游击队投入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轻型炮兵、自动武器、机动车辆和中国的技术援助使他们如虎添翼。到1951年初，虽然美国对法国的军事援助已高达5,000万美元，但这已不足以扭转战局。^②

然而，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并没有改弦更张。因为朝鲜战争使它们不能对美国政策进行认真的重新评估，而且导致美国在越南进一步扩大干预。当毛泽东在中国取得举世为之震惊的胜利之后，朝鲜战争接踵而来。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印度支那当前的局势是共产党在整个东南亚扩张的大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政策计划人员都认为，在越南丢失阵地将导致灾难。如果美国在派出自己的军队在朝鲜作战的同时却不支持法国在越南的行动，那么共产党就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这又将使各地的共产党人大壮其胆，从而将整个东南亚地区置于危险之中。^③ 这些想法使已在着手制定中的援助计划加速进行，到1954年美国支付了法国全部战争费用的78%。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比例远远高于越盟接受的外部援助的比重。^④ 遏制政策的僵硬逻辑只能推动美国政策向着扩大介入的方向发展。

更有甚者，美国的援助对战争的总体进程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法国将军亨利·纳瓦尔(Henri Navarre)试图引诱越盟前

① Harrison, *Endless War*, 116.

② Schulzinger, *Time for War*, 52; Harrison, *Endless War*, 116—17.

③ Smith,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1:40; Schulzinger, *Time For War*, 47.

④ Harrison, *Endless War*, 117.

来越南北部的奠边府镇进行一场老套路的决战,但法国在此战役中受到毁灭性打击。纳瓦尔向一个村庄空投了大约 13,000 名伞兵,希望他们从这个位于河谷中心、毗邻老越边界的有利地点发起进攻,击溃越盟士兵的“人海”。武元甲指挥下的游击武装和越南农民却有不同计划。他们用牲畜拉的车、自行车运送大炮、弹药和给养,靠双脚跨越 300 英里的崎岖山路,在法国人驻守的孤城外掘出条条相互连通的地道。脚夫们把武器搬上山顶和山梁,由此越盟战士居高临下地向要塞中的法国军团开火,并将敌人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经过七个星期的激烈战斗,革命者最终迫使弹尽粮绝的法军残部缴械投降。一些美国官员,包括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都公开主张采取军事行动营救法国人。还有几个人,比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亚瑟·雷德福海军上将,甚至考虑过对越盟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然而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以及美国的重要盟国如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的反对下,这类建议最终被否决了。由于对法国人的信心逐渐消失,而扩大干预的目标尚未明确,冒直接介入的风险的想法在美国决策层几乎没有市场。^①

越盟的胜利迫使战败的法国人及其沮丧的美国支持者走到谈判桌前寻求和平解决,由此达成了 1954 年的日内瓦协议。中国和苏联希望确保其边境地区的安全,对协议予以支持。美国不愿冒冲突升级的风险,不愿冒与中国再打一场代价高昂、历时长久的朝鲜式的战争的风险,所以虽然它没有正式参加谈判,但还是做出了不破坏协议执行的承诺。协议条款中包括:外国军事力量全部撤出该地区,以北纬 17° 度线将越南临时划分为两个军事区;但也规

^① 关于对奠边府战役及其影响的讨论,参见 Fall, *Hell in a Very Small Place*; Harrison, *Endless War*, 123-25; Schulzinger, *Time for War*, 58-68。

定在 1956 年举行全国选举以重新统一国家，并建立一个由加拿大、印度和波兰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以监督协议的执行。越盟领导人对其卓越的组织结构和胡志明的威望极具信心，毫不怀疑他们会在未来的大选中获胜，所以耐心地接受了这个没有充分反映其军事胜利和战场实力的协议。他们希望，在两年内将会发生由军事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变，而政治斗争将保证他们最终获得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①

然而全国大选始终没有举行，而军事斗争也丝毫没有停止。美国在希腊控制共产主义的努力，在菲律宾对胡克起义的打击，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颠覆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英国在马来亚镇压叛乱的能力，这些都给美国的战略规划人员增添了信心，促使他们无视日内瓦协议，采取多项步骤使北纬 17° 线变成一条永久性边界。艾森豪威尔及其谋士们担心，日内瓦的解决方案很可能会使越南统一在胡志明的领导之下。美国没有接受经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拒不执行禁止外国军事力量进入该国的条款，开始采取新的行动以加强它在东南亚的地位。由于派遣作战部队将可能导致中国方面采取相应的行动，艾森豪威尔政府转面制定了一项对南越进行政治、社会 and 军事援助的计划，其目的是建设一个独立的南越国家，使之成为阻止革命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蔓延的屏障。^② 当局还将中央情报局特工爱德华·兰斯代尔从菲律宾调往越南，指导一项对河内进行破坏的秘密计划。美国还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 (SEATO)，使之作为向南越提供保护的一个防御同盟。

美国的决策者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南越国家，为此要寻找一

^① Kahan, *Intervention*, 61; Schulzinger, *Time for War*, 76—77. 关于日内瓦协议的详细情况，参见 Randle, *Geneva 1954*.

^②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44—46; Young, *Vietnam Wars*, 37—59.



20世纪50年代末,很少有美国人能在地图上找得出越南这个国家,但却有不少人把吴庭艳想像成能将美国的自由民主之梦在一个遥远而落后的国度里变为现实的卓越的政治领袖。图为吴庭艳1957年5月访问美国时,在纽约百老汇接受公众的欢迎。

个统治者。吴庭艳,法国建立的保大政府的总理大臣、坚定的反共分子,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官员看来似乎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吴庭艳也受到美国越南之友协会(American Friends of Vietnam)的积极支持。这是一个有影响的组织,其成员包括纽约大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Francis Spellman)、蒙大拿州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

las)以及麻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肯尼迪。^① 吴庭艳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领导人，要求法国给予越南更多的自治权。他曾周游欧洲，也曾在新泽西州雷克伍德的一所神学院生活，他向世界描绘出一个以美国为榜样的独立越南的形象。所有这些使他受到兰斯代尔的特别注意。这个美国人受自己在菲律宾的经历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终于把吴庭艳看做是越南的拉蒙·麦格塞塞，是“一位对其祖国有责任感的正直的人。如果他能得到正确的建言，他会成为他的同胞心目中的英雄”。^②

从1954年开始，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一直支持吴庭艳巩固其在南方的反共统治，也支持其在单一的越南民族内开辟出一个分裂的国家。然而，美国的援助和顾问并没有做什么事去减轻大众的疾苦或者消除革命的威胁。中央情报局帮助吴庭艳扫清了在城市地区挑战其权威的武装宗教帮派。爱德华·兰斯代尔也帮助吴庭艳操纵了一次公民投票，废黜了保大皇帝，将全部国家权力置于吴氏一人之手。根据美国政府和吴氏政权的协议，密西根州立大学训练南越的公共管理人员和警务人员。密西根州立大学被用以掩盖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它帮助南越准军事组织征召山民，并派特工越过边界潜入北方。^③ 艾森豪威尔政府每年向南越输送大约两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后者政府支出的大约三分之二。但这既没有创造经济增长，也没有吸引来它所期待的私人投资。

① Schulzinger, *Time for War*, 78.

② FitzGerald, *Fire in the Lake*, 98.

③ Young, *Vietnam Wars*, 53; Schulzinger, *Time for War*, 89-90. 从1954年到1962年，密西根州立大学为在南越建立“现代国家”而参与从事各种活动，这本身就是历史上有趣的一章。关于密西根州立大学派往南越的工作组中的成员对其活动的叙述，参见 Fishel, “Problems of Democratic Growth in Free Vietnam”; Scigliano and Fox,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Vietnam*。另参见 Ernst, *Forging a Fateful Alliance*。

吴庭艳及其支持者的统治也使多数南越人民与之离心离德。在1954年,南方农村人口中的0.25%占有近全部稻作土地的40%,但是保守的土地改革对这种严重的两极分化状况几乎毫无触动,更不能与北方革命重新分配地主土地的做法相比。



吴庭艳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共思想,其天主教背景是美国人特别欣赏的。但他性情孤僻、行事刻板,上台之初就没有稳固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支持。美国高层其实早就清楚地知道:他在越南人心目中的威望是无法与胡志明相提并论的,如果要在越南全境内实行自由选举,吴庭艳无论如何是竞争不过胡志明的。

商品进口计划也被证明是同样无效的,因为所进口的商品丝毫没有帮助南越政权扩大其统治的群众基础。美元和进口信贷在

一般情况下是被用以支持上层和中等城市居民的消费品购买力的，对其他阶层无所助益，更不能促成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持续的经济进步。^① 美国还帮助吴庭艳建立了一整套残酷的镇压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这位南越领导人设立了强大的秘密警察机构，杀害了数万同情越盟的人士，并对数十万人施以监禁和酷刑。在基础广泛的革命的威胁之下，吴庭艳政府成了一个腐败、褊狭和残酷的独裁政权，除了维持自身生存外几乎别无追求。即使在吴庭艳采取行动镇压一切异议分子、使自己残酷的个人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时，美国仍继续把他树为“自由越南”之民主、进步的领袖。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况是，美国决策者认识不到许多南越



吴庭艳统治的家族统治色彩十分浓厚。特别是照片中他身后的弟弟吴庭叔(右)、吴庭儒(左)以及身边的弟媳吴庭儒夫人，都是南越政治生活中的显赫人物。吴庭叔是大主教，吴庭儒是南越安全部队首脑，而貌美、泼辣、热衷于推行女权主义的吴庭儒夫人则认为自己是南越的第一夫人。

^① Wiegiersma, *Vietnam*, 180—82; Harrison, *Endless War*, 183—85, 210—11.

人并不认同被强加给他们的吴庭艳政府，而是认同于范围更大的、具有特定历史和文化内涵的越南民族。南越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宗教和社会领袖因吴庭艳的残暴统治而背弃了它，这促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共同反对吴庭艳政府及其美国后台老板。^①

吴庭艳在其辖区只维持着虚弱的统治，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革命者转而采取更多的暴力手段来和他作斗争。河内的共产党（劳动党）最初对抵抗南越政权的活动加以限制，以免在预定的统一全国的选举举行之前引发美国的干涉。为此河内指示其南方同志集中力量建立基层政治组织。当大选根本不可能举行的情况完全明朗、而吴庭艳的镇压又变本加厉时，南方的共产党员和前越盟成员强烈呼吁改变战略。南方的革命者告诉河内的领袖们，对吴庭艳打击他们的运动采取更有力的回击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在这些呼吁的推动下，越南劳动党在1959年初批准了“革命暴力斗争”和“起义”的方针。在其后的几个月里，南方革命者在多个省份发起武力反攻，从政府部队夺取武器，并在各地推进其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的计划。南方的激进派还联合知识分子、劳工、学生和持异议的宗教团体成员，组成了一个行动积极、基础广泛的反吴庭艳联盟。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LF）正式成立，该组织不仅致力于建立政治组织体系，而且力图武力推翻吴庭艳政府。这个迅速扩大的组织被吴庭艳及其美国盟友称为“越共”。民族解放阵线组织游击队，处决或威胁地方政府官员，还发起有效的宣传攻势，逐步控制了南越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其

^① Kahin, *Intervention*, 95—103; Wieggersma, *Endless War*, 216. Halberstam, *Making of a Quagmire*, 该书也全面地讲述了吴庭艳政府的腐败和有系统的镇压。

中的乡村地区。^①



兰斯代尔职位不算高，但作为美国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反叛乱专家和吴庭艳的顾问却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图为兰斯代尔和吴庭艳在一起。

所以，肯尼迪政府上台伊始，越南战争已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 1955 年至 1961 年间，美国向南越输送了 10 亿美元以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南越在美国受援国中列第五位。在肯尼迪入主白宫前，有 1500 多名美国人被派驻在首都西贡，在行政机构和在军事援助和顾问团(MAAG)工作，后者还负责训练吴庭艳的武装部队。^② 而且肯尼迪的谋士们不久后还断定美国援助的力度还

^① 关于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以及其在南方的基础、与河内的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参见 Kahin, *Intervention*, 112—21; Harrison, *Endless War*, 175—78, 225—30。关于民解的建立对地方革命活动的影响，参见 Race, *War Comes to Long An*, 105—30。

^②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56—57。

不够。1961年,已供职于五角大楼的兰斯代尔从越南访问归来后向政府报告说,那里的革命形势正在迅猛发展。他在致罗斯托的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又被罗斯托呈给总统)中指出:“当我和美越双方的情报人员一起察看形势分析图时深感震惊,我们发现,成千上万接受了‘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教育、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共党分子已经渗透到南越最富庶的地区,并且除了一些军事行动保护下的通道外,几乎控制了整个这片地区。”^①1961年3月,中央情报局提交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文件进一步证实了兰斯代尔的警告。吴庭艳当局处在持续的压力之下,“在1960年,越共暗杀和绑架了超过2,600名非军事人员,其中大多数是政府官员和支持政府的人”。未来的前景也仍然很不乐观。中央情报局警告说:“尽管越南军队的攻势不断加强,并且对越共造成重大伤亡,但是战场上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越共游击队手中。”^②几个月以后,肯尼迪的朋友、作家白修德(Theodore White)也传回了对形势的黯淡估计。他在从西贡发出的一封致总统的信中哀叹道:“形势正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稳步下滑。……现在游击队几乎控制了全部南部三角洲地区,以至于如果没有军人护送,即使在白天我也找不到一个美国人愿意开车送我到西贡以外的地方去。……更让我万分困惑的是,在共党分子方面,似乎却有人愿意为了他们的事业去死。”^③勇于献身的革命者正在向前推进,留给吴庭艳政权及其美

① Memorandum, Lansdale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others, January 17, 1961, Lansdale Papers, box 42, “Memoranda, 1950-1961”, HIA。关于罗斯托将兰斯代尔的报告转呈肯尼迪一事,参见 Rostow, Oral History Interview by Richard Neustadt, April 11, 1964, transcript, 44--45, JFKL。

②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o. 50-61, March 28, 1961, Vice-President's Security File, box 10, “27 April -- Viet Nam, Col. Burriss EOB(1),” LBJL。

③ As cited in Olson and Roberts, *Where the Domino Fell*, 87.

国后台老板的时间越来越少。

肯尼迪政府为美国的国际信誉感到忧心忡忡，而在这方面形势似乎更加严峻。美国战略家把越南视为东南亚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而且更认为这个国家的命运将对整个“欠发达”世界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兰斯代尔坚持认为，在越南的失败将毁灭“我们一方在这一地区最坚定的力量”，而且“将在亚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的威望和影响力构成沉重打击，因为全世界都认为越南靠着美国的帮助才保持了自由。如果共产党取得这个胜利，其他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就都会认为做美国的朋友是得不偿失的”。^①林登·约翰逊在东南亚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强硬。在1961年访问越南之后，这位副总统告诉肯尼迪，这个地区的领导人都开始带着“怀疑和忧虑”来看待美国的意图。他指出，如果美国不拿出“力量和决心”来支持各反共国家的政府，“那些岛屿据点——菲律宾、日本和台湾——就没有安全可言，太平洋就会变成红色海洋”。约翰逊坚持认为，东南亚的安全取决于全世界“对美国力量的了解和信心”，并为总统描绘了一幅“要么全都有、要么全都没有”的图景。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要么全力支持这些国家，要么在这个地区认输，干脆把我们的防御撤回旧金山，打定主意‘以美国为要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告诉世界，我们不再遵守我们的条约，不再支持我们的朋友。”^②和其他官员一样，兰斯代尔和约翰逊也认为美国的公众形象和民族特性与其冷战战略是不可分割的。

^① Memorandum, Lansdale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others, January 17, 1961, Lansdale Papers, box 42, "Memoranda, 1950—1961," HIA.

^② Memorandum, Johnson to Kennedy, May 23, 1961, Vice Presidential Security File, box 1, "Vice-President's Visit to Southeast Asia, May 9—24, 1961(D)," LBJL.



肯尼迪在1961年5月,也就是其就职后3个月,就派副总统约翰逊前往南越,向吴庭艳保证美国将继续坚决支持他的政权。约翰逊在公开场合把吴庭艳称为“亚洲的丘吉尔”。在给肯尼迪的报告中,约翰逊对吴庭艳政权的种种衰败迹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吴庭艳“是个为许多问题所缠绕的复杂人物,他有值得钦佩的品质,但他脱离人民,周围净是些不像他那么值得钦佩的人物”。图为约翰逊访问南越时会见吴庭艳。

更有甚者,美国在国际上遭受的一系列挫折也使越南的重要性变得更突出了。在令美国大失颜面的猪湾事件发生后不久,沃尔特·罗斯托向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国务卿腊斯克建议说,“在越南干净利落地取胜”,将有助于打消那些所谓美国无力推行遏制政策或无力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该政策的想法。^①当时,帕特寮游击队向脆弱的老挝政府发起挑战,而美国试图促成一项协议,建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盟而使该国中立化。在这种情况下,在越南划定界线的必要性似乎就更紧迫了。更糟糕的是,在1961年6

^① Buzzanco, *Masters of War*, 87--88; Gardner, *Pay Any Price*, 44.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美苏最高级会议上，赫鲁晓夫威胁要与东德单独签订和平条约。美国官员认为，这个举动将危及西方在柏林的地位，而且是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的又一次打击。许多官员估计，这对国内造成的积累性影响也是十分严重的。肯尼迪在竞选曾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他之所以以微弱多数票险胜理查德·尼克松赢得大选，在于他宣称“新眼光”^①(New Look)实际上等于“不敢直面现实的眼光”(Look the Other Way)甚至“根本没有眼光”(No Look at All)。^② 肯尼迪曾许诺他要采用一种比“大规模报复”更能调动主动性和责任感的战略，而这将创造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然而，如果越南走上中国或者古巴的道路，肯尼迪本人就会成为受害者，要被指责为无力抗拒共产主义扩张。肯尼迪及其策士认为，美国受到的每一次挫折都将危及别国对美国的信任，而且他们主要从美苏权力角逐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对国际冲突做出分析判断。所以，他们很快就决定，要把越南作为一个证明美国将严守其义务的关键地方。

肯尼迪决定坚持既定路线，入主白宫伊始就试图找到更有效地支持南越政权的手段。^③ 在其就职演说仅一个星期后，总统批准了一个计划，向吴庭艳提供4,100万美元，以帮助其扩充南越军队20万人。而且美国提出训练和装备32,000人的民团，花费1,270万美元。在1961年5月，政府越南特别小组发出警告，说“越共骨干分子的人数已从1960年的4,400人增加到今天的大约12,000人”，随后肯尼迪的战略家们再一次加大干预的力度。一个政府特别小组坚持说，仅有提高军事行动的有效性的计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美国还必须改善“政治和经济条件，而这将(为吴

① 亦译作“新面貌”。 -译者

② Gardner, *Pay Any Price*, 26—27, 45—47.

③ Kahin, *Intervention*, 126.

庭艳政府)争取到稳固和广泛的支持。”^①就在同一个月,肯尼迪下令加强空中侦察,部署了一个特种兵训练队,并为公共工作计划追加拨款。^②

然而,战争的进程仍在继续加快。1961年9月,政府接到报告,称湄公河三角洲大有为民族解放阵线控制之势,同时中央情报局也估计,受过训练的叛乱武装现已增加到16万之多。游击队以多个千人以上的战斗建制发起了三次进攻,一度占领了距西贡仅55英里的一个省会城市,这表明他们的实力又有了新的壮大。^③虽然革命者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在农村,但是他们也开始在城市扩充其地下组织。他们的作为显示,革命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北越侵略的问题,而这与许多美国官员的看法正相反。尽管胡志明政府提供的补给、顾问和训练肯定是起了作用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民族解放阵线在当地群众中受到高度的支持。

面对革命力量不断增长的明显事实,肯尼迪及其下属花了整个1961年秋季来寻求更全面的战略。肯尼迪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担心谈判解决方式会危及美国的可信度,并扩大共产党对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威胁,所以不愿考虑这种办法。同时他们仍然十分谨慎,有意不向吴庭艳那个不稳定的政府作出派遣美国战斗部队的公开承诺。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建议部署有限的部队,以鼓起南越军队的士气,显示美国的决心,进而避免战争进一步升级的风险。但其他官员有更多的怀疑,而吴庭艳本人对此反应也相当冷淡。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费尔特(Harry Felt)海军上将就对有限战争可能引起的后果感到担忧。他问道,一旦美国做出公开承诺,

①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A Program to Prevent Communist Domination of South Vietnam", *FRUS*, 1961-1963, 1: 93, 99.

② 关于对肯尼迪政府在初期所做的各项决定的详细记述,参见 Senate,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2:5-17.

③ Kahin, *Intervention*, 133.



在肯尼迪、约翰逊两界政府的三位主要对外政策顾问和决策者(从左至右: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和罗斯托)中,学术素养最深厚的罗斯托对扩大越南战争的态度最为坚决。约翰逊政府时,罗斯托已经升任国家安全顾问,在美国政府高层内对越南战争的怀疑和不安越来越多时,罗斯托仍然对战争予以热情支持。他是战略轰炸策略的坚定支持者,为此得到“空军上将罗斯托”的绰号。罗斯托在1969年越战政策走进死胡同时离开政府。进入肯尼迪政府前他担任教职的麻省理工学院不欢迎他回来,反战的学生更是把他看做“战争罪犯”,但罗斯托始终坚持认为他当时的观点和政策主张是正确的。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才能全力以赴去履行承诺呢?^① 肯尼迪的私人军事顾问马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在1961年10月访问了越南,建议肯尼迪派遣8,000人的常规地面部队和5,000人的工兵部队。然而,迪安·腊斯克、乔治·鲍尔(George Ball)、切斯特·鲍尔斯、埃弗雷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等谋士持反对

^① Buzzanco, *Masters of War*, 96—99.

意见,他们和总统本人的保守意见相吻合。^①肯尼迪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不能指望得到主要欧洲盟国的支持。英国和法国被自己在殖民地的斗争所拖累,不愿帮助越南的反共力量。总统还担心,派美国步兵去给吴庭艳的压制性政府撑腰,会使其政府受到民主党内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成员的批评,而且会激起中国和苏联方面的军事反应。所以,肯尼迪一方面在1961年底为自己保留了以后部署美国战斗部队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寻求其他打击越南的革命的办。^②

肯尼迪政府并没有放弃军事措施。部署由美国军人充任驾驶员的直升机分队,增加对吴庭艳军队的援助,向南越军队提供燃烧弹、白磷榴弹和化学落叶剂,这些都反映了美国仍然在寻求军事胜利。玛丽琳·扬(Marilyn Young)的战争史著作指出,肯尼迪刚上台时在越南有美国军事顾问和其他人员800名,而一年后已经增加到11,000名。^③然而,肯尼迪及其下属已经决定不派战斗部队直接参战,而是试图通过其他策略来战胜民族解放阵线。他们断定,军事力量必须与消除革命的政治和社会根源的计划相配合。肯尼迪政府官员认为,如果吴庭艳政权能够被改造成一个民众对之寄予希望的政府,那么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就可能阻挡革命浪潮。肯尼迪及其谋士以及美国驻南越的援助代表团都转而强调农村和农民,不再拘泥于一般的军事策略,而开始对综合全面的反叛乱计划大感兴趣。而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要把军事行动和社会工程的战略结合在一起。到1961年底,肯尼迪政府已经开始致力于通过现代化来打击越共。

① Kahin, *Intervention*, 136—37.

② Minutes of NSC Meeting, November 15, 1961, Vice Presidential Security File, box 4“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II)”, LBJL.

③ Young, *Vietnam War*, 82.



1961年10月，总统私人军事顾问马克斯维尔·泰勒和罗斯托在对越南进行调查后，建议向南越派遣地面战斗部队。虽然当时肯尼迪并不打算为越南“承担任何代价”，但还是决定成立“驻越援军司令部”，在增加军事顾问之外派遣“战斗支援部队”，这开启了在越南的“特种战争”(The Special War)。“顾问”和“战斗支援部队”与“战斗部队”在战场上往往是没有太大差别的，所以实际上美国人已经由此亲身投入了在越南的战争。图为1963年一名美国军事顾问亲自率领南越士兵参战。

肯尼迪及其谋士们都认为，通过对发展进程的方向加以控制，可以对游击战争加以阻遏。前中央情报局驻老挝情报站站长达格拉斯·布劳法布(Douglas Blaufarb)指出，在肯尼迪召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总统就要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增加美国在反游击战方面的资源投入和人员培训。总统花费了大量时间，



反革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石之一，“反叛乱”和“反游击战”是肯尼迪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基本目标和重要内容，把越南作为“反叛乱”和“反游击战”的“实验场”是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重要动因。图为肯尼迪总统在查看美军特种部队专用于“特种丛林战争”的武器。

饶有兴味地阅读美国陆军的各种手册、切·格瓦拉和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关于古巴、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等地的游击战的分析材料。肯尼迪授权绿色贝雷帽部队专门承担反游击战的任务；还命令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研究反游击战理论，并就美国如何利用这些理论提出研究报告。为了协调美国各军兵种、美国新闻署(USIA)、国际开发署和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的计划，总统批准成立了一个高级别、跨部门的反叛乱委员会。一个最能体现肯尼迪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的事例是，他任命其弟弟罗伯特·肯

尼迪作为他在该项事务上的个人代表。^①

总统还呼吁建立一个专门培训美国高级官员的“全国性的学校”，其中要开设一些课程和计划，“以提高美国指导欠发达国家跨越现代化障碍的能力”。^② 肯尼迪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沃尔特·罗斯托和马克斯维尔·泰勒指示国务院和国防部，要求他们提出关于建立官方性质的“现代化学院”的建议。最后他们决定举行一系列为期五星期、以“当前欠发达地区问题”为主题的研修班，认为通过这种做法可以最有效地传播社会科学理论和反叛乱学说。^③ 授课地点在国务院的外事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前去授课的专家包括罗斯托、白鲁恂、马克斯·米利坎。参加过美国在菲律宾打击胡克叛乱的行动的老战士爱德华·兰斯代尔也在课堂上传授其亲身实践现代化理论的经验。该研修班每年共举办八到十期，每期有40至70名学员，他们都是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的高、中级官员。其主要课

① Blaufarb, *Counterinsurgency Era*, 52—56, 67—68. 反叛乱委员会执行部门的其他成员包括：肯尼迪私人军事顾问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国防部长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Gilpatric)、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泽尔(Lyman Lemnitzer)、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国际开发署署长福勒尔·汉密尔顿(Fowler Hamilton)和美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马罗(Edward R. Murrow)。关于决定设立该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备忘录，参见 Senate,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2: 660—61. 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训练计划实施情况的汇报，参见 Memorandum, Lemnitzer to McGeorge Bundy, July 21, 1962, NSF, box 319, “Special Group (Ci)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Accomplishments, July, 1962,” JFKL.

② McGeorge Bundy,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131, March 13, 1962, Senate,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2: 667—69.

③ Memorandum, Taylor to the Special Group for Counterinsurgency, NSF, box 319, JFKL; Memorandum, Special Group for Counterinsurgency to Kennedy, NSF, box 319, “Special Group (Ci), 1/61—6/62,” JFKL.

程是“欠发达问题”、“共产党排挤西方的企图”，以及以对付革命挑战为目的的反叛乱战略。该研讨班的设计者都认为，其目标是建立一套新的、积极有效的驾驭社会变迁的方法。腊斯克在该研修班开学仪式上宣称：“我们必须成为发展进程的保驾护航者，而不是现状的维护者。我们必须亲现代化，同时反共产主义。”^①

现代化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肯尼迪政府对反叛乱问题的认识。政治学家迈克尔·沙弗尔(Michael Shafer)曾指出，美国政策制定者“让学者们去从事一种工作：把最时髦的关于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和政府方面关于符合第三世界发展的后果的学说结合起来”。^②沃尔特·罗斯托被派到北卡罗莱那州布莱格堡，向“反游击战课程”班的结业学员讲话。其间他阐明了军事战略、反叛乱和现代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一次经肯尼迪亲自审阅批准、作为正式政策声明发表的讲话中，罗斯托指出，共产党推动的游击战争是其“利用欠发达国家内在的不稳定因素”的策略的一部分。为了对付其中的危险，我们必须认识到，“和所有的革命一样，现代化的革命也是十分麻烦的。个人会在自己熟悉的古老生活方式和诱惑着他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无所适从。旧社会集团——特别是那些通常主宰着传统社会的地主阶级——的力量会受到削弱。权力转移到那些能驾驭现代技术的人的手中。……村庄和城市中的男男女女会感到老的生活方式正在动摇，新的机会正向他们敞开大门，所以他们表达出来的是旧的怨忿和新的希望”。罗斯托强调，共产党人力求在这个“革命性变迁的大舞台上”大捞一把，还试图利用“许多欠发达地区对殖民主义积压已久的怨恨”。通过推广自己的“民族解放”的发展模式，共产党试图“使新兴国家相信：只有共产主义才

^① Blaufarb, *Counterinsurgency Era*, 71-73; State Department, “FSI Begins Seminars on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 Defense”, 42.

^② Shafer, *Deadly Paradigm*, 21.

能帮助他们实现其取得独立、世界地位和经济进步的热切愿望”。^①

罗斯托认为，要对付共产党人发动的这种战争类型，就必须控制和利用现代化进程，而叛乱分子也正从这一进程中谋取好处。由于游击队武装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进程中的“食腐动物”，所以要遏制他们就必须加速社会进步。他解释说，共产党人“知道他们在欠发达地区攫取权力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他们知道，当现代化在欠发达地区成为大势所趋之时——这时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就得以解决——他们夺取权力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② 通过推动现代化，美国将对侵略者关上最后一扇机会之门。通过加速和控制变迁进程，美国将推动越南之类的国家进入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并彻底摧毁革命的力量。

罗斯托总结道，在遏制共产主义和建设“真正的独立国家”的过程中，美国将追寻自己的历史经验，履行自己作为仁义之邦的国际使命。在“新兴”世界推动现代化事业，将“使美国社会在仁爱精神的指引下继续向前发展。这种仁爱的传统可上溯至我国诞生之际——我国历史实有比建国时期更为深远的渊源，亦可上溯到西方文明在地中海发端之时”。罗斯托称游击战是“一项事关内心世界的东西，不仅要用枪在战场上打，而且要在那些生活在山村中的人们的头脑中展开，靠地方政府官员的精神和政策来打”。由此罗斯托将反叛乱和传播他所认为的最先进的、而且是西方独有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他宣称，要取得游击战的胜利，仅提供物质援助是不够的，它还要求彻底改变当地人的文化。^③

^① Rostow, "Countering Guerrilla Attack", 464-66. 关于肯尼迪批准该讲话稿作为政府政策的正式声明一事，参见 Blaufarb, *Counterinsurgency Era*, 57.

^② Rostow, "Countering Guerrilla Attack", 464-66.

^③ Ibid., 466-68.

以自己的方式,爱德华·兰斯代尔也在战场上的战术和社会工程之间建立了联系,得出了和罗斯托相似的结论。他向美国陆



作为总统,肯尼迪对当时美国的“反叛乱热”推波助澜。1962年10月12日,肯尼迪亲自前往布莱格堡视察,图为肯尼迪与一名绿色贝雷帽部队士兵在一起。

军军官解释说,胡克叛乱分子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原因在于:他们“操纵着一场革命”,而非律宾政府试图将其作为“正规的敌对武装力量”来加以打击。然而,随着麦格塞塞的军队开展广泛的社会服务行动,向农民提供物质帮助,赢得他们的信任,并“为他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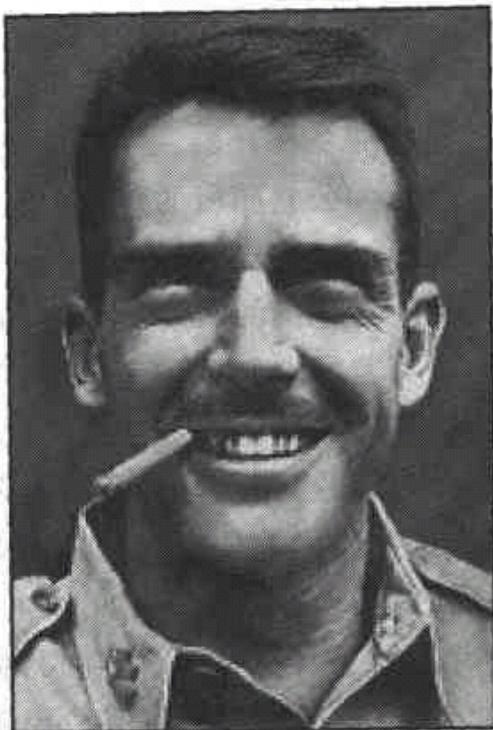
战争建立真正的政治基础”，胜利就站在了政府一边。^① 兰斯代尔对和平队的那种社区发展的基本理论十分热衷，他告诉一群职业军人，成功的反叛乱必须从乡村开始。他解释说，当与世隔绝的村民开始投身于水井、学校和公共厕所的建设中时，他们的世界观也会发生剧烈和深刻的变化。一旦农民们认识到他们共同劳动互相帮助的好处，认识到国家对他们的帮助的价值，他们也就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社区“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这个更大的实体的一部分。如果做到这一点，社区的政治生活也将得到发展，这又将要求对这样的问题有所理解和回答：‘究竟什么是值得一个人牺牲生命去保卫的？’当这些因素渗透到社区的最基层时，当全国性政府变得对自己负责时，当人民和军队之间的纽带更加坚强时，共产党的游击队就没有活路了，因为他们事业可鄙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② 现代化论者声称，只要农民阶级冷漠消极、听天由命的传统生活态度受到动摇，利用农民自身的文化缺陷而煽动起来的革命就会失去根基。

在一项题为“美国在海外的内部防卫政策”(U. S. Overseas Internal Defense Policy)的正式文件中，罗斯托和兰斯代尔之流的这种观点体现得更加鲜明。在1962年8月直到1968年这个时期，这项政策训令成为美国各项反叛乱计划的基础。^③ 该文件指出：“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状况和制度是极具可塑性的。”进而解释说：“各社会都在或主动或被动地做出自我调整，以适应更高

① Report of Seminar on Counter-Guerrilla Opera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U. S. Army Special Warfare Center, June 15, 1961, NSF, box 326, “Rostow, Guerrilla and Unconventional Warfare, June 14-30, 1961”, JFKL.

② Lansdale, speech to the Special Warfare School, Fort Bragg, N. C., August 30, 1962, Lansdale Papers, box 45, HIA.

③ Shafer, *Deadly Paradigms*, 112-13.



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不仅在军队和政府,而且在学术界,“反叛乱”和“反游击战”都成了令许多美国人兴奋和神往的话题,阳刚威武、不拘常规、身怀绝技而且智力超群、具有第三世界国家语言文化知识的反游击战战士成为新时代的美国英雄。中央情报局特工爱德华·塔斯代尔就是公众心目中的反叛乱英雄,在政府内他则被认为是精通亚洲问题和反游击战的双料专家。此人后来担任国防部长特种战争助理。

水平上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必要的基础正在被建立起来,这将不可避免地破坏那种孤立的乡村生活所塑造出来的传统和习惯。……现代化革命将破坏、根除和震撼传统社会。……虽然现代化所需的制度仍在建立之中,但这一革命将引起压力、焦虑和希望,而这似乎给暴力行动提供了理由。”^①对那些“组织松散的国家”

^① Memorandum, Inter-Departmental Seminar on Counterinsurgency, August, 1962, NSF, box 338, “NSAM 182, Counterinsurgency”, JFKL.

而言特别危险的是，那里“冷漠的农村民众成为共产党政治行动的脆弱目标”。所以在这些国家，革命性叛乱的问题就提出一种要求，即“通常作为关键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层级的村庄要加入”战斗。政治分析家们都认为，交通通讯设施的增加、公共卫生计划、住房建设和对农业的援助都将有助于对社会变迁加以引导控制。战略家们认为，成功的前提是满足“弱势群体对提高生活水平和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的热切愿望”。由此他们得出了单一的中心结论。在一项政策声明中，有如下并无讥诮之意的话：“最终的和决定性的目标是人民。社会本身就处在战争当中，而斗争的起源、动机和目标几乎完全存在当地人民中间。”^①

肯尼迪政府的计划的基础还包括越南在此前的一些做法。从1959年开始，吴庭艳和他的弟弟兼主要顾问吴庭儒曾试验推行法国殖民统治的一种做法，即通过对农民社区进行迁移合并而建立“安全区”。他们希望，将农民迁入一些无人居住的地区，可以加强他们对与自己离心离德的人民的个人控制关系和权威政治统治。南越政府制定了一个计划，强迫农民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和土地，并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建立了22个“繁荣稠密中心”（prosperity and density centers），又称“农居镇”（agrovilles）。这些农居镇是通过强迫农民自己服劳役而修建起来的，每个容纳大约400户居民，分布在重要交通线两侧，与更大的城镇相连。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分配给农民，根据计划，他们要在上面建立新的农舍，饲养家禽、牲畜，并种植果树。每个居民点通常还要有一所学校、一座公共教堂、一个公共鱼塘或一条引水渠。白天农民在三英里以外的稻田里耕作。到了夜间，政府官吏就命令他们留在农居镇。他们声称要靠主要由村民们组成的乡间自卫武装来保护他们

^① Ibid.（着重符号为资料原件所有）

自己免遭革命者的侵袭。^①

农居镇计划是不成功的。密西根州立大学向国际开发署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作出结论认为,这个计划给南越农村居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腐败的官吏经常不发放政府向农民许诺的各种物资。而农民们被驱离家园,还要为那一小块农居镇土地交纳租税,对此他们痛恨不已。农民所遭受的苦难还包括其他方面。在一个农居镇,几个无人照料的小孩掉进水渠中,而大人们都在居民区外从事官派的建筑工作。在另外一处,农妇们受到身着政府军制服的男子的凌辱和袭击,而他们的丈夫们都被派出去服劳役了。在计划推行的过程中,电影、高音喇叭和讲话都被用来对农民做宣传教化,但农民们从内心里抵制着政府的这种政治灌输。许多被驱离家园的家庭并不感激吴庭艳政府的仁德和恩惠,反而和游击队站在一起。游击队因而能随意出入农居镇,放火烧毁一些据点,袭击或处决地方官吏。^②

然而,美国不顾这种重新安置居民的计划的明显失败,反而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其支持吴庭艳政府的努力之中。出于对吴庭艳政权的总体稳定的担心,肯尼迪在1961年6月派斯坦福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发展理论专家尤金·斯塔利前往西贡,领导一个美国—南越联合工作组,负责起草一项全国性财政计划。这些专家最初的任务局限于就美国经济援助和增加南越防务预算等事务提出建议,但实际上他们介入了更为广泛的一系列问题。斯塔利小组不仅就增加对医疗、公务员培训、农村改革和工业扩张的投入提出建议,而且在工作中把发展问题和反叛乱问题联系起来。

① BDM Corporation, "A Study of Strategic Lessons Learned in Vietnam", 1980, vol. 5, BDM Study, 5--14, 5--16, LBJL; Senate,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2: 133-34; Zasloff, *Rural Resettlement in Vietnam*, 16-17, 24-25.

② Zasloff, *Rural Resettlement in Vietnam*, 13-32.



美国在越南的反游击战术非常依赖化学落叶剂，因为美国认为落叶剂可以改变越共游击队赖以隐蔽的自然植被条件。到1964年，越南已有9万多英亩的土地植被遭到摧毁，多年后也不能恢复。照片中树木均已枯死，显示了美国的现代化战争招致的生态灾难。

该小组在其最终报告中把越共描述为一个“为国际共产主义组织通过河内加以援助、强化和统一指导”的敌人，并指出：“基本的问题是修复内部安全。”该报告解释说，要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就必须有一个“与军事行动密切配合的加强经济和社会行动（的计划），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而且，吴庭艳的如下计划正符合这种要求：“把分散的人口集中到更易于防御的社区中，并为改善其居民的生活而对社区进行规划和辅助。”在斯塔利及其同事看来，南越政府已经创造了“一个迄今为止最有希望的反游击战的手段”。该报告的作者们建议，为了通过促进当地发展来消灭革命，美国应提供

350 万美元,以在随后的 18 个月内新建 100 个农居镇。^①

美国对斯塔利小组的报告做出了十分积极的反应。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向肯尼迪总统表示,联合工作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从经济上加强越南安全的计划”;强调他相信这些措施将“加强政府,特别是加强它和农村人民的关系”,并使越南农民“以更安全的方式进入国家体系之内”。^② 1962 年 1 月,肯尼迪政府以该小组的建议为基础制定了一项有 11 点内容的计划,目的是改善医疗条件,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工业生产,提高农民总体福利水平。为了支持这些措施的执行,美国还承诺要对其上一年 1.36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发展援助予以大幅度增加。^③

由此在很早的时候,农村居民区重置计划和村级现代化计划就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被纳入了美国在越南的反叛乱战略。作为一名长期涉足官、学两界的社会科学家,斯塔利本人相信“欠发达地区”是对美国的一个“决定性的考验”。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说,这个问题既有深刻的战略意义,也有深刻的道德意义:“非西方世界的人民将不仅广泛地获得现代文明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且他们还将获得更多的作为人的尊严。所以这些起源于西方的好处将不再几乎完全为西方各国人民所独享。不然,我们这

① Memorandum, Viet Nam—United States Special Financial Groups to Ngo Dinh Diem and John F. Kennedy, July 1961, Staley Papers, box 23, “Historian, Dept. of State Re: Vietnam Mission, 1961”, IIIA. 该文件另可见于 Vice—Presidential Security File, box 10, “27 April—Viet Nam Col. Burris EOB (II)”。

② Memorandum, Rusk to Kennedy, July 28, 1961, Staley Papers, box 23, “Historian, Dept. of state, RE: Vietnam Mission, 1961”, IIIA.

③ Frankel, “U. S. Giving Saigon New Economic Aid in Fight on Reds.”

些生活在西方的人也将失去这些好处。”^①他在别的地方也写道，由于西方国家是物质进步和民主价值观的基本发源地，所以他们有义务去“推动其他社会走出古老习惯的束缚，（并）走上现代经济发展之路”。而且，通过执行“社区发展”计划可以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手段之一是：将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派去“增进村民们对更好的事物的期望和追求，比如干净的水井、学校、更先进的耕作技术和道路”。^②斯塔利指出，一旦农民们古老、僵化的生活方式受到变革性观念的动摇，他们就会被驱动去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寻求他们自己的进步。

和密西根大学政治学家、和平队顾问萨缪尔·哈耶斯很相似的是，尤金·斯塔利最初也曾希望美国海外援助中的大部分通过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加以发放。在1960年底，他甚至向即将就任的肯尼迪政府班子建议，邀请苏联人一同来创建和资助一个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援助机构，以此来使发展援助“出离冷战”。与其他理论家和肯尼迪政府的战略家一样，斯塔利没有对这样的基本假设提出质疑：越南是外部共产主义侵略的明显例子，这要求美国采取直接的和决定性的行动。斯塔利还认为，吴庭艳的策略能够创造农民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从而有效地削弱共产主义叛乱的号召力。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清楚吴庭艳政府在执行农居镇计划的过程中是如何地榨取民脂民膏、如何地胡作非为。所以他居然认为这种战略是面对危险的暴力威胁而做出的一种进步行

^① Staley, "American Interests and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the World", speech deliver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November 9, 1954, Staley Papers, box 3, "Staley Speeches, Articles 1946-60", HIA.

^② Staley, "The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 unpublished paper, ca. 1957, Staley Papers, box 3, "Staley Speeches, Articles, 1946-1960", HIA. 关于斯塔利对这种想法的另外一个类似的表述，参见 Staley, *Future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动。他在1961年对一位记者说：“在越南正在进行一场热战。……这是一场由善于打仗的人所导演的血腥、残酷、没有节制的战争。”他指出，通过配备无线电设备、修筑连接各居民点的道路来改善交通通讯条件，就可以使“民众的意见被传达给政府”，也使人民了解吴庭艳的各项计划的情况。他解释说，就越南的情况而言，“你必须在社会经济层面上做一些事，以提升人民的精神，并向他们表明在现任政府之下事情可以取得进展”。斯塔利把国际安全与住房、学校、商店以及社区中心的建设联系起来，认为农居镇是综合性现代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理论家和策士一样，他也认为，美国无私地推动南越的经济发展，帮助南越农民确立一套新的价值观，这些是其为建立广泛而强大的南越国家而付出的努力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①

从1961年底到1962年初，吴庭艳政府和美国使对农村居民的重新安置成为其反叛乱计划的基础。时任中央情报局驻西贡情报站站长的威廉·科尔比(William F. Colby)帮助促成政策向这种方向发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特种兵分队曾在越南中部高地的土著居民——“山民”(Montagnards)中试验推行乡村自卫和物质援助计划。科尔比鼓励吴庭艳和吴庭儒在村一级逐步推行他们自己的战略性计划，并建议他们与英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团长、曾参与过成功地控制了“马来亚紧急状态”(Malayan Emergency)行动的老军人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G. K. Thompson)会面。^② 吴庭艳和吴庭儒被汤普森的想法所吸引，对把军事行动和一个全国性的“战略村”计划结合起来越来越感兴

^① Madison, "S. R. I. Aide Offers Plan to Beat South Viet Nam Reds." 关于斯塔利就联合国问题提出的建议，参见 Staley, "Tak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New Countries Out of the Cold War", Staley Papers, box 3, IIIA.

^② Gibbons, *U. 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104.

趣。基于其在英国殖民地军队中与马来亚华人叛乱分子作战的经验，汤普森指出，一个游击队之所以强大，其原因首先不在于其军事实力，而更多地在于其有能力在乡村地区争取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并有能力建立向其提供情报、补给和人力的网络。他认为，为了击败越共，吴庭艳政府必须攻击革命的基层组织。^①

汤普森指出，这种工作应该通过一个互有交错重叠的阶段加以推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一个阶段包括，“清剿”与一个已经实现安全的地方的相邻的地区，并“投入大量军队和警察力量。这将迫使叛乱组织要么在这一地区内疏散开来，要么有可能撤退到仍然处于他们控制下的邻近地区”。但汤普森也警告说，警察和军队的行动不能“扫荡”完一个地区后就离开，而让叛乱分子再回来。他们还应该发起第二个、也就是“巩固”阶段的行动，其目标是“在一个地区内恢复政府的权威，建立稳固的安全体制”。^② 他解释说，马来亚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那里的战略村计划被证明是如此有效。他告诉吴庭艳，战略村计划的关键要求是将当地农民和叛乱武装隔离开来：“最重要的是，各省首长和负责的军事指挥官应该充分理解成功的反共产党游击行动背后的观念，比如，要在人员上和政治上将游击队和民众隔离开来。我们必须使‘鱼儿’离开‘水’，然后‘鱼’就会死掉。”汤普森主张对农民实施迁移，使他们聚居在为数大约 1,000 人、更便于防御的村庄中。他认为这对防止叛乱分子获取必要的资源能产生关键的作用。新设的居民点在修建时必须由军队来守卫。一旦居民点四周布满壕沟、栅栏和竹尖桩，就需要正规军来组建、武装和训练村庄民团。军队还要监督、审查和管束老百姓，以确保“村庄内的地下叛乱组织被清除得

① Senate,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2:139—10.

② Thompson, *Defeating Communist Insurgency*, 1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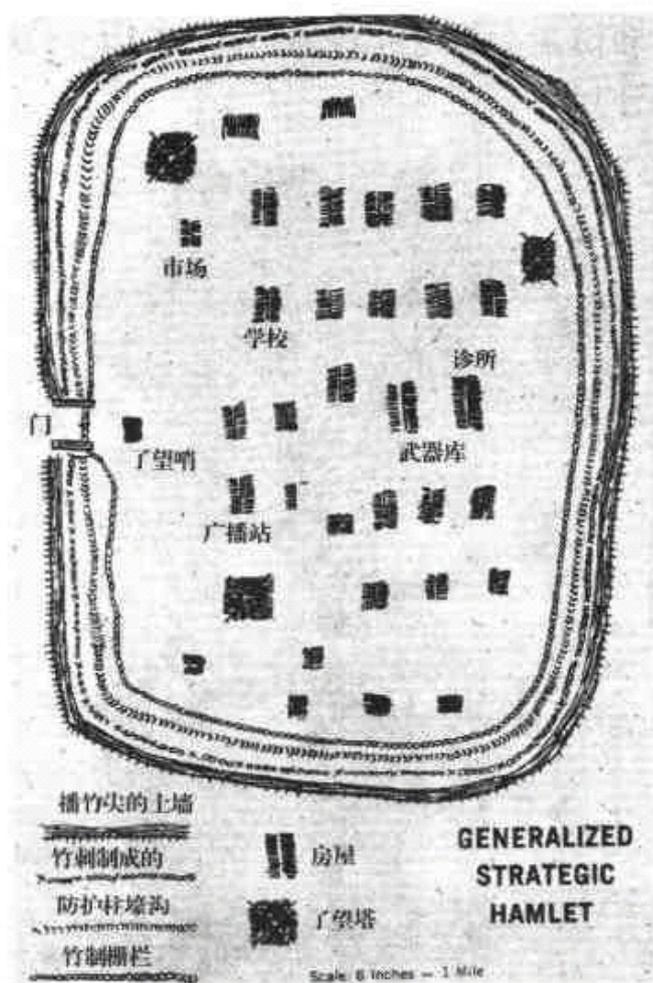
干干净净”。^①



美国的反游击战专家指望战略村的铁丝网能把越共游击队和人民隔开，使之成为无水之鱼。而且在现代化理论的指引下，他们还寄希望于战略村成为“现代性”茁壮成长的肥田沃土。

在完成了对农民的迁移并将他们和游击队隔离开以后，政府就可以进入第三个阶段：“赢得”农村民众。建设学校，开掘沟渠，整修道路，提供化肥、种籽和牲畜，这些做法将“给人民这样的印象：不仅政府现在正在为人民的利益而采取行动，而且它还在推行长远计划，这说明它希望留在这里不走”。汤普森相信，这种心理影响将使听天由命的农民“把希望寄托在稳定上，并对未来产生期待”。这又将促使当地民众“为防止叛乱分子渗透而采取必要的积极行动”，并鼓励他们“提供清除残余叛乱分子所需的情报”。在农民阶级已经显示出对政府的忠诚之后，政府就可以开始推行“目标

^① Ibid., 12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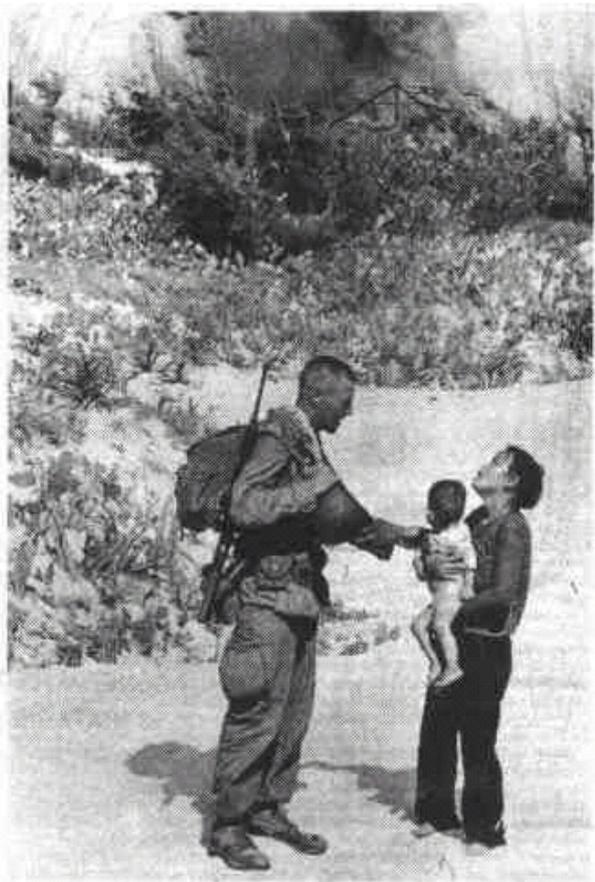
战略村图示

更宏大的自助计划”，并逐步取消对人口流动的限制。^①

汤普森在 1961 年 11 月向吴庭艳正式提交了他的计划，他称这个计划为赢得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汤普森向吴庭艳建议，由于目标是“赢得忠诚而不是杀死叛乱分子”，所以他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西贡以南的三角洲地区。这是一个双方仍在争夺的地区，农村人口众多，但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相对较弱。汤普森认为，他的办法最终会为一项全国性行动提供基础。在一定时期内，这个计划“将逐步向前推进，最后将开展对政府机器的重新组织，以使

^① Ibid., 112—13.

之有能力指导和协调全部反共行动,并产生一个新的针对全国的总体战略行动计划”。^①



实际上在推行“现代化”的社会工程的同时,美国人在越南也并没有放弃军事手段。越南战争期间的“封锁轰炸”展现了现代常规战争所达到的最高破坏力和残暴程度。美国决策者不仅相信轰炸有直接的军事效应,而且认为这能取得政治和心理上的收益,其中包括“使越共畏惧上帝”(美国一空军将领语)。图为一次轰炸后一名悲苦不堪的越南农妇。轰炸显然没能使越南的游击队和人民“畏惧”上帝,它只使人民更加仇恨美国。

汤普森的策略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赞成。特别是一些美

^① Senate,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2:140.

国军官，对其将“清剿和巩固”行动置于“搜索和破坏”的常规战术之上的主张颇为不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军事援助和顾问团(U. S. Military Assistance and Advisory Group)一直在训练南越军队打常规战争。虽然肯尼迪政府已将反叛乱和发展理论结合起来，但许多军官仍然认为他们应该在越南采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的那种战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泽尔将军尤其打心眼反感汤普森的想法，他写信给肯尼迪的顾问马克斯维尔·泰勒，敦促他阻止这套方案被纳入政府计划之中。兰尼泽尔和其他军官坚持认为，形势太危险，无法尝试以战略村为基础的长期性策略。他们声称，赢得战争的方式只能是集中火力、加强南越军队、尽快地杀死越共使之来不及补充兵员。这些军人还说，只有通过消耗战，而不是村一级的反叛乱，才能最终确保胜利。¹¹



美国轰炸后的废墟

虽然位高权重的美国军队将领坚持主张采用更常规的战略战术，而且在实战中也贯彻这种主张，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地压制后

11. Ibid., 2, 110-11; Buzzanco, *Masters of War*, 119-20; Gibbons, *U. 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105-6.

来很快就变成战略村计划的方案。汤普森的计划已经在保卫英帝国的过程中被采用过,而且它完全符合肯尼迪政府对自己在越南面临的挑战的看法。在1961年底,中央情报局曾警告说,尽管民族解放阵线组织“希望从河内得到政治和军事指导以及各种形式的支持”,但他们“在人员补充和供给方面仍然能大体上依靠自己”。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情报评估报告称:“越共的食品都取自当地,其中有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也有从乡村中征收来的。通过对他们控制下的地区征税、抢掠和敲诈,他们能够获得所需的大部分货币。……许多地区的居民向越共提供食品、掩护和行动支援,有些情况下是出于自愿,有些情况下是威胁和强迫所致。”^①由于民族解放阵线是一个依靠农村民众才能保持活力的组织,所以,如果将农民和游击队隔离开来,就能打破支撑着叛乱的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因此,汤普森的这类计划看起来极具战略价值。

汤普森那种具有鲜明英帝国色彩的战略也符合美国自己在菲律宾的历史经验。肯尼迪总统任期开始之初,罗斯托曾向腊斯克建议:“像麦格塞塞的那种反游击战措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一方面在欠发达国家提出有吸引力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另一方面要通过残酷的教训使农民接受这种观念,即中央政府的统治是未来的发展方向。”^②罗斯托解释说,20世纪50年代初,在菲律宾成功地对农村居民实施重新安置计划,以民团武装对付胡克起义,这些都

^①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53-2-61, October 5, 1961,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box 7, “53, South Vietnam”, LBJL.

^② Memorandum, Rostow to Rusk, January 6, 1961, POF, box 64a, “Rostow, 11/61-2/61”, JFKL (emphasis added).

预示着在越南的取胜之路。^① 尽管鼓吹现代化的人从来不直接承认这一点，但汤普森的建议与美国自己历史上久已有之的一个计划确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历史学家斯图尔特·米勒(Stuart Miller)指出，在1901年和1902年，为镇压菲律宾人反对美国殖民统治的起义，美国军官自己就曾向那里施加过“残酷的教训”：“老百姓全部被赶进集中营，而集中营的四周是……‘死亡线’。在集中营以外，所有的东西都被毁掉了——人、庄稼、食品铺、畜禽、房屋和船。”^②肯尼迪政府虽然没有明确号召进行这种全盘的破坏，但是它采用和推行那种糅合了重新安置和暴力的政策，确与当年在菲律宾的做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旦在一个地区完成“清剿”并建立了战略村，则那些抵制政府的监视和控制的人就都不再被认为是单纯的农民。他们就会成为叛乱嫌疑分子，并成为强大火力的目标。

对于那些已经把推动现代化和社会工程看成是反叛乱的有效武器的人来说，汤普森的“巩固”和“赢得民众”两个阶段使他们很感兴趣。在1952年至1953年，白鲁恂受雇于美国政府前往马来亚进行实地调查工作。在马来亚联邦警察部队的协助下，他对60名“敌方投降人员”进行了访谈。人们之所以去参加共产党叛乱，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号召力，也不是因为他们从共产党那里分得了实际的物质利益。以白鲁恂之见，马来亚华人参加叛乱是因为叛乱满足了他们的这样一种需求——“在高度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找到)稳定的因素”。西方的影响反映在多方面，包括城市的兴起、新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变迁、工业的兴起，而这些

^① 尼克·卡拉瑟曾指出，罗斯托等谋士并没有认识到，麦格塞塞不仅用这种计划来对付叛乱，而且也成功地以此来“操纵”美国人。参见 Cul-lather, *Illusions of Influence*, 102-3。

^② Miller, "Benevolent Assimilation", 208-9。米勒还指出，西班牙在古巴、英国在布尔战争中也曾利用类似的手段来打殖民战争。

变化同时也动摇着古老的、“传统的”亚洲式生活方式，不断激发起人们的期望。在这样的过渡进程中，“大多数人正在一点点地放弃他们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认同，并在惶恐中追寻着现代的生活方式”。而就在此时，马来亚共产党出来提供了一种力量，使迷惘的人们得以“控制住他们的欲望”。白鲁恂宣称，科层结构、组织化、个人升迁的可能性、革命纪律的约束，这些都使得投向共产党的人相信“在党内系统中他们可以找到付出和回报之间的一种更紧密的关系，而这是他们在静止僵化的传统社会中找不到的，也是他们在变化无常、前途莫测的新社会中找不到的”。^① 他断言，乡村地区的叛乱分子之所以卷入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出于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民族主义思想和种族观念，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变得现代。

沃尔特·罗斯托对革命浪潮席卷之下的“欠发达”越南的农民也进行了分析，其要旨与白鲁恂关于马来亚的观点相去不远。在1961年10月他和马克斯维尔·泰勒对西贡的访问中，罗斯托也安排对被俘的游击队员进行访谈，以期从中找到他们加入共产党一方的原因。和白鲁恂一样，他也看到了“那些第一次为超越家族和村庄的现代组织结构所吸引——同时也发现了其中不同程度的令他们满意和失望的地方——的欠发达地区的年轻人”。^② 罗斯托指出，那些变成游击队员及游击队的同情者的流离失所的农民，并没有接触多少马克思、列宁、甚至胡志明的思想。他们并不持有的一种关于越南是一个统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观点，也并不企望重新分配当地的财富和权力，甚至也不试图去使吴庭艳政府不再胡作非为。他们只是希望成为一个更大、更现代的制度的一部分，他们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他们在越共那里看到的组织结构上。

^① Pye,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3, 7.

^② Rostow, *Diffusion of Power*, 273—74.

这些访谈在监狱中进行，受访的战俘都是由政府挑选的，存在着抽样规模不足的问题，而受访者就其政治信仰的表述的真实性更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但就是白鲁恂和罗斯托获得的这些“证据”被用来证实一种世界观，而汤普森计划之所以被采纳和扩充，又正是这种世界观起作用的结果。既然迷惘的、“过渡中的”农民阶级参加革命组织是为了获得现代的成就感和进步感，那么，以有号召力的政府取代发动叛乱的革命者就成了击败共产党的关键所在。而且，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扩展到地方基层，由此为农民提供参与政府运作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建立对国家的归属感。白鲁恂指出，马来亚的问题仅仅在于殖民地国家的构成不够广泛。他写道：“的确有超过70%的受访者都表示，他们认为殖民当局与马来亚的华人之间完全是隔绝的。政府只在距离遥远、范围有限的地方活动，他们并不能理解政府的行为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对他们来说，一个中央政府——它能有效地、经常性地照料最大多数人民的福利和活动——的概念完全是陌生的。”^①白鲁恂表示，如果政府能够使他自己的作为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成为村民们寄托其希望的对象，并在治理的过程中使人民直接参与进来，那么，叛乱就会失去其作为一种通向现代性的道路的吸引力。肯尼迪的越南问题特别小组在1961年指出，问题在于“将越南的农村居民纳入国家政治实体当中”。^②

肯尼迪政府及其社会科学家顾问们就是这样来考虑反叛乱问题的。他们把吴庭艳的试验和汤普森的一套想法变成了关于意义深远的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战略。肯尼迪政府决心要扩展国家政权的权力范围，为此建议向流离失所的农民灌输新的政治文化，以

^① Pye,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201-2.

^② Memorandum, Sterling Cottrell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ay 9, 1961, NSF, box 330, 'NSAM 52, Vietnam', JFKL.

自下而上地建立一种南越特有的民族主义。白鲁恂在其向国际开发署顾问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着“合法性”、“渗透”和“参与”的重大危机。他们有必要确保对民众的控制,并通过使民众积极介入政治进程而取得他们的支持。^①肯尼迪政府最终形成了对战略村计划的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它可以提供对争取群众支持和赢得战争所必需的制度体制。美国官员和策士们的期望是,“传统的”农民将能够被改造成“现代的”公民。



美国顾问对南越军队进行训练,但南越官兵一般很少在战场上使用美国老师教给他们的战术和技术,因为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更有效地避开越共武装或者如何更快地逃离战场。

而且,许多政策规划人员认为,在越南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推展这一进程所需的适当手段。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南越军队

^① Py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Aid", November 1963, Bell Papers, box 23, "AID's Advisory Committe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ason Committee), 1963—1964", JFKL.

就受命执行“爱民行动”计划下的各项任务。据报告,仅在1959年一年时间内,就有4,000名南越士兵修筑了152座桥梁和274公里的森林公路。美国对这些军队进行训练并提供给养,希望他们能帮助推进现代化进程。通过向那些敏感而具有可塑性的农民展示新的积极有为的思想观念,以及“现代的”组织和科层制度,南越军队可以在地方基层推进社会变革。专家们相信,与现代军事力量的联系交往将推动村民采取自卫手段,而且也将促使他们认同于超越其乡村生活的、更广泛的全国性政府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爱德华·西尔斯、丹尼尔·勒纳等社会科学家进行的研究把土耳其等国挑选出来,奉为迅速、持久的“军事现代化”的成功案例。肯尼迪政府的官员们相信,战略村计划将产生类似的影响,将击败发生在越南的这场革命。^①

国务院的情报头目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本来毕业于西点军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后来又在耶鲁大学被培养成一名政治学家。他的思想框架与西尔斯、勒纳、白鲁恂和罗斯托如出一辙。希尔斯曼在1962年1月被派往越南,在那里他也对英国那种以社会工程为基础的作战计划很感兴趣。他在西贡和罗伯特·汤普森见了面,又亲眼看到常规军事行动的一连串失败,这使他相信有必要找到一种通过破坏叛乱分子和农村民众的关系而打击叛乱的办法。他发现,南越的轰炸及其步兵的攻击得不偿失,因为这些做法杀死了无辜的村民,破坏了民众对

^① Smith,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1: 183-84. 关于“军事现代化”的理论文献,参见 Shils,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tates”; Lerner and Robinson, “Swords and Ploughshares”。关于美国政府的观点,参见 unidentified author,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prepared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Policy Planning Meeting, January 29, 1963, Thompson Papers, box 6, “Department of Stat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1/63”, JFKL.

政府的支持,在没有抓获革命者之前就赶跑了民族解放阵线武装。他对这种情况深感失望,同时也比以前更加相信只有把军事行动和政治进步结合起来才能有成功的战略。^①

遵照肯尼迪的指示,希尔斯曼在1962年2月着手将战略村计划界定为政府的“关于越南的战略构想”的基础。他指出,战略村可以被纳入一项更全面的建国路线。和汤普森一样,希尔斯曼强调:“争夺南越的斗争归结起来无非是一场争夺对村庄的控制权的战斗。”只有“割断越共获取力量的当地命脉”才能取得胜利。为了阐明把村民重新集中到“一个紧凑而便于防御的地区”的办法,希尔斯曼也详细规划了一个示范性的居民点。他解释说:“每一个战略村都由壕沟和铁丝网环绕起来。其中还包括一个以上的瞭望塔、前缘哨位和保护中央武器仓库的岗哨。……战略村的周围都要被开辟成空地,作为开火区;而接近这片空地的地方要布满机关(竹尖桩、陷坑和爆炸物等等),还要派人驻守。”除了这些有形的障碍,还要准备“战地电话和预警系统”,并组建“75人到100人的民卫队(Self Defense Corps),给他们配备卡宾枪、冲锋枪和手枪”。所有这些,使希尔斯曼构想中的战略村看上去简直是坚不可摧。而且,居民点里的瞭望塔不仅是对着战略村外面的,而且要监视和管制村里的生活。除了能够抵御袭击外,民团的自卫巡逻队还将在政府的正规军的协助下承担其他任务,包括“实行宵禁、检查身份证件、搜查共党中坚分子”。^②

希尔斯曼还认为,南越政府必须通过提高群众的福利来赢得

^① Rust, *Kennedy in Vietnam*, 67-68. 白宫幕僚布拉贝克(William H. Brubeck)向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也提到汤普森在1962年初对华盛顿划时代的访问,并建议肯尼迪在1963年春天和他会面。参见NSF, box 197, “Vietnam, 3/1-3/19/63”, JFKL。

^② Hilsman, “A Strategic Concept for South Vietnam”, February 2, 1962, Hilsman Papers, box 3, Vietnam, “Strategic Concept”, JFKL。



美国在越南并非不重视争取越南人的人心，“爱民行动”就是为了树立美军和南越政府军“仁义之师”的形象。图为一名美国军医在为一名南越农村儿童看病。

整个农民阶级的“人心”。将医疗人员和教师纳入拟议中的“爱民行动”(civic action)小组,就可以显示国家是真正关心人民的生计的。然而,在希尔斯曼看来,战略村不仅能够将游击队和农民隔离开来,并为吴庭艳政权树立一个更好的形象,除此之外还会有更多的收效。战略村能够激起民众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能够在曾经消极冷漠的农民和南越政府之间产生亲和感。他指出,“爱民行动小组”是“消灭越共的最重要因素”,因为“爱民行动小组”将建立起“实质性的社会政治基础”。由于“叛乱是一个政治而非军事问题”,所以,在政府和农村民众之间建立一整套新的纽带就成了“第一原则”。他期望,公共管理工作“将建立乡村政府,并将其纳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这样就可以确保将村民的要求和困难上报上级政府,同时向下输送上级政府提供的服务”。希尔斯曼希望,将农民编入民卫队,继续扩大吴庭艳组织起来的有 30

万人参加的青年运动,这两项措施都将加强村民和国家之间的联系。^①

希尔斯曼虽然没有使用白鲁恂关于农民的动机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那套术语,但他显然与后者持有一系列相同的潜在文化假设。一旦处于现代化阵痛中的农民意识到政府愿意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他们就有望参加到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典范的地方政治进程中,从而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权利。当国家的眷顾到达农民身上、农民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他们就会承担起作为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并积极保卫他们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利益。原先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乡村中孝敬长辈的“传统”观念将无法继续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忠于南越国家的“现代”情感。希尔斯曼等战略家相信,一旦促成了这种变革,越共就将失去所有的机会。^②

随着“日出行动”在1962年3月后开始执行,实施战略村计划也进入了系统的实施。这个开端并不顺利,“日出行动”在西贡以北的平阳省实施,但该省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民族解放阵线手中。汤普森曾极力主张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开始实施战略村计划,然后再逐步向其他地区推广,以防止叛乱武装重新集结起来。然而,之所以选择从平阳开始,是因为美国希望这个地方能让美国取得一个惊人的胜利,也因为吴庭艳的目标是保卫首都附近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的地区。^③ 在南越军队为驱除越共而席卷这一地

① Ibid.

② 一些官员是如此热衷于希尔斯曼关于世界形势以及美国操纵世界的能力的看法,以至于激动得不能自己。美国新闻署官员爱德华·马罗(Edward R. Murrow)在读了希尔斯曼的“战略构想”一文后,给希尔斯曼打电话,说他“要向上帝发誓,(这是)许多个月来他第一次……读到这样的章句,如此智慧而又锋芒不露。……在读前三页的时候像是久旱之逢甘雨。”Hilsman, Memo to File, April 25, 1962, Hilsman Papers, box 3, “Vietnam, A Strategic Concept for South Vietnam, 2/2/62”, JFKL.

③ Senate,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2:129.

区的同时，国际开发署的分支机构美国行动代表团(United States Operations Mission, USOM)向迁居的农民提供了30万美元(大约每户21美元)，以补偿他们的财产损失，并为爱民行动小组提供药品、身份证、化肥和农具。美国新闻署也不甘落后，它分发了一种专门印制的小册子《向着美好生活前进》。在军事扫荡完成后，在1962年3月22日启动了迁移和集中的工作，地点在边葛地区，一个为越共所大举渗透、周围布满橡胶园和森林的地区。有70户同意搬走，另外的140户则是在枪口下被迫迁移的。所有的搬迁户都被迫修筑新的住房，还要挖沟筑墙，以保护羽翼未滿的战略村。南越士兵还仔细地烧毁每一处旧的住房，以阻止农民回去居住。成效并不显著。1962年5月，政府控制的西贡报纸承认，在行动开始六个星期之后，在该地区38,000名居民中只有2,769人被迫或自愿地实现了永久性的重新安置。到了7月，民族解放阵线也显示了农村民众并没有背弃它：它的游击队员在村民的支持下成功地伏击了一支有11辆汽车的南越政府军巡逻队。村民们阻断了道路，使政府的增援部队无法到达出事地点。^①

人们可能以为，既然战略村计划的开端如此不祥，那么，即使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也该停下来考虑一下这个计划究竟有多大的胜算。但是，在一种被无休止地加以重复的观念体系当中，战略村的观念本身，以及其背后深层的意识形态假设，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无可辩驳的。美国政策规划人员坚持认为，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合作和管理。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循序渐进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选择恰当的地点和合适的人选，提供充分的资金，则必定会有收效。美国人坚信他们的国家有能力发动广泛、进步的变革，而现代

^① Fall, *Two Viet - Nams*, 376-79; Memorandum, Sterling Cottrell to Special Group (Ci), March 22, 1962, NSF, box 319, "Special Group (Ci), 1/61-6/62", JFKL.

化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美国人的这种强烈的自信心密切相关。而正是这种现代化思想使得美国决策者和战略家认识不到那些对战略村计划的有效性构成挑战的明显事实。在致国务院高级官员埃弗雷尔·哈里曼的备忘录中,罗杰·希尔斯曼只讲“日出行动”的成绩,完全忽略了它的失败之处,描绘出一幅令人满意和振奋的图景。他报告说,吴庭艳已经加强了他的“爱民行动部”,新设了一个专门的“跨部门战略村工作委员会”,并批准了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推行战略村的“绥靖计划”。他还厚着脸皮大胆预言:这种战略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被成功实施,起到保护村民和粉碎叛乱的作用。^①

1962年年中,美国还建立了一整套组织系统来管理和辅助战略村计划在南越全境范围内的推行。受前中央情报局特务、兰斯代尔在菲律宾的秘密小组成员鲁弗斯·菲利普斯第三(Rufus Philips III)的影响,美国行动代表团在南越的每一个省都设立了乡村事务办公室和“复兴委员会”,以此来把它那宏大的建国计划和农村反叛乱结合起来。复兴委员会由负责该地区的美国军事顾问、美国行动代表团驻该省的代表、南越省政府的首脑组成,主持在各自地区实施战略村计划。在计划和预算被批准后,马上就建立一笔专用款项并送到南越省长的手中。然而实际的开销始终要经过各省复兴委员会中的两名美国委员的同意。然后,在征得美国军事顾问和经济援助顾问的同意的前提下,南越的省长就会召集其下属地区的首长来开会,指示他们在村民中进行选拔,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充当主持修建战略村的干部,并从中招收地方官吏和民兵。南越政府设立了一些专门地点来训练这些当地应征人员,

^① Memorandum, Hilsman to Harriman, April 3, 1962, Hilsman Papers, box 3, "Vietnam, A Strategic Concept for South Vietnam", 2/2/62. JFKL.

这些人在训练结束后分成小组，各小组在一名来自省爱民行动办公室的官员率领下被派往各地。这些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关于已在迁移计划中的人们的情报，也参与制订社会和经济计划，组织农民参加具体工作，并向群众宣传迁移到新的战略村去的必要性。^①

为了支持这些行动，国际开发署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资金。在1963财政年度，国务院的东南亚工作小组建议给“强调直接向乡村分配物质利益”的村庄计划拨款8,760万美元，并赞扬国际开发署把重点放在农村的绥靖行动方面。一份形势报告指出：“前一年战略村计划下的分支计划都由中央政府操作，利益逐级向下分配。但新的计划与此相反，它强调通过非集中化的机构将经济、社会和安全方面的利益直接输送到农村部门。”该报告建议将当年新增资金的93%投入对反叛乱的协助和直接物资投入，并断言“村一级和地区一级的计划直接改变了农村生活。”^②当该财政年度在1964年6月结束的时候，除了提供价值21,5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服务和给养外，国际开发署还提供了8,200万美元的建筑材料、医疗

^① Tanham, *War without Guns*, 24-27; O'Donnell, "Strategic Hamlet Program in Kien Hoa Province", 711-18;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ve History 1963-1969*, vol. 1, pt. 1: 391-92, LBJL. 国际开发署的记载显示，对在省一级推行反叛乱的强调导致了一场部门冲突。国际开发署有的人主张把他们的工作范围限定在经济援助的技术性事务方面，而另一些人则强调全面综合的社会工程。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开发署在政治和财政上都对反叛乱工作予以重点支持。参见 *Indochina Terminal Report, Vietnam*, July 12, 1976, AIDC.

^② State Department Task Force, *Status Report on Southeast Asia*, August 8, 1962, Vice - Presidential Security File, box 1, "Vice President's Visit to Southeast Asia (II)", LBJL.

设备、学校设备、牲畜、农药和食品,用于支持战略村计划。^①“直接改变农村生活”的思想渗透到制度规划和财政拨款当中。许多政策制定者认为,美国的资源一定能改造一个变革中的传统世界。

尽管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在战略村和爱民行动计划的设计中,希尔斯曼提出的把安全措施和爱民行动结合起来的主张还是在总体上被体现了出来。情况通常是,南越政府派出由十到20人组成的“乡村重建”工作队到农村地区,对当地民众进行调查,并经常为每个村都绘制出一张摄影地图,上面标明各个农户与民族解放阵线的关系、土地所有权和农户的住址。工作队把村民分为劳动小组,为他们制定工作日程,安排他们为新的战略村修筑堡垒。官吏们把战略村外围的农户迁到村内,甚至干脆毁坏他们的房屋;然后给这些搬进战略村的农户分一小块地,让他们在上面建立新家。除了在居民点周围安装铁丝网外,村民们经常在村庄四周还要挖掘壕沟,修筑防护墙,放置竹尖桩。官吏们还组织起战略村民兵和民卫队,人数从5名到12名不等,从志愿者中征召,如果需要也会抓壮丁。如果政府将“自卫武装”派往地方首府接受训练,也可以向村民们分发武器和装备。^②

政府还通过建立内部防御机制来补充对外防御,将战略村居民置于严密的监督和无情的人身控制之下。在许多地区,还向农民分发身份证,并给每一户居民照相。这些照片有时被钉在农户家中,当地政府的管理中心也保管着另外一套照片。白天农民们到附近的田间劳动,但是政府也建立了夜间的宵禁制度,那些违反宵禁令的人很可能被就地射杀。如果农民从其他地区来到一个战

^①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nited States Assistance to Vietnam." August 1964, Lansdale Papers, box 27, "U. S. Aid to Vietnam—Misc.," HIA.

^② Nighswonger, *Rural Pacification in Vietnam*, 99—100; Donnell and Hickey, *Vietnamese "Strategic Hamlets"*.

略村，他们就必须向这个战略村的管理中心报告自己的情况，以取得一张正式的居住证明。如果他们想离开一个战略村，他们也必须通知当地官员，向他们详细说明自己的计划，而且须经许可才可以离开。走亲串户的人如果要过夜，还必须在当地政府或警察机关登记。^①可笑的是，要成为南越的“现代公民”，就得失掉个人的自主和自由。农民要想成为南越国家的国民，就得接受成熟的“理性”制度下的严刑峻法和警察机构。用詹姆斯·斯各特(James Scott)的话来说，这种统治策略将加速“由没有国家(state)的状态到有国家的状态的剧烈转变”。一旦在规划出的定居点中将农民重新集中起来，以前的社区就会被打破，然后就开始“从下面和外部”建立起新的社区。更有甚者，那些故意留在官方的监督、指导和控制之外的人就都成了罪犯，成了必须被消灭的危险分子。^②

考察越南农民如何对这些计划做出反应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许多历史著作只是概略论述了战略村计划，对其日常运作的情况进行详细考察的著作并不多见。倒是一些美国政府支持下的研究对战略村的叙述比较详细。但是，这些研究也显示，美国观察家对事情的解释经常是从一种高度同情美国的现代化使命的立场上出发的。该计划遇到麻烦时，他们就会推测说，问题出在执行和管理层面上，而不该是观念的问题。兰德公司曾以隆安省规模较大的德立(Duc Lap)村为案例对战略村进行了一项研究，认为战略村有可能被搞得一塌糊涂。该研究报告指出：“村庄的整体情况将要

^① Memorandum, author unknown, Rural Reconstruction Efforts, Operational Guidelines, 1964, Lansdale Papers, box 23, "Vietnam Conflict, 1961—1965, Pacification, Binh Dinh Provinc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Administrative Cell," HIA; Memorandum,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lta Counterinsurgency Plan, January 1962, Hilsman Papers, box 3, "Vietnam, 1/62 2/62", JFKL.

^②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188—89, 191.

发生剧烈的变化。人们从他们在周围地区的家园中被重新安置到新建起来的德立 A 村和 B 村。在战略村计划实施以前,每一个村落中只有四五户居民,在该计划完成后,德立 A 村和 B 村分别都有超过 200 户居民。……大量居民已被迫迁移到战略村。”而且,有些村民还没有认识到这些变化会给他们带来利益。对于一些“顽抗的”的个人,“将不得不采取强迫或者威胁手段,而这样做当然不会提高政府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该报告表示,政府没有能够发挥它已经建立起来的规模更大的组织和制度结构的重大优势。这一失败也使顽固的农民受到来自南越军队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双重严重威胁。政府支持下的民兵组织的一名指挥官指出:“我们已经警告过他们:夜间在村外是不安全的,如果他们留在外面不回来,我们就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如果外面向我们开火,我们就必须开炮还击。”^①当村庄里面已经成了集中营的时候,村庄外面也成了无人区。于是乎现代化的学说和政策就显得不仅仅是目光短浅的问题了,它也成了要人命的玩意儿。

兰德公司的分析家把有时给农民添麻烦的战略村计划和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联系起来。政府官员强迫农民筑墙挖沟,强迫他们承担建造铁丝网和修碉堡用的水泥的费用,强迫他们放弃丰产的稻田。在西贡附近的一个战略村,农民从 12 月中旬开始一直到第二年 3 月中旬都要不停地服劳役,只在 2 月初的春节休五天假。农民们无法投入足够的时间种庄稼,又经常被勒令交纳供战略村防御工事所用的竹材,这使得许多村民背上沉重的债务。政府官员还经常贪污按规定应发放给农民的重新安置补助金。两位社会科学家——达特默斯学院的约翰·唐奈尔(John Donnell)和耶鲁大学的杰拉尔德·希基(Gerald Hickey)曾为兰德公司搞了一次调查,其中就显现出了这些问题。在他们访问的一个村庄中,

^① Pearce, *Evolution of a Vietnamese Village*, 40 - 41.

两人发现“该地方的一个头目声称已经向每个迁居户支付了1,000 披亚斯特(约合 14 美元),而且也已留出时间让他们来收拾自己的房屋,但是农民们却都否认曾经收到过这些补偿”。^① 鉴于给农民的补偿被拖欠、拒付、贪污,而农民们却在糊口线上苦苦挣扎,美国观察家指责南越政府无法完成必要的改革来加速现代化。农民们感觉不到扩大政治参与和认同于民族国家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物质和精神上的好处,所以他们既不在乎什么公民权,也不反对越共。

虽然出现了这些明显的弊端,但战略村计划的支持者们还是相信:爱民行动和新的政治文化的建设能够提供必要的制度框架,进而争取到迁居民众的忠诚。唐奈尔和希基指出:“在这种计划的推进过程中,某种程度的不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只要能有效地组织安置人民的工作和建设战略村的工作,而且,如果越南政府能坚持贯彻它的保证,在这些农村地区重建和扩大日常管理业务以及经济建设项目,那么,群众的这种不满就不足以对政府构成严重的政治问题。”^② 许多人认为,组织地方民主选举,以及向战略村的居民提供满足其“迫切需要”的物质帮助,将扭转战争的局面。国际开发署的鲁弗斯·菲利普斯认为:“战略村计划的中心含义是:通过公民自治的制度,人民将把他们的政治利益寄托在他们自己的村庄之上,并最终寄托在中央政府之上,认为它值得去保卫。”^③ 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看来,农民的抗议不过是对变化频仍的状况的一种暂时的反应,而全部南越人最终都将认识到这种状况是美好的,是他们所期盼的。

① Donnell and Hickey, *Vietnamese "Strategic Hamlets"*, 11—15.

② *Ibid.*, 16.

③ Philips, *Report on Counterinsurgency in Vietnam*, August 31, 1962, Lansdale Papers, box 49, "Vietnam, General, 1961—1963 (2)", HIA.

战略村计划的鼓吹者坚持认为,在历史上僵化停滞的、政治上与世隔绝的、总体上愚昧无知的民众中建立地方民主制度,将使战略村计划赢得他们的衷心拥护。甚至一个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小组在1963年初访问了越南后也加入到战略村支持者的行列:“历史上越南的中央政府的统治并没有到达基层,农民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同样地,据我们所知,农民也并不将他自己、他的活动和他的前途与政府联系起来,而且农民也不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然而,民主选举的制度和国家支持下的自助计划看来会改变这一切。这个调查小组解释说:“在选举出村长和村议事会后,这些新任的官吏自己就会对提高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做出决定。通过这些‘草根’计划,就可以逐步建立民主政治进程的框架。政府的确希望把民主选举从乡村一级扩展到地区一级和省一级,而现在地区和省级官员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①在美国的鼓动和资助的驱动之下,一种最广泛的民族国家建设事业如今被推广到了东南亚的丛林和稻田里,而这一进程起源于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而且是在那里发展到了最高水平。由于这一进程能够改变一名美军上校所说的当地人“头脑僵化”的状况,^②所以美国希望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实施改造,最后改造整个政府机构,由此就能使一个麻木不仁、文化落后的民族实现现代化。

关于村级选举和自助计划的实地调查报告不断发现问题。但并不奇怪的是,这些报告的作者们把责任推到具体负责计划实施的南越人身上。中央情报局发现,在南越某省,当局就一个战略村行政委员会的选举提出报告,并提交了新任官吏的名单。但是,“调查显示,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并不知道有过什么选举,不知道他

^① Report of Visit by Joint Chiefs of Staff Team to South Vietnam, January 1963, NSF, box 197, “Vietnam, General, 1/10-1/30 ‘63”, JFKL.

^② Huppert, “Bullets Alone Won’t Win”, 39.

们要为委员会工作，也不知道他们的职责是什么”。^① 吴庭艳政权垮台后不久，美国新闻署曾于1964年初完成了一次调查。关于这次调查的报告也认为，所谓民主革命的前景并不看好。佛教徒声称天主教官员操纵了选票的发放；一名获胜的村长候选人被迫放弃这个职位，因为一名地区官员说他不称职。而最重要的是，“只有不到一半的法定选举人”参加了投票。^② 这些报告指出，南越政府并没有认真地或者有效地使基层民主制度发挥作用。美国政府在对战略村“自助”计划的评估中也指责南越官员，认为他们没有能够促进共同讨论共同做决定的方式，从而没有能够使民众获得应有的权利、采取合作和支持的态度。一位前美国新闻署官员回忆说：“这些计划被认为是符合战略村居民的想法的，是他们在公开的村民会议上经过讨论而选择出来的。”然而情况往往是，只有在“做安抚工作的干部再三对计划予以说明”后，才能对计划予以起草。在这种情况下，有时自助计划会被“各类掌管具体事务的头目所‘操纵’，因为他们想要突出自己的计划”。在一个地区，最初的60个计划中有40个都要求建立会议室，但是“实地调查显示，过于热衷于此事的情报干部在此前已经对准备提出申请的人施加了影响，”以便他们取得“用以拉帮结派的场地”。^③

战略村的居民处于广泛的控制之中，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无时无刻不在监督之下。由此看来十分明显的是，无论最终做出了什么样的“民主”决定，这些决定都无法超越美国和吴庭艳政权所能容忍的范围，甚至有的“民主”决定就是在美国和吴庭艳政权的操

①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onymous field report, November 29, 1962, NSF, box 197, "Vietnam, General, 11/26 - 11/30/62", JFKL.

② U. S. Information Service, Village Elections in Kien Giang Province, April 1964, Fall Papers, box 29, "Vietnam - South -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JFKL.

③ Nighswonger, *Rural Pacification in Vietnam*, 168.

纵下做出的。然而,美国的政策忽视了在增进自由和建立强迫劳动的集中营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援助官员继续把战略村中的爱民行动看做社区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而在这个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已有的和新建的村庄中的人民都将感到自己全面参与了现代化进程”^①。美国行动代表团在1964年启动了6,200个自助计划,希望借此在1965年向近5,000个战略村提供资金,输入当地所匮乏的水泥、金属材料、水泵和机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行动代表团开始执行一项新计划,为13,000个战略村课堂训练所需的越南教师。^②许多美国官员相信,新建学校,并通过教育灌输新的政治理念,将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视野。美国官员希望,通过给农民提供设备材料,帮助他们修建学校、市场、猪圈、鸡舍、灌渠和水井——美国人假定他们参加投票就是为了这些,而且愿意为此义务出一——就会取得希尔斯曼所说的“巨大的政治收获”,包括使农民“获得选择的机会”、“培养出社区精神”。^③

战略家们强调,所取得的“政治收获”还将满足另外一种需要。它将使美国能够有力地驳斥民族解放阵线把美国描述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继承人的宣传。兰斯代尔的助手、中央情报局资深特工查尔斯·伯汉南(Charles T. R. Bohannon)向美国大使馆报告说,当年他雇佣的菲律宾籍密探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人“完全接受了……越共宣传的观点,即美国人现在已经取代了法国作为殖民帝国的位置”。这些密探还发现,农民们相信“美国人在地

^①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Counterinsurgency”, 326.

^②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try Assistance Program — Vietnam, Part III, December, 1964,” AID Historical Collection, AIDC.

^③ Hilsman, Memorandum to Record, December 1962, Hilsman Papers, box 3, “Hilsman Trip, 12/62 -1/63”, JFKL.

区一级和村一级的存在正说明越共的指控是实情”。伯汉南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复杂。他声称，只要加大宣传的力度，就能“向人民说清楚美国在越南国土上的行动和动机”。在各省更多地使用亚洲人，特别是菲律宾人，也是一个办法。因为他们“和越南人一样都有着黝黑的皮肤”，可以向越南人说明“美国援助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①

肯尼迪政府的战略家一方面受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考虑要以完全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利他主义的方式来推进民族国家建构的事业。现代化论者相信“肤色黝黑”的菲律宾人能够转达美国的真正意愿，希望自己能在法国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在他们看来，当地的民族主义和当地人民一样，都有着很强的可塑性。战略家们坚信，一旦南越人认识到他们的政府能够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和精神上的鼓舞，能带领他们取得实际的成就，社会工程就会胜券在握。菲律宾被认为是美国开明仁德的监护下复制美国模式的一个产物，那么，有哪个国家能比菲律宾更好地被美国用来制造“示范效应”呢？在现代化理论家看来，胜利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对美国国内公众的公开宣传也反映了一种与幕后的决策过程中的情况十分相似的意识形态建构方式。美国政府和媒体都不厌其烦地这样归纳战略村计划的本质：这是美国对一个为实现美国式现代化而在危难中苦苦挣扎的民族的帮助。虽然戴维·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和尼尔·希汉(Neil Sheehan)等新闻记者详细报道了吴庭艳政权一贯的残暴统治，但美国决策者还是强调，战略村计划证明了美国正在播下民主的种子，正在为民众对政府的支持打下基础。当《纽约时报》发表了哈尔伯斯坦的报道、告

^① Memorandum, Bohannon to John M. Dunn, January 13, 1964, Lansdale Papers, box 42, "Memoranda 1962-1964", HIA.



奔忙在胡志明小道上的多是越南农民,这很能说明当时越南的人心向背。胡志明小道所穿越的地段几乎全部是崇山峻岭。越南民族唾弃了美国的战略村和现代化,却在这里寄托了他们的希望,展现出追求民族独立和强盛的信念和意志力。

诉读者战略村计划无法阻挡越共时,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向肯尼迪保证说,这是记者们彻头彻尾的错误说法。他解释说,“严密的分析”显示,战略村的建设仍在向前推进,而且它“赋予社区居民以一种归属感”。即便是在“核心地区”,美国也成功地处理了发展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日本人和法国人所未能解决的”。^① 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也向公众作出类似的解释。他在1963年对一群听他演讲的纽约商人说,对“南越不是完全的立宪民主国家,以及南越浪费和滥用我们的援助”的抱怨不应该成为“无所作为的托

^① Memorandum, McNamara to Kennedy, September 21, 1963, NSF, box 204, “Halberstam Article, 9/63”, JFKL.

辞”。他强调指出，吴庭艳政府“自己独当一面的时间还不到十年”，“没有多少直接处理政治事务的经验”。但是美国方面正在取得进展。腊斯克举例说，“南越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经选举产生的小村的议事会，而且大村议事会的选举也即将举行”。进而他论证说，这说明南越“正朝着以大众支持为基础的宪政制度稳步前进”。腊斯克宣称，在南越的 5000 多个“通过秘密投票来统治”的村落中，生活着 700 多万渴望社会经济进步的人民。他这样说，是为美国越来越多地介入越南的战争寻找理由，意思是美国的国家使命要求它这样做。在他看来，美国并非在和—个压制性政权合作，即使这个政权把农民强行驱赶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居住的土地，强迫他们服劳役，还要控制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举—动。美国是在为南越提供指导，以使之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美好国家，而且美国是在帮助这个国家“在现代民族之林中占据受尊敬的地位”。^①

国际开发署署长戴维·贝尔(David Bell)也呼应腊斯克的观点，致力于为美国树立—种拥有推动现代化力量的公众形象，而美国所拥有的现代化力量将使它在越南的胜利似乎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他报告说美国的援助中包括“铁丝网、武器和电台”，并强调指出，战略村计划已成功地促使当地村民贡献出“人力、团结和能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意愿，来保卫他们自己”。贝尔在内华达州的一次集会上说，人们—向以为与世隔绝的农民“在政府军和游击队在稻田里作战时将冷眼旁观”。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村民们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提高生活水平的计划”之上，并拿起武器和民族解放阵线作战，显示了他们新的坚强决心。他还谈起自己与在越南农民中工作的“两个美国青年”的会面，宣称他相信美国的努力将会促使越南农民“越来越多地把希望寄托在进步和国家独立之上”，并使他们“击退越共”。他解释说，“在两年前”，南

^① Rusk, “Stake in Vietnam”.

越“对共产党几乎是唾手可得的果实”，但是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其自由完全有保障的国家，其经济独立的前景也清晰可见”。尽管斗争仍将是残酷的，但是在美国的鼎力相助之下，其现代化必将取得成功。毕竟美国已经把南越送上了历史性变革的康庄大道。^①

虽然许多美国军人仍然以鄙夷的目光看待战略村，但是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开始投身于这项事业，把这个计划看做是美国的变革力量的体现。陆军参谋长艾尔·惠勒(Earle Wheeler)将军告诉美国新闻机构说，通过提供“政治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会”，美国已经知道了该如何和“神出鬼没的敌人”作战。和吴庭艳一道，美国已经能保证该国“政府正在走近人民，而人民也在走近政府”。美国通过劝说南越实行乡村选举和自助计划而推动了民主进程，“美国的忠告”正在帮助农民实现那种已在西方出现过的“对更好的生活的期望”。而且，曾经是听天由命的越南人现在正在拒绝革命。他们受到美国人和美国价值观的鼓舞，开始“每天都在全国各地”和叛乱作斗争。以惠勒的看法，战略村既不是监狱，也不是实施管制和监督的所在，而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计划就是把现代性的丰硕成果带给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有一些东西值得他们去保卫”。^②

美国官员和将领的言论正好可以说明现代化学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发挥影响的。就狭义而言，并且将现代化作为一种有意识地加以利用的工具，那么可以说它被用来反映复杂事物的一个侧面。当腊斯克、贝尔和惠勒等人故意忽略一些残酷的事实(包括强迫迁移、强制劳作、严密监控等)时，他们是在

① Bell, speech to National Rural Electric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January 14, 1963, Moscoso Papers, box 10, "Speech Material 1/63", JFKL.

② Wheeler, Press Statement, February 4, 1963, Hilsman Papers, box 3, "Vietnam, 3/1 -8/21/63", JFKL.

按政府政策的精神行事。早在实施日出行动时,肯尼迪政府的反叛乱特别小组就曾警告说,如果“把农民从他们的家园连锅端到战略村中……美国的名誉就会蒙上恶名”。顾问们建议,为了避免留下错误印象,“美国人的工作队不要在重新安置运动中现身”。^①肯尼迪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都以此为统一口径。他们的公开言论使世人都相信美国正在推动越南的现代化,而且这些言论被用来帮助美国抵挡那些就具体行动的真实情况而提出的疑问。在这个层面上,现代化是一种工具,一种被用来树立一种形象、掩盖另一种形象的概念框架。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现代化理论所产生的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是,美国官员在利用现代化理论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自己和其他许多美国人所共同持有的、关于美国的力量的大众性文化假设。从美国当局的角度看,他们所表述出来的一整套思想,以一种有力的方式清晰地展现了广泛存在于美国人当中的一种本来不那么明确具体的观念。他们自信美国能够变革“发展中”世界,他们也表达了他们的这种信念。

大众传媒也把战略村解释为美国在东南亚推行现代化的善良愿望和强大能力的体现。在《纽约时报》曾刊发一篇关于日出行动的报道,文中的确承认当局勒令许多“不知所措的农民家庭”“收拾其家什”,强迫他们迁入新的居民点。但是该报也解释说,边祥(Ben Tuong)村的866户居民除了受到针对越共侵袭的保护之外,获得了“新的房屋、新的土地、自由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该报道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看法总结说,该计划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有意义的对游击队的进攻行动”。^②《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上的一篇文章对这个计划的描述更是热情洋溢,它认为这个计划“把军

^① Thomas Davis, Special Group (Ci) Meeting Minutes, April 3, 1962, NSF, box 319, “Special Group (Ci) Meetings, 1961-63,” JFKL.

^② “South Vietnam: New Strategy”.

事、经济和社会行动——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政治行动结合了起来,以对付共产主义的挑战”。该文章认为,迁居的农民“被鼓励利用空余时间自愿参加劳动”,而且被付给报酬。该杂志也强调南越政府计划向民众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这显然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官方的说法。在美国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被铁丝网和竹尖桩围起来的村落将成为培育新文化的摇篮。战略村将在“农民中间促成一种公民意识”,是“为击败游击队并将他们驱逐出南越的第一次系统的努力”。^①



美国和南越士兵强迫下的迁居和“重新安置”

几年后,《时代》周刊也响应这种论调。它用一个沿海村庄怀美(Hoaimy)的情况作为依据,来反对如下观点:“西方实际上没有什么能提供给这些贫困而惊恐万状的农民,而只有越共知道该如何接近越南的村民。”该杂志解释说,这个有16,000人的怀美村“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一个处于停滞状态的村落,这里的人从不问“山那边和海对岸的世界有什么,除非外面有他们村里生产的稻米

^① Martin, “Latest Report from the Front in Vietnam”.

的市场”。但是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侵入了这个地区，给这里带来沉重的赋税、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征兵的负担，取代了吴庭艳松散薄弱的统治。当政府军最终剿灭了共产党后，“越南和美国的医务人员就和部队一同来到这里，诊治生病的村民”，而政府还分发“衣物、实用油、药品和农具”。该报告接着宣称，于是乎这里出现了一个奇迹：“突然之间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老幼病残者以外的全部10,000名村民主动出工，整整干了27天，挖出一条10英里长的壕沟，把狭长的村庄围了起来。”在这条10英尺深、20英尺宽的险恶屏障被建成以后，农民们又修了一条四英尺高的墙加强他们的防御。《时代》周刊的记者约翰·萧(John Shaw)惊叹道：“……怀美村的长城中显现出某些神奇的东西。一万村民不计报酬自愿出工的情景，他们所如此猛然而鲜明地展示出来的抵抗意志，都给交战的双方留下很多有待思考的东西。……怀美村的精神自有其重要意义。对于如何与越共竞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击败他们的问题，部分的答案可能就在这里。”^①在《时代》周刊所描绘出的图景中，在美国顾问的指导和美国援助的辅助下，强迫劳役成了“自愿”出工，战略村计划中的严密管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所剩下的就是与现代性的接触所激发起来的那种新的意愿。美国媒体的如下论调正反映了一整套根基半固的文化假设：虽然民族解放阵线可能曾将镇压和压迫强加在人民身上，但是在美国的规划和指导下，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能够给听天由命的亚洲农民灌输一种“不可思议的”抵抗精神。这些报道声称，美国和西方能够发动社会生活和个人观念上的剧烈变化，从而将封闭的传统农民阶级动员起来反对国际共产主义。

对重新安置计划和美援推动的现代化的一片赞誉声中，最夸张的来自积极配合政府政策的媒体。爱德华·兰斯代尔曾就越南

^① “South Viet Nam: Miracle at Hoaimy”.

领土南端的一群意志坚定的天主教村民的情况撰写了一份报告，肯尼迪读到后为之一振。他亲自向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建议说，兰斯代尔所“讲述的反游击战的典型事例对《星期六晚邮报》那样的报纸来说是一篇精彩的文章”。肯尼迪还说，虽然这份由中央情报局特工签名的报告不能公开发表，但是可以把它交给别的作者来加以扩充并发稿。总统告诉邦迪：“你应该确保这类材料能够得到很好的分发。”^①《星期六晚邮报》很高兴和白宫合作，刊登这篇由一位“出于职业原因”不能透露姓名的“美国空军军官”撰写、“总统希望予以发表”的报道。这篇报道说，阮禄和神父曾经是蒋介石军队的军官，他率领着一群来自共产党中国的流亡者。报道讲述了他们如何修建平兴村，如何种植水稻，又如何配备了美国枪炮的同时还用“棍棒小刀”武装自己。凡此云云，这篇报道最终把这群人变成了一个象征，用来说明西方的价值观和美国的援助如何帮助亚洲人建立起反对极权主义的坚强堡垒。报道中描绘了“我们的小布莱格堡”（就是居民点的训练中心），还描写一对民兵如何兴高采烈地摆出“童子军敬礼”的姿势——和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模一样，从而形象地说明美国自身的理念赋予这个民族以反抗马克思主义压迫的力量。不久以后，“拒绝死亡的村庄”也被拍成了电视片。而《读者文摘》也跟随《星期六晚邮报》讲述了一个民族的故事：这个民族曾经“品尝了做奴隶的滋味，知道这滋味是苦的”，而它现在则在美国的帮助下着手“在世界上扩张自由的领地”。^② 阮禄和神父的村庄虽然不是正式的“战略村”，但它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和一种观念框架，许多美国人是通过它来认

^① Memorandum, Kennedy to Bundy, February 6, 1961, NSF, box 328, “NSAM 9”, JFKL.

^② Drinnon, *Facing West*, 380-82; Lansdale, “Report the President Wanted Published”, 31, 69-70; Schanche, “Father Hoa’s Little War”, 74-79; Chappelle, “Fighting Priest of South Vietnam”, 200.

识美国怎样支持思想幼稚、但正在奋斗的南越农民。这些言论宣称，如果越南人受到西方观念的推动和美国物质资源的支持，那么他们一定能够认识到真正的现代化所能带给他们的一切，并与试图裹挟他们走上歧路的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



一名美国军事顾问在帮助越南儿童领略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魅力。这也是“爱民行动”的一部分。

与和平队志愿者身上发生的情况一样，与困难重重的越南村民一起工作的美国人的形象也被用来作为美国的代表，以表现美国的仁慈、活力、坚定和打赢冷战的决心。罗杰·希尔斯曼在一篇题为“内部战争”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必须准备好要深深卷入”反对共产主义的艰苦战斗。美国要“促使友好国家政府把扩大社会政治改革作为现代化的基础，增强他们在这方面的信心和能力”。希尔斯曼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与极权主义侵略作斗争的美国人要

保持那种敢于牺牲的古老传统。这位国务院情报首脑回忆起 20 世纪初在菲律宾的“反游击战役”中第九步兵团 C 连遭受屠杀,绘声绘色地讲述 450 名残酷无情的游击队员如何威逼被囚在“伙房”里的美国士兵,而他们又是如何用垒球棒和切肉刀英勇还击。虽然这个连队只有 24 个人逃出虎口,但最后美国还是制服了野蛮的叛乱——不是通过武力,而是用他们的价值观来感化这些任性的当地人。美国人还征召“善于找出丛林通道的菲律宾当地人”组成小队,还向每个小队派出“一名训练有素、勇敢坚决的军官”来指挥它。^① 通过强调牺牲精神,强调献身于殖民战争的美国人的作用,希尔斯曼重新编织了美帝国尚武神勇的神话,使之能为冷战中的反叛乱运动所用。

这些论调被直接套用于越南,而且在官方言论中被连续不断地重复。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描述了国际开发署人员在“新生活村”(这种居民点只在名称上不同于吴庭艳时代的战略村)的工作,此间又谈起一场“衬衫袖子战争”(shirtsleeves war)中的英勇和无私。汉弗莱以与肯尼迪描述和平队志愿者的话十分相似的语言提出,普通美国公民正在“使越南的农夫和渔民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即美国人所为之战斗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他们还展开了‘另外一场战争’——一场对贫困、愚昧和疾病的战争”,而且要帮助“拯救和建设一个国家”。汉弗莱又谈到国际开发署工作人员被民族解放阵线所俘虏、伏击和杀害的事情。他引用一位受伤的驻南越某省的代表的话,来营造出一种圣徒式的奉献精神:“无论他们给我多少钱,无论他们给我佩上什么样的勋章,都比不上越南人民的感谢带给我的巨大满足感。他们一句话都不必说。我可以从他们的目光中看出感激之情。”许多国际开发署工作人员个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并且可能对那些他们试图去帮助的人也是有关心照

^① Hilsman, “Internal War”, 455-56.

顾问的。但在汉弗莱的口中，他们似乎成了整个美国的化身。他指出：“美国人一向对别人有求必应——这个特点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且，尽管在帮助越南人的过程中会遇到艰难困苦，但是那儿的美国文职人员还是卷起袖子，和我们的军人一样地投入战斗。这是一种坚不可摧的联合。”^①由此说来，国际开发署的工作简直就代表了美国国家品格的精髓。勇于自我牺牲的、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美国将带领这些共产党侵略的受害者进入一个一经启动就无法阻遏的发展进程。



当时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军人和顾问将促进越南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但娼妓业才是在越南的美国人推动作用最大的“产业”。由于美国驻越南军人带来的旺盛需求，西贡和南方其他城市的娼妓业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发展”。这里的美国兵代表了美国的什么，到这里来又是为了什么呢？

^① Humphrey, “American Civilians Who Are Fighting the Shirtsleeves War,” 2-3, 6-7.

国务院在一份题为“沉默的战士”的出版物上也指出，派驻越南的美国文职人员是“外交官、医生、教师、警察教官、工程师、农场主、情报专家，以及了解多种行当的百事通”。尽管他们的职业不同，但都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代表，到越南是为了“建设社会关系、社会服务和共同的制度，没有这些东西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国家”。^①按林登·约翰逊本人的说法，在越南工作的美国文职人员有“一种爱国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不是以枪炮，而是以20世纪的所有和平武器去赢得胜利”。^②现代化理论使约翰逊错误地得出一种在战争和社会工程之间的两分，由此推动了一种关于美国的利他主义形象的形成，而正是这种利他主义的形象为美国所施加的暴力提供了借口和正当性。警察和军队为“摧毁”战略村中的“叛乱组织”所使用的手段却没有被提及。尽管战略村内外都在进行一场破坏性的战争，但继续从牺牲、援助和道义责任之类的角度来说明美国的行动。

国际开发署在招聘对越南的工作人员时也毫不迟疑地动用了使命之类的言辞。在一封致宣传委员会（也就是为和平队处理公共关系的那个机构）的信中，国际开发署新闻办公室主任起草了一份文件，为征召工作定下他认为恰当的基调。他说，美国人正在“与越南人肩并肩地一起工作”，“分发紧急物资”、“向地方政府官员献计献策”，并“与痛苦、饥饿和贫穷作战”。而且他们的工作反映了一种所有的公民都会予以积极响应的道德召唤。用他的话来说，“工作时间很长，工作很辛苦，而且可能有危险，但是1000名技艺精湛的美国人在越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无论你是一个实干家、鼓动家还是领导人，或者你是一个对社区发展和地方政府有

^① State Department, “Quiet Warriors: Supporting Social Revolution in Vietnam”, 1966, USIA Agency Records, microfilm reel 40, LBJL.

^② Johnson, *Public Papers*, 1: 526.

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工作中的一个职位可能就在等着你。……工作有多艰苦，回报就有多丰厚”。^① 一些公众言论甚至走得更远，在早期和平队的活动和国际开发署在越南的工作之间建立了一种明显的意识形态上的关系。一家都市报纸宣称，在越南工作的文职人员包括“医生、工程师、宣传员、农场主和技术员。……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在西贡过舒适的生活。他们组成了一支工作繁重的和平队。他们顺利地开展工作，并向农民解释政府是什么、为什么应该忠于政府”。^② 尽管萨金特·施雷弗试图限制拿他的机构和战争中的“绥靖”行动相比的做法，但是在1964年，国际开发署也试图征召“有农村发展或社区发展的背景和经验的”前和平队志愿者参加其“越南农村事务计划”。^③

和争取进步联盟的创立者一样，战略村计划的鼓吹者也诉诸美国过去的历史，宣称这里有现代化中的人们所需要汲取的丰富经验。早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末期，美国就有人把吴庭艳的土地重整计划和农居镇计划拿来和本国征服西部的经历相比。怀俄明州参议员、前历史学教授盖尔·麦吉(Gale W. McGee)指出，如果将农民迁移到人口稀疏的地区，那么农民就能“要求获得自己应有的一块地”，从而“给生活带来新的希望和机会”，进而“寻求他们自己

① Michael W. Moynihan to Allan Wilson, April 27, 1966. Advertising Council Files, box 1, "AID(Program for Civilian Help in Vietnam), LBJL.

② "The Quiet Struggle in VietNam: U. S. Civilian Employees Working to Show Peasants the Functions and Fruits of Democracy," included in AID compilation on "Nation Building in Vietnam", reprinted from *St. Louis Post Dispatch*, April 24, 1966. USIA Agency Records, microfilm reel 40, LBJL.

③ David Bell to Shriver, April 20, 1964, NSF, box 42, "Peace Corps". LBJL; memorandum, McGeorge Bundy to Shriver, May 13, 1964. NSF, box 42, "Peace Corps". LBJL.

的经济独立”。按照麦吉的看法,吴庭艳的计划是以美国自己土地重整的历史经验为范本的:“这与我们美国自己的土地重整史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当时,如果一个人在人满为患的东部地区得不到经济独立,那么政府就让他西部公地发放区获得开始新生活的机会。这种类似情况应该使美国人感到兴奋,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它应该使我们感到某种程度的自豪,因为我们的范例为越南的这种实验提供了鼓舞。”他指出,将农民迁入空置地区,将会为反对游击队提供所需的“情报、防御和安全系统”。^① 在一个世纪以后,在地球的另一面,美洲大平原上的围栏和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又在湄公河三角洲重现出来。罗杰·希尔斯曼指出:南越人应该在20世纪美国历史中寻求发展的经验。希尔斯曼认为,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被冠以“新政博士”和“战胜博士”两个称号,吴庭艳政府也一定能够实施一个把“与世隔绝的村庄”纳入“政府结构”的计划,从而“将军事行动和一个社会层面上的新政结合起来”。^② 在这种观点看来,美国的过去是越南未来的蓝本。以这种方式看问题,想认识越南的形势,可以不必去透彻地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通晓美国自己的英雄史传就足够了。

前国际开发署驻南越某省代表约翰·奥唐奈尔(John O'Donnell)也应和麦吉和希尔斯曼的观点,认为美国经验中还有一点可供南越仿效。他宣称,南越应该把战略村计划和对“政府的目标和理念”的宣扬结合起来,并由此“提供一些东西使所有公民团结起来,而且使他们为了保卫政府而不惜牺牲生命。我们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宣示,而其中的理念又为帕特

^① *Congressional Record*, Senate, 86th Cong., 2d. sess., February 9, 1960, vol. 106, pt. 2, 2331.

^② Hilsman, speech to the 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 September 18, 1962, Hilsman Papers, box 3, "Vietnam, 2/1-8/21/63." JFKL.

里克·亨利、托马斯·杰弗逊、亚伯拉罕·林肯和其他人的言论所加强和重新肯定”。南越人努力通过战略村来动员人民，这说明他们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而这正是美国曾经走过的发展道路。奥唐奈尔解释说：“美国宪法和政府的设计者们都清醒地意识到，应该创造一种使斗争（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资方和工会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等等）以最低程度的暴力而展开的环境。……越南政府试图实施这种观念，它制定了自由选举地方官员的规定，在战略村中组建社会和经济行动小组，在战略村计划中实行对自助计划的投票表决。”^①把吴庭艳变成托马斯·杰弗逊的忠实信徒绝非等闲之事，但现代化意识形态恰能产生这种效果。

事实证明，现代化理论的力量和号召力也长期阻碍着有系统的反对战略村计划的观点的出现。大多数批评战略村计划的人坚信一些号称是真理的意识形态信条，在思想上把美国自身的特性和它的世界角色紧密相连，所以他们的言论也都不能脱离现代化范式的藩篱。不仅当时官方的主事者，而且大多数分析家在事后也都认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在于管理和执行方面，而不是其中的基本假设和核心观念。批评者一次又一次地指责战略村计划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但是，出于对该计划的目标和理论基础的尊重，他们发表意见时又总是语气和缓。既然肯尼迪政府试图为这个计划越来越多的失败找到借口，这种分析的路数也就扼杀了一种更深入、更有成果的批评。

在一个短时期内，战略村似乎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在1962年7月，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报告说，吴庭艳和他的弟弟吴庭儒理解该计划的重要意义，也知道有必要把安全问题和爱民行动结合起来，以期使农民“支持南越政府击败敌人”。这位特工相信这个

^① O'Donnell, "Strategic Hamlet Program in Kien Hoa Province," 738-39.

计划正“在确定无疑地向前推进”，指出它“很有可能被农民接受，并且成为一种专门防止越共扩张的战术”。^① 1962年夏季的一些报告也指出，这个计划正在使民族解放阵线后退。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诺尔廷在访问福安省以后告诉华盛顿说，南越已经完成了该地区计划建立的84个战略村中的63个。他谈到，还有1,000多位村民逃离越共控制，进入战略村寻求政府保护。他又补充说，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好几个地区的农民已经开始向南越政府和美国顾问提供有关越共行踪的消息。这位大使认为：“……当越来越多的人主动为反对共产党恐怖分子提供更多更好的情报时，马来亚紧急状态的转折点就来临了。”对此深感振奋的大使宣称，“打开农村地区”，以及向农民“提供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将“赢回农民”。^②

然而，正如近期有关越南革命的研究和回忆所指出的，民族解放阵线迅速而成功地采取了抵制战略村计划的行动。当农民对重新安置计划怨声载道、在强迫劳动和严密监控下怒火中烧时，民族解放阵线就利用他们的怨愤，对他们说如果革命胜利了他们就能回家。民族解放阵线还通过扩大招兵和加强军事行动来对战略村计划作出回应。河内的共产党领导人向他们的南方同志建议，如果可能就对战略村发动直接的武力攻击，在必要的情况下则采取政治和心理渗透的策略。北方领导人还指出，妇女和老年人可以在战略村内部成为特别有用的侦察员，因为政府当局不太可能怀疑到他们。据威廉·戴克(William Duiker)的描述，“南方领导人首先被建议要保持耐心，要作好准备一次又一次地袭击和破坏战

^① Senate,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2: 685-86.

^② Nolting, Ambassador's Weekly Status Report, July 12, 1962, NSF, box 196, Countries "Vietnam. General, 7/11-7/19/62", JFKL.

略村，直到政府的控制瓦解”。^① 民族解放阵线的创建者和前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张如增解释说，吴庭艳政府内的秘密行动也将帮助坚持斗争的革命者。越盟抵抗运动成员、张如增的战友范玉韬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点点地取得了吴庭艳的信任。吴庭艳是如此欣赏和信任他的这位顾问，以至于派他到马来亚去学习英国在那里镇压叛乱的经验。当美国和南越在 1962 年实施战略村计划时，范玉韬还担任负责行动的军官。正如张如增所表示的，他的这位助手可能已经从内部破坏和过度扩大了这个计划。他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对战略村的监督下，战略村在农民中引起的不满要超过从前的农居镇。”^② 在越南的农村，甚至可能在西贡的中心，民族解放阵线都有效地对战略村计划作出应对。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美国的正式评估注意到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功，这给早先的乐观估计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官员承认，游击队员能够渗透到新建立的居民点中，并经常在当地获得帮助。然而，虽然说明战略村计划不能产生期望中的彻底变化的证据越来越多地被摆在美国战略家面前，但他们还是顽固地坚持战略村的基本目标和假设。虽然他们也指出了管理和执行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样一个思想：美国有能力创造新的、独特的南越民族主义和国家忠诚。1962 年 10 月，在一封致国务院的信中，美国大使诺尔廷承认武装自卫组织的工作进展得太缓慢。他写道，战略村的民兵往往要依靠“由手枪和老式法国武器构成的小军火库”。然而他又把这些不和谐的现象撇在一边不去深究，而去论证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那个倒霉的日出行动是一个重大的成功。他宣称，迁移农民是“明智而必要”之举。农村民众

^① Duiker, *Sacred War*, 153; Olson and Roberts, *Where the Domino Fell*, 97—98.

^② Truong, *Viet Cong Memoir*, 46—47.

又被“重新纳入(南越政府的)控制之下,他们给越共提供的后勤支持减少了,他们自己也获得了更好、更安全的生活”。诺尔廷决心再接再厉,说他不相信“所谓我们正在继承法国殖民统治衣钵的说法会引起什么严重问题”。^①

从1962年底以来还有其他报告更直率地指出了问题,但是这些报告总体上也集中关注执行问题而不是深层假设的问题。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官员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H. Johnson)告诉其上司沃尔特·罗斯托说,在越南中部,由于缺乏充分的防御,吴庭儒和他的兄弟吴庭瑾的争吵,以及“越南人一贯的管理不善”,战略村计划“几乎是纯粹的表面文章”。约翰逊还提出过更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只要战略村里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在根本上是政府用来向乡村强加其各种计划的工具”,那么这样的选举就没有什么意义。然而,他和其他分析家一样也认为,一旦执行中的滥用权力问题得到纠正,那么民主就可以确立起来,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就可以被打开,进步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② 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也对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虽然计划开始得过早,村庄得不到足够的防御,但“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修改……关于该计划的长期优点……的观点。这个计划现在刚开始成熟”。^③ 在11月,诺尔廷再一次禀报其上司:“我们正在取得进步。”这位大使说,美国驻越南的官员正学着“一边工作一边吹口哨”。他指出:“由于安全形势的改善,我们应该可以期望经济措施和爱民行动措

^① Nolting to Sterling Cottrell, October 15, 1962, *FRUS*, 1961-1963, 2: 699-701.

^② Memorandum, Johnson to Rostow, October 16, 1962, *FRUS*, 1961-1963, 2:703-6.

^③ Memorandum, Taylor to McNamara, November 17, 1962, *FRUS*, 1961-1963, 2: 736-38.

施被加速实施,并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①

到1963年,即使是最有批评色彩报道也接受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信念:反叛乱战略行将发挥其神奇的效能。在当年3月,罗伯特·汤普森发现,战略村计划“在过去六个月期间已经比他曾经预想的有了很大提高”,美国海军上将哈里·费尔特向华盛顿报告了这个好消息。^②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司令保罗·哈金斯上将也报告说“日有所进”。哈金斯宣称:“由于越南共和国和美国的共同努力,反叛乱的成功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对其结果充满信心。”^③1963年10月,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的确也发出过一项不寻常的警告信号。他们注意到,虽然“该计划中有关经济和爱民行动的部分”已经为“美国方面所相当有效地实施了”,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远远落后于战略村在建筑工程方面的进展”。他们警告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进展,并且将这方面的工作与有效的防御措施结合起来,那么所谓的‘战略村’就可能只是在名义上处于越南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这两个人还是坚持说,他们“发现大家一致认为战略村计划的观念是合理的”,并指出美国人在越南的存在对该国农村地区有变革性的影响。他们解释说:“美国的行为和态度的强化效应和示范效应并不只对战争产生影响,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越南人的行事方式。”^④尽管战略村计划对事物的理解不尽人意,但现代化意识形态却站

^① Nolting to Harriman, November 19, 1962, *FRUS*, 1961-1963, 2, 73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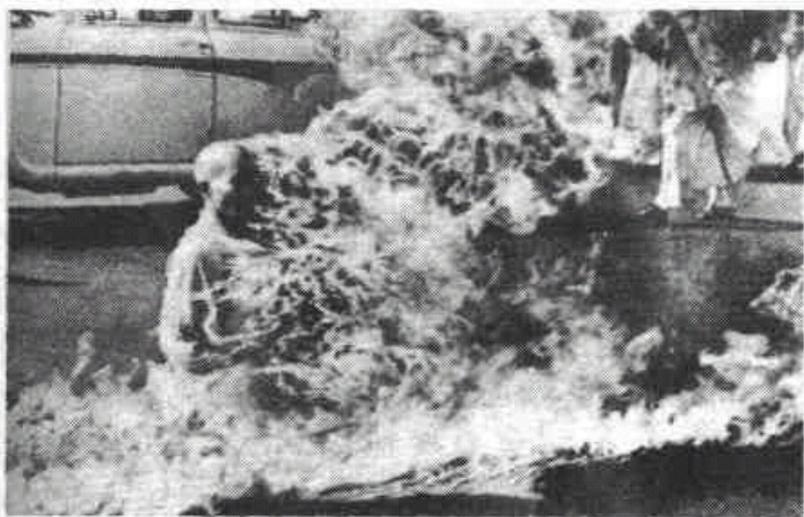
^② Memorandum, Felt to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rch 26, 1963, NSF, box 197 “Vietnam, 3/20-3/29/63”, JFKL.

^③ Memorandum, Felt to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rch 9, 1963, NSF, box 197 “Vietnam, 3/1-3/19/63”, JFKL.

^④ Report, McNamara and Taylor to Kennedy, October 2, 1963, NSF, Vietnam Country File, Addendum, “Holsman, Roger (Vietnam - Diem) (1963),” LBJL.

稳了脚跟。

最后,肯尼迪政府变得憎恨起吴庭艳来,但并不是憎恨他实施社会工程的雄心。吴庭艳和他的兄弟吴庭儒对美国剥夺其操控战争的权力的做法大为沮丧,于是愤怒地宣称美国过多的干涉损害了南越的主权和独立。这些抱怨损害了南越作为一个与美国亲密合作、共同反对共产党的外来侵略的新兴国家的形象,没有使吴庭艳在华盛顿捞到便宜。当吴庭艳长期的政治镇压突然被媒体曝光后,它自然也就成了肯尼迪政府的包袱。吴庭艳一向不容异见,对批评在南越享有特权的少数天主教徒的言论特别敏感。在1963年春天,他动用军队镇压佛教徒,因为他们在只准升国旗的地方升起了佛幡,南



美国对吴庭艳的支持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欧洲的天主教比亚洲土生的宗教要更适宜于“现代性”。天主教色彩浓厚的吴庭艳集团对佛教徒的歧视和迫害是南越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吴庭艳政权遭到民众厌弃的一大原因。图为广为人知的1963年6月僧人释光德以自焚来抗议吴庭艳政权的场景。

越士兵向顺化的一群人开火并杀死9人,激起成千上万的佛教徒上街游行。吴庭艳不是寻求和缓局势,而是指责这些佛教徒是共产党在背后怂恿的煽动闹事者,逮捕其宗教上的敌人及其大声疾呼的支

持者，试图以此来平息所有的争执。一位老僧释光德公开自焚以示抗议，可怕的照片中他那烈火中的身躯显示了民众对吴庭艳的憎恨达到了什么程度，而此人经常被美国说成是英勇无畏的和开明的领导人。在整个夏季，持续的暴力和搜捕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释光德之后又有几次佛教徒自焚抗议事件，并引发了更广泛的佛教徒抗议浪潮。图为西贡佛教徒举行静坐示威。

抗议示威活动继续升级，而新闻报道又不断揭露吴庭艳独裁镇压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政府首次试图以局部调整性质的措施解决问题。可以使白宫避免右翼攻击的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被派往南越，以取代弗里德里克·诺尔廷。后者被许多人认为对吴庭艳过于友好和宽容。美国还要求把吴庭艳的弟弟和弟媳从政府中清除出去。吴庭儒和吴庭儒夫人是反佛教运动的领导人，已经成为南越政权腐败暴虐的象征。一些美国决策者希望，一旦把这对夫妇及其影响力清除掉，吴庭艳政府就会转而推行必要的改革。但是到了当年8月底，局势却恶化到新的地步，使肯尼迪政府许多官员不能再容忍下去。当关于吴庭儒已经开始与

河内进行秘密谈判的谣言传来后,肯尼迪政府内部就是否应该继续支持吴庭艳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一些谋士建议推迟向吴庭艳政权交付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款项,以迫使他收敛对佛教徒的攻击,并重新把精力投入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斗争;但另外一些政策制定者却断定只有政变和权力更迭才能拨乱反正。10月初,当美国断绝了对吴庭儒的特种部队的援助后,南越军队内部的反对力量感到他们的时机到来了。就在美国有意撤回对吴庭艳的支持之际,南越的密谋者与中央情报局驻西贡情报站官员会面,讨论推翻甚至刺杀吴庭艳的办法。这些南越将领估计一旦他们掌权就会获得美国支持,所以抓捕了吴庭艳和吴庭儒,并于11月2日在一辆装甲运兵车中将这兄弟二人处决。他们还宣布建立一个由他们掌权的新政府,获得了美国支持,并誓言要加紧进行战争。^①



美丽娇艳的吴庭儒夫人在许多越南人眼中是一条毒蛇。她在1963年夏秋间发表了一系列反佛教言论,不仅激怒了南越民众,而且也促使美国下决心换马。

^① Young, *Vietnam Wars*, 93-102; Schulzinger, *Time for War*, 119--23.

在吴庭艳被杀后纷乱喧嚣的几个星期里，战略村计划作为一种反叛乱措施究竟失败到了什么地步，这一点已十分清楚了。对隆安省的一次调查显示，民族解放阵线已经极大地巩固了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基础。一个居民点接着一个居民点，美国新闻署的工作队不断上报的是完全的灾难。以下描述的是一种典型的情况：“战略村的门户和铁丝网已经被敌人百分之百地破坏。铁丝网和铁桩被砍断，没有剩下一段。……战略村议事厅被越共烧毁。……所有的行政机关、村委员会工作人员和所有的战略村武装人员都无法开展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安全可言，而且他们的士气相当低落，害怕敌人。防御体系已被完全摧毁。”据美国新闻署一个小组的报告，在另一个战略村，“行政委员会和村议事会都瓦解了，都在寻求和平，都变得亲共。群众组织也分崩离析，已经停止了工作”。有的调查队作出结论认为，战略村中所有的青年男子都已经跑去参加越共，还有调查队发现农民们根本就不想和他们说话。^①

然而，即使面对这些事态发展，对这些明显的失败的解释仍然是牢固地以现代化模式为中心的。美国官员认为，如果说战略村计划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那么问题完全是由越南人的管理不善引起的，而不应归咎于美国的思想路线。新任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呈交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指出，游击队已成功地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已经进入、甚至开始生活在许多战略村里。然而，在解释何以出现这种情况时，该报告却把矛头直指前南越政府。吴庭儒没有遵照缓慢地从一个安全的地区向另外的地方扩展的既定计划行事，“战略村被吴庭儒过度扩大，以便他尽可能快地扩大自己对

^① U. S. Information Service, Long An Province Survey, January 1964, Lansdale Papers, box 23, "Pacification and Land Reform/General, 1964-1969", HIA.

这个国家的控制,置许多战略村根本没有价值的事实于不顾”。^①

美国行动代表团驻隆安省代表厄尔·扬(Earl Young)提交的一份报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向洛奇报告说,越共已经能够“逐日清除”战略村,“9月间有219个拥有防卫武装(村民兵)的战略村,现在只有50个了。其余的都放下武器,或者逃跑了”。然而在扬看来,问题与美国的这样一种假设毫无关系:选举和社区发展将使农民阶级愿意为保卫一种外部强加的、已经剧烈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镇压性社会秩序而战斗。扬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不良局面,原因是南越政府的失败,它没有能够支持和保卫战略村。”由于南越军队不愿意执行夜间行动,同时也不能保卫分散的村落及其地区指挥部,所以导致“人民的抵抗意志的衰落”。扬断言,战略村计划“是能够被搞成可以利用、甚至十分有效的反对越共的手段”,但是必须有额外的部队增援,而且必须制止南越军队的腐败。^②

《五角大楼文件》表示,“通过代理人实施绥靖”当然不会带来严重障碍。只不过吴庭艳和吴庭儒没有像汤普森和希尔斯曼指导的那样来实施战略村计划,没有像“油点”那样从一个安全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缓慢推进。而且他们还打着自己的算盘。在吴庭艳看来,战略村计划从属于他的一个更大的谋划,也就是让美国“承担支持南越(以及他自己的政府)的义务而又不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吴庭艳和吴庭儒还把战略村计划及该计划的资源直接作为控制地方政治和省级权力系统的手段,以便于他们排除出现政治对手的

^① Memorandum, Lodge to Rusk, December 11, 1963, NSF, Vietnam Country File, box 1, “Vietnam Cables, Vol. 1, 11/63—12/63(2 of 2),” LB-JL.

^② Telegram, Lodge to Rusk, December 7, 1962, NSF, Vietnam Country File, box 1, “Vietnam Cables, Vol. 1, 11/63—12/63(2 of 2),” LB-JL.

可能性。他们把忠于自己的人任命为各省和各地区的首长，以防止对手有任何机会利用美国资源或建立群众基础。^① 美国对爱民行动的物资供应跟不上战略村的修建进度，防御往往不足，而且当地官员没有向迁移的居民提供补偿，经常盗用应该发放给农民的资金。

官方对战略村计划的分析只关注这些管理方面的因素，没有对其中的关键的思想理念提出质疑。虽然吴庭艳时期的试验已经失败了，但几乎没有人考虑到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无处不在的监视、严密的控制和对南越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这些本来就根本不是当地农民所期望的。美国人以为可以轻易地对农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进行塑造，以使之适应于反共目标，这种期望在战争升级的同时也继续被保持着。虽然吴庭艳兄弟被杀后美国决策部门放弃了“战略村”这个词，但是战略村计划所遵循的美国反叛乱思想路线却在其后仍使这个计划的基本原则继续生效。1963年11月，迪安·腊斯克乐观地对林登·约翰逊说，南越新军人政权能够“纠正（这个计划）执行中的缺陷”；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工作人员迈克尔·福莱斯特尔（Michael Forrestal）则向总统建议说，美国可以“相当容易地”在越南“设立新的村庄计划……因为旧的战略村计划中有许多可以汲取的经验”。^② 当年年底启动了“新生活”村计划，它与战略村计划仅有表面上的不同。越南领导人承诺要从安全地区开始，并分阶段实施计划，表示要和美国合作训练村庄民兵，以使之更有效地执行巡逻任务；并接受了建立以地方为

^① Senate,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2: 128-31.

^② Memorandum, Rusk to Johnson, December 1963, NSF, box 1 "Vietnam Cables, Vol. I (2 of 2) 11/63-12/63," LBJL; memorandum, Forrestal to Johnson, December 11, 1963, NSF, box 1 "Vietnam Cables, Vol. I (2 of 2) 11/63-12/63," LBJL.

基础的爱民行动队的主意,放弃以前由中央统一管理的方法。^①但是,这样一种基本假设——安全监控、扩大国家机构并提高政治参与、提供社会服务将创造对南越政府的现代民族主义忠诚——在肯尼迪政府最后的日子仍然没有受到什么质疑。

在基本上没有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在此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原则也渗透到美国的反叛乱思维中去。在 1964 年,亨利·卡伯特·洛奇详细阐述了一个村级计划,称在这个计划中要“以能为群众领会并对群众能产生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来充实人们的头脑”,这显示出他仍然相信现代化理论对反叛乱所具有的针对性。和罗杰·希尔斯曼一样,洛奇相信人口普查、身份证、宵禁,以及在每一个战略村进行“拉网式的彻底搜查”以“抓捕恐怖分子”,这些办法可以提供安全。“在最初的平静时刻”,教师、农业专家和地方选举将开始创造有利于反共进步的局面,最终会给美国带来胜利。林登·约翰逊在南越“绥靖”计划事务上的助手罗伯特·科莫尔(Robert Komer)也把现代化纳入到他的“公务员行动和革命性发展支持计划”(Civilian Operations and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Support,CORDS)中去。这个计划启动于 1966 年底,在整个 1967 年被推广开来。与此前的战略村运动和新生活运动一样,这个新计划也把战争和安全措施与企图在农村民众中创造新的政治文化的爱民行动和福利计划结合起来。^②与肯尼迪时代的战略家一样,科莫尔也表现出对自己的想法的极度自信。他告诉美国新闻界,尽管越南人在管理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是“我们在 1968 年已经有了一个远远胜过以

^① Lens, "Only Hope," 23-24, 文中这列举了上述各点。

^② Young, *Vietnam War*, 144-45; 212-13. 扬还指出,美国主导的“凤凰行动”的野蛮暴力和恐怖主义也被用来支持 CORDS 的实施。凤凰计划的目的是甄别和“压制”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和支持者。

往的起点”。^① 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不熟悉美国文化，从来没有能够理解他们所要打击的革命。而现代化理论中抽象的、一般化的概念让他们感到似乎没有必要费神去理解这场革命。正如玛里琳·扬所指出的，美国官员毫不怀疑他们“能够给越南人这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一套完整的‘信念’，而他们一旦接触到这样的信念就会不惜为之牺牲生命”。^②

这个基本假设在公众舆论中也没有受到挑战。和其他许多大众媒体一样，《时代》周刊也撤销了它早先对吴庭艳的那种热情，转而强调他“大权独揽，他的政府效率低下”，“他的军官队伍士气低落”。该杂志在报道中称，吴庭艳“经常受到的指责”使得1,400万南越人民对他离心离德”。^③ 虽然这些看法也许是对的，但是这些媒体不断重复的论调只是造成公众对越南战争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越南人头上了事，却从来不去质疑美国公众自己的这样一个信念：美国的资源和理念可以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加速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在1963年夏秋两季，在南越的佛教徒危机愈演愈烈之际，吴庭艳兄弟镇压异己的残暴只被美国人用来证明这种信念的正确。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在1963年曾引用一名美国驻越南官员的话来说明他自己和其他许多人的想法：“我们和越南官员之间有根本的差异。”卡诺和其他人认为，美国的确有击败民族解放阵线和建设新南越的方法和手段，只不过目光短浅的越南人不能领会“这场战争的政治方面”。^④

20世纪60年代早期和中期倒是有一些异议人士超越了指责吴庭艳政权的短处的做法，开始挑战现代化意识形态本身。在民

① 转引自 FitzGerald, *Fire in the Lake*, 486.

② Young, *Vietnam War*, 145.

③ “South Viet Nam; What the People Say.”

④ Karnow, “Edge of Chaos”, 34. 许多历史著作也强调这一点。例如参见 Smith,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2: 168.

主党内更具进步主义色彩的派别中,蒙大拿州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等国会议员公开表明了他们对战略村计划不断增加的怀疑。曼斯菲尔德和他的几位同事自南越访问归来后指出,战略村的概念“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农村民众之所以供养越共首先是出于畏惧,同时也部分地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一点,即政府的支持和他们参与政府的活动会给他们带来特别优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如果我们姑且判定这些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在目前各方面的努力的范围内就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军事行动。……但是即使要给初步的军事胜利赋予意义,也要求进行社会工程方面的大量工作”。^① 尽管曼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还是愿意接受当时的流行观点的,但他们至少使得以往很少被讨论的那些潜在假设得以清晰起来。而且他们和大多数评论家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这些假设还没有得到证实。

关于美国能否通过现代化而赢得越南战争的胜利,戴维·哈尔伯斯坦等记者的著作也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尽管哈尔伯斯坦把战略村计划失败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吴氏兄弟,而且也承袭了对所谓消极的“传统”社会的流行看法,但是他的确也指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样一种计划在任何一个政府之下都不会成功。在他于1964年出版的《陷入泥潭》一书中,哈尔伯斯坦解释说,“战争在老百姓面前来来回回地打。农民们白天要受政府军的罪,晚上要吃越共的苦”。农民们在残酷的战争中失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和家园,庄稼荒芜,妻离子散。而政府军的到来并没有使农民燃起靠美援过上好日子的希望,也没有使他们积极参与到吴庭艳的民族国家中来。他们所怀有的只是恐惧和怨恨,以及对终止这种破坏他们生活的恐怖状态的深切希望:“一名越南青年苦涩地对

^① Senate, *Vietnam and Southeast Asia*, 7.



著名记者越南·哈尔伯斯坦是最早对越南战争进行批评和反思的美国人之一。他对越南实际情况的报道对美国国内反战运动的兴起发挥了先导和推动作用。

我说：“战争会打上‘一辈子’”。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即使这些有点含蓄的不同意见的声音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把东南亚的现代化和他自己那种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和使命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似乎美国是在履行自己的使命，帮助一个奋斗中的民族走上自己的历史所昭示出来的康庄大道。要想让“传统的”民族摆脱冷漠停滞的状态，只能靠从外部引入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技术。所以，当地的民族主义绝不可能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和真诚的民族主义。按照这种看法，民族解放阵线是一个完全受国际共产主义力量驱动的组织。按照这

① Halberstam, *Making of a Quagmire*, 50.

种观察世界的方法,越南农民阶级之所以投身于革命,不是因为他们基于其深远的历史文化观念而渴望一个独立、统一的越南,也不是因为他们盼望获得一个更公平地分配权力和财富的农村社会结构。农民们参加民族解放阵线,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变得和西方人一样;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能使他们变得更现代的西方的社会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经济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用以观察越南战争的是一个几乎不存在中间地带的观念框架。面对一种和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针锋相对的发展模式,美国决策者认为他们的使命是帮助南越渡过一个不稳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革命有可能破坏本来被历史注定了的进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以为自己是推进民族国家建设的无私使者,而美国对越南的政策战略的内容也远不止于社会工程和反叛乱策略。肯尼迪政府时期的战略村计划所招致的暴力在其后也并没有停止。随着1965年美国向越南派遣战斗部队,随着它在越南乡村实施无情的大规模轰炸,这种暴力被提升到了新的水平。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现代化意识形态所树立的国家使命感一直保持着它强大的号召力。美国人在对自己的认知中承袭了古老的天定命运观念,把自己看做一个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认为自己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进而要在一个非殖民化的时代里保持一种帝国式的权威。美国在实施战略村计划之类的措施的过程中,既吸收了美国自己在菲律宾殖民的历史经验,又借鉴了英国为马来亚维持殖民统治面采取的一些做法。而且,美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与历史上英国在南非的实践、西班牙在古巴的策略、法国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实行村庄重新安置和集中的做法在形式上也十分相似。然而,如果要论一种“客观的”社会科学体系的作用,那么,美国在越南的行为,与美国自己的帝国主义历史以及印度支那的老殖民主义历史之间,却是有所差异的。在后来的岁月里发生了“雷鸣”轰炸行动、抵制征兵运动、美莱大屠



林登·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政府的全套对外政策班底，其对第三世界政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延续了他的前任。

杀和美国入侵柬埔寨等事件，这些事件最终使得所谓推动越南现代化的说法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成为争议的焦点。在美国人和越南人中越来越多地敲响的丧钟，最终引发了认真而又苦涩的反思。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们还不能清楚地看到美国最终将为越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结 论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在欧洲殖民主义秩序瓦解的过程中,为了对付他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威胁,社会科学家和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把现代化作为一种用来提高自由世界的力量的手段。在这个世界里,“新兴”国家的发展将保护美国的安全。现代化不仅为美国力量的持续扩张规定了方向,而且为美国把自身界定为一个准备在世界各地对抗革命挑战的利他主义的、反殖民主义的国家。现代化不仅是一种用来赋予政府行动以正当性的宣传战略。有关幕后政策制定的材料和公开言论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这说明现代化也是一种概念框架。现代化塑造了具体的行动,也表达着美国人中广泛持有的关于美国的特性、美国的道义责任及其指导世界变迁的能力的信念。现代化被深深嵌入了社会科学话语、对外政策制度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表述之中,号称能够加速世界的“进步”,而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的资源及其开明的监护。

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更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这些理论,以及这些理论所反映和强化的那些文化假设都不是肯尼迪时期的对外政策的惟一动因。创建争取进步联盟的背景中包括了以下因素:此前马歇尔计划取得的成功,拉丁美洲几十年来对美国援助的要求,古巴革命,以及美国在猪湾事件中的灾难性失败。社区发展也仅仅是和平队各项计划中

的一个,而这项计划之所以能得以实施,除了在社会工程方面的雄心壮志外,还有一个因素起了作用,那就是针对志愿者中有大量文科毕业生的实际考虑。在越南,战略村计划也有多种根源,其中包括吴庭艳自己重新安置居民的试验,英国曾在马来亚实施过的计划,肯尼迪对赢得战争胜利的办法的寻求。当时肯尼迪政府虽然没有排除其他各种选择,但是还没有采用派遣美国战斗部队的做法。然而,在以上各案例中,现代化思想都塑造了对发展进程的制度性理解,解释了非殖民化的战略意义,而且提出了美国用以指导和加速全球变迁的具体方式。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和战略村三者可能看起来有很大差异,但是三者的目的都是通过物质援助和展现理性的组织和社会结构来变革“传统”社会和文化。

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还把社会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加以处理。他们论证说,在追求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的同时,须以促进当地人的世界观发生必要变化来作为配合。主事者希望参加社区发展计划工作的和平队志愿者带去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结构,以此来推动“消极的”农民参加自助计划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建立战略村的目的是,通过将农村居民转变为积极的公民,并培养他们对南越政权的新的忠诚感,从而赢得他们的“人心民意”。即使是争取进步联盟也试图把经济增长和民主政治与“情绪化的”、被认为是不成熟的拉美民族主义力量联系起来。在每一个案例中,政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和现代化理论家一样,认为“欠发达”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结构问题,而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文化缺陷与政治和经济缺陷在其中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状态。

三个计划都与美国对冷战危险的认知密切相关。在政策制定者及其社会科学家顾问的头脑中,西方的思想、技术和市场所激发起来的热切愿望将促使世界上的“传统”社会脱离曾经是社会聚合手段的家庭和宗教纽带。他们还把向现代性的过渡理解为一种危

机,一个巨大的机遇和严重的危险并存的时刻。由于过渡中的社会缺乏一种整合性的价值体系。理论家们认为这种整合性价值体系是稳定的西方民主国家达成均衡的条件,所以决策者们认为这些过渡社会极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受到其关于社会改革、政治秩序和经济增长的蛊惑人心的主张的影响。为了应付这种威胁,为了推动这些脆弱的社会走出这个关键的阶段,肯尼迪政府的三项计划都提出了物质和道义蓝图,目标是赶在革命和叛乱打断“自然”发展进程之前促成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起飞”。争取进步联盟的目标不仅仅是减缓贫困和专制,建立它也是为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美国模式来对抗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古巴的邪路。他们希望和平队的社会发展计划能够改变消极被动、但却有可塑性的贫困人群,使他们成为积极的、致力于自由进步的公民。“与当地入过同样水平的生活”的和平队志愿者被当作美国的无私、坚定和仁爱的象征,他们被用来显示美国能够在任何战线上抵御共产主义威胁。在越南,美国也是以类似的方式来对付民族解放阵线的。肯尼迪政府的战略家相信敌人的号召力来自他们展现出来的科层制度和稳定的秩序,因而试图将安全措施与建设一个广泛的南越国家的方略结合起来。而他们期望农民能够在这个民族国家当中产生目标感、责任感和归属感。他们预期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能够预防共产主义革命,而经济增长、社区发展和反叛乱都是由这种预期所塑造的。

现代化理论也令人遗憾地使对问题的分析被过分地简单化了。由于现代化论者通常几乎完全根据外部“欠发达”社会在一组一元的、抽象的发展指标体系中的相对位置来对这些社会进行评估,所以他们往往很少去注意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独特的文化特性。政策制定者们相信“传统”世界是具有弹性和可塑性的,因此也高估了他们改变和引导民族主义力量的能力。在越南等地,这方面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危机。对美国力量的自信支撑着现代化理论,

使它的影响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很少有人对它的假设和预言提出质疑,即使当出现了明显与它相悖的证据时也是如此。

而且,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与传统的美国民族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有许多共同之处。虽然数量指标、结构—功能主义的模型以及科学主义的热情相对来说是新东西,但是对美国历史发展道路和它潜在的拯救能力的称颂却是久已有之。在一部出版于1966年的书中,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erick Merk)论证说,虽然美国固有的仁德善良依然存在,但是“天定命运在20世纪已经消失了。它不仅已经死亡,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毫无声息”。^①以类似的语调,许多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也把美国的帝国主义描述为一段短暂的越轨,美国人当时轻率地突然决定追求帝国主义,但很快就抛弃了它。^②我相信,正是试图将现代化付诸实践的努力,使诸如此类的论断受到质疑,并由此开启了针对冷战时期的挑战性研究途径。在19世纪末,关于天定命运和所谓帝国使命的想法中有什么成分被埋葬了?而又有什么成分被保留下来并以各种形式重新出现?如果从狭义而言,将天定命运界定为一种关于美国享有在整个北美大陆向西扩张的神授权利的思想,将美国帝国主义界定为一种正式占领外国领土的实践,那么可以说天定命运和美国帝国主义的确消失了。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所谓它们已经消失的流行说法是夸大其辞。正如安德斯·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等学者曾经指出的,天定命运还可以从广义上加以考察,那么天定命运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认为“这个国家自打诞生之日起就注定要向历史性的落后民族指示前进的方

^① Merk, *Manifest Destiny and Mission*, 266. 关于早期的与之相对的观点,参见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该书初版于1935年。

^② 关于在这个问题上的有趣的讨论,参见 Schwabe, “Global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向”的信念,或者可以认为它反映“一种特别的(或者特别强有力的)民族主义,不仅认为自己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而且也具有普世的价值”。^① 在相似的意义上,帝国主义也可以从文化层面加以解释,将其作为一种首先指责外国民族的缺陷、然后在所谓先进社会的监护下为外国民族规划改革和进步的实践。从这些方面看,现代化显然是美国人对其国家特性和潜力的传统看法的一脉相传。

所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一种内容广泛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换自己的形式的? 冷战期间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 19 世纪的天定命运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帝国主义。上天的授权和上帝之手之类的说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客观的科学和人类的理性的诉求。学者们引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撰写以生产数据和指数化的“现代化指标”为基础的论文,都是为先前的那些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千禧年布道中的说法作辩护。现代化论者不再把自己看做是用以在现世建立神圣秩序的工具,而是试图去确定普遍的历史发展道路,然后又带着极大的自信试图去加速历史的发展。而且在他们的观念中,扩张的类型也会发生变化。现代化论者的先辈曾经描述过的是一种靠领土扩张来传播民主的使命,而现代化论者所谈论的却是通过“示范效应”——而不是正式的征服——推广他们的价值观和制度。而且,对那些一再强调美国的文化进步和道义使命的人来说,已经没有必要再明目张胆地从生物和种族的角度来进行论证了。正如雷金纳尔德·豪斯曼(Reginald Horsman)所指出的,19 世纪初的种族主义思想中有许多是从永恒的生物属性的角度来描述他们眼中的低等人类,认为他们是只能推行有限变革的民族,注定要在与活力无限的盎格鲁-撒克逊

^① Stephanson, *Manifest Destiny*, xii, xiii.

人的竞争中灭绝。^① 但是美国的现代化论者已转向文化方面,强调的是“传统人”在根本上的可塑性。所以,他们和那些比较乐观的鼓吹同化印第安人和鼓吹海外扩张的人一样,为他们自己规定了另外一种拯救的使命。^② 外国人并不会消失,但是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他们的文化缺陷将消失。

如果想要避免非历史的和大而不当的描述,就应该重视上述变化。对美国的世界角色及其潜力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这一点还是清楚的:现代化并非一个全新的事物。尽管理论家是在严格的经验分析的基础上谈论轴心突破(pivotal breakthrough),而决策者又把他们的计划视为一种史无前例的努力,但是他们描述出的那种直线式的历史进化道路,以及他们试图驱赶落后民族走上这条道路的努力,都与早先的民族主义观点有诸多共同之处。在现代化论者的眼中,美国高居于普遍的历史发展进程的顶端。美国是一个比那些仍在沿着它的足迹苦苦奋斗的社会都发展得更好、更快的社会。美国是世界上的一支进步力量,它履行自己的道德使命的方式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资源提供给那些缺乏这些东西的人。现代化论者运用的是科学而不是上帝,但是他们也为美国和那些须由美国来照管的国家指明了一种命运。在冷战的意识形态竞争中,许多战略家相信,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现代化意识形态提出,要用新的、开明的国际援助形式来取代欧洲老殖民主义,由此它也重新塑造美国自己以往的帝国主义历史。在争取进步联盟的声明中,美国保护拉丁美洲独裁政权的事实被有意忽略,对美国不断干涉该地区的历史也避而不谈,争取进

①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② 关于西方帝国主义历史的连续性,参见 Williams,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and the Debate over Philippine Annexation”。

步联盟反而承诺要把美国的反殖民革命送到其国界以南,为那些希望用美国经验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国家造福兴利。当美国官员把和平队志愿者派往菲律宾去教授英语时,他们谈论的是与这个国家保持一种人道主义的“特殊关系”,却闭口不谈它们之间历史上的殖民关系。通过在越南对民众实行重新安置和集中,美国决策者宣称要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而他们所采用的策略却沿袭了当年英国在马来亚、美国在菲律宾为巩固殖民帝国而采用过的暴力手段,虽然具体的形式有所不同。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论证说,现代化将以加速民族独立的计划来取代殖民主义统治。但是以现代化为基础的计划往往采用一种与帝国主义话语和实践极为类似的方式,去界定“欠发达”国家的缺陷,并指明美国干预的必要性。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种内在的矛盾并没有引起多少抗议。在一个正式的非殖民化时代,现代化承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其中所有人都将得益,除了那些一心要搞颠覆叛乱的人。

现代化的观念框架也延续着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史,而且与当代美国关于所谓“贫困的文化”的假设相互呼应。当沃尔特·罗斯托把争取进步联盟描述为用以减缓对拉美的“国际救济”的一种手段时,他把对外援助与战争援助相提并论。而争取进步联盟的其他鼓吹者把它说成是对拉美实行的“新政”。和平队的社区发展工作者被派往纽约市的廉价公寓和亚利桑纳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去援助那些被认为是“低度发展的”和“消极麻木”的人,以此作为执行海外使命的前期训练。林登·约翰逊居然在湄公河三角洲看到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立。有一次在火奴鲁鲁,他与南越官员会面后对记者说,刚才他“像芝加哥的一名社会工作者一样,坐下来讨论改革的细枝末节”,这对美国总统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绿色贝雷帽部队的爱民行动小队从越南回国后,被派去帮助布莱格堡附近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以及南卡莱罗纳州的

一个“战略村”里的穷人。这些例子表明，自由派改革者经常把海外的现代化计划和国内的公共援助事务加以等量齐观。^① 历史学家迈克尔·卡兹(Michael Katz)发现：“关于穷人的大多数著作(即使是那些有同情心的观察者所写的)都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我们当中真正与我们不同的陌生人。穷人在思想、感受和行动上的方式与美国中产阶级人士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贫穷在某种程度上要由他们自己来负责。要想减轻他们的贫困，他们就得改变自己。”^②

在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改革者在美国国界内也发现了“传统人”，而他们为此制定的解决办法又类似于他们在海外所采取的办法。“最大限度的切实可行的参与”可以拯救那些沉溺于消极冷漠中的人们。“社区发展”可以扩大贫民区居民的权利，使他们从联邦政府机构获得必要的物质援助。由于穷人们盼望秩序、组织和归属感，所以如果使他们认识到中央政府能够帮助他们达成自己的目标，就能够把他们动员起来。在实施“伟大社会”计划的最初几年中，约翰逊政府强调个人价值和道义原则优先于政治或权力关系，这与肯尼迪时代的现代化计划有极为类似之处。在一个不仅以地理因素，而且不断以“现代性”来界定自己的社会中，这些情况也显示出，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被看做是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想像出来的共同体”^③之完全的或真正的成员。

^① 关于罗斯托的原话，参见 Memorandum, Rostow to Kennedy, March 2, 1961. FOF, box 64a, “Rostow, 3/61-5/61,” JFKL. 约翰逊关于“社会工作者”的谈话见于《Time》杂志的一篇题为“The War”的文章。关于绿色贝雷帽部队的故事，参见《Time》杂志文章“Nation-Mending at Home”。关于约翰逊对湄公河上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参见 Gardner, Pay any Price.

^② Katz, *Undeserving Poor*, 7.

^③ 关于这个概念，参见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发生在国内外的事件都对现代化模式提出了严峻的质疑。随着越南的战争陷入僵局,许多美国人都认识到,无论是战略村还是狂轰滥炸都不能发动社会科学家和决策者所期望的那种广泛的社会变迁。当美国的城市在骚乱中火光四起时,当更激进的民权运动超越了废除种族隔离和平等权利的主张,进而要求社会经济平等并号召再分配时,国内的“传统人”似乎也远不是消极被动的和不关心政治的。越来越多的持异议人士不仅对管理、资金和执行中的具体问题提出挑战,同时也对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宣称可以不经权力秩序和财富秩序的根本重组而达成改革目标——的核心观点和基本假设发起攻击。随着“新左派”和“新右派”的兴起,冷战自由主义的共识及这种意识形态之“至关重要的中心”都瓦解了。尽管它的假设仍然不断激起关于发展的问题以及如何确定美国的世界角色的问题的争论,但现代化不再能受到以往那种程度的信任和欢迎。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社会科学家、肯尼迪政府的决策者,以及美国媒体都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实行变革性的社会工程,不仅有充分的可能性,而且也有迫切的必要性。现代化论者相信他们注定要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扮演关键的角色,并没有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他们所谓的国际使命之间看到有什么冲突。他们对自己那种自由主义的直线式发展观充满自信,对他们那些建立在科学和理性基础之上的计划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前景信心十足。毕竟,除了共产党,还有谁能不赞成发展,或者拒绝进步的前景呢?在理论上,在实践上,现代化理论都告诉美国人他们是谁,告诉他们如果把这个国家的基本历史经验和宝贵资源输出到世界上就可以取得什么样的伟大成就。作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历史必然性、仁德善良的使命和最终的历史性胜利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理论与对美国过往历史的英雄式叙事相互呼应。作为一种冷战高潮中被表达出来的权力观,它也试图规划、界定和推动世界的未来。



参考文献

未出版的档案和文献原件

-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for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and Evaluation, Rosslyn, Virginia
 - AID Historical Collection, 1961-69
-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California
 - Charles L. R. Bohannon Papers
 - Edward Lansdale Papers
 - Eugene Staley Papers
- John F. Kennedy Library, Boston, Massachusetts
 - Edwin Bayley Papers
 - Carmine Bellino Papers
 - David Bell Papers
 - Gerald Bush Papers
 - Bernard Fall Papers
 - Fowler Hamilton Papers
 - Roger Hillsman Papers
 - William Josephson Papers
 - Samuel P. Hayes Papers
 - John F. Kennedy Papers
 -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a
 - Country File - Vietnam
 - Meetings and Memoranda
 - Staff File of Carl Kaysen
 - Pre-Presidential Papers
 - 1960 Task Force Report on Foreign Affairs
 -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 Special Correspondence
 - Legislative Files
 - Staff Memoranda
 -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 Subjects—Alliance for Progress

- White House Central Subject File
 - Peace Corps
- Robert F. Kennedy Papers
 - Attorney General's Correspondence
- Frank Mankiewicz Papers
- Max Millikan Papers
- Teodoro Moscoso Papers
-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Papers
- James Thomson Papers
-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Austin, Texas
 - Brent Ashabranner Papers
 - William P. Bundy Papers
 - Lyndon B. Johnson Papers
 - Vice-Presidential Security File
 -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a
 -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 Declassified and Sanitized Documents from Unprocessed Files
 - Agency File—AID and Alliance for Progress
 - Country File—Vietnam
 - Name Files
 - Records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 Task Force Reports
 - Special Files
 - Administrative Histories— AID
 -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 Office Files of White House Aides
 -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 U.S. Peace Corps Library, Washington, D.C.
 - Historical Collection, 1961–63
 - Files 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s and Training
 - Files on Advertising, Recruiting

正式出版的档案材料和论著

-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utting PEP in AID." *Area Digest* 2 (Fall 1963): 7.
- . "The Role of the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Counterinsurgency." In *Insurgency and Counterinsurgency: An Anthology*, edited by Richard M. Leighton and Ralph Sanders, 325, 29. Washington, D.C.: Industrial College of the Armed Forces, 1962.
- Alba, Victor. *Alliance without Allies: The Mythology of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1965.

- Alexander, Jeffrey C. "Modern, Anti, Post, and Neo: How Social Theories Hav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New Problems of Our Ti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23 (June 1994): 165-97.
- .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Alianza, Sí, Progreso, No." *Time*, March 16, 1962, 33.
- "Alliance for Progress: The Big Need Is Deeds." *Newsweek*, August 27, 1962, 50.
- "Alliance Progresses." *Newsweek*, August 21, 1961, 44.
- Almond, Gabriel. "The Seminar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Items* 10 (December 1956): 45-48.
- Almond, Gabriel, and James S.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 Amin, Julius A. *The Peace Corps in Cameroon*.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Appleby, Joyce.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ocial Theories in England and Americ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 (April 1978): 259-85.
- Apter, David E. *Ghana in Transition*, 2d rev.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 *Rethinking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Postmodern Politic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1987.
- . *Some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Moderniz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8.
- Arndt, H. W.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Asad, Talal, ed.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3.
- Ashabranner, Brent. *A Moment in History: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eace Corp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1.
-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National Review*, October 22, 1963, 334-35.
- Ball, Terence.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cience in Postwar America." In *Recasting America: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Cold War*, edited by Lary May, 76-9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Banuri, Tariq.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 Role of Modernization Theo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In *Dominat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Resistance*, edited by Stephen A. Marglin and Frédérique Apfel Marglin, 29-7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 Baritz, Loren. *Backfire. A History of How American Culture Led Us into Vietnam and Made Us Fight the Way We Did*. New York: Morrow, 1985.
- Barnes, Barry. "On Author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ower." In *Power, Action, and*

-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Science?*, edited by John Law, 180-95.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 Barnet, Richard J. *Roots of War: The Men and Institutions behi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Atheneum, 1972.
- Barnett, David. "Volunteers Resent 'Hero' Role - Researcher." *Peace Corps Volunteer*, July 1963, 2.
- Bauer, P. T. *Dissent on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Debat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Belshaw, Michael. "Experts, Not Youths Needed." *Foreign Policy Bulletin*, January 15, 1961, 68, 70.
- Bendix, Reinhard.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Benjamin, Jules R. "The Framework of U.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 Interpretive Essay." *Diplomatic History* 11 (Spring 1987): 91-112.
- Bernstein, Michael A. "American Economic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1-1953." *Radical History Review* 63 (Fall 1995): 8-26.
- Beschloss, Michael. *The Crisis Years: Kennedy and Khrushchev, 1960-1963*.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 Biersack, Aletta. "Local Knowledge, Local History: Geertz and Beyond." 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Lynn Hunt, 72-9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Bierstedt, Robert. *American Sociological Theory. A Critical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Binder, Leonar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velopment Theo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8 (January 1986): 3-33.
- Black, C. E.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 Blaufarb, Douglas S. *The Counterinsurgency Era: U.S. Doctrine and Performance, 195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 Bock, Kenneth F. "Theories of Progress and Evolution." In *Sociology and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Werner J. Cahnman and Alvin Boskoff, 21-41.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 Bodenheimer, Susanne J. "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Paradigm Surrogate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15 (1970): 95-137.
- Boyer, Paul. *By the Bomb's Early Light: 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at the Dawn of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Pantheon, 1985.
- Braestrup, Peter. "Peace Corpsman No. 1—A Progress Repor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17, 1961, 64.
- Brown, Richard D. "Modernization and the Modern Personality in Early America, 1600-1865: A Sketch of a Synthesi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 (Winter 1972): 201-28.
- Bundy, McGeorge. "The Battlefields of Power and the Searchlights of the Academy."

- In *The Dimensions of Diplomacy*, edited by E. A. J. Johnson, 1–1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4.
- Butler, Dorothy. "50 Peacecorpsmen Doing Well in Ghana."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8, 1961. A22.
- Buxton, William.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Capitalist Nation-State: Political Sociology as a Strategic Vo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
- Buzanco, Robert. *Masters of War: Military Dissent and Politics in the Vietnam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ampbell, David.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 Carey, Robert G. *The Peace Corps*. New York: Praeger, 1970.
- Challenger, Richard D., and Shaw Livermore Jr. "Challenger, Livermore Recount Corps History." *Daily Princetonian*, January 19, 1962, 3.
- Chambers, William Nisbet. *Political Parties in a New Nati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1776–180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Chapelle, Dickey. "The Fighting Priest of South Vietnam." *Reader's Digest*, July 1963, 194–200.
- Chenery, Hollis.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 (September 1966): 679–729.
- Chomsky, Noam.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undari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 . *Rethinking Camelot: JFK, the Vietnam War, and U.S. Political Cultur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3.
- Clifford, James. "On Orientalism." I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edited by James Clifford, 255–7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Cmiel, Kenneth. "Destiny and Amnesia: The Vision of Modernity in Robert Wiebe's *The Search for Order*."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21 (June 1993): 352–68.
- Cobbs, Elizabeth A. "Decolonization, the Cold War,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ace Corps." *Diplomatic History* 20 (Winter 1996): 79–105.
- Cobbs Hoffman, Elizabeth. *All You Need Is Love: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Spirit of the 1960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Cockcroft, James D., Dale I. Johnson, and André Gunder Frank. *Dependence and Under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s Political Econom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2.
- Cohen, Warren I. *America in the Age of Soviet Power, 194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Corpsmen in Ghana." *Time*, November 17, 1961, 20–21.
- Cowan, Paul. *The Making of an Un-American: A Dialogue with Experience*. New York: Viking, 1967.
- Cullather, Nick. *Illusions of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ited States–Philippines Relations, 1942–196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Dahl, Gudrun, and Anders Hjørt. "Development as Message and Meaning." *Ethnos* 49, no. 3 (1984): 165–85.

- Dale, W. B., and D. C. Fulton. "On Statesmanship." *Saturday Review*, November 4, 1961, 52.
- Davis, Watson. "Peace Corps Volunteer an American Image." *Science Newsletter*, March 16, 1963, 165.
- Dean, Robert D. "Masculinity as Ideology. John F. Kennedy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History* 22 (Winter 1998): 29–62.
- Decter, Midge. "Kennedyism." *Commentary* 49 (January 1970): 19–27.
- de Oliveira Campos, Roberto. *Reflections on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7.
- Deutsch, Karl.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September 1961): 493–514.
- Diamond, Sigmund.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45–195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Dirks, Nicholas. Introduction to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edited by Nicholas Dirks, 1–2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 Donnell, John C., and Gerald C. Hickey. *The Vietnamese "Strategic Hamlets": A Preliminary Report*.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62. Memorandum RM-3208-ARPA.
- Donovan, R. J. "Peace Corps to Hire State Dept.'s Foremost Critic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April 28, 1962, 2.
- Dosal, Paul J. "Accelerating 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Revolution: Nicaragua and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Inter-American Economic Affairs* 38 (Spring 1985): 75–96.
- Dow, Maynard Weston.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Boulder, Colo.: Pruett Press, 1965.
- Dreier, John C.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 Drinnon, Richard. *Facing West: The Metaphysics of Indian-Hating and Empire-Build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 Duiker, William J.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 . *Sacred War.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a Divided Vietna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 Eisenstadt, S. N.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6.
- . "Social Change,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June 1964): 375–86.
- . "Studies of Modernization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History and Theory* 13, no. 3 (1974): 225–52.
- , ed.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Modernization: A Comparative View*.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 Ernst, John. *Forging a Fateful Allianc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 Vietnam War*.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Escobar, Arturo. "Discourse and Power in Development: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Relevance of His Work to the Third World." *Alternatives* 10 (Winter 1984-85): 377-400.
- .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Power and Visibi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In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Third World." *Cultural Anthropology* 3, no. 4 (1988): 428-43.
- .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in Colombia in the Early Post-World War II Period*. Berkeley: Stanford-Berkeley Joint Studies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988.
- "Evangelist for Progress." *Newsweek*, February 19, 1962, 54-55.
- Fall, Bernard. *Hell in a Very Small Place. The Siege of Dien Bien Phu*.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6.
- . *The Two Viet-Nams: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alysis*. New York: Praeger, 1963.
- Ferguson, James.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Fischer, Fritz. *Making Them Like Us: Peace Corps Volunteers in the 1960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8.
- Fishel, Wesley R. "Problems of Democratic Growth in Free Vietnam." In *Problems of Freedom: South Vietnam since Independence*, edited by Wesley R. Fishel, 9-28.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 Fisher, Donald. *Funda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s: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 FitzGerald, Frances. *Fire in the Lake: The Vietnamese and the Americans in Vietnam*. New York: Vintage, 1972.
- Foner, Eric.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For 'Alianza' a Warning." *Life*, March 16, 1962, 4.
-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979.
- .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8.
- .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1973.
- Frank, André Gunder.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Essays on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and the Immediate Ene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 Frankel, Max. "U.S. Giving Saigon New Economic Aid in Fight on Red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1962, 1-2.
- "Fresh Breeze from the South." *Life*, August 25, 1961, 46.
- Fried, Richard M. *Nightmare in Red: The McCarthy-Era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 Gaddis, John Lew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al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 —, "A Positive Approach to Economic Aid." *Foreign Affairs* 39 (April 1961): 444–57.
- Galeano, Eduardo.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 Galula, David.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1964.
- Gardner, Lloyd C. *Approaching Vietnam: From World War II through Dienbienphu*. New York: Norton, 1988.
- —. *Pay Any Price: Lyndon Johnson and the Wars for Vietnam*. Chicago: Ivan R. Dee, 1995.
- Gardner, Richard. *New Directions in U.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1959.
- Geertz, Clifford.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193–233.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Geiger, Roger L. *Research and Relevant Knowledg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Gendzier, Irene L.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5.
- —. "Play It Again Sam: The Practice and Apology of Development." In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edited by Christopher Simpson, 57–95.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 Gerschenkron, Alexander.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Gibbons, William Conrad.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Part II, 1961–196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Gibson, James William. *The Perfect War: Technowar in Vietnam*. Bosto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6.
- Giddens, Anthony.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January 1976): 703–79.
- Giglio, James N. *The Presidency of John F. Kenned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 Gilderhus, Mark J. "An Emerging Synthesis?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merica in the Worl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1*, edited by Michael J. Hogan, 424–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Gleijeses, Piero. *Shattered Hope: The Guatemalan Revol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4–195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Goldstein, Judith, and Robert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Goodman, Paul. *Growing Up Absurd: Problems of Youth in the Organized Syst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 Gordon, Lincoln. "The Alliance at Birth: Hopes and Fears." In *The Alliance for*

- Progress: A Retrospective*, edited by L. Ronald Scheman, 73–79. New York: Praeger, 1988.
- . *A New Deal for Latin America: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Gramer, Regina U. "On Poststructuralisms, Revisionisms, and Cold Wars." *Diplomatic History* 19 (Summer 1995): 515–24.
- Gross, Leonard. "Has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a Chance?" *Look*, August 28, 1962, 80.
- Gruening, Ernest. "Why the Alianza May Fail." *New Republic*, March 30, 1963, 11.
- Gusfield, Joseph R.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Misplaced Polar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2 (January 1967): 351–62.
- Halberstam, David.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 . *The Making of a Quagmire: America and Vietnam during the Kennedy Era*. Rev.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8.
- Hammer, Elizabeth. *A Death in November: America in Vietnam, 196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Hanson, Simon G. *Dollar Diplomacy Modern Style: Chapters in the Failure of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Washington: Inter-American Affairs Press, 1970.
- Harrison, James P. *The Endless War: Vietnam'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Hartz, Louis.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54.
- Hearden, Patrick J. *The Tragedy of Vietna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 Hein, Laura E. "Free Floating Anxieties on the Pacific: Japan and the West Revisited." *Diplomatic History* 20 (Summer 1996): 411–37.
- "Help on the Way." *Time*, September 27, 1961, 46.
- Herman, Ellen. *The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Exper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Herring, George C.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2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6.
- Hill, Polly. *Development Economics on Trial: The Anthropological Case for the Prosec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Hilsman, Roger. "Internal War: The New Communist Tactic." In *Modern Guerrilla Warfare: Fighting Communist Guerrilla Movements, 1941–1961*, edited by Franklin Mark Osanka, 452–63.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 . *To Move a Nation: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ohn F. Kenned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 Hirschman, Albert O. "A Dissenter's Confession: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sited." In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edited by Gerald M. Meier and Dudley Seers, 87–11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Essays in Trespassing: Economics to Politics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Sir W. Arthur Lewis*, edited by Mark Gersovitz, Carlos E. Díaz Alejandro, Gustav Ranis, and Mark R. Rosenzweig, 372–90.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2.

- . "The Search for Paradigms as a Hindrance to Understanding." In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Second Look*, edited by Paul Rabinow and William M. Sullivan, 177–9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 "Second Thoughts on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Reporter*, May 25, 1961, 20–23.
- Hobsbawm, Eric.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ited by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Hogan, Michael J. "Corporatism." In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edited by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226–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195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Holbik, Karel.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 Hamburg: Verlag Weltarchiv, 1968.
- Hollinger, David A. "Free Enterprise and Free Inquiry: The Emergence of Laissez-faire Communitarianism in the Ideology of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Literary History* 21 (Autumn 1990): 897–919.
- . "How Wide the Circle of the 'W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 (April 1993): 317–37.
- Hont, Istvan, and Michael Ignatieff. "Needs and Justice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 Introductory Essay." In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ited by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1–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Hoover, Herbert. *The Vital Need for Greater Financial Support of Pure Science Research*. New York: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25.
- Horesh, Edward. "Labelling and the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6 (July 1985): 503–14.
- Horsman, Reginald.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S. Congres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2*. 87th Cong., 2d ses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 . *Regional and Other Documents Concerning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
- "How Much Progress in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October 20, 1962, 42–44.
- Humphrey, Hubert. "American Civilians Who Are Fighting the Shirtsleeves War in Vietnam." *Civil Service Journal*, June 1966, 2–3, 6–9.
- Hunt, Michael H.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The Long Crisis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Diplomatic History* 16 (Winter 1992): 115–40.
- . *Lyndon Johnson's War: America's Cold War Crusade in Vietnam, 1945–1968*.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Bases of Accommodation." *Foreign Affairs* 64 (July 1968): 642-56.
- .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3 (April 1971): 283-322.
- .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17 (April 1965): 386-430.
- Huppert, G. Harry. "Bullets Alone Won't Win." *Infantry*, August 1964, 38-42.
- Immerman, Richard H. *The CIA in Guatemala: 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 Inkeles, Alex. "The Modernization of Man." In *Moder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Growth*, edited by Myron Weiner, 138-5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 Inkeles, Alex, and David H. Smith.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Iriye, Akira.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7 (June 1990), 99-107.
- . "Culture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3 (Spring 1979): 115-28.
- "Is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Progressing?" *Christian Century*, March 28, 1962, 380.
- Jacobs, Frankie W. "Peace Corps Trainees Do Field Work at California Housing Project." *Journal of Housing* 1, no. 1 (1965): 41-42.
- Johnson, John J., ed.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 Johnson, Lyndon B.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1963-196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5-69.
- Jones, Kirby. "The Peace Corps Volunteer in the Fiel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65 (May 1966): 63-71.
- Kahin, George McT. *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6.
- Kahin, George McT., Guy J. Pauker, and Lucian W. Py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Non-Western Count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9 (December 1955): 1022-41.
- Kaplan, Amy. "Domesticating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History* 18 (Winter 1994): 97-106.
- . "'Left Alone with America': The Absence of Empire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Culture." In *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 edited by Amy Kaplan and Donald Pease, 3-21.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Karney, Rex. "Peace Corps a Farce, Says Editor of Illinois Newspaper." *Peace Corps Volunteer*, February 1962, 2.
- Karnow, Stanley. "The Edge of Chaos." *Saturday Evening Post*, September 28, 1963, 27-36.
- Katz, Barry M. *Foreign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1942-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Katz, Michael B. *In the Shadow of the Poorhouse: A Social History of Welfare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 . *The Undeserving Poor: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Welfare*. New York: Pantheon, 1989.
- Katznelson, Ira. "The Subtl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Emergency: Political Science as Liberal Guardianship." In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edited by Andre Schaffrin, 233-58. New York: New Press, 1997.
- Keller, Evelyn Fox. "The Paradox of Scientific Subjectivity." *Annals of Scholarship* 9, nos. 1-2 (1992): 135-53.
- Kennan, George F.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 .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 Kennedy, John F.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196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64.
- Kiernan, V. G. *Imperial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Killian, James R., Jr. *The Education of a College President*.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 Kleinman, Daniel Lee. *Politics on the Endless Frontier: Postwar Research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Kleinman, Daniel Lee, and Mark Solovey. "Hot Science/Cold War: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Radical History Review* 63 (Fall 1995): 110-39.
- Kolko, Gabriel. *Anatomy of a War: Vietn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York: Pantheon, 1985.
- . *Confronting the Third Worl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80*. New York: Pantheon, 1988.
- . *The Roo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 Analysis of Power and Purpos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 Kuhn, Thoma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Kunz, Diane. *Butter and Guns: America's Cold War Economic Diploma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 . "The Power of Money: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Economic Diplomacy." In *America in the Worl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1*, edited by Michael J. Hogan, 536-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ed. *The Diplomacy of the Crucial Decad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1960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 LaFeber, Walter. "The Alliances in Retrospect." In *Bordering on Trouble: Resource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edited by Andrew Maguire and Janet Welsh Brown, 337-88. Bethesda, Md.: Adler and Adler, 1986.
- .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90*.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91.
- . *The American Age: U.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2d ed. New York: Norton, 1994.

- — —. *Inevitable Revol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1984.
- — —.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189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 Landis, Mark. *Joseph McCarthy: The Politics of Chaos*.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Lansdale, Edward G. "The Report the President Wanted Published."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20, 1961, 31, 69–70.
- Larsen, Otto N. *Milestones and Millstones: Social Science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45–1991*.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2.
- Lasch, Christopher. *The World of Nations: Reflections on American History,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3.
- Lauer, Robert H. "The Scientific Legitimation of Fallacy: Neutralizing Social Change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October 1971): 881–89.
- Leaf, Murray J. *Man, Mind,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 Lederer, William J., and Eugene Burdick. *The Ugly American*. New York: Norton, 1958.
- Leffler, Melvyn P. "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194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April 1984): 346–81.
- — —.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 —. *The Specter of Commun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17–1953*.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 Lens, Sidney. "The Only Hope." *Progressive* 28 (November 1964): 22–27.
- Lerner, Daniel.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 Lerner, Daniel, and Richard D. Robinson. "Swords and Ploughshares: The Turkish Army as a Modernizing Force." In *The Military and Modernization*, edited by Henry Bienen, 117–48. Chicago: Aldine-Atherton, 1971.
- Leslie, Stuart W. *The Cold War and American Science: The 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 at MIT and Stan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evinson, Jerome, and Juan de Onís. *The Alliance That Lost Its Wa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0.
- Levy, Marion J., Jr. "Armed Force Organizations." In *The Military and Modernization*, edited by Henry Bienen, 41–78. Chicago: Aldine-Atherton, 1971.
- — —. *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Lewis, Bernar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2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Lewis, W. Arth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22 (May 1954): 139–91.

- Lewontin, R. C. "The Cold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cademy." In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edited by Andre Schiffrin, 1-34.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 Leyden, John. "British Scientist Salutes Tanganyika Project." *Peace Corps Volunteer*, November 1962, 2.
- Leys, Colin. "Conflict and Convergence in Development Theory." In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edited by Wolfgang J.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315-24.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
- Lichtenstein, Nelson, ed. *Political Profiles: The Kennedy Year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76.
- Lindblom, Charles E. "A New Look at Latin America." *Atlantic*, October 1962, 81-86.
- Lipset, Seymour Martin.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 Lipsitz, George. *Class and Culture in Cold War America: "A Rainbow at Midnight."* New York: Praeger, 1981.
- Little, Ian M. 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 Lodge, George C. *The Case for the Generalist in Rur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Peace Corps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1969.
- Love, Joseph L. "Raúl Prebisc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octrine of Unequal Exchang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5, no. 3 (1980): 45-72.
- Lowther, Kevin, and C. Payne Lucas. *Keeping Kennedy's Promise: The Peace Corps—Unmet Hope of the New Fronti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8.
- Lumsdaine, David Halloran. *Moral Vision and Its Politics: The Foreign Aid Regime, 1949-198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ynd, Robert S. *Knowledge for What?: The Place of Social Science in American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
- Mackenthun, Gesa. "State of the Art: Adding Empire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0 (August 1996): 263-69.
- Madison, Mary. "S.R.I. Aide Offers Plan to Beat Viet Nam Reds." *Daily Palo Alto Times*, August 7, 1961, 3.
- Mann, Thomas.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 Relevance for Latin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47 (November 19, 1962): 772-75.
- Mannheim, Karl.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8.
- Martin, Robert P. "Latest Report from the Front in Vietnam."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pril 9, 1962, 60-62.
- Mason, Edward S.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sia*. Claremont, Calif.: Claremont College, 1955.
- May, Elaine Tyler.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 .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Culture and Gender in Diplomatic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18 (Winter 1994): 71-78.
- May, Ernest R. *American Imperialism: A Speculative Essay*. New York: Atheneum, 1968.

- May, Gary. "Passing the Torch and Lighting Fires: The Peace Corps." I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1963*, edited by Thomas G. Paterson, 284-31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May, Herbert K.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New York: Praeger, 1968.
- Mazrui, Ali A. "From Social Darwinism to Current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A Tradition in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21 (October 1968): 69-83.
- Megill, Allan. "Introduction: Four Senses of Objectivity." *Annals of Scholarship* 8, nos. 3-4 (1991): 301-20.
- Meier, Gerald M. "The Formative Period." In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edited by Gerald M. Meier and Dudley Seers, 1-2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McMami, Albert.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London: Earthscan, 1990.
- Merk, Frederick. *Manifest Destiny and Mis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A Reinterpretation*. New York: Vintage, 1966.
- Merrill, Dennis. *Bread and the Ballo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s Economic Development, 1947-196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the Third World."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considered, 1890-1993*, edited by Gordon Martel, 166-86. London: Routledge, 1994.
- "Mexico: No Aid for the Competent." *New Republic*, November 2, 1963, 9.
- Miller, Stuart Creighton. *"Benevolent Assimilation": The American Conquest of the Philippines, 1899-190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Millikan, Max F., and W. W. Rostow. "Notes o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edited by Christopher Simpson, 39-55.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 . *A Proposal: Key to an Effectiv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7.
- Millikan, Max F., and Donald L. M. Blackmer, eds. *The Emerging Nations: Their Growth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1961.
- Mills, C. Wright.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Mitchell, Timothy. *Colonising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Montgomery, David. "Prosperity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Bomb." In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edited by Andre Schiffrin, xi-xxxvii.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 Morgenthau, Hans J.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1.
- .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June 1962): 301-9.
- Morse, Wayne, and Bourke B. Hickenlooper. *Report of the Second Punta del Este Conference, January 22-31, 1962*.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 Mothner, Ira. "The Peace Corps: Revolutions without Blood." *Look*, June 14, 1966, 40.
- Myrdal, Gunnar.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Cairo: National Bank of Egypt, 1956.

- Nagel, Thomas. *The View from Now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Najita, Tetsuo. "Presidential Address: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 (November 1993): 845-53.
- "Nation Mending at Home." *Time*, June 21, 1970, 21.
- Needell, Allan A. "Truth Is Our Weapon": Project EROD, Political Warfare, and Government-Academic Relations in the National-Security State." *Diplomatic History* 17 (Summer 1993): 399-420.
- Nehemkis, Peter. *Latin America, Myth and Realit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4.
- Nelkin, Dorothy. *The University and Military Research: Moral Politics at MI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 Ng, Franklin. "Knowledge for Empire: Academic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Service of Imperialism." In *On Cultural Ground: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edited by Robert David Johnson, 123-46. Chicago: Imprint, 1994.
- Nighswonger, William A. *Rural Pacification in Vietnam*. New York: Praeger, 1966.
- Ninkovich, Frank. "Culture, Power, and Civilization: The Place of Cultur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On Cultural Ground: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edited by Robert David Johnson, 1-22. Chicago: Imprint, 1994.
- . "Interests and Discourse in Diplomatic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13 (Spring 1989): 135-61.
- . *Modernity and Power: 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Nisbet, Robert A. "Ethnocentrism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Essays on Modernization of Underdeveloped Societies*, edited by A. R. Desai, 195-114. Bombay: Thacker, 1971.
- .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Aspects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Nolting, Frederick. *From Trust to Tragedy: The Political Mentions of Frederick Nolting, Kennedy's Ambassador to Diem's Vietnam*. New York: Praeger, 1988.
- Nye, John V. C. "An Interview with W. W. Rostow." *Newsletter of the Cliometric Society* 9 (July 1994): 3-8, 26-32.
- Nystrom, J. Warren, and Nathan A. Haverstock.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Key to Latin America's Development*.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Co., 1966.
- O'Connell, James.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64 (Autumn 1965): 549-64.
- O'Donnell, John B. "The Strategic Hamlet Program in Kien Hoa Province, South Vietnam: A Case Study of Counter-Insurgency." In *Southeast Asian Tribes, Minorities, and Nations*, edited by Peter Kunstadter, 2703-4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 Olson, James S., and Randy Roberts. *Where the Domino Fell: America and Vietnam, 1945 to 199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 Omvedt, Gail. "Modernization Theories: The Ideology of Empire." In *Essays on Modernization of Underdeveloped Societies*, edited by A. R. Desai, 1:119-38. Bombay: Thacker, 1971.
- Packenham, Robert A. *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deas in Foreign Aid and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Parsons, Talcott. "Democrac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Pre-Nazi Germany." In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Talcott Parsons, 104–23.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 . "Evolutionary Universals in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June 1964): 339–57.
- . "Social Science: A Basic National Resource." I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Samuel Z. Klausner and Victor M. Lidz, 41–112.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 .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 .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6.
- .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 Parsons, Talcott, and Edward Shils.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Paterson, Thomas G. "Bearing the Burden: A Critical Look at JFK's Foreign Policy."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54 (Spring 1978): 196–201.
- . *Contesting Castr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iumph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Fixation with Cuba: The Bay of Pigs, Missile Crisis, and Covert War against Castro." I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1963*, edited by Thomas G. Paterson, 123–5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Introduction: John F.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nd Global Crisis." I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1963*, edited by Thomas G. Paterson, 3–2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ed.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196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aterson, Thomas G., and Stephen G. Rabe, eds. *Imperial Surge: The United States Abroad: The 1890s–Early 1900s*. Lexington, Mass.: Heath, 1992.
- Peace Corps. *Annual Report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66.
- . "Colombia: Acción Comunal." *Peace Corps Volunteer*, November 1962, 8–9.
- . "I Learned More in Ten Months with Volunteer Than I Have Learned in Thirty Years, Co-Worker." *Peace Corps Volunteer*, April 1963, 4.
- . "Journey to a Reservation." *Peace Corps News*, March 1962, 1, 7.
- . *The Peace Corps Fact Book*.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 . *The Peace Corps Reader*.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 . "Peace Corps Trainees Work, Study in New York Slums." *Peace Corps Volunteer*, November 1962, 1, 3.
- . "Tubman Sees Object Lesson in Peace Corps." *Peace Corps Volunteer*, May 1963, 5.
- . "The Volunteer Image." *Peace Corps Volunteer*, February 1963, 4.
- . *What Can I Do in the Peace Corp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n.d.

- . *Who's Working Where: A Catalogue of Peace Corps Volunteer Skill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 "Peace Corps in Training." *Economist*, July 22, 1961, 334.
- "The Peace Corps Starts."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61, 26.
- Pearce, R. Michael. *Evolution of a Vietnamese Village—Part II: The Past, August 1945 to April 1964*.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66. Memorandum RM-4692-ARPA.
- Perkins, Bradford.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Twenty-five Years After."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2 (March 1984): 1–18.
- Perloff, Harvey S. *Alliance for Progress: A Social Invention in the Mak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9.
- Popkin, Samuel L.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Porter, Theodore M.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oster, Mark. "Foucault and History." *Social Research* 49 (Spring 1982): 116–42.
- Potter, David M. *People of Plenty: Economic Abundance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 Prakash, Gyan. "Writing Post-Orientalist Histories of the Third World." In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edited by Nicholas B. Dirks, 353–88.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 Price, Don K. *The Scientific E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Progreso, Sí." *Time*, March 24, 1961, 29.
- "A Progress Report on the Alliance." *Morgan Guaranty Survey*, February 1963, 10.
- Pursell, Carroll. "Science Agencies in World War II: The OSRD and Its Challengers." In *The Sciences in the American Context: New Perspectives*, edited by Nathan Reingold, 359–78.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79.
- Pye, Lucian W. "Armies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dited by John J. Johnson, 69–8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 .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 .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Items* 13 (September 1959): 25–28.
- .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g: 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 , ed.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 "Quasi Stagnation." *Newsweek*, October 15, 1962, 44.
- Rabe, Stephen G. "Controlling Revolutions: Latin America,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and Cold War Anti Communism." I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1963*, edited by Thomas G. Paterson, 105–2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The Foreign Policy of Anticommu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 Rabinow, Paul,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1984.
- Race, Jeffrey. *War Comes to Long An: Revolutionary Conflict in a Vietnamese Provi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 Rafael, Vicente L. "White Love: Surveillance and Nationalist Resistance in the U.S. Colo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In *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 edited by Amy Kaplan and Donald Pease, 185–218.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Randle, Robert F. *Geneva 1954: The Settlement of the Indochinese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 Redmon, Coates. *Come As You Are: The Peace Corps Story*.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 "Report on the Peace Corps." *Time*, December 29, 1961, 10–11.
- Reuss, Henry S. "A Point Four Youth Corps." *Commonweal*, May 5, 1960, 146–48.
- Rice, Gerard T. *The Bold Experiment: JFK's Peace Corps*.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5.
- . *Twenty Years of the Peace Corp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 Ridinger, Robert B. Marks. *The Peace Corp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Boston: G. K. Hall and Co., 1989.
- Riesman, David, with Nathan Glazier and Reuel Denney.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Abridge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Ritzer, George.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4th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6.
- Robinson, Archie W. "Now the U.S. Is Exporting Union Ideas to Latin America."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May 20, 1963, 86, 88–89.
- Rocher, Guy. *Talcott Parsons and American Sociology*.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75.
- Rodney, Walter.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Rogers, William D. *The Twilight Struggle: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 Rogin, Michael. *Fathers and Children: Andrew Jackson and the Subjugation of the American India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 Rosaldo, Renato.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 Rosenberg, Emily S. "Presidential Address: Revisiting Dollar Diplomacy, Narratives of Money and Manliness." *Diplomatic History* 22 (Winter 1998), 155–76.
- .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 1890–1945*.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 Rosenstein-Rodan, P. N. "International Aid fo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3 (May 1961), 107–38.
- . "Natura Facit Saltum: Analysis of the Disequilibrium Growth Process." In

-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edited by Gerald M. Meier and Dudley Seers, 207–2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Rosenthal, Michael. *The Character Factory: Baden-Powell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oy Scout Movement*. New York: Pantheon, 1984.
- Rosenzweig, Robert M. *The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ir Patr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 Ross, Dorothy. "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June 1995): 651–77.
- .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October 1984): 909–28.
- . "Modernism Reconsidered." In *Modernist Impulses in the Human Sciences, 1870–1930*, edited by Dorothy Ross, 1–2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Modernist Social Science in the Land of the New/Old." In *Modernist Impulses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ited by Dorothy Ross, 171–89.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ostow, W. W. "American Strategy on the World Scen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46 (April 16, 1962): 628.
- . "Countering Guerrilla Attack." In *Modern Guerrilla Warfare: Fighting Communist Guerrilla Movements, 1941–1961*, edited by Franklin Mark Osanka, 464–71.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 .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rshallian Long Period." In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edited by Gerald M. Meier and Dudley Seers, 229–6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The Diffusion of Power: An Essay in Recent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 . *Eisenhower, Kennedy, and Foreign Ai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 . *The Great Transition: Task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ost War Generations*. Cambridge, England: Leeds University Press, 1967.
- .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 . *Theorists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The Two Major Communist Offensiv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 . *View from the Seventh Floo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 Rotter, Andrew J. *The Path to Vietnam: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South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Rusk, Dean. "The Allianc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Affairs." In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edited by Jim Dreier, 102–17.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 . "America's Destiny in the Building of a World Community."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46 (December 10, 1962): 898–99.

- . *As I Saw It*. New York: Norton, 1990.
- . "Secretary Rusk's News Conference of February 6."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44 (February 27, 1961): 298.
- . "The Stake in Vietnam."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48 (May 13, 1964): 729–30.
- Rust, William J. *Kennedy in Vietna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5.
- Sablins, Marshall.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 .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9.
- Sapolsky, Harvey M. "Academic Science and the Military: The Year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he Sciences in the American Context: New Perspectives*, edited by Nathan Reingold, 379–99.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79.
- Savage, Stephen P. *The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Ac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1.
- Schanche, Don. "Father Hoa's Little War." *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ruary 17, 1962, 74–79.
-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Myth and Reality." In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A Retrospective*, edited by L. Ronald Scheman, 67–72. New York: Praeger, 1988.
- . *The Politics of Hop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4.
- .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 . *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9.
- Schlesinger, Stephen C., and Stephen Kinzer. *Bitter Fruit: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merican Coup in Guatemal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2.
- Schoultz, Lars. *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y of U.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chrecker, Ellen W. *No Ivory Tower: McCarthyism and the Universi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Schulzinger, Robert D. *A Time for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41–197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chwabe, Klaus. "The Global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mperial Consequences, 1898–1973." In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edited by Wolfgang I.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13–33.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
- Schwartz, Harry. "Review of *The Stages of Growth*."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6, 1960, 6.
- Schwartz, Karen.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An Oral History of the Peace Corps*. New York: Morrow, 1991.
- Scigliano, Robert, and Guy H. Fox.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Vietnam: Th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xperience*. New York: Praeger, 1965.
-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eers, Dudley. "The Birth, Ebb, and Death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0 (October 1979): 707–19.
- Senate, U.S. Congress,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Nomination of R. Sargent*

- Shriver, Jr. *to Be Director of the Peace Corps*. 87th Cong., 1st ses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 . *Vietnam and Southeast Asia: Report of Senators Mike Mansfield, J. Caleb Boggs, Claiborne Pell, Benjamin A. Smith*. 88th Cong., 1st ses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 Senate. U.S. Congress. Subcommittee on Public Buildings and Grounds. *The Pentagon Papers, Senator Gravel Edition.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 4 vols. Boston: Beacon, 1971.
- Sevareid, Eric. "Writer Says Time Is Right to Evaluate Peace Corps." *Peace Corps Volunteer*, February 1963, 2.
- Shaler, D. Michael. *Deadly Paradigms: The Failure of U.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herry, Michael S. *In the Shadow of War: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93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hils, Edward. Introduction to *Criteria for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ublic Policy and National Goals: A Selection of Articles from Minerva*, edited by Edward Shils, v-xiv. Cambridge: MIT Press, 1968.
- .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tates." In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dited by John J. Johnson, 7-6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 .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ew States." In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frica and Asia*, edited by Clifford Geertz, 1-26.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 . *The Present State of American Sociolog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48.
- Shriver, R. Sargent, Jr. "Ambassadors of Goodwill: The Peace Corps." *National Geographic* 126 (September 1964): 298-313.
- . "Five Years with the Peace Corps." In *The Peace Corps Reader*, edited by the Peace Corps, 18-2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 . *Point of the La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 . "Two Years of the Peace Corps." *Foreign Affairs* 41 (July 1963): 694-707.
- Simpson, Christopher. "Universities, Empi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edited by Christopher Simpson, xi-xxxiv.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 ,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 Skidmore, Thomas F., and Peter H. 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Slotkin, Richard. *Gunfighter Nation: The Myth of the Frontier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Atheneum, 1992.
-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 Smith, Anthony D. *The Concept of Social Change: A Critique of the Functionalist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3.

- Smith, Gaddis. *The Last Years of the Monroe Doctrine, 1945–1993*.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 Smith, R. B.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 1, *Revolution versus Containment, 1955–61*. London: Macmillan, 1983.
- .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 2, *The Kennedy Strate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 Smith, Tony.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56–1957*. New York: SSRC, 1957.
- . *Annual Report, 1957–1958*. New York: SSRC, 1958.
- Solovey, Mark. "The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Identity and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1945–197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1996.
- Sorenson, Theodore, ed. *"Let the World Go Forth": The Statements,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John F. Kennedy, 1947–1963*. New York: Dell, 1988.
- "South Vietnam: New Strategy." *Newsweek*, April, 9, 1962, 46.
- "South Viet Nam: Miracle at Hoaimy." *Time*, May 1, 1964, 26.
- "South Viet Nam: What the People Say." *Time*, February 2, 1962, 26.
- Spencer, Herbert. *First Principles*. New York: H. M. Caldwell, 1900.
- Spengler, J. J.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Precondition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olitics* 22 (August 1960): 387–416.
- Sprinker, Michael, ed. *Edward Said: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 Staley, Eugene. *The Future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54.
-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 "FSI Begins Seminars on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 Defens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47 (July 2, 1962): 41–42.
- Stephanson, Anders. "Considerations on Culture and Theory." *Diplomatic History* 18 (Winter 1994): 107–120.
- . "Ideology and Neorealist Mirrors." *Diplomatic History* 17 (Spring 1993): 285–95.
- . *Kenan and the Art of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5.
- Stocking, George W., Jr.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 .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 Stoler, Ann Laura. "Rethinking Colonial Categories: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Rule." In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edited by Nicholas B. Dirks, 319–5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 Sutton, Francis X. "Development Ideology: Its Emergence and Decline." *Daedalus* 118 (Winter 1989): 35–58.
- Zulic, Tad. "Selling a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17, 1961, 10.

- Lanham, George K. *War without Guns: American Civilians in Rural Vietnam*. New York: Praeger, 1966.
- Thompson, Robert G. K. *Defeating Communist Insurgency: Experiences from Malaya and Vietna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6.
- Tilman, Seth. *The Peace Corps: From Enthusiasm to Disciplined Idealism*. Washington, D.C.: Peace Corps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1969.
- Tipps, Dean C.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i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5 (March 1973): 199–226.
- Toews, John F.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 (October 1987): 879–907.
- Tönnies, Ferdinand. *Community and Society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ranslated by Charles P. Loomi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7.
- Toyne, John.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n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olic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 Toyne, Arnold J. "America's New Lay Army." In *The Peace Corps Reader*, edited by the Peace Corps, 10–1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 "Troubled Alliance." *Time*, October 10, 1962, 22.
- "Troubles and Remedies." *Time*, May 3, 1963, 26.
- Truong Nhu Lang. *A Viet Cong Memoir*. New York: Vintage, 1985.
- Trussell, C. P. "Peace Corps Rise Is Voted by Hous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1962, 1.
- Tulchin, Joseph S.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in the 1960s."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30 (Spring 1988): 1–36.
- Turner, Bryan S. "Parsons and His Critics: On the Ubiquity of Functionalism." In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Robert J. Holton and Bryan S. Turner, 181–206.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In *Annual Report for 1893*, edited b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9–22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94.
- Walker, William O., III. "Mixing the Sweet with the Sour: Kennedy, Johnson, and Latin America." In *The Diplomacy of the Crucial Decade: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1960s*, edited by Diane B. Kunz, 42–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Wallerstein, Immanuel. "Modernization: Requiescat in Pace."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132–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Mass.: Polity Press, 1991.
- Walterhouse, Harry F. *A Time to Build, Military Civic Action: Medium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for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64.
- Walters, Ronald G. "Signs of the Times: Clifford Geertz and the Historians." *Social Research* 47 (Autumn 1980): 537–56.
- "The War." *Time*, February 18, 1966, 19–21.

- Ward, Robert, ed. *Studying Politics Abroad: Field Research in the Developing Area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4.
- Waring, Stephen P. "Cold Calculus: The Cold War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Radical History Review* 63 (Fall 1995): 28–51.
-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Weinberg, Albert K.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3.
- Werner, Myron, ed. *Moder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Growt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 Wetzel, Charles L. "The Peace Corps in Our Pas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05 (May 1966): 4–11.
- "Where the Reds May Take Over Next in Latin America."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March 18, 1963, 50.
- Whitaker, C. S., Jr. "A Dysrhythmic Process of Political Change." *World Politics* 19 (January 1967): 190–217.
- White, Hayden.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1–2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 Whitfield, Stephen J. *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White, William H., Jr.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6.
- Warda, Howard J.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History, Politics, and U.S. Policy*.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90.
- . "Misreading Latin America—Again." *Foreign Policy* 65 (Winter 1986–87): 143–53.
- Wiegman, Nancy. *Vietnam, Peasant Land, Peasant 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 Williams, Walter D.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and the Debate over Philippine Annex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6 (March 1980): 810–31.
- Williams, William Appleman.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An Essay on the Causes and Character of America's Present Predicament along with a Few Thoughts about an Alterna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 "The Frontier Thesi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4, no. 4 (1955): 379–95.
- .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 1959.
- Windmiller, Marshall. *The Peace Corps and Pax Americana*.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70.
- Winks, Robin W. *Clout and Gown: Scholars in the Secret War, 1939–1961*. New York: Morrow, 1987.
- Wolfe, Patrick. "History and Imperialism: A Century of Theory, from Marx to Postcoloni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April 1997): 388–420.
- Wood, Geoff.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Policy Labeling."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6 (July 1985): 347–73.

- Wood, Robert C. "The Future of Modernization." In *Moder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Growth*, edited by Myron Weiner, 40–52.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 "Yanquis Open a New World Series against the Reds." *Life*, August 18, 1961, 40.
- Young, Marilyn. *The Vietnam Wars, 1945–1990*.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 Young, Robert.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1990.
- Zalba, Serapio R. "The Peace Corps—Its Historical Antecedents and Its Meaning for Social Work." *Duquesne Review* (Fall 1966): 125–37.
- Zasloff, Joseph J. *Rural Resettlement in Vietnam: An Agrovilla in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62.
- Zimmerman, Jonathan. "Beyond Double Consciousness: Black Peace Corps Volunteers in Africa, 1961–1971."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2 (December 1995): 999–1028.

附录：注释中使用的缩略词

Abbreviations use in Notes

- AIDC: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for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and Evaluation, Rosslyn, Va. (国际开发署发展情报和评估中心)
- FRU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 HIA: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 JFKL: John F. Kennedy Library, Boston, Mass. (肯尼迪图书馆)
- LBJL: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Austin, Tex. (约翰逊图书馆)
- NSF: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国家安全档案)
- PCL: Peace Corps Library, Washington, D. C. (和平队图书馆)
- POF: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总统办公厅档案)
- Public Papers*: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总统公共文件)